



OUR HONG KONG
FOUNDATION
團結香港基金

迎接時代變遷： 與內地經濟並進



目錄

關於作者	4
報告摘要	6
1. 香港作為細小開放經濟體	15
2. 不同時期香港與內地經濟相互依存的关系	27
3. 經濟增長與中國內地因素	55
4. 香港對外貿易何去何從	59
5. 香港作為資金雙向流動的門戶	81
6. 中國內地移民與人才流入	101
7. 結語	155
附錄：在各個情境下推算的人口結構	158
參考書目及文獻	164



關於作者

廖柏偉教授

廖柏偉教授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研究教授及經濟學榮休教授。廖教授曾任大學副校長、經濟學系系主任、經濟學講座教授及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創所所長。廖教授亦曾為哈佛燕京訪問學人及傑出富布賴特訪問學人。現任東亞經濟學會副會長及香港金融管理局轄下香港金融研究中心董事。

廖柏偉教授為普林斯頓大學學士和史丹福大學碩士及博士。廖教授的研究專長為應用經濟學理論、不確定定理、勞動經濟學、行政人員薪酬、金融市場以及中國和香港經濟。

廖教授熱心服務社會，出任多項公職，現為前任行政長官及政治委任官員離職後工作諮詢委員會主席。廖教授曾任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非執行董事及其轄下薪酬委員會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委員，以及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成員、政治委任制度官員薪津獨立委員會委員，亦曾任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委員及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委員。一九九九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銀紫荊星章，以表揚其“傑出的學術成就及在公共服務方面的卓越表現”。二零零六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

林潔珍教授

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及香港浸信會神學院道學碩士。為香港大學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實用神學(經濟及商業倫理)特約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倫理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及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編輯委員會委員。曾任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教授，哈佛大學及普林斯頓神學院訪問學者，中國神學研究院名譽研究員。公職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存款保障上訴審裁處成員，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金融機構）覆核審裁處委員，前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及香港會計師公會紀律小組成員。

水志偉先生

水志偉先生現為團結香港基金高級研究員，專攻經濟分析及發展和創新科技的研究。此前，他曾於不同機構從事不同的研究工作，包括香港金融管理局，以及於政府統計處出任統計師等。水先生擁有香港中文大學數學榮譽學士學位以及經濟學哲學碩士學位。

報告摘要

香港作為細小開放經濟體

1. 香港、愛爾蘭、以色列、盧森堡、新加坡、瑞典和瑞士都是成功細小經濟體的例子。這七個經濟體的經濟特徵各有不同，但它們的經濟成功可歸因於一些共同因素——它們均是開放經濟體。
2. 細小經濟體要在經濟上取得成功，必須保持經濟開放。雖然規模經濟可降低平均生產成本，但大規模生產要符合經濟效益，必須有充足的最終需求。細小經濟體其內部需求通常不足以支持大規模的國內生產。然而，國外需求便可彌補國內需求的不足。
3. 事實上，不論任何規模的經濟體，經濟開放經濟對其經濟增長均十分重要。中型和大型經濟體同樣須開放予國際貿易和投資，以維持其經濟增長，儘管相對而言，它們比細小經濟體較少依賴經濟開放。
4. 上述七個經濟體說明了幾種細小經濟體可以參照，以保持經濟增長和良好生活水平的經濟模式。香港和新加坡可以沿用現行模式，在貿易、投資和金融服務維持極高的開放性，或參照盧森堡專門發展金融服務業，亦可參考以色列、愛爾蘭和瑞典的策略，建立和發展科技創新產業，又或走上瑞士的道路，同時以金融服務和科技為支柱產業。

5. 然而，不論發展方向如何，香港與中國內地的經濟關係始終不可分割：

- i. 中國內地是香港最大的貿易夥伴，香港貿易行業的表現取決於內地的供應和需求。
- ii. 內地的儲蓄和財富不斷增加，人民幣亦逐步走向國際化，香港可把握當中機遇，進一步發展其金融服務。
- iii. 香港發展創新科技產業，中國內地可以成為香港的腹地，以解決香港土地不足的問題。香港亦可打入內地市場，滿足內地工商業及消費者對創新產品和服務的需求。

6. 展望未來，香港必須繼續向世界開放，以延續其成功及維持競爭優勢。香港人絕不應轉趨保守、排外、以為可以孤立自己而同時發展經濟，因為這將令香港走下坡。

不同時期香港與內地經濟相互依存的關係

7. 中國內地在香港經濟發展的不同層面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i. 中國內地長久以來都是香港進口食品、食水和生活必需品的的主要供應來源。改革開放後，內地佔香港商品出口的比重急速上升到2015年的54%，而大部分香港對內地的出口均為轉口貨品。中國內地同樣是香港服務貿易最大的出口國與進口國。
- ii. 中國內地既是香港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地，亦是香港外來直接投資的重要來源地。中國內地在香港享譽國際的股票市場上擔當重要的角色。2015年香港首次公開招股集資總額當中，內地企業佔最大比重達92%。香港股市的交投亦日漸受在港上市的內地企業主導。從1997年到2015年，內地企業股票的成交金額佔香港股市全年總成交金額的比重由38%升近一倍至73%。此外，人民幣國際化乃中國國家政策。香港正把握此契機，建設成領先的人民幣離岸中心。
- iii. 一直以來，香港的移民主要來自中國內地。內地人才來港，補充香港的人力資本，並使勞動力供應更多元化。

8. 香港在內地不同的發展階段扮演重要角色，對內地走向世界發揮關鍵作用。過往，香港作為中國市場與國際市場之間的橋樑，一直是內地企業「走出去」的踏腳石，亦是外資進入內地的渠道。

9. 不過隨著時代變遷，香港對中國內地整體的重要性自90年代開始逐漸下降。中國迅速發展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港兩地經濟規模的差距日漸擴大。1994年，香港生產總值相當於中國內地的24%，到2015年此比例已降至不足3%。隨着中國晉身全球最大貿易國，香港佔內地對外貿易的比重已大幅減少。香港佔內地商品貿易總額的比重於1992年達到49%的頂峰，其後跌至2015年的12.8%。然而，香港在中國資本帳開放，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並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的過程中的重要性仍不容忽視。

10. 香港應洞悉這些變化，尋找當中機遇並再次與中國內地緊密聯繫，在中國這一輪經濟增長過程中繼續扮演重要的角色。隨着中國踏入經濟發展的新階段，香港應定位為內地緊密的合作夥伴，分享中國內地經濟增長的成果。

經濟增長與中國內地因素

11. 針對供應、需求和特定行業三個角度，本報告提出一套政策。此套政策建基於下列前提，而這些前提乃總結香港過去和當前的成功經驗而得出：

- i. 香港經濟高度開放，要延續成功必須維持開放；轉趨內向孤立將會令經濟不振；
- ii. 香港必須對貿易夥伴、海外投資者和旅客保持熱情友好；
- iii. 香港屬細小經濟體，其經濟盛衰不免受本港最大貿易夥伴及投資者，亦即中國內地所影響；
- iv. 香港必須與內地經濟維繫良好的相互依存關係，一方面分享內地經濟發展的成果，另一方面為內地發展策略提供適切和寶貴的支援，從而使兩地雙贏關係得以持續。

香港對外貿易何去何從

12. 中國經濟轉型，逐漸依賴內需作為經濟增長的動力，並更重視第三產業的發展，預期中國商品出口的增長速度將有所放緩。香港的商品出口十分依賴往返內地的轉口，因此在未來幾年不免會經歷較緩慢增長，與出口相關的行業（如運輸物流）亦將受拖累。

13. 對於香港這細小開放經濟體，達成貿易平衡相當重要。香港已持續地錄得商品貿易赤字。可幸的是，香港亦長久以來錄得服務貿易盈餘，抵消了商品貿易之赤字。自2012年起，香港對內地的服務貿易盈餘上升。香港必須適應這「新常態」，以服務貿

易為重點，促進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

14. 城鎮人口和家庭收入增加將繼續使中國內地對高價值產品和服務的需求急增。香港經濟以服務業為主導，服務業佔本港經濟生產總值高達92.7%。憑藉與中國內地長期的貿易夥伴關係，香港應把握此機遇，為內地提供高價值服務：

i. 高端旅遊

為產生更大經濟效益，並避免為基礎設施帶來太大壓力，香港應著力開拓高增值旅遊服務。除休閒旅遊外，香港有充足條件發展高端旅遊，例如醫療美容旅遊、郵輪旅遊和會議及展覽旅遊。

(a) 醫療旅遊

- 鑑於中國內地的消費能力不斷增長，而且受人口老化和「一孩政策」影響，內地城鎮人口對高質素醫療服務的需求將有增無減。

- 在發展醫療旅遊的過程中，對本地居民使用醫療服務的負面影響應減至最低。醫療設施應同時照顧本地居民和旅客的需要。因此，為外地病者提供的醫療服務最初應集中於有剩餘容量的範疇，例如體檢服務，以及由私人診所和醫院提供的覆診服務。

(b) 美容旅遊

- 中國內地對美容護理服務的需求正在上升。截至2013年的五年期間，中國內地美容護理服務業的年均增長率達到20%。除了傳統以人手進行的面部和身體護理外，科技美容很可能成為香港未來的發展趨勢。消費者傾向視高科技美容儀器（例如超聲波和納米離子）為品質和成效之保證，並願意為此支付更高價格。

(c) 郵輪旅遊

- 中國內地郵輪旅客在2012年至2014年的年均增長率為79%，冠絕亞洲市場。啟德郵輪碼頭大大提高了香港接待郵輪旅客的能力。

- 作為亞洲交通樞紐和亞洲頂級旅遊城市，香港可成為郵輪母港或停泊港。除了短線郵輪外，在「一帶一路」的策略下，郵輪旅遊更可拓展至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

(d) 會議及展覽旅遊

- 隨著中國內地對展覽的需求不斷增長，香港應吸引內地參展商和主辦者來港參與國際展覽。憑藉有利的地理位置，以及「

兩文三語」環境的優勢，香港可作為內地企業走向世界、接觸全球潛在客戶的窗口。

- 然而，在發展為會議及展覽旅遊城市的過程中，香港難免面對來自亞洲其他國家（如新加坡和韓國）的競爭。因此，香港政府應就會議及展覽旅遊制訂長遠發展計劃，例如進一步改善各會展場地附近的商業設施，尤其是亞洲國際博覽館。

ii. 專業服務

香港不但可向內地客戶直接提供專業服務，更可擔當中間人的角色(例如為內地提供諮詢、市場調查、人才招聘、法律支援等服務)，將內地企業與消費者跟全球各地聯繫起來。香港可以為「一帶一路」項目提供仲裁、會計、金融及保險服務。香港亦可協助內地企業提高服務質素，並且為其專業服務提供認可。另外，香港可為內地的CEPA專業服務提供者給予支援。香港政府應鼓勵香港服務提供者將內地部分業務遷移或外判到香港。香港成為後端支援中心，可為本港創造就業機會，使CEPA所帶來的經濟好處能夠惠及更多香港市民。

iii. 電影及視聽服務:

中國內地市場的票房收入一直迅速上升。通過中港合拍片，香港電影人對於內地電影市場的蓬勃可謂功不可沒。我們必須進一步制訂適當的政策，以加強培育本地電影制作人及其他相關專業人士，使他們可以繼續積極參與其中。

iv. 金融服務:

2014年，出口到中國內地的金融服務僅佔香港金融服務輸出總額（不包括非直接計算的金融中介服務）的7%，美國和英國則分別佔31%和21%。由此可見，香港對內地的金融服務輸出仍有相當大的增長空間。

香港作為資金雙向流動的門戶

15. 香港從一個卑微的珠江三角洲港口，為華南的轉口貿易提供資金，以及充當海外華僑給中國家鄉親屬的匯款中介，發展成為當今首屈一指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是一個細小開放經濟體，香港金融服務向全球擴展是預料中事。

16. 香港坐擁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各項獨特優勢。有別於其他內地城市，香港的資本市場完全開放而且不設任何資金進出管制。聯繫匯率制度大大減低市場參與者持有港元的匯率風險。香港利得稅稅率低，亦不徵收資本增值稅及遺產稅，對資產管理界無疑極具吸引力。香港時區比倫敦及紐約分別快7及12小時，讓

本地市場可以於兩地開市前進行交易。香港社會雙語通行，其所奉行的普通法亦是各國際金融市場的主要法律框架。香港是內地與西方國家資金雙向流動的合適門戶。

17. 香港是內地外來直接投資主要來源地，同時也是內地向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地。在為資本的雙向流動門戶，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可以為內地龐大的儲蓄和財富作為中介。基於高儲蓄率 and 持續的貿易順差，中國累積了大量外匯儲備。在2015年，中國更成為資本淨出口國。中國企業和投資者開始運用盈餘於海外尋找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另一方面，海外投資者對投資中國的興趣漸濃，希望能搭上中國這輛經濟高速增長列車。香港應要把握經濟增長機會，從擔當雙向中介及門戶中獲益。

18. 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香港可擔當卓越的人民幣離岸中心。人民幣在國際貿易、投資及儲備方面的使用度日漸提升。2014年，24%內地貿易使用人民幣結算。人民幣的國際支付貨幣排名，以1.9%的使用率位列第五。人民幣已納入特別提款權（SDR）的一籃子貨幣。目前人民幣佔全球外匯儲備約1.9%。未來3至5年間，人民幣在國際儲備貨幣的比重將提升到4%至5%。隨着人民幣逐漸冒起成為主要的國際貨幣，香港的人民幣離岸中心角色，將能把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推向另一高峰。香港的人民幣離岸市場可作為內地開放資本帳及推出人民幣計價投資產品的試點平台。香港必須定位為離岸「超級市場」，為國際投資者提供多元化高流動性的人民幣計價證券。

19. 當中國資本帳完全開放及人民幣可完全自由兌換後，香港的離岸人民幣市場將會面臨新挑戰。不過香港的離岸人民幣中心相較上海的在岸中心，在軟基建方面仍繼續佔優。香港的利得稅率低，又不徵收資本增值稅，專業人士的薪俸稅率亦低，並設有可預測及透明度高的監管制度，以及健全的司法體系和獨立法院，奉行國際金融交易一直沿用的普通法。當人民幣可完全自由兌換時，海外的人民幣存款及以人民幣計價的資產將會迅速膨脹，香港亦能從更大的市場中分一杯羹。倫敦之所以能成為數一數二的國際金融中心，是基於它坐擁最大的離岸歐洲美元市場，並與紐約在岸美元市場競爭。香港亦可借助人民幣躍升成為主要國際貨幣的契機，加上自身與在岸市場相比的獨特優勢，成為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

20. 香港可成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金融樞紐。自2020年起，每年單是亞洲國家對基建投資的資金需求便高達7,500億美元。香港可以同時提供美元及人民幣融資平台，以填補資金缺口。亞投行及絲路基金亦可應要求在港設立分支或財資管理中心，讓他們能透過發行債券，收集在港的美元及人民幣流動資

金。「一帶一路」的項目可以透過發行債券或股票的方式進行融資，有關證券可以在香港市場作第一或第二上市。香港應提供多元的金融工具，以滿足市場對收益及風險分散的需求，例如發展伊斯蘭債券市場。

中國內地移民與人才流入

21. 有控制地輸入移民對香港非常重要，有助提升本港人力資本、改善人口老化及抑制勞動人口下滑。

22. 日本是全亞洲甚至是全球第一的超高齡社會。香港在亞洲是排名第二的高齡社會。今天日本人口稍為回落，比2008年少100萬人。其勞動人口則下跌得更快。日本的人均名義經濟生產總值由2013年開始一直落後於香港。而事實上，由於香港的總和生育率偏低，而且平均預期壽命比日本更高，若非戰後嬰兒潮、80年代前的大規模湧港移民潮以及80年代後內地移民持續流入，香港的人口老化問題可能會跟日本一樣嚴峻。

23. 更重要的是要明白在統計上，移民與他們的下一代整體上能否在社會經濟、教育及文化層面融入香港社會。經濟層面上，2001年後內地移民與本地居民的收入差距正在縮窄。隨着近年內地移民的教育水平有所提升，未來兩者的收入差距將會收窄得更快。

24. 有如其他國家的經驗，第二代移民的教育水平及跨代教育流動性較本地出生的人為高。第一代年輕的成年內地移民雖然教育程度比不上香港本地出生的人士，但他們能利用香港的教育機會超越其父母的教育水平。至於出生於香港的第二代移民在教育程度及跨代教育流動性兩方面都特別成功。

25. 文化層面上，根據2013年「世界價值觀調查」在香港調查的結果，我們發現父母來自內地的人士與父母生於香港的人士在社會、文化、政治及道德上的價值觀皆大致相同。問卷內270條問題中，比較父母在香港出生的人士與父或母其中一方在內地出生的人士的回應，只有在37條問題在統計上有顯著差異。從工作、家庭、生命、子女、道德、信任、文化、宗教及政治議題的看法、觀念及態度來看，內地移民融入香港社會的情況還算不錯。

26. 自1997年以來內地移民的人口結構及社會經濟特徵有明顯的轉變。移民擁有更高的學歷，並更活躍於經濟活動。與1997前的移民相比，他們應更容易融入香港的勞動市場。

27. 內地移民中最多是持單程證來港的人士。在單程證計劃中，兒童所佔比例自1997年起開始下降，相反持單程證與配偶團聚的比例則不斷增加。跨境婚姻的趨勢亦不斷轉變。2014年有80%的跨境婚姻在香港註冊，1997年此比例只有13%。其中香港新娘嫁予內地新郎的比例亦持續上升，由1997年的14%增加至2015年的27%。與早期的跨境婚姻伴侶相比，近年的跨境婚姻伴侶估計有較大多數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年青專業人士，他們在香港或內地工作或求學時認識對方繼而共諧連理。這個新趨勢為香港累積更多的人力資本，並有助減慢人口老化。因此香港有需要把現時的單程證配額上限維持，並且預期將會收到更多的申請，雖然現時的配額未有用盡。

28. 准許持單程證來港移民保留或重新申請其國內家鄉戶籍的方案能減輕香港支援錯誤移民的社會福利負擔，定能得到香港的支持。

29. 增加非本地學生的流入將會是人口政策的關鍵，不但能促進香港經濟發展，亦能減慢人口老化。香港可以善用獲批的非本地生本科生學額（20%學額上限）來錄取更多非本地學生。此等學額屬教資會所批本地生資助學額之外，因此不會影響本地生入大學機會。與非本地研究生相比，非本地本科生在更年輕的時候抵港，理應能更快學習廣東話，而且他們通常住在大學宿舍。直到畢業他們有四年時間融入香港，畢業後要過渡到香港社會將會更為容易及順暢。但平衡來自內地及其他國家的非本地學生比例，以及學生宿位短缺的問題都需要考慮。

30. 與增招非本地本科生同時，政府亦應考慮增加本地生大學學額，並透過適當的課程和培訓，加強本地青年在新時代下的競爭力，以增強本地人力資本存量。

31. 新加坡政府非常謹慎控制永久居民的數量。我們可以參考新加坡的移民政策，進行情境分析並總結出每年應輸入多少移民。假設香港不再輸入移民，總人口及勞動人口幾乎即時萎縮，分別大幅下滑至2064年的每年1.2%及1.3%負增長。即使我們能成功提升總和生育率至2.1，但人口老化問題以及勞動人口萎縮的情況，仍比假設現行移民政策的基準情境差。

32. 要將整體人口及勞動人口維持在一定水平，及減慢老年撫養比率的增幅，本報告建議因應房屋及基礎設施的承載能力，於未來數年分階段增加輸入移民。

33. 本報告建議新增的移民名額不應透過單程證計劃來港，反而應從其他途徑輸入年輕及高教育水平的移民。如果擴大現有的

入境計劃仍不能將移民人數增加至目標數量，香港可以考慮推出一項類似美國多元化移民簽證的有限度計劃。香港可以自行設定目標人數及申請條件，包括年齡組別、教育水平、工作經驗及沒有犯罪記錄。若果申請人數超過限額，計劃將透過隨機抽籤選擇申請人。

34. 最近一個美國研究報告指出，高技術移民能為本地人士（無論有否接受大學教育）的薪酬及就業帶來正面影響，因為他們通常能與本地人互相補足。至於香港，未有數據顯示增加大學收生人數會令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顯著上升或令大學畢業生的大學教育溢價(大學畢業生對中學畢業生平均收入比例)帶來顯著的負面影響。而且由於接近所有新增移民都具大學學歷，有部份甚至具備工作經驗及有一定儲蓄，這類移民的流入預期不會對社會福利系統或公共房屋系統構成壓力，但會對私人房屋及基建有一定需求。政府應及早計劃未來數年分階段增加抵港移民，同時配合擴大住屋、醫療設施及交通基建的容量。

35. 本報告模擬了每年增加不同數目移民的情況下，直至2064年的整體人口、勞動人口、人口結構及總撫養比率的趨勢。除非能持續有大批的年輕新移民流入，否則只能紓緩人口老化而未能逆轉。不過，維持整體人口及勞動人口的數目仍然重要，因其對長遠經濟增長有正面影響。

36. 2010年約有235,000名香港居民基於不同的原因而身在內地。當香港與內地的生活水平差距減少，預計更多人會穿梭兩地就學、就業及從事商業活動，從而增加兩地人口的雙向流動。

結語

37. 中國的增長正步入一個「新常態」，經濟進入重新平衡及調整結構的階段，強調內需，進一步開放資本帳，並邁向人民幣國際化。在這新階段，香港必須重新定位，成為內地的主要服務供應者，以及資本雙向流動的門戶，成為內地與世界之間的通道。內地專業技術人才仍然認為香港是具吸引力的工作及居住地點，香港必須以更有效的方法，輸入更多高技術的內地移民，以增加香港的人力資本，刺激增長，並紓緩人口老化的問題。

38. 雖然香港在製造業及轉口貿易方面漸缺優勢，新機遇卻接踵而來。在不久將來，中國會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香港必須乘著中國騰飛之勢，尋求新的發展機會。過程中香港必須扮演重要的角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某些領域不可或缺的夥伴。只有這樣，香港才能維持與內地相得益彰的經濟關係。



1. 香港作為細小開放經濟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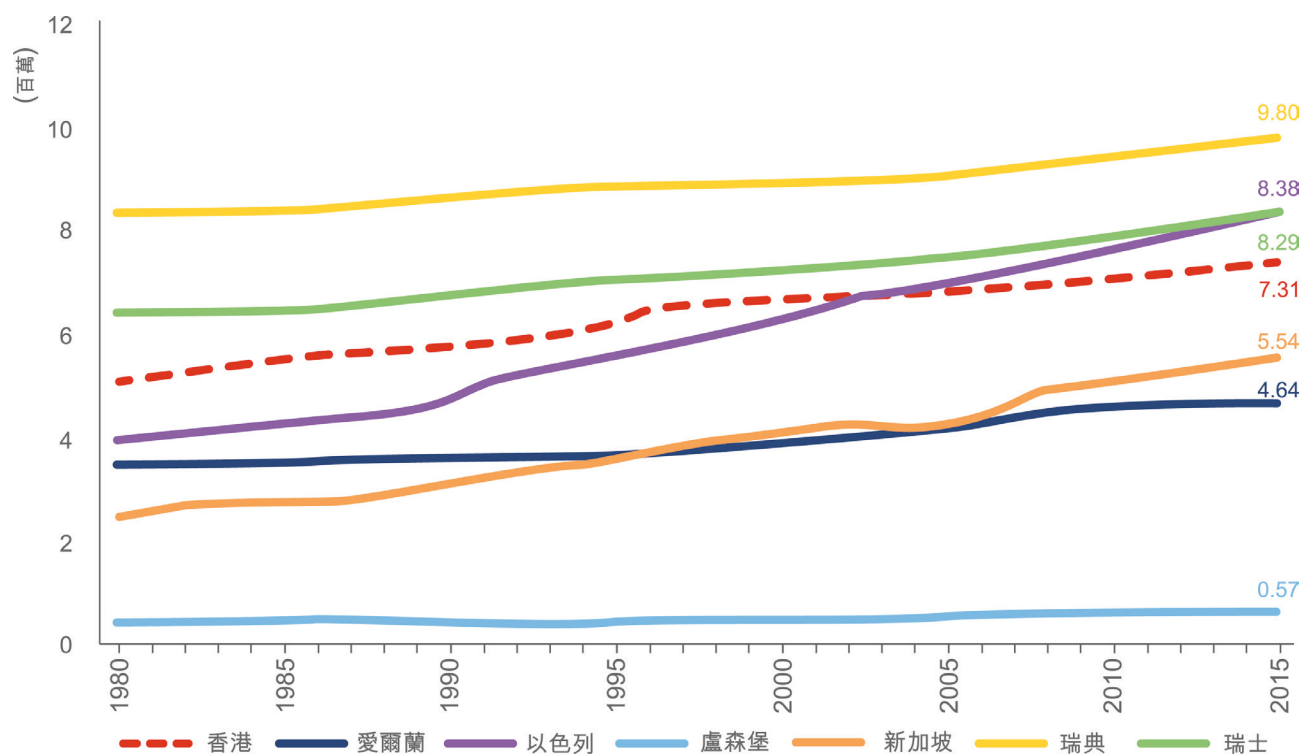
1. 香港作為細小開放經濟體

1.1 細小開放經濟體及其成功之道

香港是眾所周知的細小開放經濟體。細小經濟體的定義是按人口而非土地面積界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Kuznets（1960）將「細小經濟體」定義為人口不多於1,000萬的經濟體¹。香港、愛爾蘭、以色列、盧森堡、新加坡、瑞典和瑞士都是成功細小經濟體的例子。2015年，香港的人口為731萬，略少於以色列、瑞典和瑞士，但多於愛爾蘭、盧森堡和新加坡（見圖1）。雖然以上七個經濟體的經濟特徵各有不同，但它們的經濟成功可歸因於一些共同因素。回顧這些經濟體的發展，可總結出細小經濟體的成功因素，藉以為香港經濟發展方向帶來啟示。

1 Commonwealth Advisory Group（1997）及Commonwealth Secretariat與世界銀行（2000）均在其報告中將「細小國家」定義為人口1,500萬或以下的國家。

圖1：1980年至2015年香港、愛爾蘭、以色列、盧森堡、新加坡、瑞典及瑞士的總人口



註：根據世界銀行，總人口包括所有居民，不論其法律地位或公民身份，但不包括在庇護國短暫定居的難民。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由國際商會發表的「開放市場指數」按四項因素評估經濟體的開放程度，包括貿易開放程度、貿易政策、促進貿易的基礎設施，以及對外來直接投資的開放程度。根據國際商會於2015年9月發佈的最新《開放市場指數報告》，新加坡和香港均以5.5分獲評為最開放的經濟體。盧森堡、愛爾蘭、瑞士和瑞典獲評為第二類經濟體，即擁有高於平均水平的開放程度，而以色列則獲評為第三類經濟體，在多個擁有一般開放程度的經濟體中位列榜首（見表1）。以人均經濟生產總值衡量的生活水平與開放市場指數之間存在正向關係²，即開放市場指數愈高，該國家的生活水平都會愈高。按每個國家的開放市場指數及人均經濟生產總值，圖2標繪出表1中國家的分佈，每一顏色點代表一個國家。從圖中可見，分佈呈向上曲線。有兩點是顯而易見的：首先，細小經濟體（藍點）的人均經濟生產總值通常較高；其次，藍點呈現的曲線特別傾斜，表示與其他經濟體相比，細小經濟體往往傾向高度開放市場，以達至更高的生活水平。相反，被國際商會的報告評為「開放程度很低」的經濟體（如孟加拉、埃塞俄比亞、蘇丹），以及封閉經濟體（如北韓及近期前的緬甸），其生活水平都相當低³。

2 開放市場指數與以人均經濟生產總值衡量的生活水平的相關系數為0.70。

3 2015年人均經濟生產總值：孟加拉（1,287美元）；埃塞俄比亞（687美元）；蘇丹（2,175美元）；緬甸（1,204美元）；北韓（無公佈數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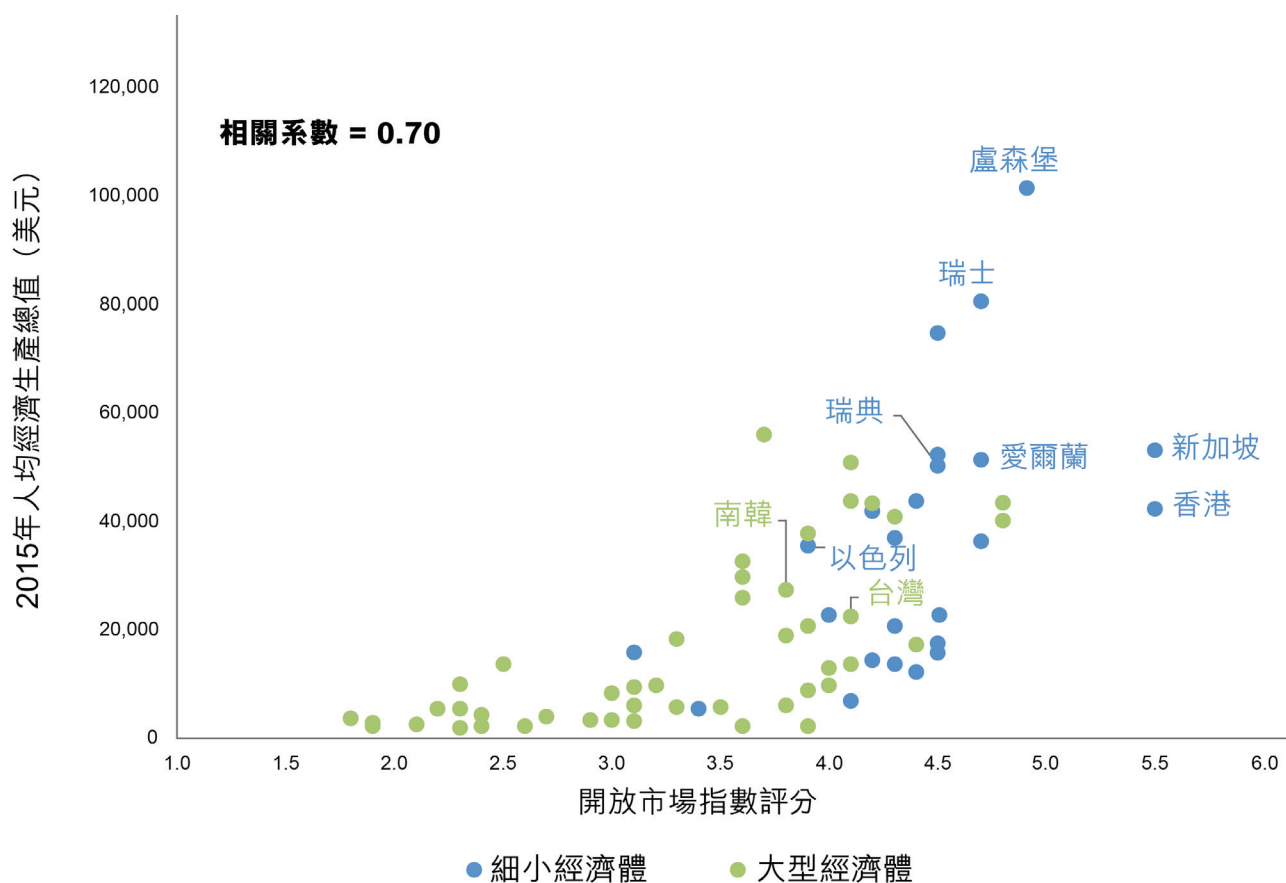
表1：國際商會《開放市場指數報告》（2015年第三版）評分及排名

類別		排名	評分			排名	評分		
1 最開放	新加坡	1	5.5	3 開放程度 一般	羅馬尼亞	38	3.9		
	香港	2	5.5		葡萄牙	39	3.8		
2 開放程度 高於平均水平	盧森堡	3	4.9		秘魯	40	3.8		
	比利時	4	4.8		南韓	41	3.8		
	荷蘭	5	4.8		美國	42	3.7		
	愛爾蘭	6	4.7		意大利	43	3.6		
	瑞士	7	4.7		日本	44	3.6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8	4.7		越南	45	3.6		
	冰島	9	4.7		西班牙	46	3.6		
	瑞典	10	4.5		泰國	47	3.5		
	愛沙尼亞	11	4.5		約旦	48	3.4		
	丹麥	12	4.5		希臘	49	3.3		
	馬爾他	13	4.5		南非	50	3.3		
	挪威	14	4.5		土耳其	51	3.2		
	斯洛伐克	15	4.5		哈薩克斯坦	52	3.2		
	奧地利	16	4.4		烏拉圭	53	3.1		
	捷克共和國	17	4.4		墨西哥	54	3.1		
	匈牙利	18	4.4		哥倫比亞	55	3.1		
	德國	19	4.3		印尼	56	3.1		
	拉脫維亞	20	4.3		俄羅斯聯邦	57	3.1		
	新西蘭	21	4.3		摩洛哥	58	3.0		
	斯洛文尼亞	22	4.3		中國	59	3.0		
	立陶宛	23	4.2		4 開放程度 低於平均水平	菲律賓	60	2.9	
	加拿大	24	4.2			埃及	61	2.7	
	芬蘭	25	4.2			突尼西亞	62	2.7	
	保加利亞	26	4.1			印度	63	2.6	
	澳洲	27	4.1			委內瑞拉	64	2.6	
	台灣	28	4.1			阿根廷	65	2.5	
智利	29	4.1	尼日利亞			66	2.4		
英國	30	4.1	肯尼亞			67	2.4		
波蘭	31	4.0	斯里蘭卡			68	2.3		
塞浦路斯	32	4.0	烏干達			69	2.3		
馬來西亞	33	4.0	巴西			70	2.3		
3 開放程度 一般	以色列	34	3.9			阿爾及利亞	71	2.2	
	烏克蘭	35	3.9			巴基斯坦	72	2.1	
	沙特阿拉伯	36	3.9			5 開放程度很低	孟加拉	73	1.9
	法國	37	3.9				埃塞俄比亞	74	1.9
			蘇丹	75			1.8		

註：5-6分：最開放經濟體；4-4.99分：開放程度高於平均水平的經濟體；3-3.99分：開放程度一般的經濟體；2-2.99分：開放程度低於平均水平的經濟體；1-1.99分：開放程度很低的經濟體。

資料來源：國際商會《開放市場指數報告》

圖2：人均經濟生產總值與開放市場指數評分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商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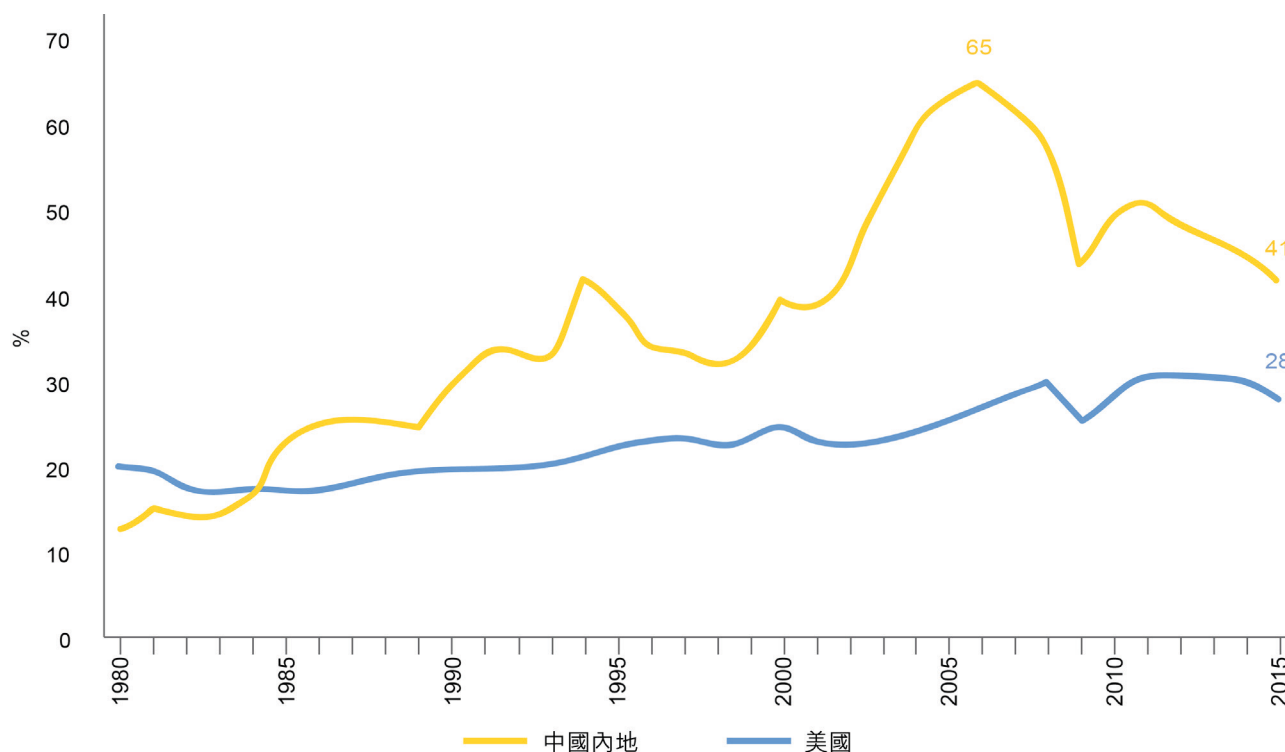
1.2 經濟開放的必要性

細小經濟體要在經濟上取得成功，必須保持經濟開放。雖然規模經濟可降低平均生產成本，但大規模生產要符合經濟效益，必須有充足的最終需求。而往往人口少於1,000萬的細小經濟體，其內部需求通常不足以支持大規模的國內生產。然而，當細小經濟體開放貿易、可在國際市場上出售其產品和服務以滿足全球市場的需求，國外需求便可彌補國內需求的不足。從供給層面而言，規模經濟有助提升生產力；從需求層面而言，細小經濟體能受益於全球市場所帶來的國外需求。由此可見，經濟開放對細小經濟體的經濟生產總值增長至關重要。此外，經濟開放亦會引進外資、科技、意念和技術，這些因素均可促進經濟增長。

事實上，中型和大型經濟體同樣須開放予國際貿易和投資，以維持其經濟增長，儘管相對而言，它們比細小經濟體較少依賴經濟開放。亞洲四小龍在20世紀下半葉傳奇性的出口導向型增長，正是由於它們的開放貿易和投資政策。亞洲四小龍當中，南韓和台灣屬中型經濟體（香港和新加坡則屬細小開放經濟體），它們的貿易總額分別佔各自經濟生產總值的84.8%和119%。即使美國和中國這兩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按經濟生產總值計）亦是開放經濟體。美國的資本帳開放、美元是主要國際貨幣，其貿易總額佔經濟生產總值比重約為30%（見圖3）。而中國自1978年實行經濟改革，早年的經濟增長主要由對外貿易和外來直接投資帶動。90年代至2000年代間中國成為了「世界工廠」，其貿易總額佔經濟生產總值比重於2006年上升至65%。雖然中央政府在「十一五」和「十二五」規劃中提出經濟轉型並有意從出口導向型轉變為內需導向型，但2015年的貿易總額佔經濟生產總值比重仍維持在41%以上（見圖3）。與此同時，中央政府正逐步開放其資本帳，並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總括而言，不論任何規模的經濟體，經濟開放對其經濟增長均十分重要。而由於受生產規模所限，加上內需不足，經濟開放對細小經濟體尤為關鍵。

圖3：1980年至2015年美國和中國內地貿易總額佔經濟生產總值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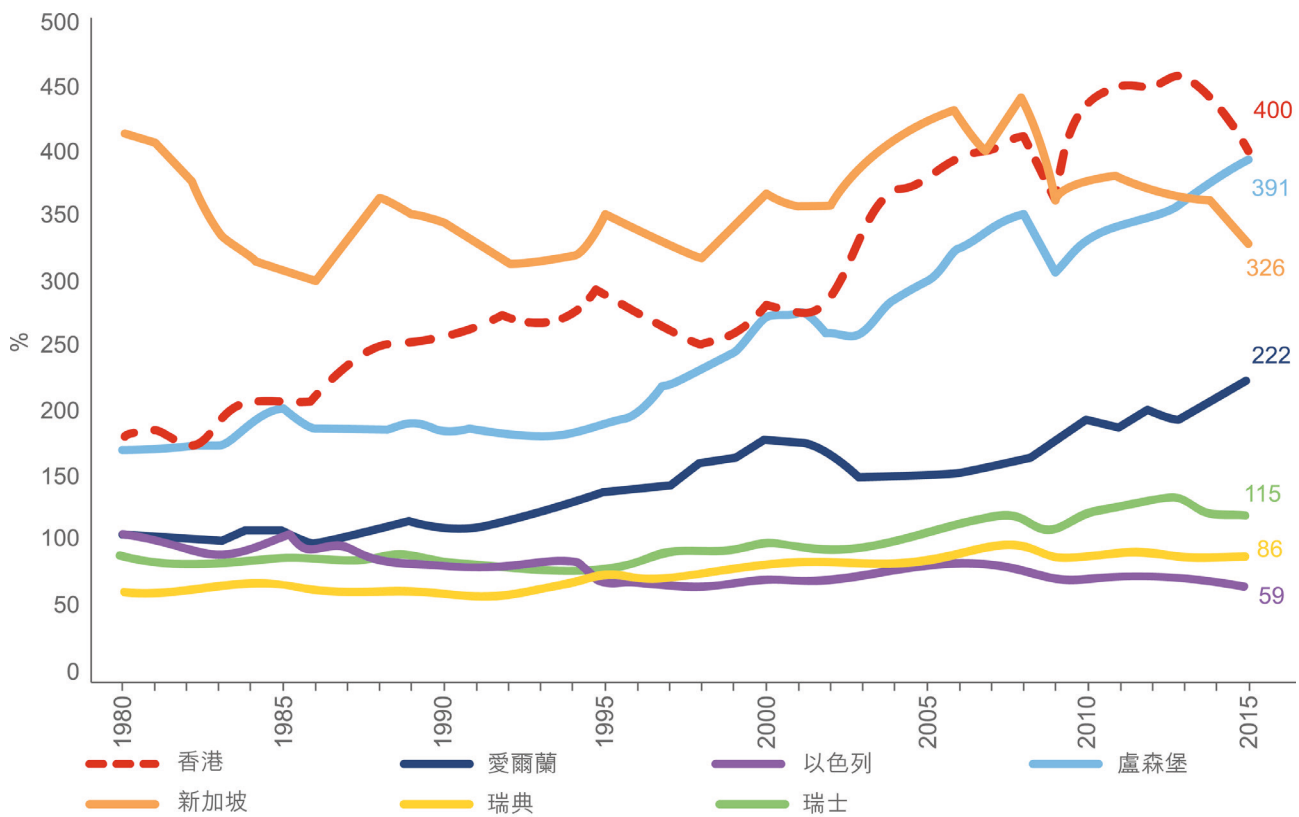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1.3 其他細小開放經濟體的啟示

開放市場指數的四項評估因素中，「貿易開放程度」對開放市場至為關鍵，而貿易總額佔經濟生產總值的比重是一項常用指標去量度貿易開放程度。在前述七個細小經濟體中，香港、盧森堡和新加坡的貿易開放程度非常高，其2015年貿易總額佔經濟生產總值比重分別高達400%、391%和326%。雖然相比之下，其他四個細小經濟體的貿易開放程度較低，但其貿易總額佔經濟生產總值比重亦高達222%（愛爾蘭）、115%（瑞士）、86%（瑞典）及59%（以色列）（見圖4）。

圖4：1980年至2015年香港、愛爾蘭、以色列、盧森堡、新加坡、瑞典及瑞士貿易總額佔經濟生產總值比重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出口貿易方面，香港和新加坡主要依靠轉口貿易，以及與貿易相關的服務和金融服務。盧森堡以其金融服務著稱，有關服務佔2015年服務貿易總額超過一半。盧森堡證券交易所是歐洲的主要證券交易所之一，更是歐洲擁有最多國際債券上市的交易所。

金融服務和科技皆為瑞士的支柱產業。瑞士擁有歷史悠久的銀行和保險業，並有多家知名金融機構，例如瑞信（Credit Suisse）、瑞銀（UBS）和瑞士再保險（Swiss Re）等。與此同時，化工與相關行業及機電行業佔瑞士2015年商品出口的四成以上。而且根據2016年全球創新指數，瑞士獲評為最具創新力經濟體。

以色列、愛爾蘭和瑞典則較為專注於科技產業。以色列以其科技創新和高研發開支而聞名⁴。愛爾蘭是全球最大的電子通訊、電腦及資訊服務輸出國之一，有關服務佔其2015年商業服務輸出總額接近一半。此外，愛爾蘭亦是歐洲製藥業重鎮，全球十大製藥公司之中有九家⁵都於該國設廠。瑞典的科技和創新產業蓬勃。正如團結香港基金《香港創新科技業概況》（2015）研究報告所指出，不少成功的科網界巨人均來自瑞典，例如Skype、MySQL、Klarna和Spotify。科技亦有助瑞典促進其商業服務貿易。該國在2016年全球創新指數中排名第二。知識產權使用費和電子通訊、電腦及資訊服務佔瑞典2015年商業服務輸出總額超過三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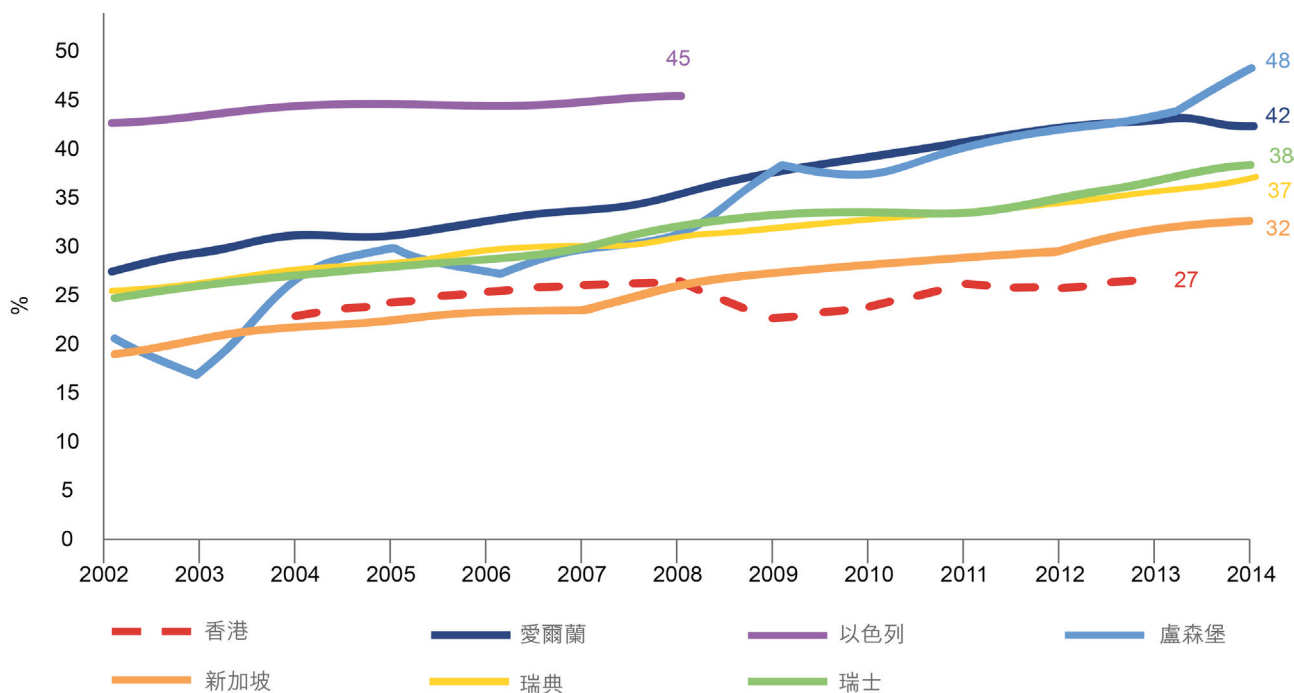
上述七個經濟體說明了幾種細小經濟體可以參照，以保持經濟增長和良好生活水平的經濟模式。細小經濟體可採納香港和新加坡的模式，在貿易、投資和金融服務維持極高的開放性，或參照盧森堡專門發展金融服務業，亦可參考以色列、愛爾蘭和瑞典的策略，建立和發展科技創新產業，又或走上瑞士的道路，同時以金融服務和科技為支柱產業。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一個細小經濟體選擇專注於科技發展的經濟策略，它仍須依賴貿易以出口其產品和服務（儘管依賴程度不及側重貿易和投資的經濟體），因此經濟開放是不可缺少。另外一點要注意的是，科技發展的成功有賴眾多因素，人才乃其中之一。只有擁有高技術的勞動力，才能生產高價值的科技產品和服務。相對較專注發展科技創新產業而較少依賴貿易的愛爾蘭、以色列、瑞典和瑞士均具備優秀人才，曾接受高等教育的勞動人口比例從37%至45%不等，高於新加坡的32%和香港的27%（見圖5）。

4 2014年，以色列總研發開支佔經濟生產總值約4.1%，屬全球數一數二。

5 根據愛爾蘭醫藥保健協會（IPHA），這九家製藥公司分別為強生、諾華、輝瑞、羅氏、默克、賽諾菲、葛蘭素史克、雅培和安進。

圖5：2002年至2014年香港、愛爾蘭、以色列、盧森堡、新加坡、瑞典和瑞士曾接受高等教育的勞動人口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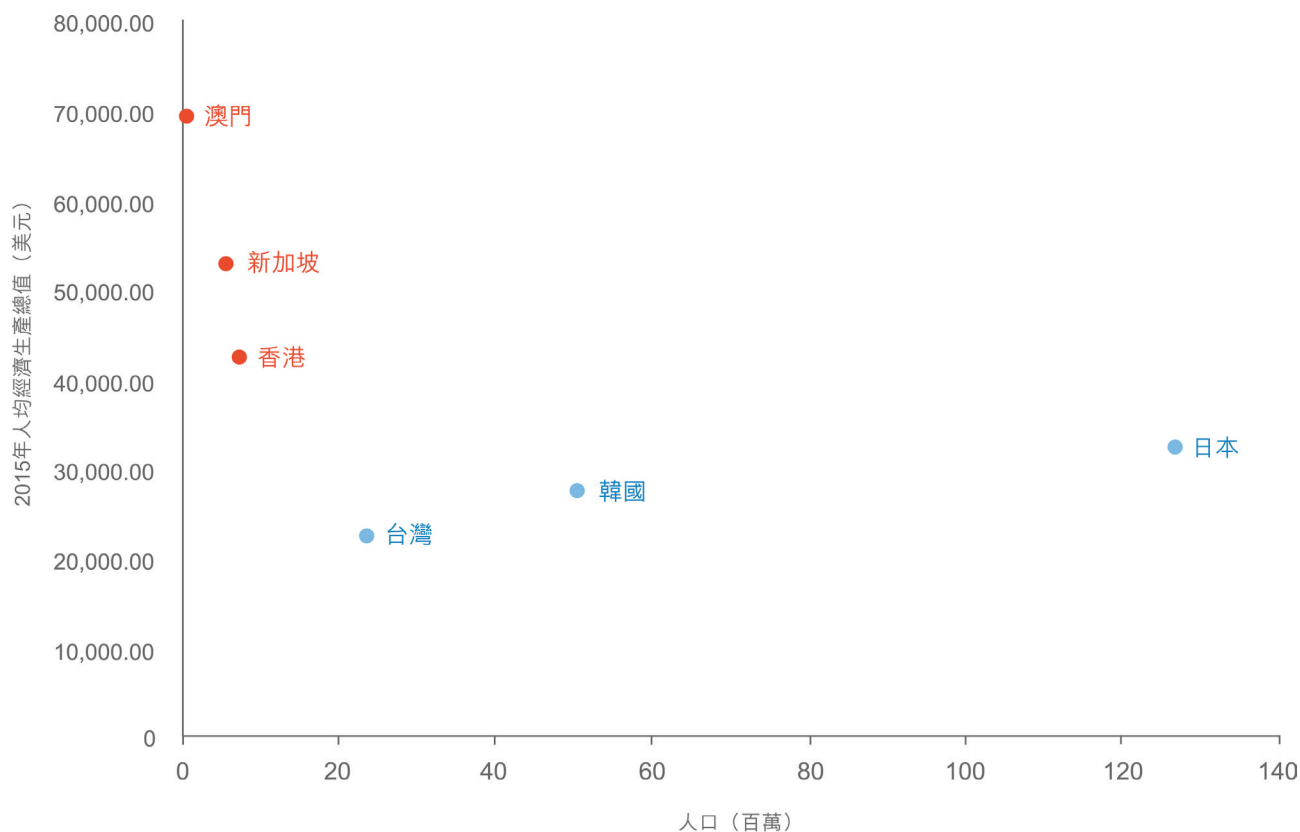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新加坡人力部

1.4 香港的定位

香港一直定位為非常開放的細小經濟體。從50年代由轉口港轉型為製造業中心，繼而發展成中國以至世界的金融和服務中心，此定位一直對香港十分有利，亦大大改善了香港市民的生活水平。香港、新加坡及澳門是唯一三個雖然缺乏天然資源，但社會富裕的亞洲細小經濟體。香港的人均經濟生產總值為42,000美元，超越其他規模較大、同樣成功，但開放程度相對較低的亞洲經濟體，包括日本（人均經濟生產總值32,000美元）、韓國（人均經濟生產總值27,000美元）和台灣（人均經濟生產總值22,000美元）（見圖6）。

圖6：2015年香港、日本、澳門、新加坡、南韓和台灣的總人口及人均經濟生產總值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

展望未來，香港必須繼續向世界開放，以延續其成功及維持競爭優勢。國際間在貿易、金融和科技的競爭非常激烈，不少亞洲城市都有意取代香港成為亞洲主要的貿易、金融和商業服務中心。歷史上有很多貿易城市和港口走向衰落，最廣為人知的例子便是威尼斯。威尼斯曾是15世紀地中海首屈一指的貿易、金融和政治中心⁶，現在卻僅是個旅遊勝地。絲綢之路沿途的歷史遺跡亦見證了許多貿易城市的興衰，曾經一度繁榮的貿易城市因戰爭、飢荒以至貿易路線變化而衰落。香港必須汲取教訓，時刻警覺全球貿易夥伴的轉變和不斷變化的相對優勢。香港人絕不應轉趨保守、排外、以為可以孤立自己而同時發展經濟，因為這將令香港走下坡。

6 正如世界經濟論壇高級媒體經理彼得·凡漢姆 (Peter Vanham) 在其文章《從15世紀威尼斯學到的三大職場啟示》所提及。

1.5 結語

綜上所述，香港作為細小經濟體必須繼續高度開放貿易和金融服務，或發展創新科技，又或兩者兼具，以保持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然而，不論發展方向如何，香港與中國內地的經濟關係始終不可分割。中國內地是香港最大的貿易夥伴，香港貿易行業的表現取決於內地的供應和需求。內地的儲蓄和財富不斷增加，人民幣亦逐步走向國際化，香港可把握當中機遇，進一步發展其金融服務。香港要發展創新科技產業，正如團結香港基金在《香港創新科技業概況》（2015）研究報告中建議，中國內地可以成為香港的腹地，以解決香港土地不足的問題，香港亦可打入內地市場，滿足內地工商業及消費者對創新產品和服務的需求。下一章將進一步分析香港與內地經濟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隨時代變遷兩地角色的轉變。



2.不同時期香港與內地經濟 相互依存的關係

2. 不同時期香港與內地經濟相互依存的關係

2.1 中國內地對香港的重要性

中國內地在香港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早年，內地是香港的轉口貿易夥伴，並向香港供應糧食和食水。到近年，內地成為了香港工業生產的腹地及消費市場。隨着中國經濟改革、逐步開放市場，並迅速崛起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不同層面上內地對香港經濟的重要性皆日益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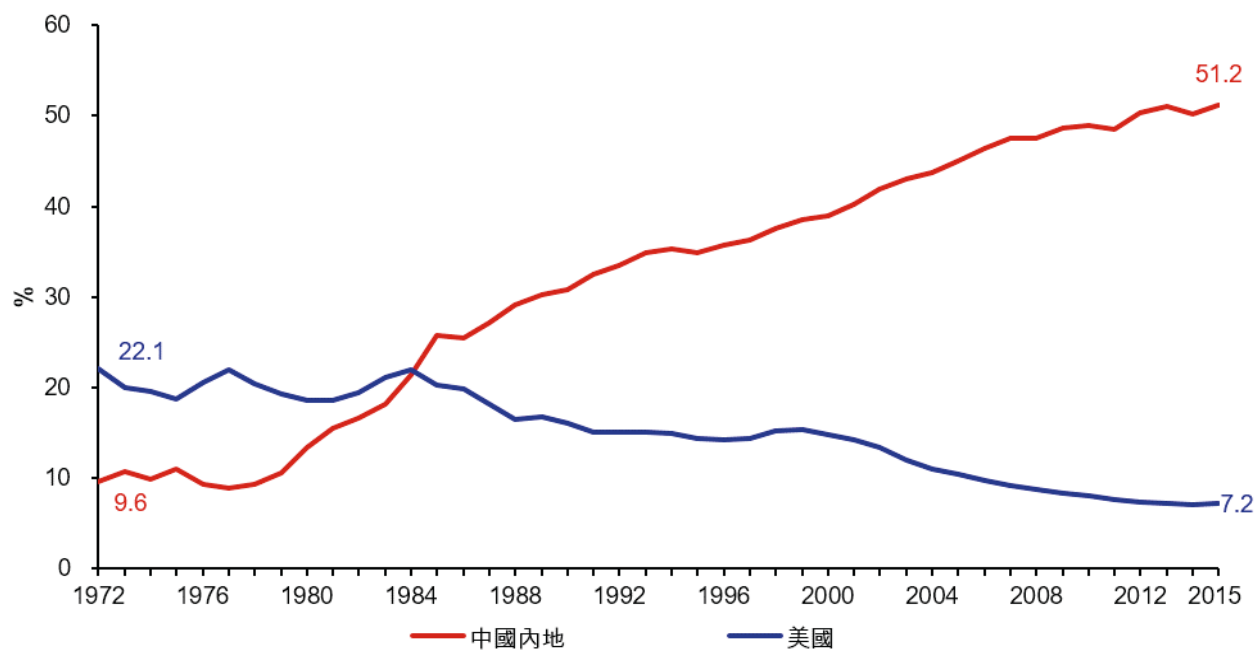
2.1.1 作為最大貿易夥伴

直至1985年，美國一直是香港最大的商品貿易夥伴，1972年美國佔香港商品貿易總額22%。因此，過去本港經濟很受美國經濟影響。當時有一種說法：美國經濟打個噴嚏，香港便將患上感冒。香港於1983年10月實施貨幣發行局制度，將港元兌每美元的匯率固定在7.8的水平，從而將香港經濟的盛衰繫於美國的經濟和貨幣政策，可見當時美國對香港經濟舉足輕重。

1985年，中國內地取代美國成為香港最大貿易夥伴。美國佔香港商品貿易總額跌至2015年的7.2%，而中國內地的比重則由1972年的10%大幅提升至2015年的51%（見圖7）。而事實上，中國內地亦同時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商品貿易國⁷，佔2015年全球商品貿易總額11.9%（見表2）。

⁷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內地是2015年全球最大商品貿易出口國，以及全球第二大商品貿易進口國。

圖7：1972年至2015年中國內地與美國佔香港商品貿易總額的比重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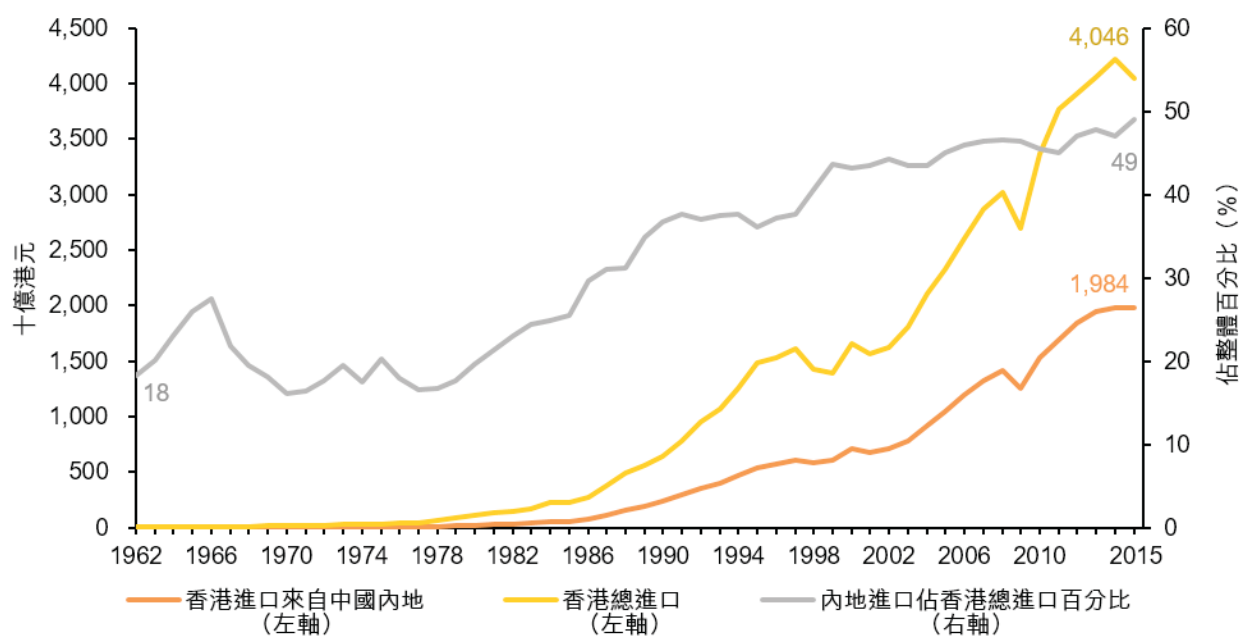
表2：2015年全球商品貿易大國

排名	商品貿易總額	價值 (十億美元)	佔整體百分比 (%)
1	中國內地	3,956.9	11.9
2	美國	3,812.9	11.5
3	德國	2,379.5	7.2
4	日本	1,273.4	3.8
5	法國	1,078.6	3.3

資料來源：世界貿易組織，團結香港基金

中國內地長久以來都是香港進口食品、食水和生活必需品的主要供應來源。儘管1962年正值「大躍進」，人民生活困乏，內地仍然佔香港商品進口的18%。此比率逐漸上升至2015年的49%。另一方面，香港對內地出口趨勢較遲開始，但升幅更為顯著。1978年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前，香港對內地的出口量微乎其微。改革開放後，內地佔香港商品出口的比重急速上升到2015年的54%。大部分香港對內地的出口均為轉口貨品，而非香港本地出口。事實上，以貨值計算，香港對內地的本地出口自1997年以來不斷減少。與此同時，隨著香港廠商將生產設施遷移至珠江三角洲，令香港的本地出口總額亦下跌。儘管如此，內地佔香港本地出口總額的比重不斷增加，在2015年達到44%。內地對香港商品貿易的重要性無容置疑，而且與日俱增。從圖12可見，香港與內地的商品出口增長率相近，反映兩者之間關係密切，因為大部分香港出口乃來自內地的轉口貨品。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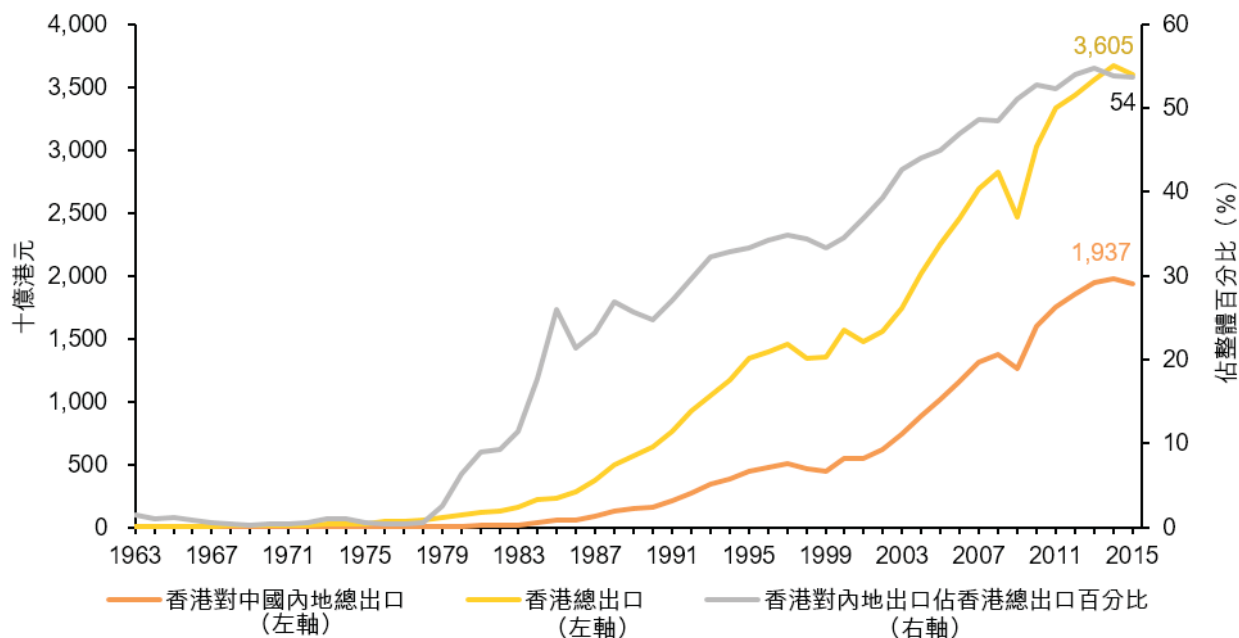
圖8：1962年至2015年中國內地進口香港商品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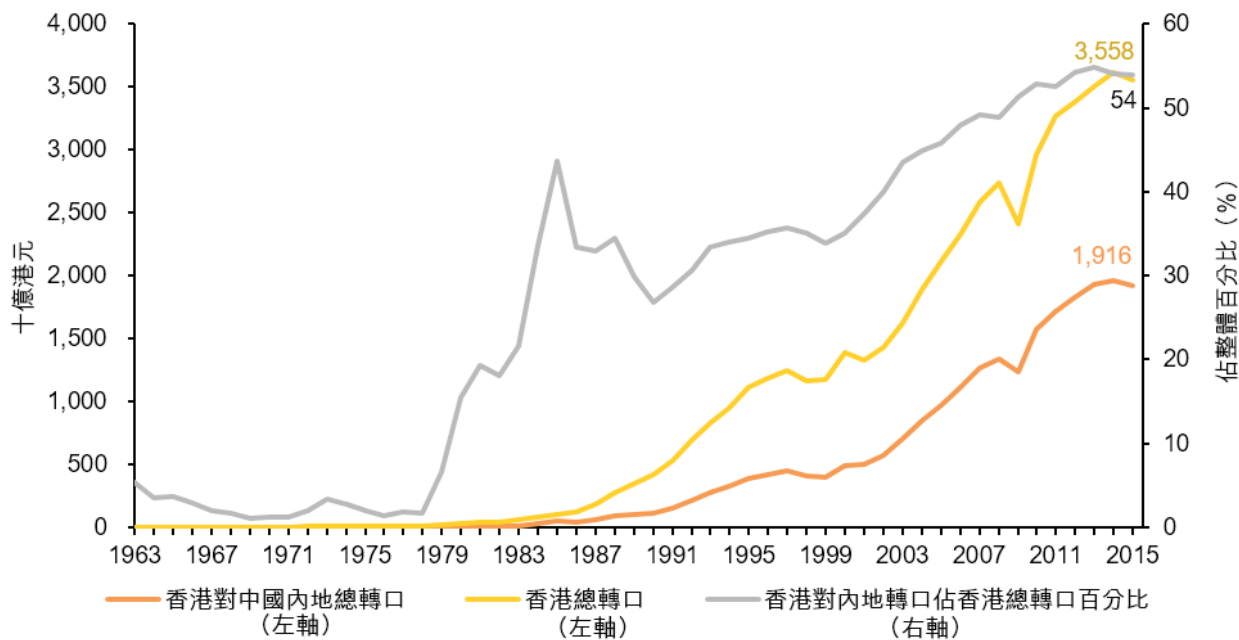
8 1979至2015年香港與中國內地商品出口的相關系數為0.63。

圖9：1963年至2015年香港對中國內地總商品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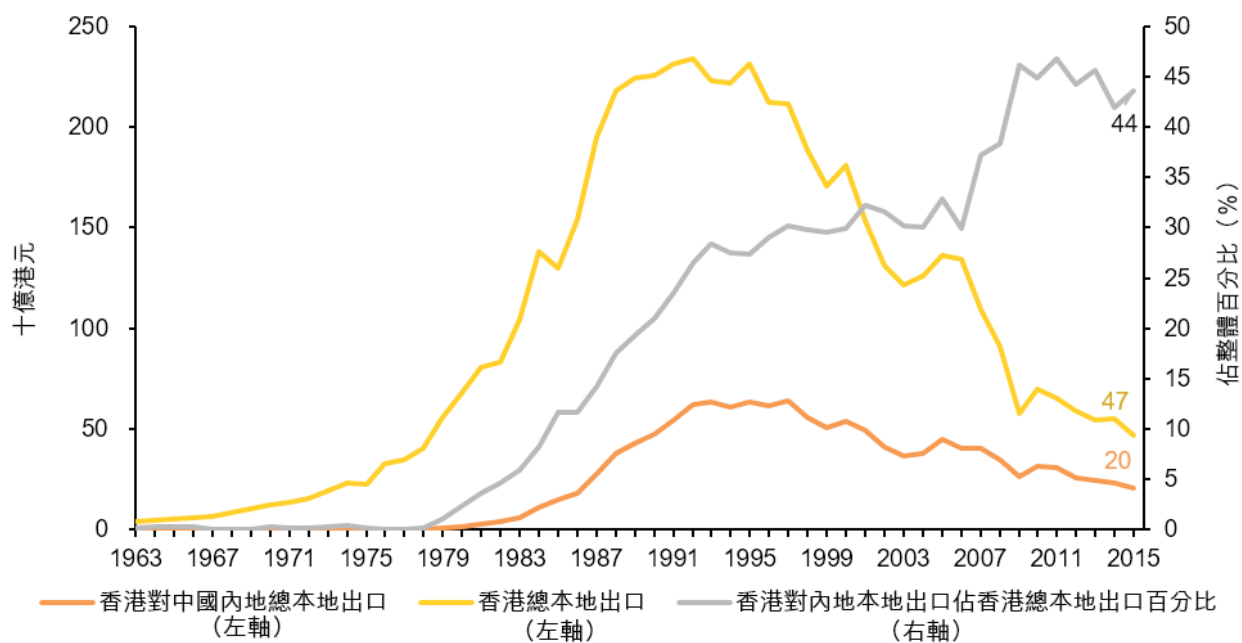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圖10：1963年至2015年香港對中國內地商品轉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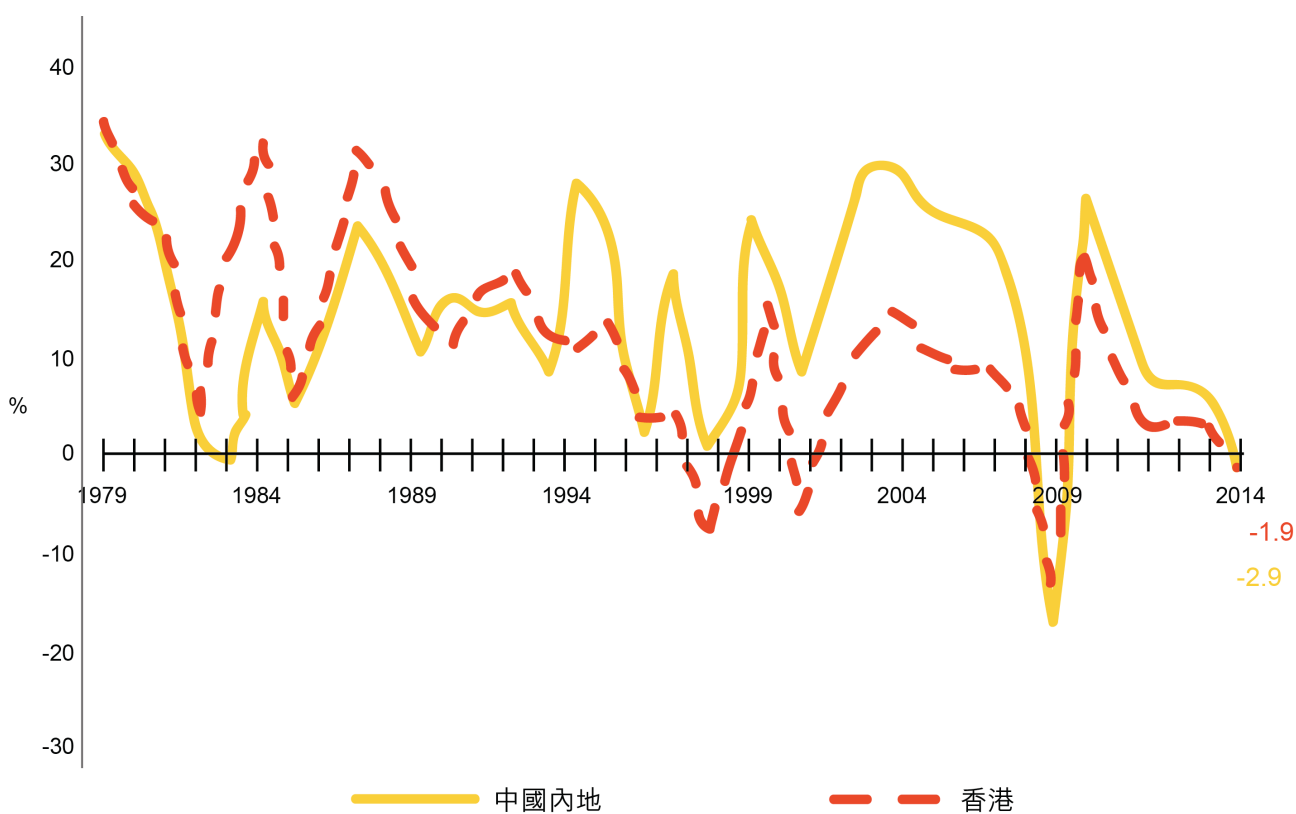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圖11：1963年至2015年香港對中國內地本地商品出口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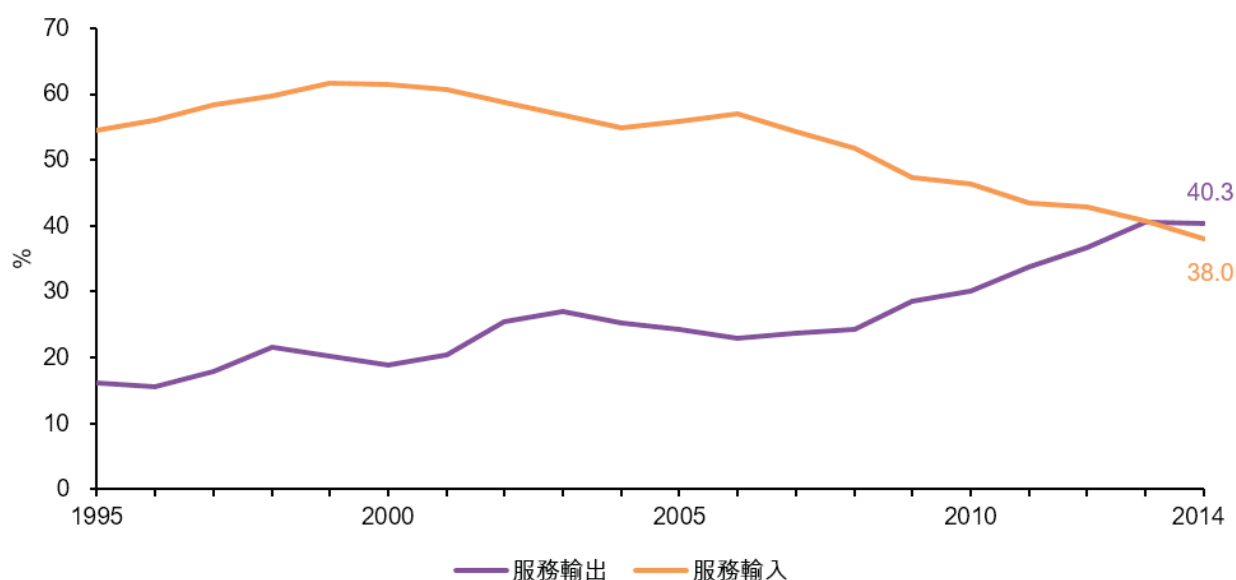
圖12：1979年至2015年香港及中國內地商品出口年均增長率



資料來源：CEIC數據

在服務貿易（有時又稱為「無形貿易」，與被稱為「有形貿易」的商品貿易相反）方面，中國內地同樣是香港服務貿易最大的出口國與進口國⁹。2014年，內地佔香港整體服務輸出40.3%，比1995年的16.2%大增。與此同時，2014年內地佔香港服務輸入38.3%，與出口數字幾乎相同（見圖13）。

圖13：1995年至2014年香港對中國內地服務輸出及輸入佔總體比例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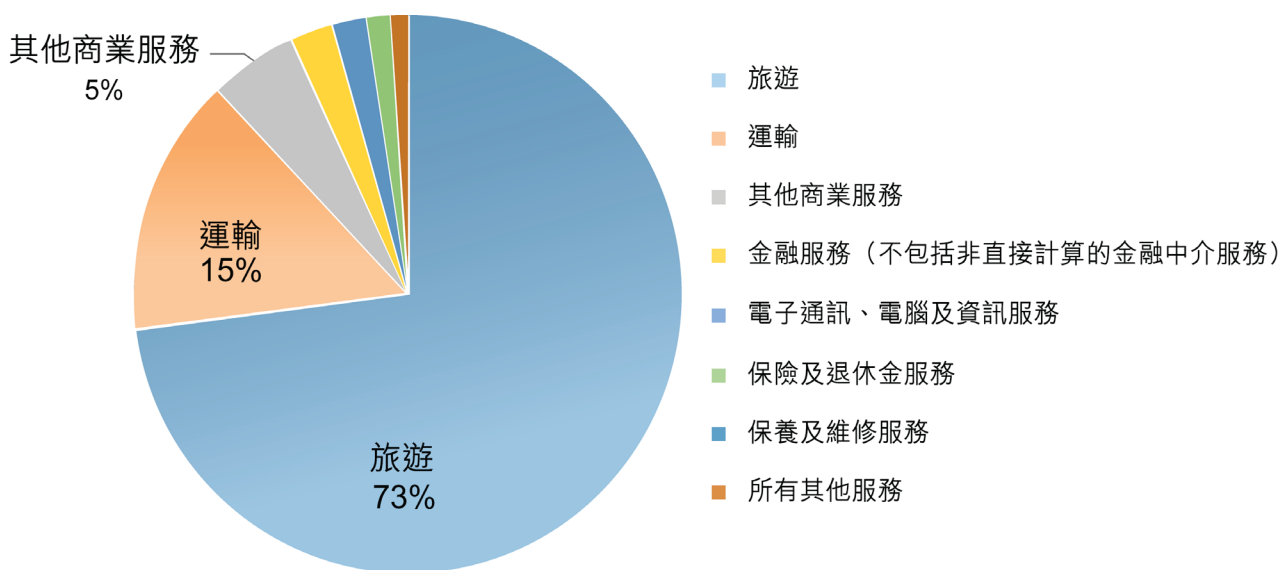
在香港對中國內地的服務輸出當中，旅遊服務¹⁰是最主要的組成部分，佔2014年香港對中國內地的總服務輸出高達73%（見圖14），相等於香港整體服務輸出的29%。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之簽訂，特別是CEPA中「自由行」計劃的實施，中國內地佔香港整體旅遊服務輸出的比重，從1995年的20%大增近三倍至2014年的79%。

9 香港對內地的服務輸出例子包括：為內地企業提供的商業和專業服務，為內地客戶提供的保險服務，為內地來港旅客提供運輸、住宿和旅遊服務。而香港自內地進口服務的一個例子，是內地為香港遊客提供的服務。

10 旅遊服務涵蓋旅客為業務及私人目的所作的商品和服務支出，包括來港進修而於香港境內所作的住宿、膳食、娛樂、交通等個人開支。

另一項內地佔相當大比重的服務輸出類別是保險及退休金服務，同期比重由14%上升至39%（見圖15）。儘管內地限制內地居民來港以銀聯卡購買保險，香港的保險產品仍然很受歡迎。2016年首半年內地客來港投保的新造保單保費總額按年升1.2倍達301億港元，第二季更按季上升28%¹¹。內地佔香港保險及退休金服務輸出的比重預期將會再進一步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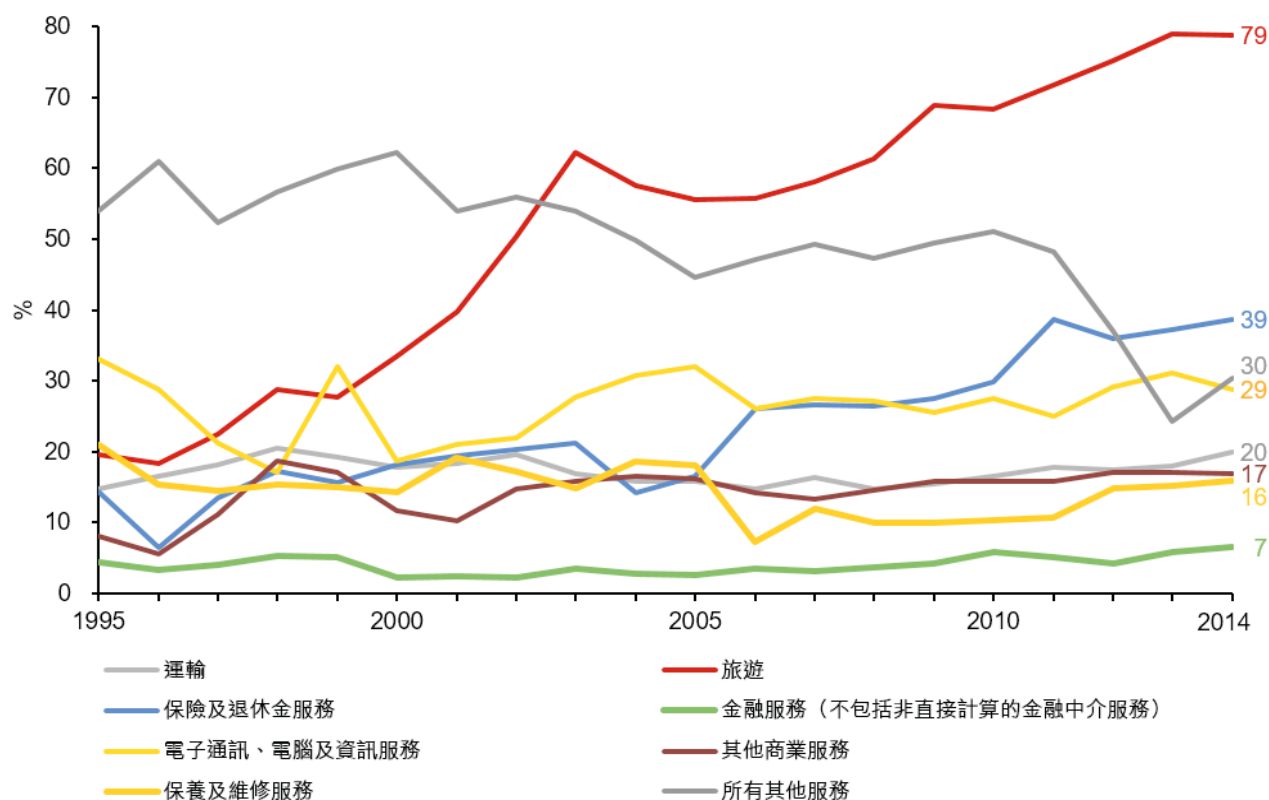
圖14：2014年香港對內地各類別服務總出口的百分比分佈



註：由於非直接計算的金融中介服務沒有按地區細分的數字，以上數字不包括有關資料。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11 截取自星島日報（2016年8月31日）內地客來港買保險 上半年投保總額增逾倍。http://std.stheadline.com/instant/articles/detail/217764-%E9%A6%99%E6%B8%AF-%E5%85%A7%E5%9C%B0%E5%AE%A2%E4%BE%86%E6%B8%AF%E8%B2%B7%E4%BF%9D%E9%9A%AA+%E4%B8%8A%E5%8D%8A%E5%B9%B4%E6%8A%95%E4%BF%9D%E7%B8%BD%E9%A1%8D%E5%A2%9E%E9%80%BE%E5%80%8D

圖15：1995年至2014年香港對內地各類別服務輸出佔該類別服務整體出口百分比



註：由於非直接計算的金融中介服務沒有按地區細分的數字，以上數字不包括有關資料。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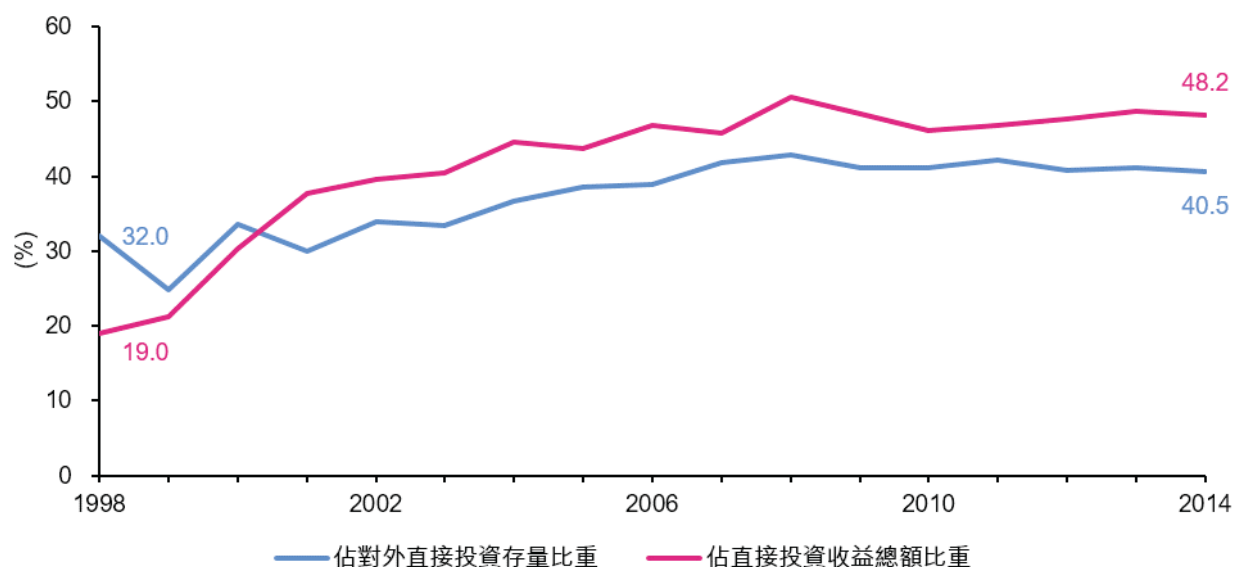
服務輸出不僅有助經濟增長，與商品出口相比服務輸出一般較為勞動密集，因此在創造就業機會方面能發揮更大作用。根據宋恩榮等人（2015）的估算，2013年所有旅客、內地旅客、「個人遊」旅客和「一年多次赴港個人遊簽注」（「一簽多行」）旅客對本地生產總值的貢獻分別為4.2%、2.6%、1.6%和0.3%，而這些旅客對香港總就業的貢獻較高，分別佔香港總就業6.4%、4.5%、2.7%和0.5%¹²。就業機會主要來自於與旅遊相關的行業，例如零售、餐飲、交通、住宿，而對其他行業的間接貢獻則沒有計算在內。因此，上述對經濟增長和就業的貢獻僅屬保守估計。

12 據宋恩榮等人（2015）估計，每千名「一簽多行」旅客、非「一簽多行」「個人遊」旅客、非「個人遊」內地旅客，以及非內地旅客，分別為香港創造1.67、5.33、4.96和5.17個就業職位。

2.1.2 資金的目的地和來源地

中國內地既是香港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地，亦是香港外來直接投資的重要來源地。2014年，香港在中國內地的投資存量達45,600億港元，佔對外直接投資總體存量41%，產生的直接投資收益達4,500億港元，佔香港對外直接投資收益總額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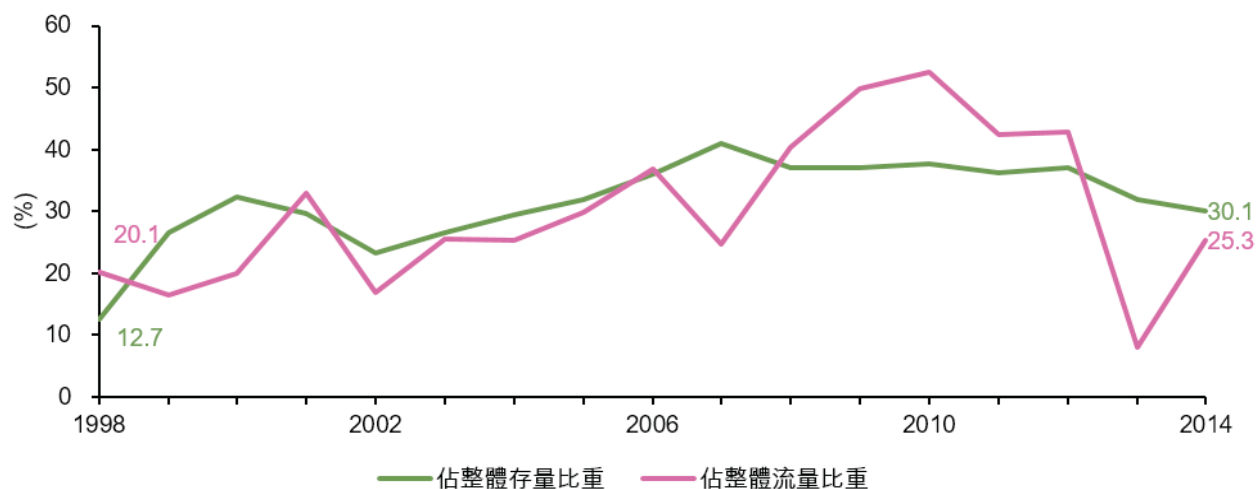
圖16：1998年至2014年與中國內地相關的香港對外直接投資佔整體百分比



資料來源: 香港政府統計處

與此同時，中國內地亦是香港外來直接投資的主要來源地，佔總體存量約30%。香港具備作為中國內地門戶的獨特地位，多年來吸引了其他國家逐漸增加在香港的投資，但內地所佔比重一直維持於約30%（見圖17）。

圖17：1998年至2014年與中國內地相關的香港外來直接投資流量及存量佔整體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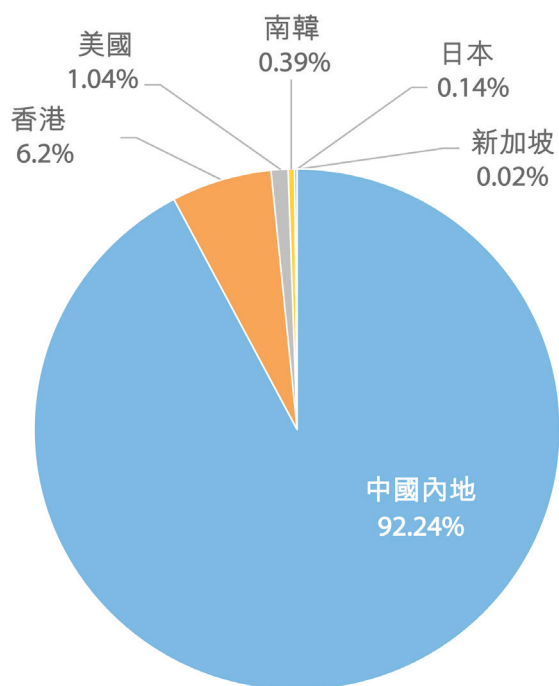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 香港政府統計處

除此之外，中國內地在香港享譽國際的股票市場上亦擔當重要的角色。過去數年，港交所在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額均位列全球前五名¹³。2015年香港首次公開招股集資總額當中，內地企業佔最大比重達92%，香港企業僅佔6%（見圖18）。香港股市的交投亦日漸受在港上市的內地企業主導。從1997年到2015年，內地企業股票的成交金額佔香港股市全年總成交金額的比重由38%升近一倍至73%（見圖19）。在市值方面亦可印證出內地企業於香港股市的佔有率不斷增加，內地企業佔香港股市總市值¹⁴的比重由1997年的16%增至2015年的62%（見圖20）。可以推斷，假如沒有內地企業來港上市，香港股市的成交金額和市值將大幅減少。

13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港交所近年的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額排名如下：2015年（首名）；2014年（次名）；2013（第四名）；2012年（第四名）；2011年（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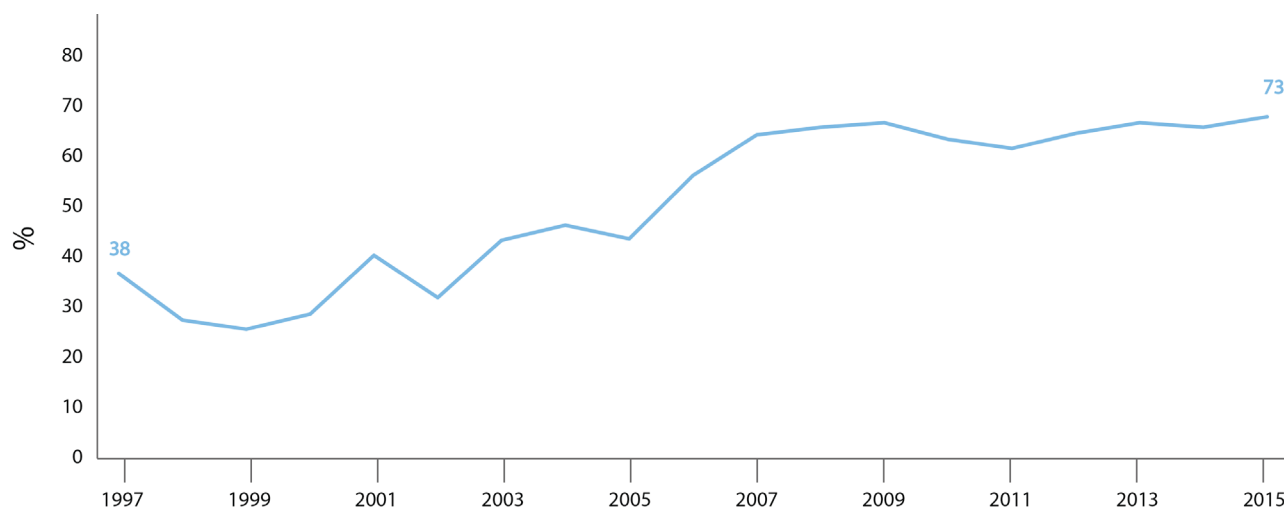
14 市值是指一家上市公司的流通股份的總市值。

圖18：2015年香港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額按企業地區劃分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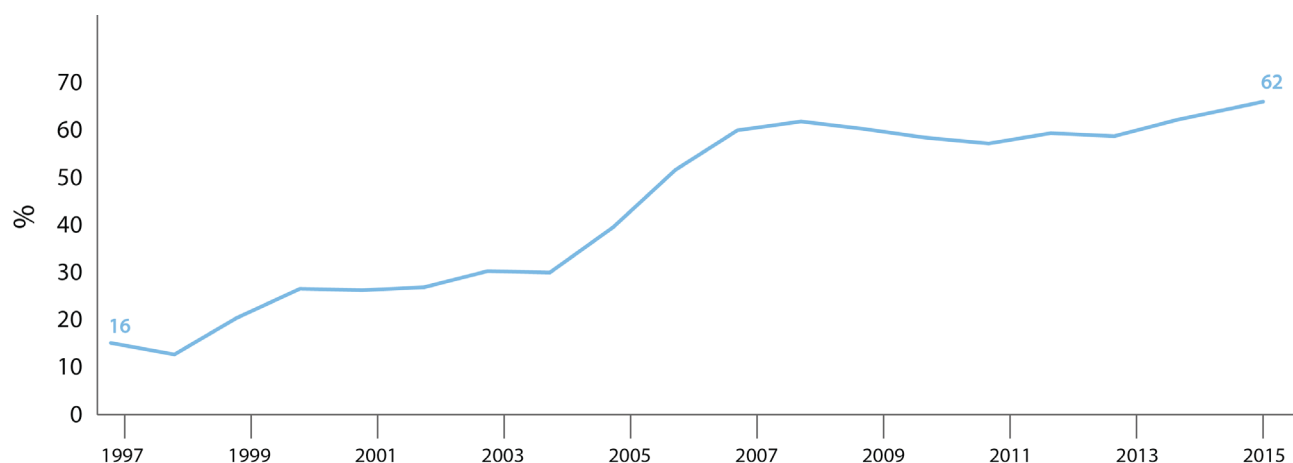
註：內地企業包括H股公司、紅籌公司及內地民營企業。
資料來源：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圖19：1997年至2015年內地企業股票全年總成交金額佔香港股市全年總成交金額的比重



註：內地企業包括H股公司、紅籌公司及內地民營企業。
資料來源：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圖20：1997年至2015年內地企業市值佔香港股市總市值份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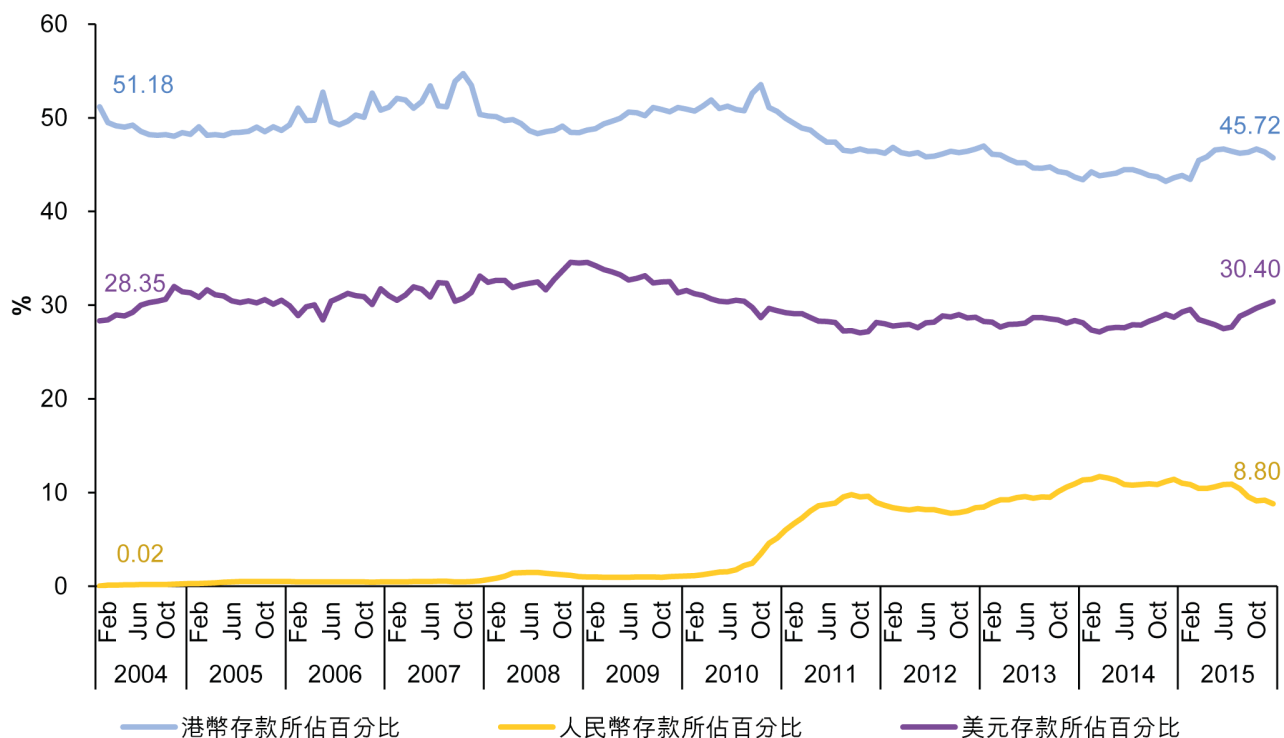


註：內地企業包括H股公司、紅籌公司及內地民營企業。
資料來源：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人民幣國際化乃中國國家政策。香港把握此契機，建設成領先的人民幣離岸中心，而且人民幣正逐漸獲得香港貨幣市場的認受。人民幣存款（包括定期、活期和儲蓄存款）佔香港貨幣供應量M2¹⁵的比重，從2004年的0.3%增加到2014年的11.4%。儘管此比重在2015年12月因人民幣急劇貶值而下降至8.8%，人民幣仍是香港M2的第二大外幣存款，僅次於美元（見圖21）。香港擁有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流動資金池，這創造了豐富的機會，讓香港金融服務業提供不同的人民幣計價產品，例如股票、點心債券和人民幣貸款。人民幣國際化有助進一步推動香港成為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第五章將就此詳細探討。

15 貨幣供應量M2包括現金及支票存款（即貨幣供應量M1），加上儲蓄存款、貨幣市場互惠基金，以及其他定期存款。

圖21：人民幣和美元存款佔香港貨幣供應量M2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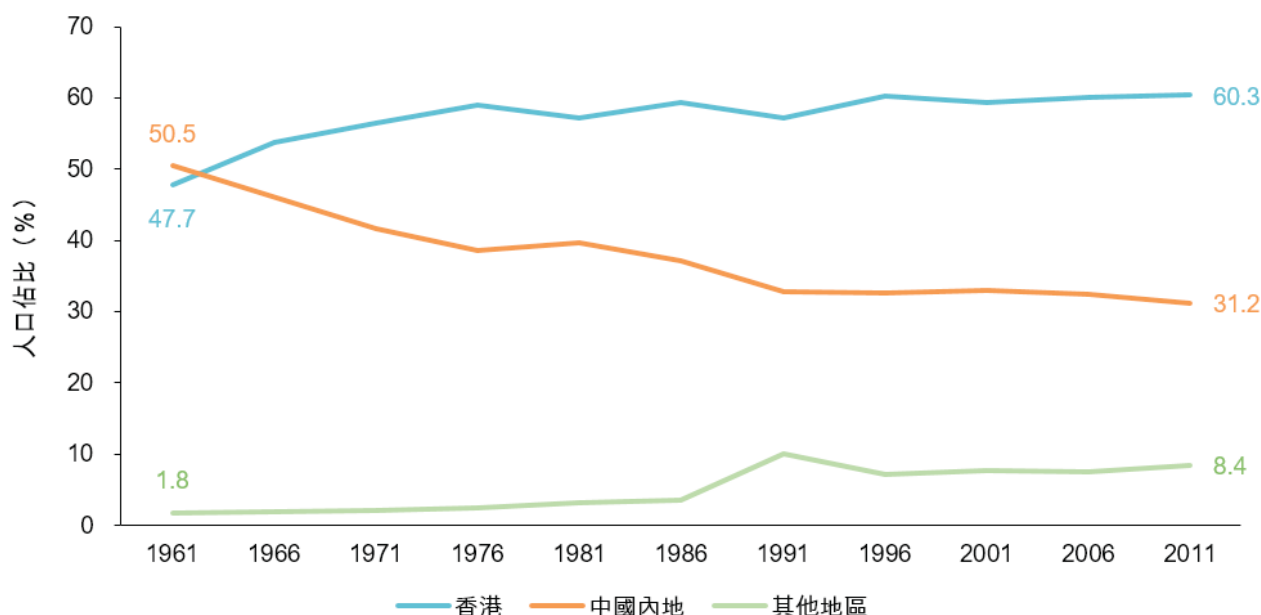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香港金融管理局，CEIC，團結香港基金

2.1.3 移民和人力資本的來源

一直以來，香港的移民主要來自中國內地。直至1960年代，香港都是個移民社會，半數以上人口均於香港境外出生而後來遷移香港。其後數十年，內地移民佔香港總體人口的比例慢慢下降，但由於內地移民仍不斷遷移到港，有關比例一直維持在30%以上（見圖22）。

圖22：1981年至2011年按出生地點劃分的香港人口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a) 內地移民與香港人口簡史¹⁶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日軍佔領香港期間逃離香港的移民形成浪潮，從內地返回香港。1949年到50年代初，另一浪為逃避共產統治的內地移民抵港。當時，中港之間對人口流動並無特別管制。移民潮衝擊後，1950年香港實施配額制度限制移民。「大躍進」於1960年代初期失敗後，引發了邊境管制實行後的第一波非法移民潮。從1959年至1962年，142,000名非法移民越過香港邊界。至1961年，香港人口有多達50.3%為中國內地出生。隨着中國改革開放，戶籍規限放寬導致地域間的人口流動性有所增加，引發1979年至1980年期間的第二波非法移民潮。此兩年間，逾30萬名移民湧港，令香港人口年均增長率增至5%。有鑑於此，香港政府於1980年10月宣佈取消「抵壘政策」，不再接收內地非法入境者。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非法移民潮，在「抵壘政策」取消前，一直都有少數非法移民抵港，亦有合法內地移民按配額來港。

16 如欲深入了解內地移民來港的情況，可參閱Lam & Liu (1998)，頁7-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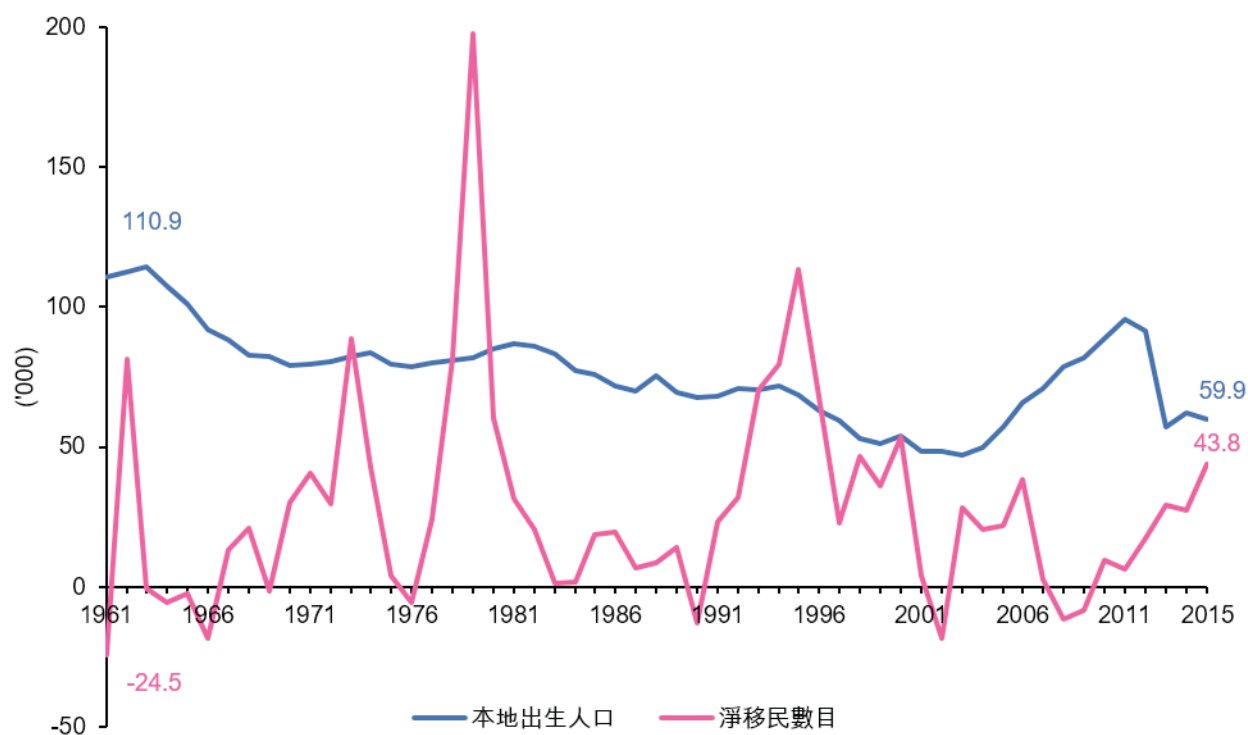
「抵壘政策」在1980年10月取消後，非法入境者不再獲發香港身份證，亦不能獲合法僱用。此後，內地移民只能按香港和中國政府訂立的每日配額合法移居香港。根據於1997年起實施的《基本法》，香港居民和內地配偶所生子女擁有香港居留權。為處理積壓的子女及配偶的申請，獲發「單程證」來港定居的內地移民配額於1993年由每天75名增至105名，並於1995年進一步增至150名，而此配額一直沿用至今。

合法和非法移民浪潮結束後，香港的人口結構徹底改變。根據1966年的人口普查，香港本土出生的人口開始超越移民數目，香港因此由移民社會逐漸變為住民社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現時香港本土出生的人口佔大多數，但他們的父母大多是內地移民。雖然他們本身並非移民，但可被稱為第二代移民。1991年的人口普查顯示，在20至25歲的年青人中，第二代移民所佔比例高達57%。在2011年的人口普查中，有關比例下降至30%，而第一代移民在該年齡組別中所佔比例為19%¹⁷。換言之，在該年齡組別中有接近一半本身是內地移民，或其父母是內地移民的第二代移民。

無論如何，中國內地的移民一直是香港維持人口增長的重要因素。從圖23可見，在過去半個世紀，隨着香港的總和生育率下降，出生數目不斷減少，導致人口增長放緩（預計到2043年會出現人口下跌）。主要由內地來港的淨移民（即來港人數減去離港人數）對減慢香港人口增速放緩至關重要，亦是防止香港未來人口萎縮的關鍵。關於防止人口萎縮這一點，我們將在第六章詳細論述。

17 Lam & Liu (2016)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al Mobility in Hong Kong: Are Immigrants More Mobile Than Natives? Working Paper No. 42, Lau Chor Tak Institute of Global Economics and Financ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vised version)

圖23：1961年至2015年香港本地出生人口及淨移民數目



註：淨移民相等於來港移民減去離港移民。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b) 移民作為人力資本的來源

海外及內地人才可通過各種入境計劃在香港工作和居留，包括「一般就業政策」、「輸入內地人才計劃」、「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優秀人才入境計劃」、「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以及「輸入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第二代計劃」。透過這些計劃來港的人士通常是擁有良好教育背景的技術人才。他們在香港連續居住滿七年，即可申請居留權。這類計劃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渠道，令香港可以吸引海外及內地人才來港，以補充香港的人力資本，並使勞動力供應更多元化。按特定計劃獲准來港人士，亦可申請其海外及內地受養人來港居留。如符合有關資格，內地居民亦可申領「單程證」來港與家人團聚。**表3**總結了上述八項計劃的宗旨和申請資格。通過這些計劃來港並在港居住滿七年，可申請居留權。這些計劃能夠成為香港入境移民和人力資本的來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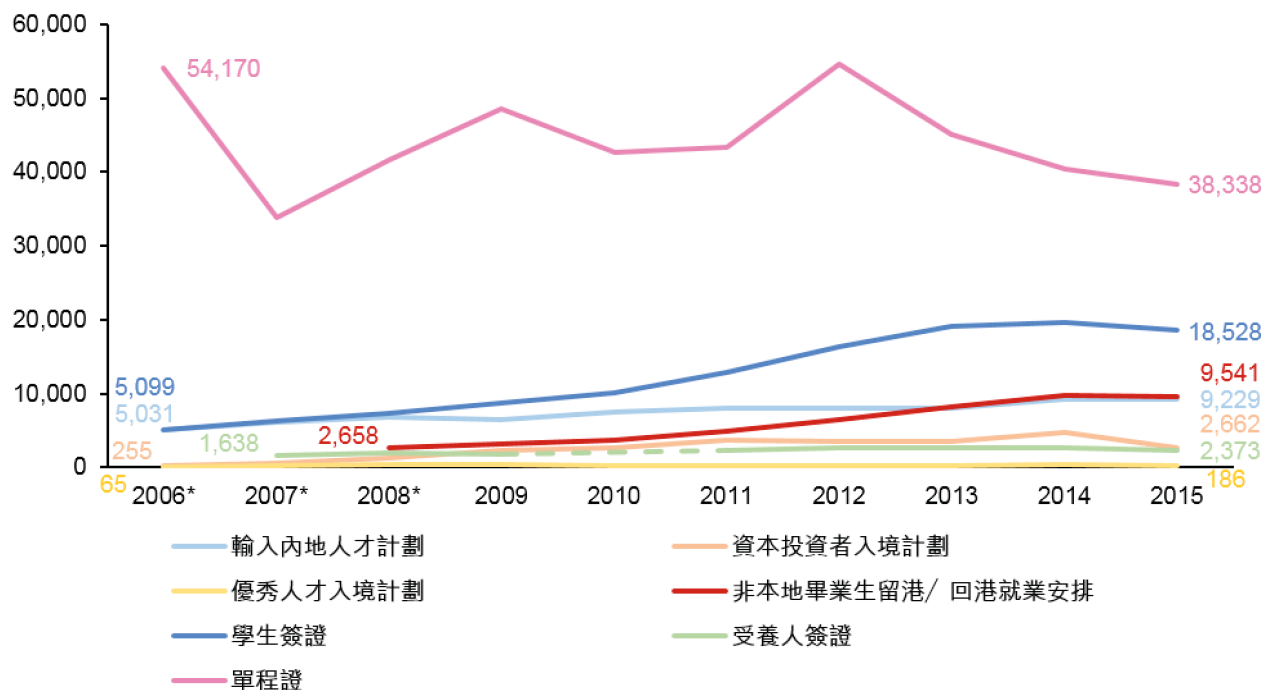
表3：香港不同入境移民計劃的宗旨及中國內地居民的申請資格

香港移民計劃	計劃宗旨	中國內地居民是否合資格申請
一般就業政策	讓專業人士來港就業	否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讓專業人士來港就業	是
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讓資本投資者來港居留	是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吸引高技術人才或優才來港定居，獲批准的申請人無須在來港定居前先獲得本地僱主聘任	是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 回港就業安排	讓非本地畢業生留港/ 回港就業	是
輸入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第二代計劃	讓已移居海外的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第二代回港工作	是
受養人簽證	為下列人士之直系親屬而設： (i) 香港永久性居民；或 (ii) 不受逗留期限約束的香港居民；或 (iii) 來港工作人士；或 (iv) 來港在本港頒授學位的院校就讀的人士；或 (v) 根據特定入境計劃來港的人士 (例如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否
單程證	讓內地居民來港與家人團聚	是

註：在「一般就業政策」及「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下簽發的短期工作簽證亦包括在內。
資料來源：入境事務處，團結香港基金

圖24顯示上述六項內地居民有資格申請的計劃中獲准來港的人數，以及同期簽發的學生簽證數目。雖然學生簽證的持有人並不能在港工作，但由於非本地學生畢業後可留港尋找工作，因此學生簽證的數目與通過「非本地畢業生留港/ 回港就業安排」獲准來港的人數有密切關係。圖25顯示2015年通過六項計劃而獲准來港的移民分佈。

圖24：2006年至2015年簽發予內地居民的特定簽證/ 入境許可證數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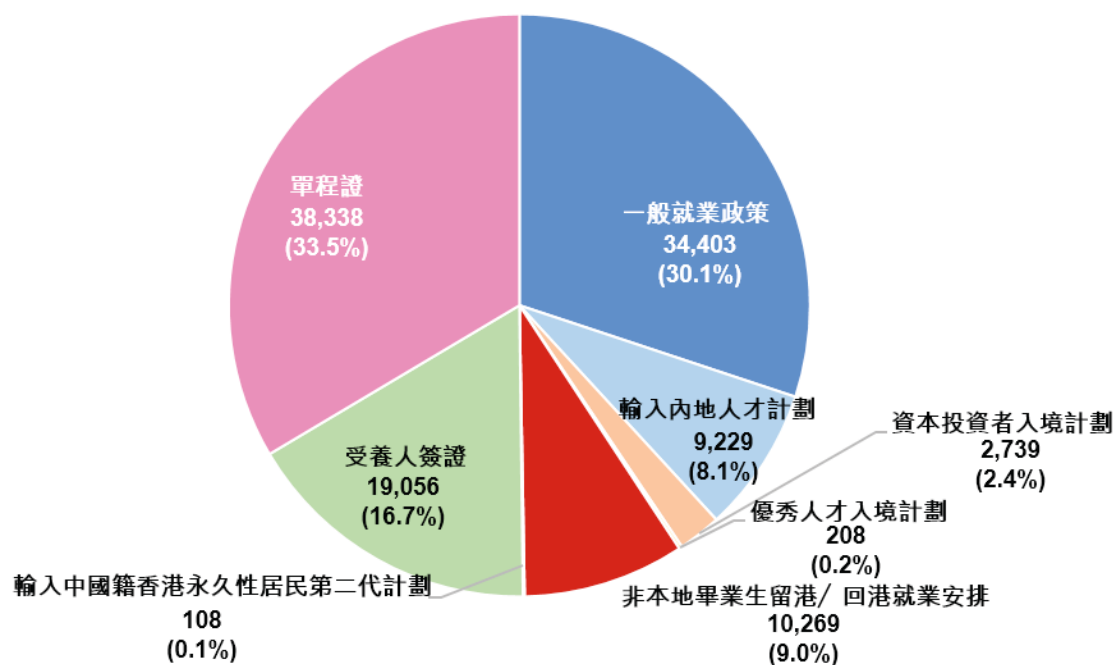


註：(*) 除「單程證」外，數字以財政年度計算。

- (1)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於2006年6月28日實施。
- (2)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 回港就業安排」於2008年5月19日實施。
- (3) 沒有2006年及2010年簽發的「受養人簽證」數字。

資料來源：入境事務處

圖25：2015年特定簽證/ 入境許可證簽發數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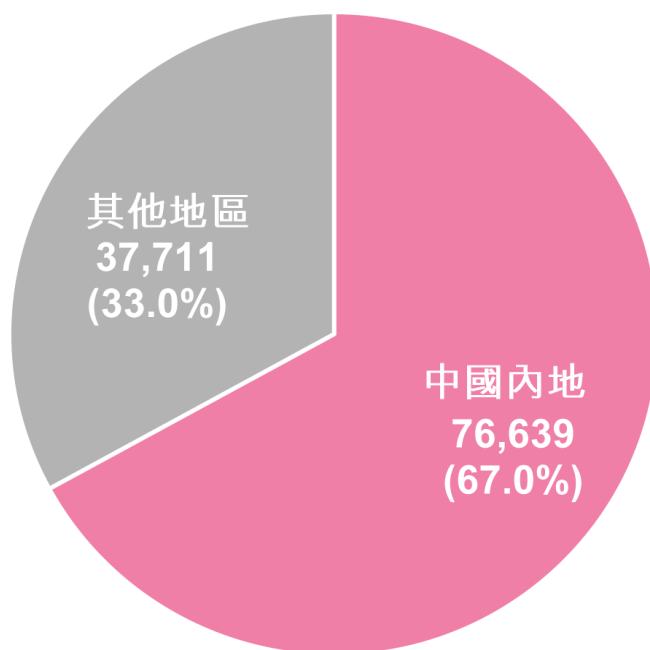


註：在「一般就業政策」及「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下簽發的短期工作簽證亦包括在內。

資料來源：入境事務處，團結香港基金

2015年，表3所列之八項計劃來港的人士當中，多達67%來自中國內地（見圖26）。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按「一般就業政策」來港的海外人士均以短期合約聘用，其逗留時間通常都不足以申請香港居留權。如計算當中有申請居留權的人士來自內地的比例，數字肯定超過三分之二。中國內地無疑是香港移民人口的主要來源。

圖26：2015年透過特定簽證/ 入境許可證來港人士按原居地分類的數目



資料來源：入境事務處

2.2香港對中國內地的重要性

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與其他國家/ 地區簽署13項自由貿易協議¹⁸，中國內地逐步向世界開放貿易，而香港在內地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的中介角色亦慢慢減退。雖然香港對中國內地在貿易方面的重要性有所減弱，但在內地不同的發展階段，香港對內地走向世界發揮關鍵作用，而將來亦必繼續扮演重要角色。

18 根據中國自由貿易區服務網，中國至今已簽訂13項自由貿易協議，涵蓋東盟、巴基斯坦、智利、新西蘭、新加坡、秘魯、香港、澳門、哥斯達黎加、冰島、瑞士、韓國和澳洲。

2.2.1 香港對中國內地的歷史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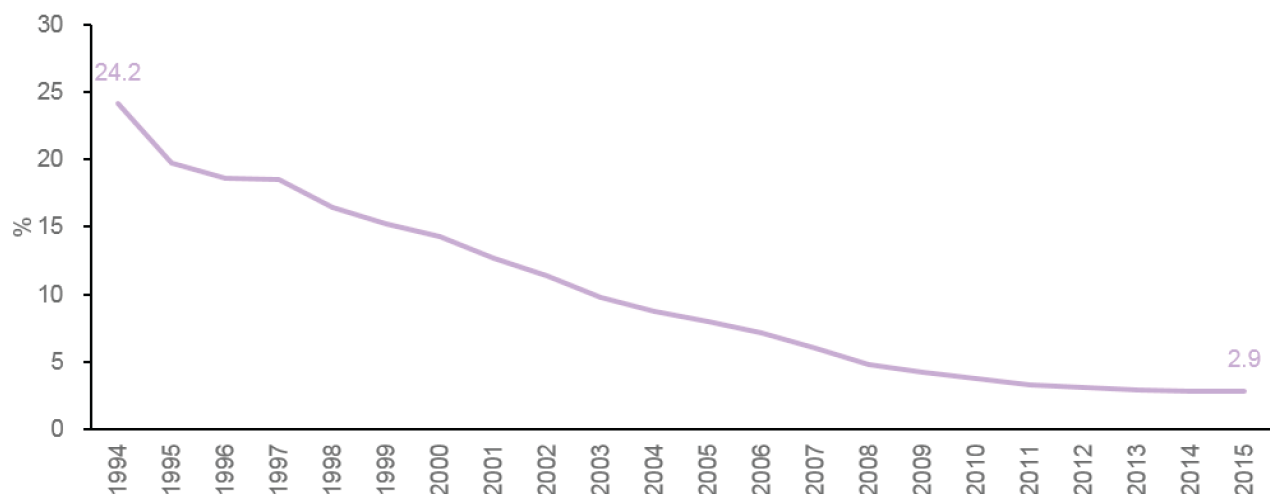
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初期，外國投資者擔心內地投資環境不穩，而且政策反覆，因此欠缺信心在內地投資。香港公司是首批到內地投資的商家，早期的投資項目例子包括1978年成立首家外資企業——珠海香洲毛紡廠；1980年成立首家中外合資企業——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以及1983年成立首家五星級酒店——白天鵝賓館。其後，內地經濟起飛，其他外國投資者緊隨香港的步伐，開始投資於中國內地。

除了直接投資，不少香港廠商將生產線北移到中國南部城市，並擴大其生產能力。90年代，在香港輸往內地的本地出口當中，超過70%（以貿易額計）涉及內地加工。香港投資者不僅將資金帶到內地，同時亦引進現代化管理方法和國際市場資訊，這加速了中國工業化和開放市場的進程。此外，作為中國市場與國際市場之間的橋樑，香港一直是內地企業「走出去」的踏腳石，亦是外資進入內地的渠道。

2.2.2 當前香港對中國內地的重要性

要衡量香港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可比對香港與中國內地的經濟生產總值。1994年，香港生產總值相當於中國內地的24%，到2015年此比例已降至不足3%（見圖27）。事實上，比對中國其他省份、直轄市和自治區，香港的生產總值高於內蒙古但低於安徽，換言之，約有一半省份和直轄市的生產總值較香港為高（見表4）。由此可見，就經濟生產總值而論，隨着內地經濟在過去數十年快速增長，香港對中國內地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

圖27：1994年至2015年香港生產總值與中國內地生產總值的比率



註：(1) 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台灣的生產總值不包括在中國內地的生產總值。
 (2) 生產總值是指以美元計的名義生產總值。上圖只顯示1994年後的數據，1979年至1994年期間，由於中國內地的匯率政策，人民幣大幅貶值；1994年後，人民幣匯率變得較為穩定。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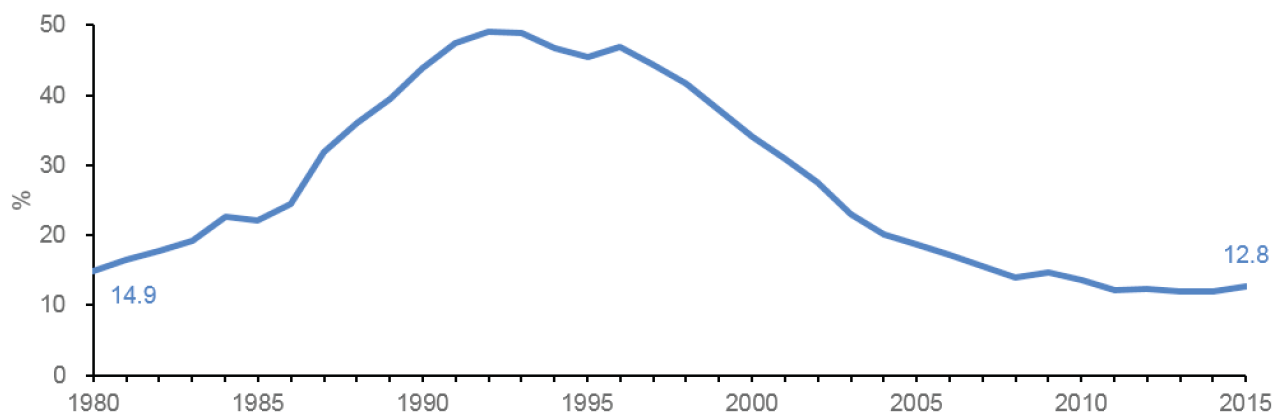
表4：2014年中國內地地區生產總值排名

地區	2014年佔全國生產總值比重	2014年排名	地區	2014年佔全國生產總值比重	2014年排名
廣東	9.9	1	天津	2.3	17
江蘇	9.5	2	江西	2.3	18
山東	8.7	3	廣西	2.3	19
浙江	5.9	4	黑龍江	2.2	20
河南	5.1	5	重慶	2.1	21
河北	4.3	6	吉林	2.0	22
遼寧	4.2	7	雲南	1.9	23
四川	4.2	8	山西	1.9	24
湖北	4.0	9	新疆	1.4	25
湖南	4.0	10	貴州	1.4	26
福建	3.5	11	甘肅	1.0	27
上海	3.4	12	海南	0.5	28
北京	3.1	13	寧夏	0.4	29
安徽	3.0	14	青海	0.3	30
內蒙古	2.6	15	西藏	0.1	31
陝西	2.6	16			

註：(1) 以上數據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台灣。
 (2) 四個直轄市以藍色陰影標示，五個自治區以黃色陰影標示。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團結香港基金

作為對方貿易夥伴的關係上，2014年香港是內地的第二大商品貿易夥伴。但必須指出，香港佔內地商品貿易總額的比重於1992年達到49%的頂峰，其後跌至2015年的12.8%（見圖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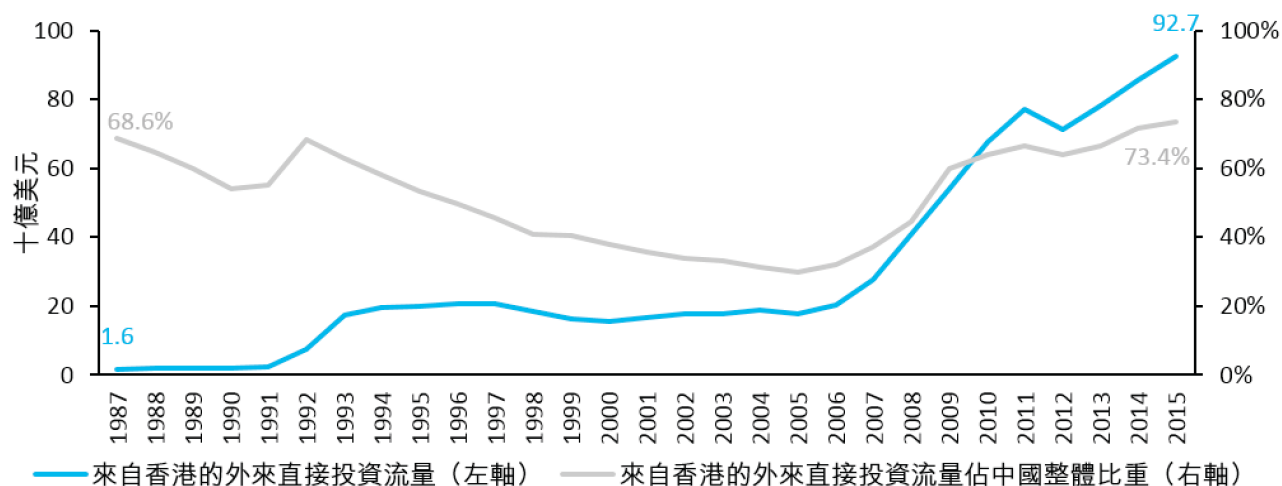
圖28：1980至2015年香港佔中國內地商品貿易總額的比重



資料來源: 香港政府統計處，中國國家統計局，團結香港基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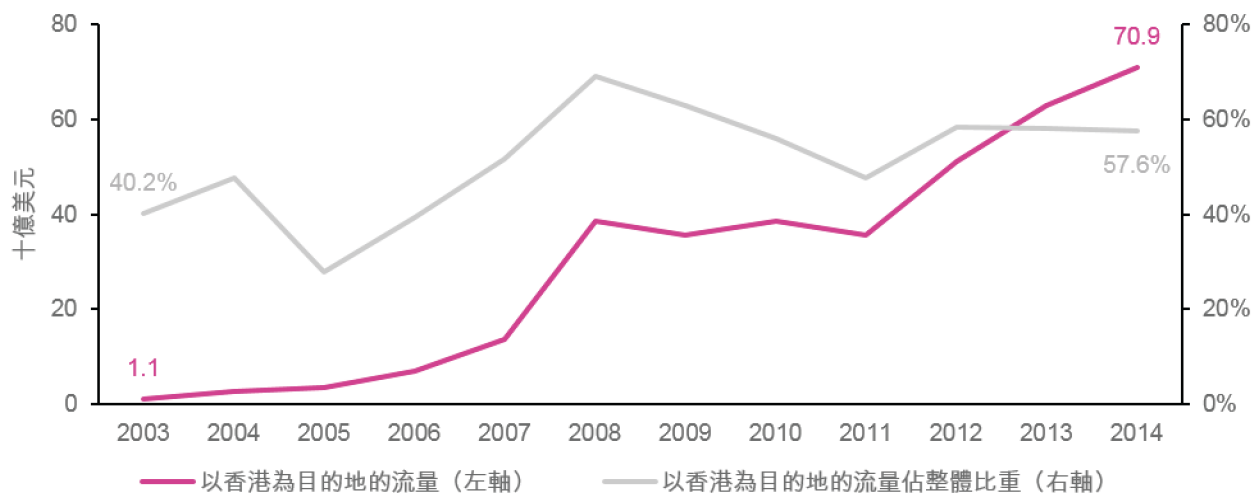
雖然香港作為內地貿易夥伴的重要性已逐漸下降，但在另外兩方面繼續對內地發揮關鍵作用，一方面作為外來直接投資內地的主要來源地，另一方面作為內地對外投資的主要目的地。自中國市場對外資開放以來，香港不論作為投資者或中介人，一直是外來直接投資中國的最主要來源。來自香港直接投資中國的金額，從1987年的不到16億美元，增加至2015年的927億美元，佔2015年中國的外來直接投資總額超過73.4%。與此同時，2006年至2015年間有關投資總額更錄得大幅增加，上升超過三倍（見圖29）。香港亦是內地對外直接投資的最主要目的地。2014年內地以香港為目的地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已上升至709億美元，佔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超過57.6%（見圖30）。

圖29：1987年至2015年中國每年來自香港的外來直接投資



註：按照國際標準，外來直接投資統計數據按投資的直接來源地計算。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中國國家統計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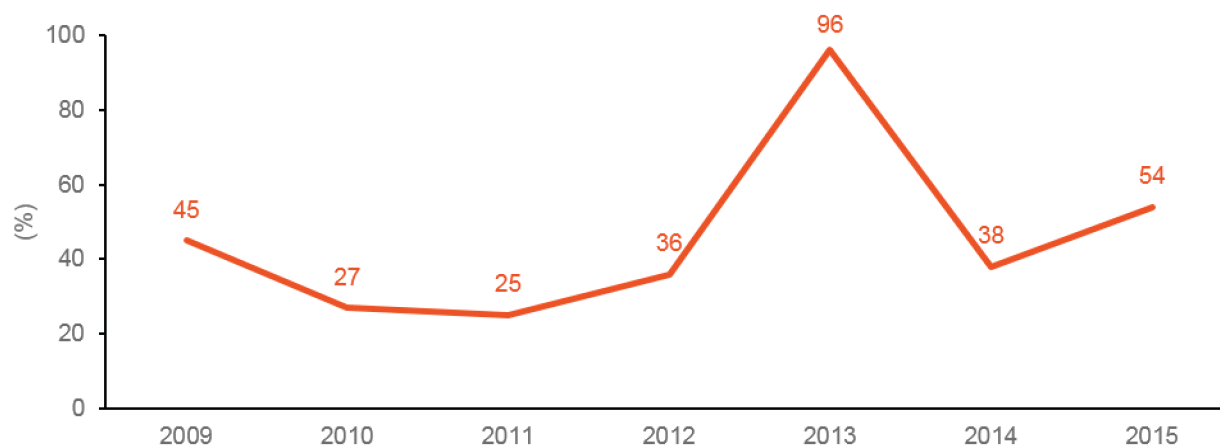
圖30：2003年至2014年中國每年以香港為目的地的對外直接投資



註：按照國際標準，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按投資的首個目的地計算。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此外，香港是中國內地企業通過首次公開招股籌集資金的主要金融市場。從2009年至2015年，內地企業通過首次公開招股所籌集的資金當中，逾四分之一來自香港股票市場¹⁹。2012年11月至2013年12月，中國政府暫停新股上市13個月，更突顯出香港對內地企業集資的重要性。因此於2013年，內地企業通過首次公開招股所籌集的資金當中，超過90%來自香港股票市場（見圖31）。香港為內地企業提供另一個通過首次公開招股籌集資金的渠道，尤其當內地實施金融管制措施。除了首次公開招股，內地企業亦可於香港透過銀行貸款或發行債券來籌集資金。過去數年，香港的人民幣金融平台相應發展。2015年，本港人民幣銀行貸款餘額為2011年的近十倍。同期，人民幣債券餘額亦增加了超過1.5倍（見圖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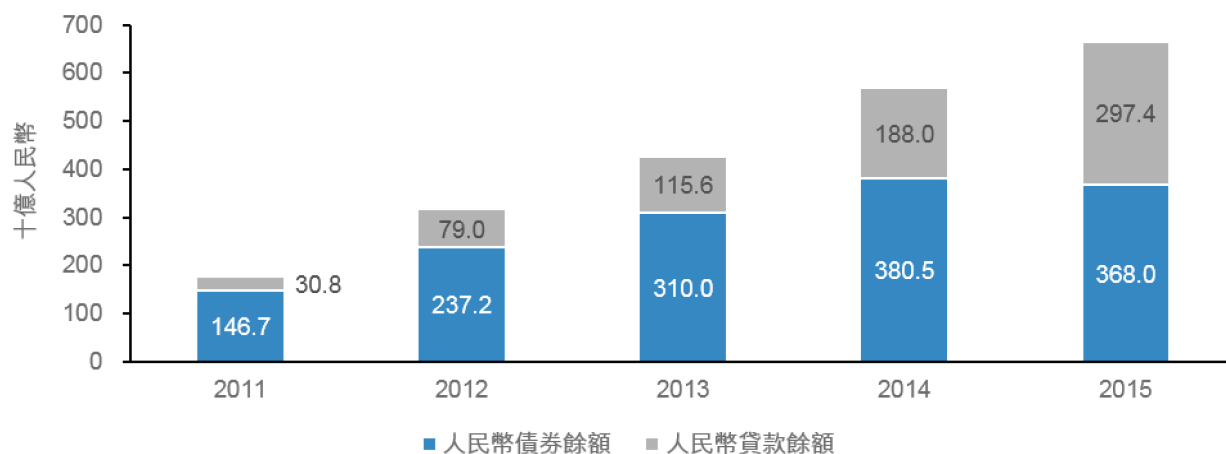
圖31：2009年至2015年內地企業於香港通過首次公開招股籌集的資金佔全部內地企業通過首次公開招股籌集的資金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清科研究中心

19 2014年，阿里巴巴在美國上市，所籌集的資金佔內地企業全年通過首次公開招股籌集的資金總額近35%。同年，內地企業通過首次公開招股所籌集的資金當中，38%來自香港股票市場（見圖32）。

圖32：2011年至2015年人民幣貸款餘額及人民幣債券餘額



資料來源：香港金融管理局

除了在物流和資金流方面對內地發揮重要作用外，香港在近數十年來亦成為了中國政府實施開放市場政策的試點，例如與內地簽訂首份自由貿易協議CEPA、成為首個擁有人民幣清算銀行的人民幣離岸中心、推出首個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計劃，以及發行首批海外人民幣主權債券及企業點心債券。此外，隨着試點項目「滬港通」推出，國際投資者將能首次通過港交所，直接參與中國最大的股票市場——上海證券交易所。上述試點項目在香港積累經驗後，中國政府會作適度調整，並進一步擴展到其他地區（見表5）。

表5：中國於香港推行的試點項目，以及在其他國家/地區的實行情況

	香港	其他地區
貿易	於2003年首次簽訂CEPA。	自2004年以來，中國內地與其他地區簽訂了12項自由貿易協議，包括東盟、巴基斯坦、智利、新西蘭、新加坡、秘魯、澳門、哥斯達黎加、冰島、瑞士、韓國和澳洲。
資本	2003年12月，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獲指定為首家離岸人民幣清算銀行。	截至2015年，在澳門、台灣、新加坡、英國和韓國等地，有20家獲指定為離岸人民幣清算銀行。
	首批海外人民幣主權債券於2009年在香港發行。	英國於2014年發行人民幣主權債券。
	香港於2011年率先推出RQFII計劃。	內地將RQFII計劃擴展至17個國家/地區，包括美國、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英國和韓國。
	「滬港通」於2014年11月推出，而「深港通」將於2016年年終推出。	內地正研究上海股市與倫敦及台北股市互通的可行性。

在接下來的「十三五」規劃中，中國將進一步與全球經濟融合、開放資本帳、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重新聚焦國內消費、推動經濟轉型並以第三產業為重，以及憑藉創新科技提高生產力、促進經濟增長。香港作為國際商業金融中心及中國的門戶，在中國走向世界的過程中，將繼續扮演重要的角色。香港成熟的自由市場經濟和各種制度，可作為內地建立其制度的參考。香港在服務業的優勢亦有助內地進一步發展第三產業。此外，內地企業在現代化過程中，在管理、企業管治和業務實踐方面均可向香港借鏡。

2.3 結語

總括而言，中國內地對香港的重要性於過去數十年顯著提升，而香港對內地改革初期的經濟發展亦扮演重要的角色。不過隨著時代變遷，香港對中國內地整體的重要性自90年代開始逐漸下降。中國迅速發展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港兩地經濟規模的差距日漸擴大。隨着中國晉身全球最大貿易國，香港佔內地對外貿易的比重已大幅減少。然而，香港在中國資本帳開放，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並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的過程中其重要性仍不容忽視。香港應洞悉這些變化，尋找當中機遇並再次與中國內地緊密聯繫，在中國這一輪經濟增長過程中繼續扮演重要的角色。隨着中國踏入經濟發展的新階段，香港應定位為內地緊密的合作夥伴，分享中國內地經濟增長的成果。

下一章，我們將探討一般的經濟發展政策。在第四至六章，我們將就中港之間於物流、資金流和人流這三個層面上的合作提出具體政策建議。

3. 經濟增長與中國內地因素

3. 經濟增長與中國內地因素

3.1 經濟增長動力

我們可從三個角度分析經濟增長的動力，了解經濟增長的成因。首先是供應角度，經濟增長（按經濟生產總值增長計）受制於資本、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長，以及其全要素生產率。若政府透過政策增加上述生產要素的供應並提高其效率以推動經濟，從這供應角度去作分析會是恰當。第二個角度是需求層面，經濟生產總值增長是由總需求的增長帶動，而總需求由消費、投資、政府開支和淨出口組成。如政府希望透過刺激總需求中的不同組成部分來促進經濟增長，從這需求角度去作分析便較恰當。第三個角度是產業結構層面，經濟生產總值增長可歸因於不同產業的增長，例如可分為第一、第二及第三產業，或再細分為製造、物流、旅遊、金融服務、商業服務等不同行業的增長。若政府透過政策推動某些行業發展以達至經濟增長，從這產業角度去作分析便會較恰當。

傳統經濟增長模型以供應面為基礎。在一定數量資源投入的條件下所能生產的最大產量，稱之為潛在經濟生產總值。潛在經濟生產總值是當資本和勞動力在當前的科技和效率下充分使用（即在效率前沿上），而可達至的最高經濟生產總值水平。在短期內，可以利用迄今未充分利用的資源並移至效率前沿，以實現經濟增長。但長遠而言，只有當資本、勞動力和全要素生產率有所增長，才能達至經濟增長（即潛在經濟生產總值增長）。因此，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在於增加投資，以提高資本和土地存量；通過人口增長和提高勞動人口參與率以增加勞動力；提升勞動人口的知識和技術以增加人力資本；以及增加對研發和科技創新的投入，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擴大經濟產能以實現更高的潛在經濟生產總值增長，政府必須著眼於中長期的規劃，制訂土地、基礎設施、人口、移民、教育和創新科技政策。

從短期來看，除非供應面出現意外變動，經濟生產總值增長主要由消費者、投資者、政府和境外對商品和服務的總需求增長來決定。政府刺激消費、促進貿易和吸引外國投資的政策，可從需求面上提供經濟增長動力。這些政策包括刺激消費和投資的稅收政策，以及與其他國家簽署貿易協定從而減少貿易壁壘。

經濟活動以不同產業和市場劃分，政府往往會扶助特定產業以推動經濟增長，例如制訂政策以便利投資、促進該產業的生產要素投入，以及為該產業的產品開拓市場。儘管政府可針對特定產業促進經濟增長，但最終經濟增長仍離不開增加生產要素投入及產品需求。

3.2 中國內地對香港經濟發展的支持

第二章已詳述中國內地對香港經濟的重要性。在推動香港經濟增長的政策中，中國內地無疑會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在不少重大國策中，中央政府亦都展示出對香港的高度支持。香港應充分利用自身優勢，在國家的重點政策中擔當主要角色。

中央政府在國家「十三五」規劃中，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其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的地位，並明確支持香港發展創新及科技事業，以及成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於2016年5月舉行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期間，國家領導人張德江²⁰表示，中央政府將在專業服務、金融服務以及人文交流的範疇上，加強香港在「一帶一路」建設的角色，並深化與內地合作，共同開闢「一帶一路」市場。在區域層面上，按《粵港合作框架協議》、《加強深港合作的備忘錄》以及《橫琴總體發展規劃》，當局將全力支持交通基礎設施的發展，包括港珠澳大橋和廣深港高速鐵路，以促進廣州與香港之間的交通往來，並通過興建蓮塘/香園圍口岸，便利過境。內地政府亦會將《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的服務貿易自由化措施推展至全國。區域發展方面，內地政府鼓勵粵港兩地合作，包括前海、南沙、橫琴等合作發展項目，長遠而言更有意打造「粵港澳大灣區」。

2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

3.3 政策前提

要推動香港經濟增長有很多不同方法，但我們將會集中討論那些中國內地扮演著重要角色的政策。下文我們將針對供應、需求和特定行業三個角度，提出一套政策用以推動香港未來的經濟增長。此套政策建基於下列前提，而這些前提乃總結香港過去和當前的成功經驗而得出：

1. 香港經濟高度開放，要延續成功必須維持開放；轉趨內向孤立將會令經濟不振；
2. 香港必須對貿易夥伴、海外投資者和旅客保持熱情友好；
3. 香港屬細小經濟體，其經濟盛衰不免受本港最大貿易夥伴及投資者，亦即中國內地所影響；
4. 香港必須與內地經濟維繫良好的相互依存關係，一方面分享內地經濟發展的成果，另一方面為內地發展提供適切和寶貴的支援，從而使兩地雙贏關係得以持續。

內地與香港的經濟關係以《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憲政安排為基礎。「一國兩制」這史無前例的安排使中港兩地皆有所得益。沒有「一國兩制」，香港將無異於中國其他主要城市。對於香港未來的發展，內地和香港必須尊重和強化「一國兩制」，並共同捍衛為此憲政安排提供法律框架的《基本法》。

4. 香港對外貿易何去何從

4. 香港對外貿易何去何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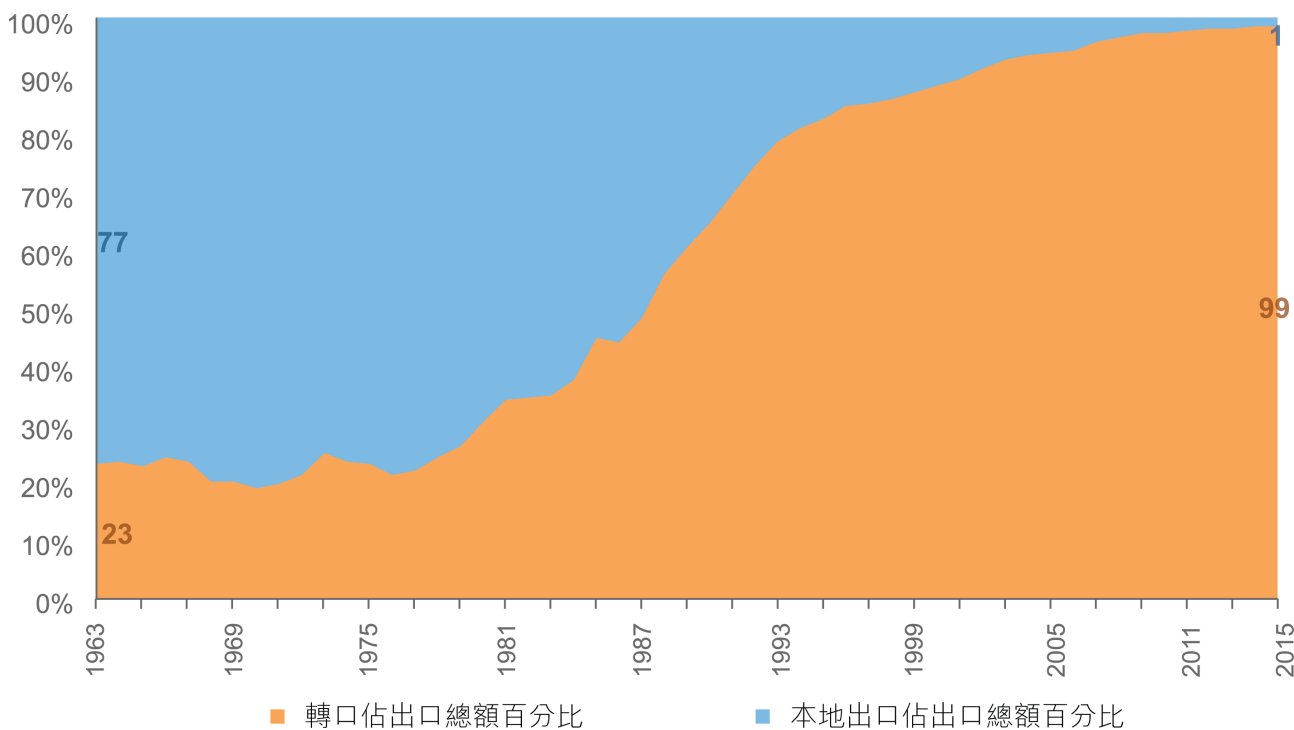
4.1 序言

香港起初是廣東省沿岸的貿易前哨基地，後來發展成為全球第七大貿易經濟體²¹，其對外貿易結構經歷了不同階段的變化。對外貿易總額包括商品貿易（又稱為貨品貿易或有形貿易）以及服務貿易（又稱為無形貿易），兩者均由出口和進口組成，而商品出口又分為本地出口和轉口。

香港商品貿易的結構不斷改變。80年代，港產品出口的主導地位被轉口所取代。50至70年代，來自中國內地的移民為香港提供充裕的勞動力，紡織、服裝、玩具及手錶等本地輕工業發展蓬勃並帶動港產品出口大增，當時港產品出口佔出口總額近80%。70年代後期，隨着1978年中國內地推行經濟改革，不少香港廠商將生產工序北移，而香港的輕工業則逐漸萎縮，香港經濟由港產品出口主導轉型為轉口貿易主導（更準確說為近年集中發展離岸貿易和轉運）。轉口貿易佔商品出口總額的比重於60年代約為20%（見圖33），到2015年此比重已達99%，而港產品出口僅佔1%。

21 根據世界銀行，七大貿易經濟體分別是美國、中國、德國、英國、日本、法國和香港。

圖33：1963年至2015年香港本地出口及轉口佔商品出口總額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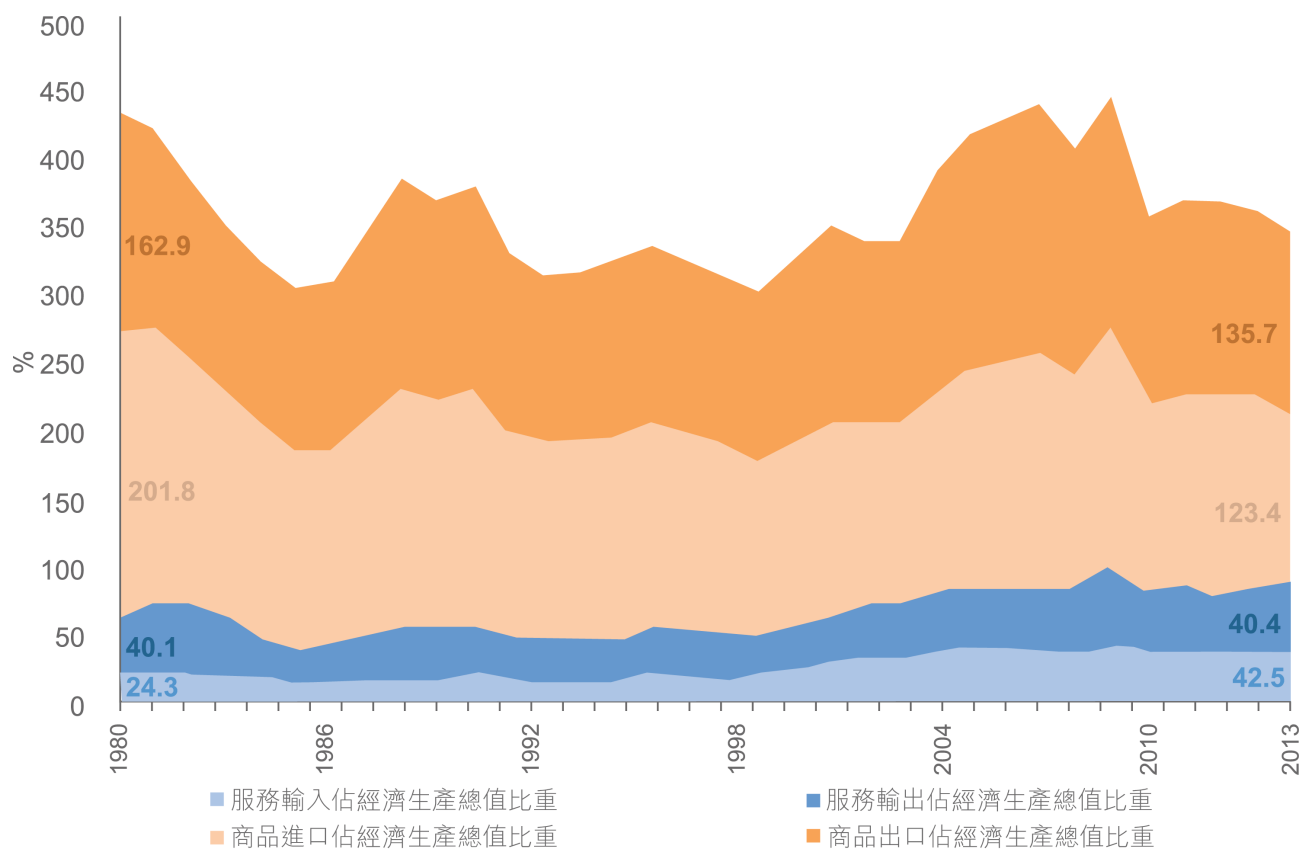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早期作為廣東的一個轉口港，香港的對外貿易很大程度上依賴其背後的腹地。當前，中國正經歷經濟轉型，對外需的依賴減少並轉為內需主導，香港的商品轉口貿易正面臨重大挑戰。香港的對外貿易應往哪個方向發展？未來的機遇何在？

4.2 從商品貿易走向服務貿易

新加坡和香港皆為高度開放的細小經濟體，兩者的貿易結構經歷了多次改變。雖然新加坡的貿易仍以商品貿易為主，但商品貿易佔新加坡經濟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80年的365%逐漸下降至2013年的259%，而同期服務貿易佔經濟生產總值的比重則從64%增至83%（見圖34）。

圖34：1980年至2013年新加坡對外貿易佔經濟生產總值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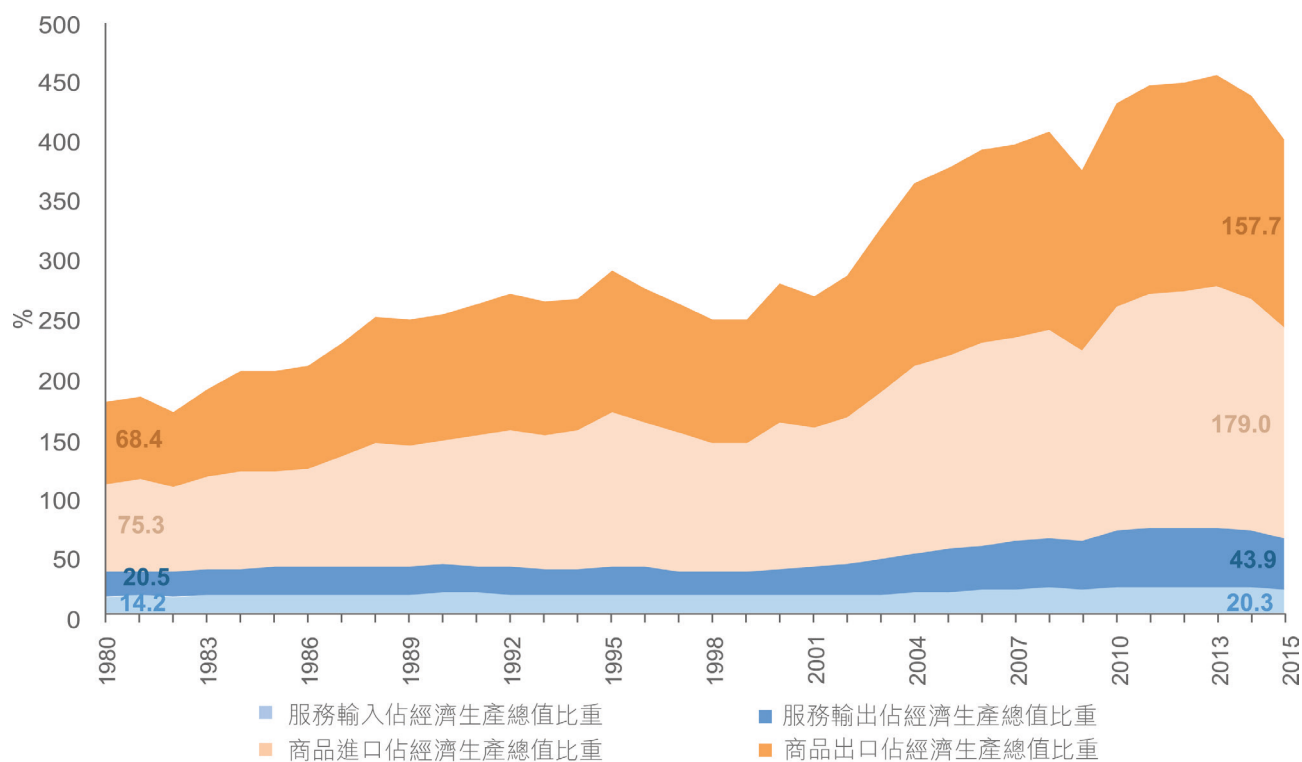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團結香港基金

與新加坡相比，香港商品貿易的比重相對於服務貿易的規模較大。從1980年至2015年，商品貿易佔香港經濟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44%增至337%，而服務貿易佔經濟生產總值的比重僅從35%提升到64%。過去十年，服務輸出佔經濟生產總值的比重顯著上升，但由於中國內地提供的製造服務²²減少，本港服務輸入的比重接近不變（見圖35），這或許是香港服務貿易增長緩慢的原因。相比起新加坡和盧森堡，香港服務貿易佔經濟生產總值的比重仍有增長空間。

22 製造服務是指加工、裝配、標籤、包裝等製造活動，而提供這些服務的加工單位並不擁有有關貨品。

圖35：1980年至2015年香港對外貿易佔經濟生產總值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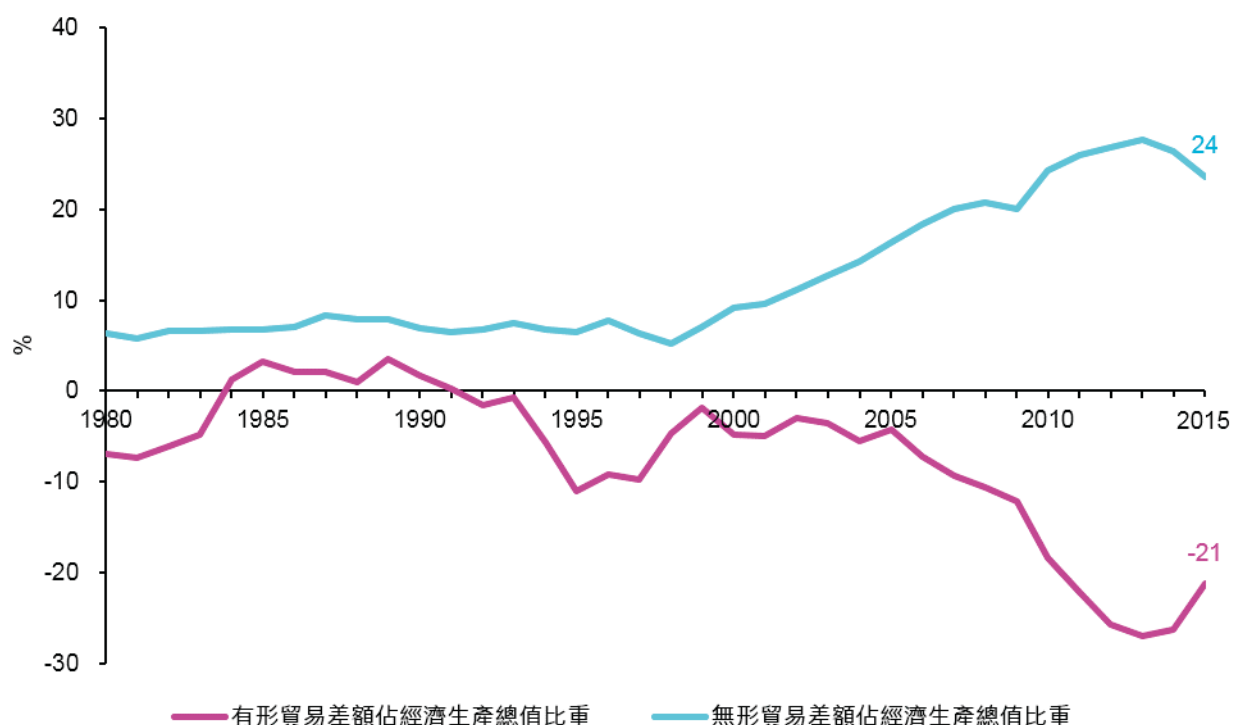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團結香港基金

4.3 貿易平衡對香港的重要性

香港屬細小經濟體而且缺乏天然資源，大部分本地消費品（包括食品及服裝）均從其他地區進口。隨着製造業式微，本地出口一直下降。雖然轉口貿易額有所上升，但香港的商品出口總額不足以抵消其不斷增加的商品進口總額，因此香港自1992年以來一直錄得有形貿易赤字²³（見圖36）。可幸的是，香港自1961年以來一直錄得無形貿易盈餘²⁴。2015年，有形貿易赤字相當於名義經濟生產總值的-21%。無形貿易盈餘持續上升並在同年達到名義經濟生產總值的24%（見圖36）。換句話說，服務貿易之盈餘完全抵消了商品貿易之赤字，令香港於2015年有少量總貿易盈餘。

圖36: 1980年至2015年香港名義有形及無形貿易差額佔名義經濟生產總值比重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團結香港基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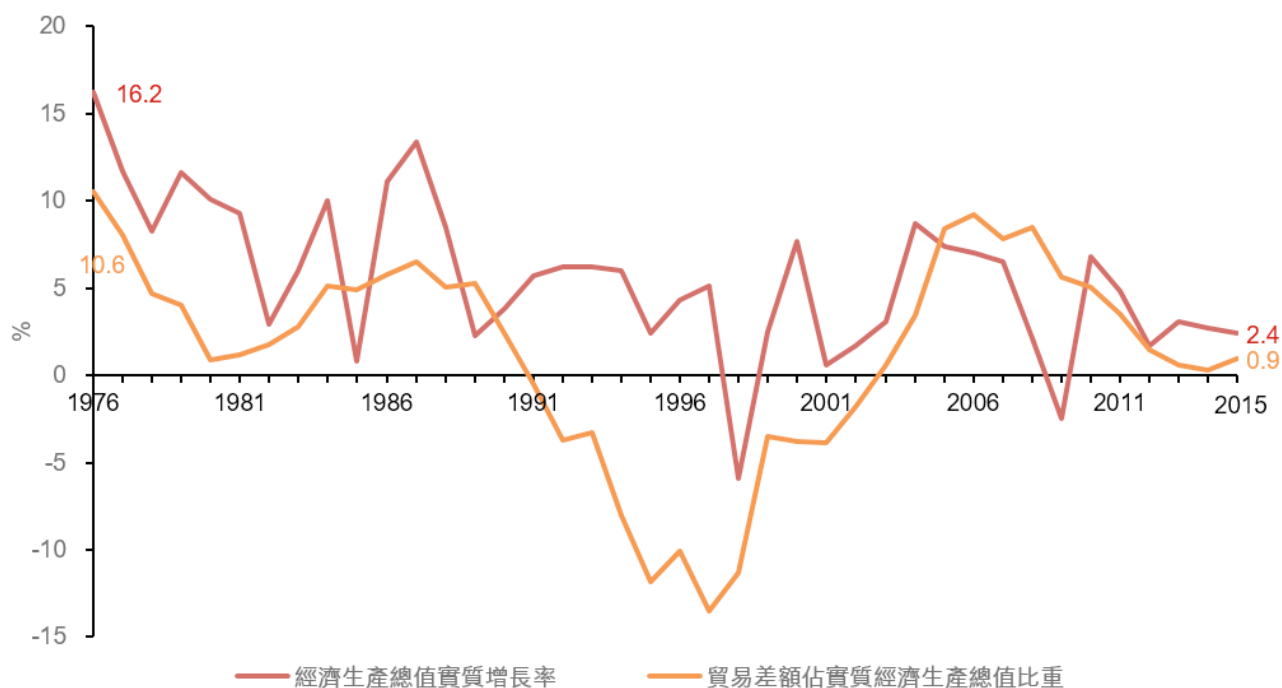
由於香港是高度外向型的經濟體，總貿易赤字往往伴隨著經濟衰退或放緩。例如，從1995年至1998年本港的總貿易赤字激增至實質經濟生產總值的10%以上，同期香港的經濟增長率從4%到5%的高位大幅跌至-6%的低點（見圖37）。根據1976年至2015年的數據，總貿易差額與實質經濟生產總值增長率的相關系數²⁵為0.44，表示兩者之間存在正向關係。因此，維持適當的貿易平衡或貿易盈餘對香港十分重要。

23 又稱為貿易逆差，即進口總值大於出口總值。

24 又稱為貿易順差，即出口總值大於進口總值。

25 相關系數數值介乎-1至1之間，-1表示兩個變量呈現絕對的反向線性關係，1表示兩個變量呈現絕對的正向線性關係，而0則表示兩個變量並不相關。

圖37: 1976年至2015年香港實質總貿易差額與實質經濟生產總值增長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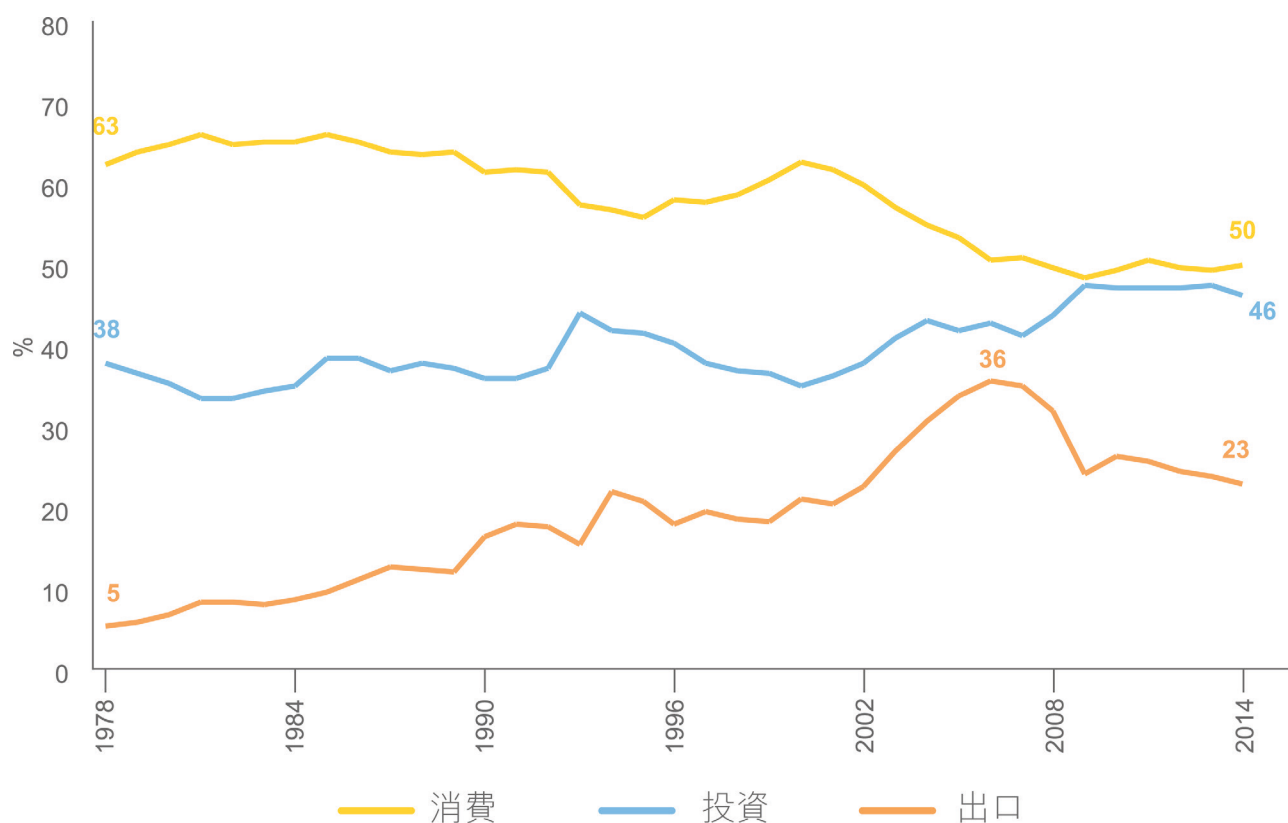
註：此圖所列出的總貿易差額佔經濟生產總值的百分比有別於圖37，是由於圖37所用的是名義數字而此圖所用的是實質數字。實質數字已剔除了價格影響，包括匯率及產品價格的變化。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團結香港基

4.4 中國內地宏觀經濟的變化

過去數十年，特別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內地受惠於其自由貿易政策，並憑藉本身低廉的生產成本而成為了「世界工廠」。對外貿易的高速增長加快了經濟發展的步伐。然而，由於生產成本上漲，加上人民幣在過去十年持續升值，中國內地的製造業正逐漸失去競爭優勢，不少生產線均從中國內地遷移到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國家。中國再不能依賴製造業出口來推動經濟增長。從「十一五」（2006年至2011年）規劃開始，中國內地便提出要推動經濟改革，將經濟由出口導向轉為由國內消費帶動。內地出口總額佔經濟生產總值比重從2006年36%的最高點，下滑至2014年的23%（見圖38）。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初步核算（2016），2015年全年最終消費支出（包括居民和政府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達66%，按年提高15.4個百分點。與此同時，第三產業²⁶（又稱為服務業）對中國內地日益重要。雖然第二產業對經濟生產總值的貢獻率維持在40%以上，但第三產業的貢獻率從1978年的25%增加至2015年的超過50%（見圖39）。服務業正逐漸成為支持內地經濟增長的支柱行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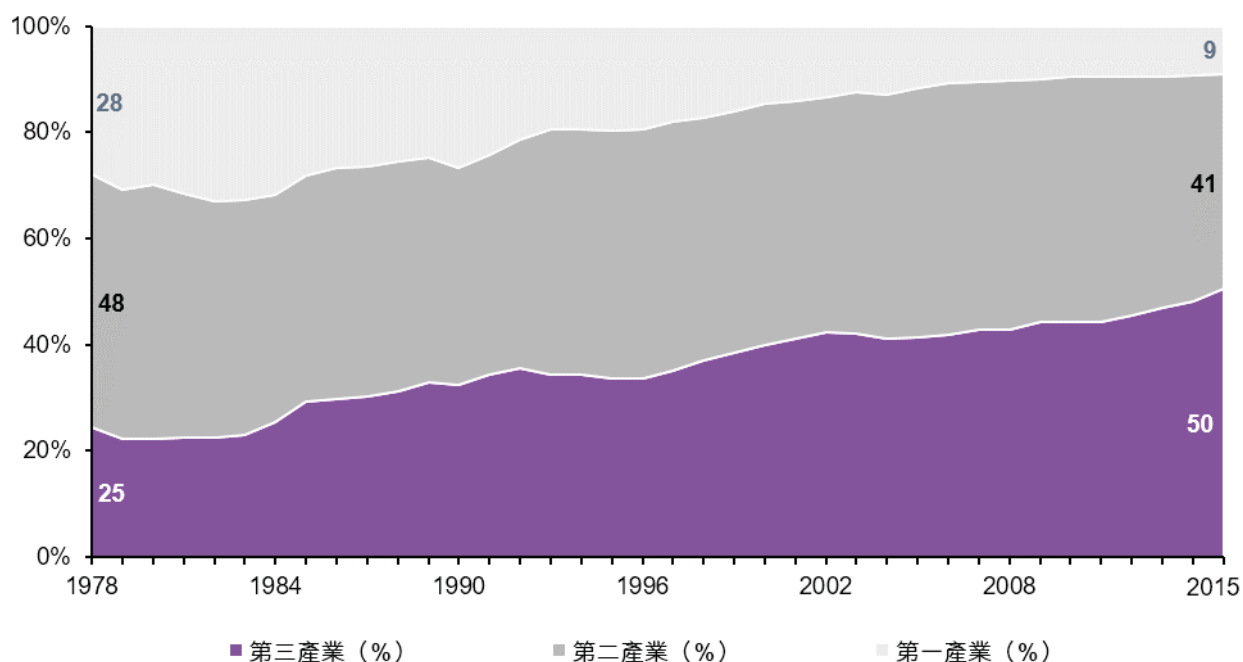
26 第一產業泛指一切從事原材料開採的行業；第二產業泛指將原材料或半製成品製造成產品的行業；第三產業泛指為消費者和企業提供服務的行業。

圖38: 1978至2014年中國內地經濟生產總值特定支出組成部分佔整體百分比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圖39: 1978年至2015年三大產業佔中國經濟生產總值百分比



註：2015年為初步數字。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

正如第2.1.1節圖12所示，中國內地的商品出口增長自2010年起持續放緩，從2012年至2015年連續四年僅錄得個位數或負數增長。2015年中國內地的商品出口錄得-2.9%的負增長，是自1978年經濟改革以來第二次錄得負增長（第一次是由於2007年至2008年的環球金融危機）。內地的外貿直至2016年仍未復甦。在2016年首兩個季度，內地的商品進口和出口仍然錄得按年負增長²⁷。

4.5 對內地輸出服務作為香港經濟的增長動力

由於來自中國的商品轉口一直是香港商品出口的主要部分，香港的商品出口在2015年亦同樣縮減並錄得-1.9%的負增長（見圖12）²⁸。隨著中國內地經濟轉型和逐步以內需為主導，香港商品貿易的雙位數高增長時期可能已經結束。香港經濟必須適應這「新常態」，減少依賴商品貿易，並且在服務貿易中尋找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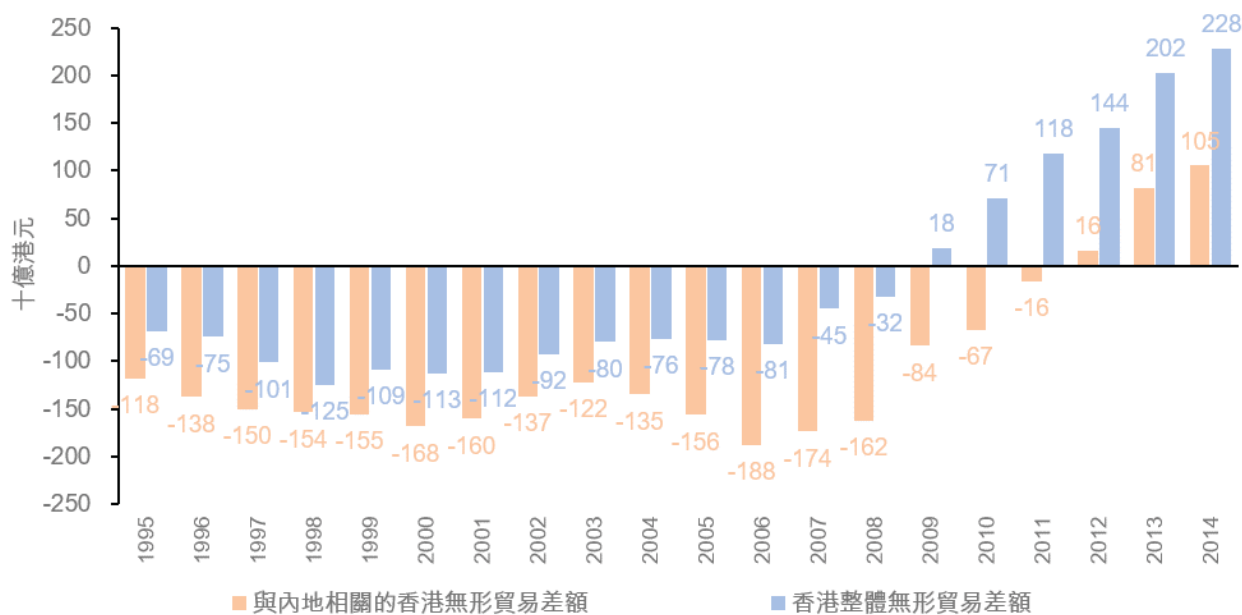
香港的服務貿易有上升趨勢；服務輸出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98年的20%，增加超過一倍至2015年的44%。中國內地是香港最大的服務貿易夥伴（不包括非直接計算的金融中介服務²⁹）。經歷2007年至2008年的金融危機後，中國內地的製造業持續衰退，香港從內地進口的製造服務從2006年的最高位下跌。由於對內地的服務輸出（特別是旅遊服務）持續增加，而且從內地進口的製造服務減少，香港對內地的雙邊服務貿易差額於2012年由赤字轉為盈餘（見圖40）。

27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

28 1979年至2015年，香港與中國內地商品出口的相關系數為0.63。

29 沒有非直接計算的金融中介服務的分區數據。

圖40：1995年至2014年與內地相關的香港服務貿易差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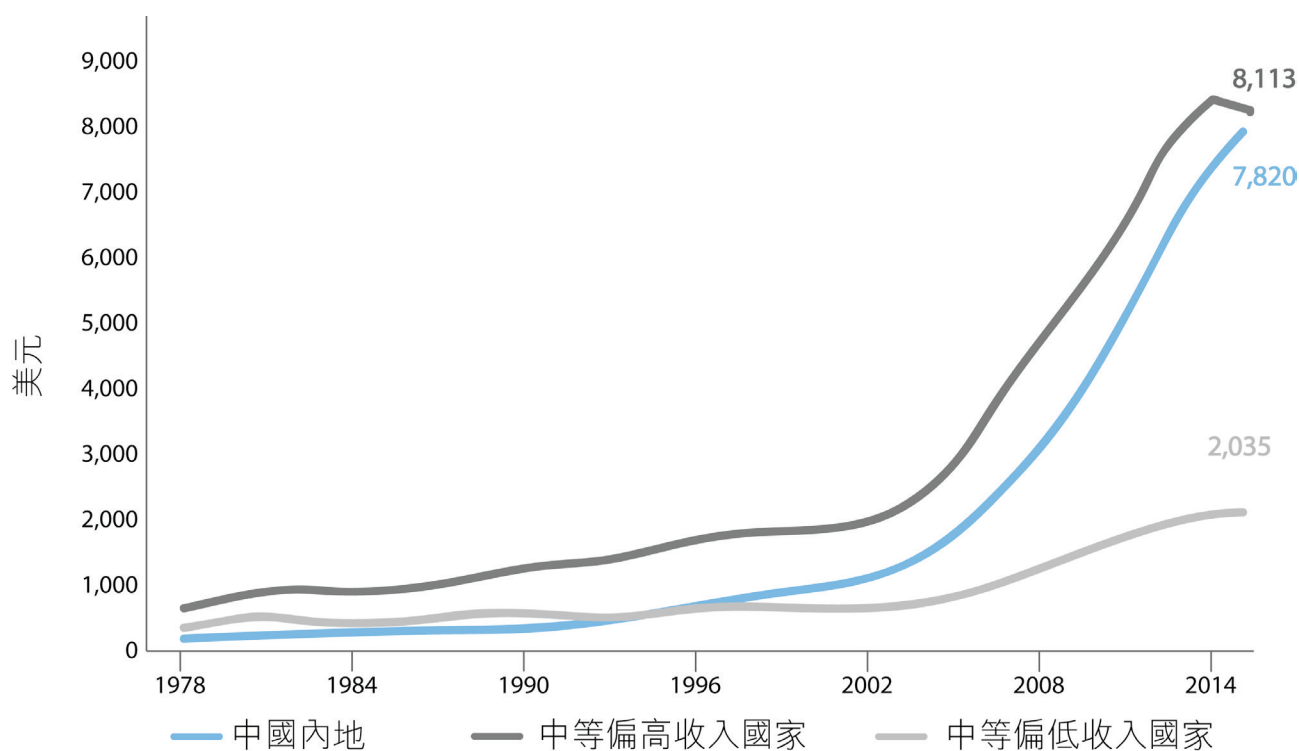
註：由於沒有非直接計算的金融中介服務的分區數據，以上數字不包括有關資料。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4.6 中國內地不斷增強的消費能力

展望未來，中國內地人民的消費能力不斷提高，帶動對香港服務的需求增加。世界銀行將中國內地歸類為中等偏高收入國家，2015年人均國民總收入為7,820美元（見圖41）。內地城鎮人口的比例從1978年的18%增至2015年的56%，達7.71億人（見圖42），而根據「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國家將以2020年城鎮化率達到60%為目標。2014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每年可支配收入達29,000元人民幣，為2002年的三倍以上，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二十之家庭組別的人均每年可支配收入甚至高達62,000元人民幣（見圖43）。城鎮人口的總消費力將十分龐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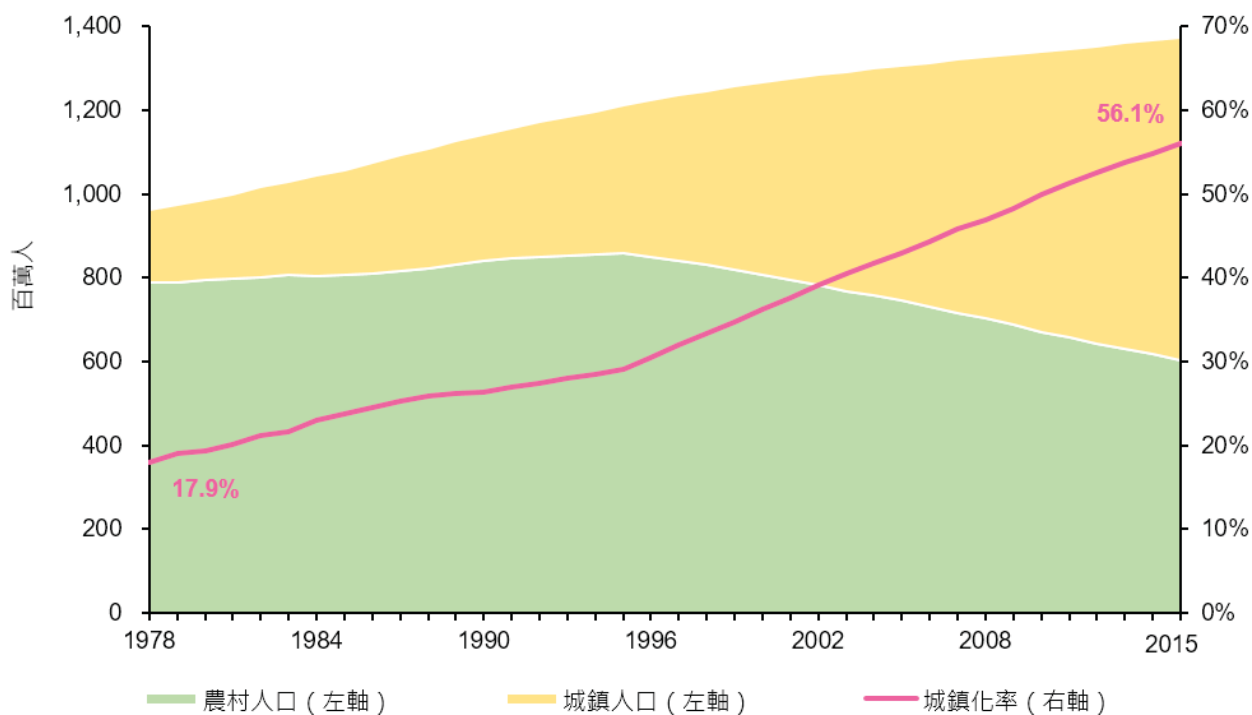
所有國家的消費研究均顯示，消費者的收入越高，對高價值商品（而非必需品）的支出比例將會越高，中國內地的情況亦不例外。隨著內地消費能力提升，高價值服務佔消費支出的比重將會增加。從圖44可見，「食品」和「衣著」這兩種必需品佔消費支出的比例，從1993年的50%和14%，分別下降至2013年的35%和11%。而「醫療保健」、「交通通信」和「文教娛樂」這三類高價值服務所佔的比重，則從1993年的2.7%、3.8%和9.2%，分別增加至2013年6.2%、15.2%和12.7%。因為社會富裕、人口老化以及人民的健康意識提高，令居民對醫療保健服務的支出增加；互聯網和流動通訊日趨普及，亦可以解釋到居民增加對交通通信服務的支出；當消費者更富足，自然更願意花費在旅遊、教育、文化和娛樂活動。

圖41: 1978年至2015年中國內地、中等偏高收入國家及中等偏低收入國家的名義人均國民總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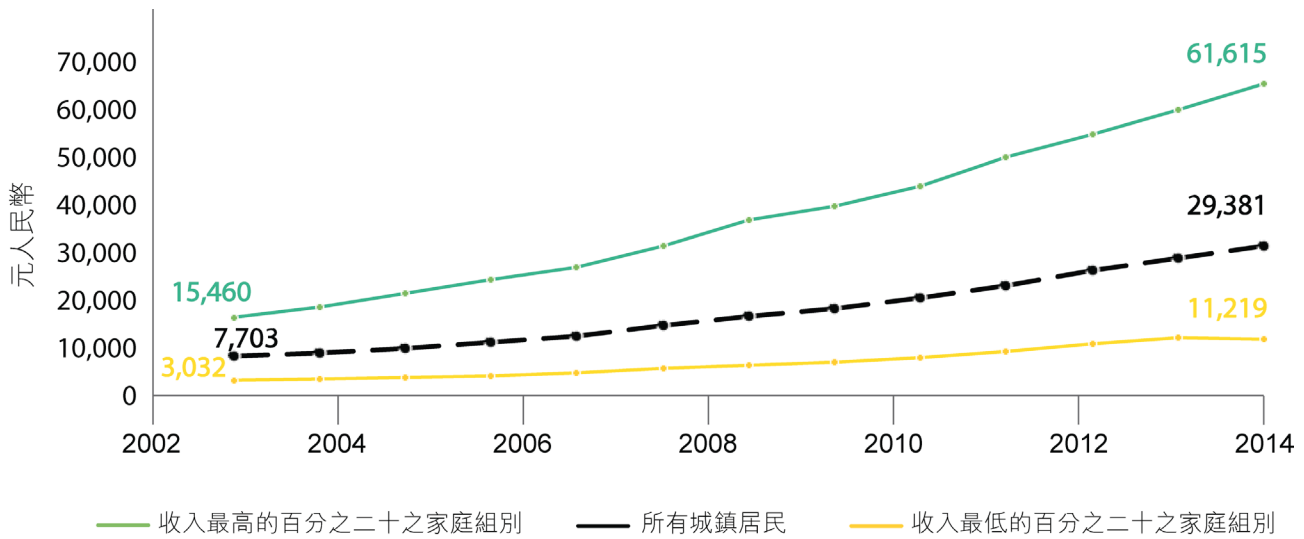
註：2015年人均國民總收入介乎4,036美元至12,475美元屬中等偏高收入經濟體；2015年人均國民總收入介乎1,026美元至4,035美元屬中等偏低收入經濟體。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圖42: 1978年至2015年中國內地城鎮化率、城鎮人口數目及農村人口數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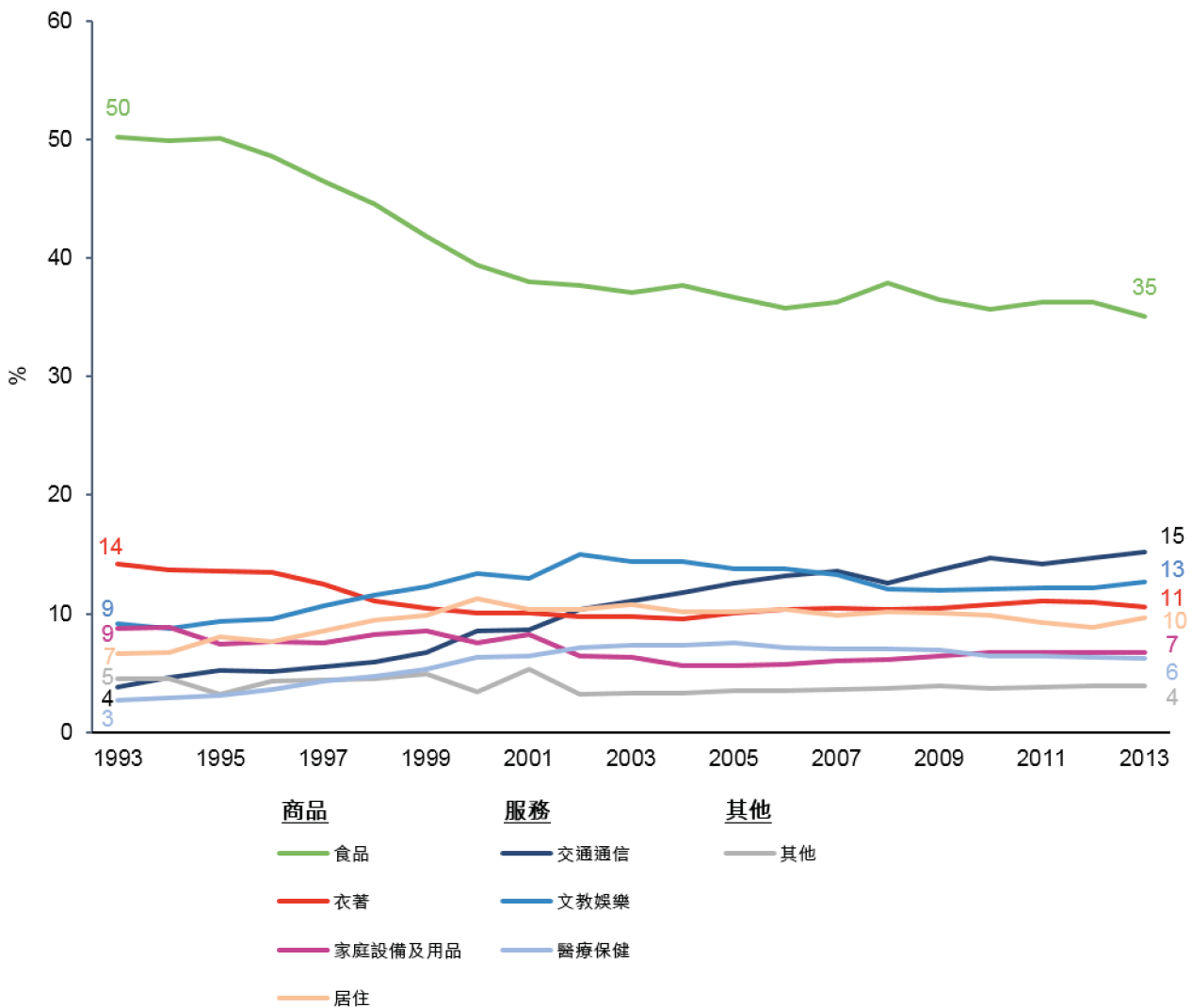
註：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事人員包括在城鎮人口內。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

圖43: 2002年至2014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每年可支配收入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

圖44: 1993年至2013年城鎮家庭每年人均現金消費支出組成部分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

消費習慣的改變意味着中國內地的居民越來越願意作非必需的消費以追求更高的生活素質。城鎮人口和家庭收入增加將繼續使中國內地對高價值產品和服務的需求急增。香港經濟以服務業為主導，服務業佔本港經濟生產總值高達92.7%³⁰。憑藉與中國內地長期的貿易夥伴關係，香港應把握此機遇，為內地提供高價值服務。

4.7 高價值服務的機遇

香港基礎設施發達、信譽良好、服務專業而安全，具備發展高價值服務的優勢。加上香港獨特的地理位置，有能力滿足中國內地對高價值服務不斷增長的需求。此外，香港市民熟習普通話，而且社會文化中西薈萃，語言與文化皆不會對中國內地的商務旅客和遊客形成障礙。香港可從四個方向發展高價值服務：高端旅遊、專業服務、視聽服務，以及金融服務。

4.7.1 高端旅遊

旅遊業在香港發展已久，亦是香港四大支柱產業之一。在2014年，香港共吸引2,800萬過夜旅客到訪，並連續第六年獲歐睿國際（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評為「最受歡迎旅遊城市」³¹首位，若包括即日往返旅客，訪港旅客總數達6,100萬人次³²，即日往返旅客則佔旅客總數54%，但其人均消費少於過夜旅客的三分之一。同年，透過「個人遊」計劃訪港的旅客佔旅客總數52%。這些旅客（尤其「一簽多行」旅客）的消費主要集中於零售，但由於香港大部分消費品均為進口貨品，零售消費對香港的增值有限。³³

為產生更大經濟效益，並避免為基礎設施帶來太大壓力，香港應著力開拓高增值旅遊服務。除休閒旅遊外，香港有充足條件發展高端旅遊，例如醫療美容旅遊、郵輪旅遊和會議及展覽旅遊（MICE tourism）。

30 2014年的數據由政府統計處提供。

31 「最受歡迎旅遊城市」每年由歐睿國際公佈，以國際旅客人數（不包括即日往返旅客和本土遊客）選出全球百大旅遊城市。

32 由香港旅遊發展局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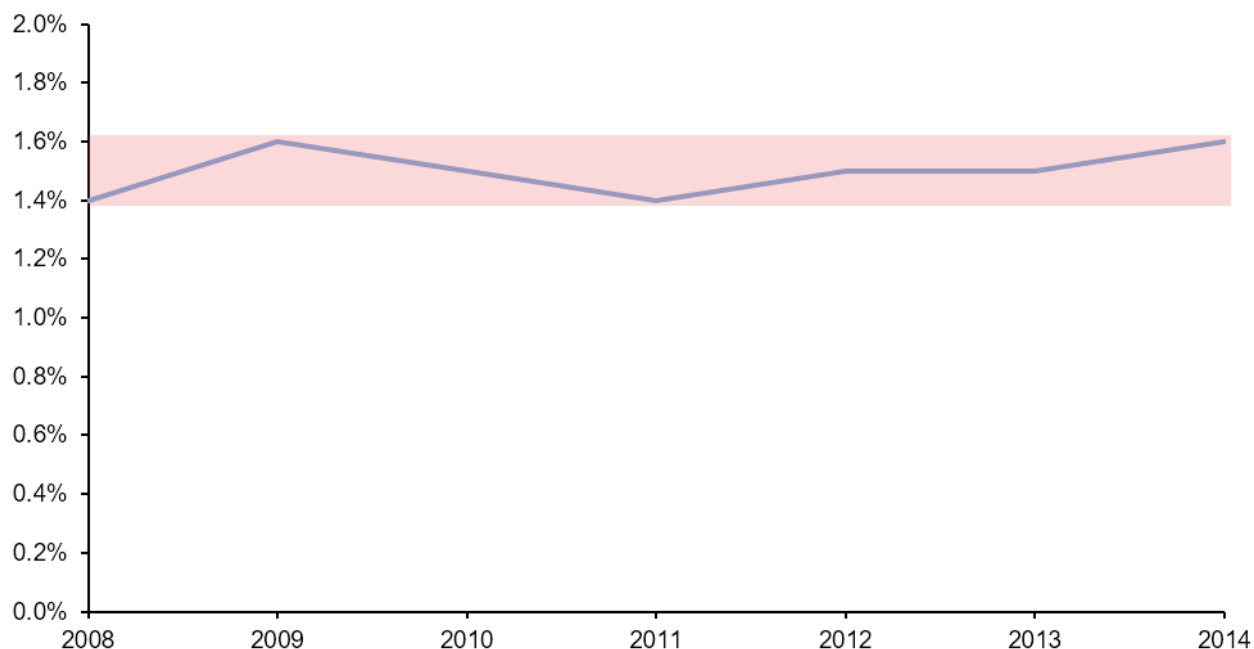
33 宋恩榮等人（2015年）。

(a) 醫療旅遊

醫療服務³⁴最早於2009至2010年度施政報告被列為六項優勢產業³⁵之一。然而，作為重點產業，醫療服務的發展一直緩慢。從2008年至2014年，醫療服務產業對本港經濟生產總值的貢獻徘徊於1.4%至1.6%（見圖45）。鑑於中國內地的消費能力不斷增長，而且受人口老化和「一孩政策」影響，內地城鎮人口對高質素醫療服務的需求將有增無減。醫療旅遊是指旅客到國外接受治療，其中「旅遊」一詞意味着旅客接受治療後，往往會留在國外一段時間（Meštrović，2014）。香港擁有世界首屈一指的醫療設施和醫護人員，具備發展醫療旅遊的潛力。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醫學院均為本港的醫護人員提供一流的專業培訓，根據2016年「QS世界大學排名」，兩者均獲列為亞洲頂尖醫學院首十位³⁶。在手術科技方面，香港同樣領先全球。例如，成立於2005年的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微創醫療技術培訓中心，是亞洲首家獲認可進行機械臂輔助外科手術訓練的培訓中心。

然而，香港必須解決公立醫院醫療人手不足的問題，審慎評估醫療產業在設施以及人手方面的承受能力。在發展醫療旅遊的過程中，對本地居民使用醫療服務的負面影響應減至最低。醫療設施應同時照顧本地居民和旅客的需要。因此，為外地病者提供的醫療服務最初應集中於有剩餘容量的範疇，例如體檢服務，以及由私人診所和醫院提供的覆診服務。

圖45: 2008年至2014年醫療服務的增加價值佔香港經濟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34 醫療服務涵蓋由私營醫院、診所、醫療和牙科醫生提供的服務；為長者、濫藥人士及殘疾人士提供的護理及院舍服務；以及與醫療相關的活動，包括醫療產品和醫療保險的零售銷售。

35 六項優勢產業包括文化及創意產業、教育產業、醫療產業、環保產業、創新科技活動和檢測及認證產業。

36 新加坡國立大學和東京大學分別位列2016年「QS世界大學排名」亞洲頂尖醫學院首兩位。

(b) 美容旅遊

中國內地對美容護理服務的需求正在上升。根據香港經貿商會（2013），在截至2013年的五年期間，中國內地美容護理服務業營業收入的年均增長率達到20%。2015年12月，香港八個美容業組織發起《美容專業發展約章》運動，以促進業界專業發展。此外，香港政府為美容及美髮業訂定了資歷架構，應能給予內地美容服務消費者一定信心。除了傳統以人手進行的面部和身體護理外，科技美容很可能成為香港未來的發展趨勢。根據香港貿易發展局（2013），消費者傾向視高科技美容儀器（例如超聲波和納米離子）為品質和成效之保證，並願意為此支付更高價格。

(c) 郵輪旅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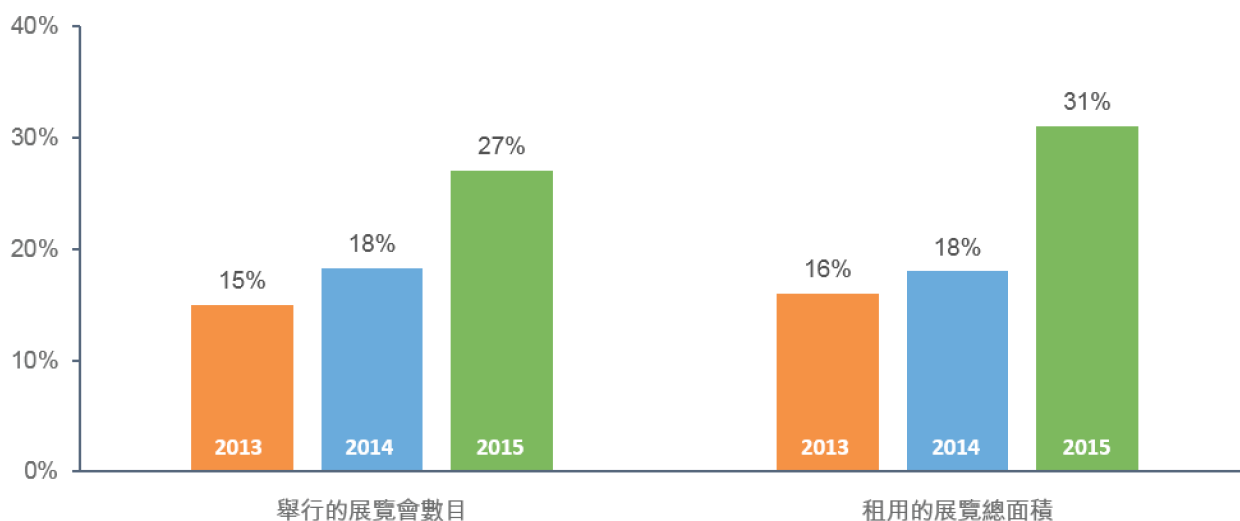
根據郵輪國際協會的研究（2015），中國內地郵輪旅客在2012年至2014年的年均增長率為79%，冠絕亞洲市場。2014年，內地郵輪旅客達67.9萬人次，佔亞洲郵輪旅客總數有一半之多。內地旅客對郵輪假期日漸濃厚的興趣，成為了香港發展郵輪旅遊的一大契機。事實上，香港具備充足條件發展為郵輪旅遊樞紐，近年相關設施亦不斷改善。啟德郵輪碼頭於2013年開幕，可供排水量達11萬噸的巨型郵輪停泊（海運大廈只能停泊排水量五萬噸以下的客輪），大大提高了香港接待郵輪旅客的能力。作為亞洲交通樞紐和亞洲頂級旅遊城市，香港可成為郵輪母港或停泊港。除了短線郵輪外，在「一帶一路」的策略下，郵輪旅遊更可拓展至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

(d) 會議及展覽旅遊（MICE）

根據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就中國展覽業發表的年度報告（2015），於中國內地舉辦的展覽會數目自2012年起逐漸增多。與2012年相比，2015年內地舉辦的展覽會數目增加27%，租用的展覽總面積增加31%（見圖46）。除了對內地會展設施需求殷切，內地商家亦不時於國外舉行展覽，從而帶領企業和業務走向國際。雖然受全球經濟形勢影響，2010年至2015年間，內地商家於海外舉辦的展覽會數目一直維持在每年1,300個以上，這些海外展覽會的規模（以參展商數目計）亦逐漸擴大（見圖47）。

隨著中國內地對展覽的需求不斷增長，香港應吸引內地參展商和主辦者來港參與國際展覽。根據香港貿易發展局（2016），在硬件方面，香港共有50多個展覽面積超過15萬平方米的會展場地。在軟件方面，香港的自由港政策對參展商和訪客而言皆十分便利。憑藉有利的地理位置，以及「兩文三語」環境的優勢，香港可作為內地企業走向世界、接觸全球潛在客戶的窗口。然而，在發展為會議及展覽旅遊城市的過程中，香港難免面對來自亞洲其他國家（如新加坡和韓國）的競爭。因此，香港政府應就會議及展覽旅遊制訂長遠發展計劃，例如進一步改善各會展場地附近的商業設施，尤其是亞洲國際博覽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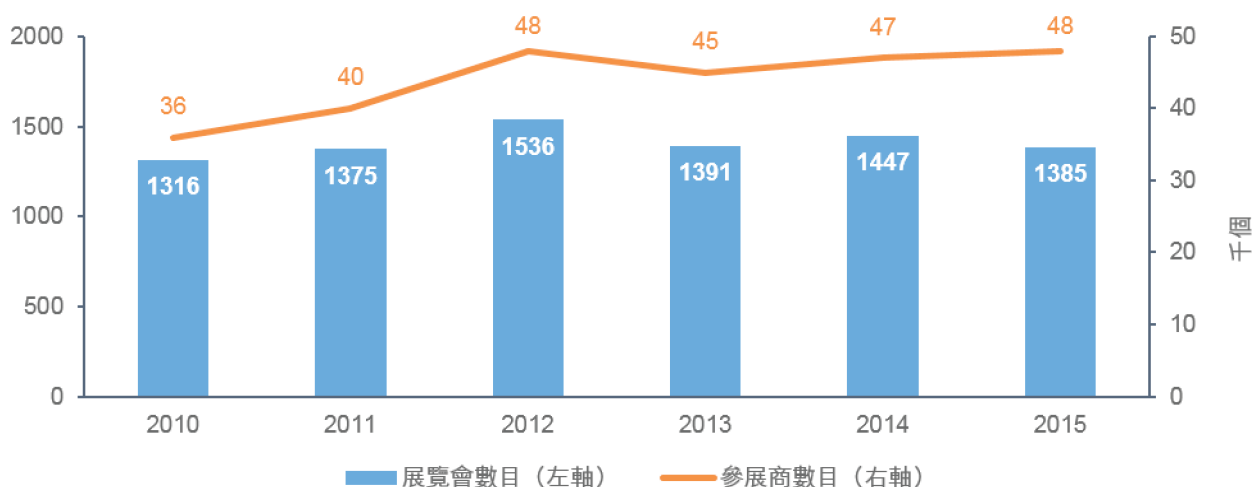
圖46: 2013年至2015年中國內地舉行的展覽數目及租用的展覽總面積的累積增長



註：數字包括貿易展覽會和交易會、於各大會展城市舉辦的人才招聘會和商品銷售會，以及在專門展覽場地舉辦的其他類型展覽會。

資料來源：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

圖47: 2010年至2015年中國內地的海外展覽會



資料來源：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

4.7.2 專業服務

正如第4.1節所提及，中國國策鼓勵第三產業的發展，服務業正日漸成為內地的支柱行業。因此，中國內地的專業服務市場將進一步擴大，不同的商機亦將隨之湧現。香港不但可向內地客戶直接提供專業服務，更可擔當中間人的角色，例如為內地提供諮詢、市場調查、人才招聘、法律支援等服務，將內地企業與消費者跟全球各地聯繫起來。

隨着「一帶一路」規劃逐步落實，中國內地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和互動將更加頻繁。香港憑藉其世界一流的專業服務和國際網絡，可在仲裁、會計、金融及保險服務等領域為此作出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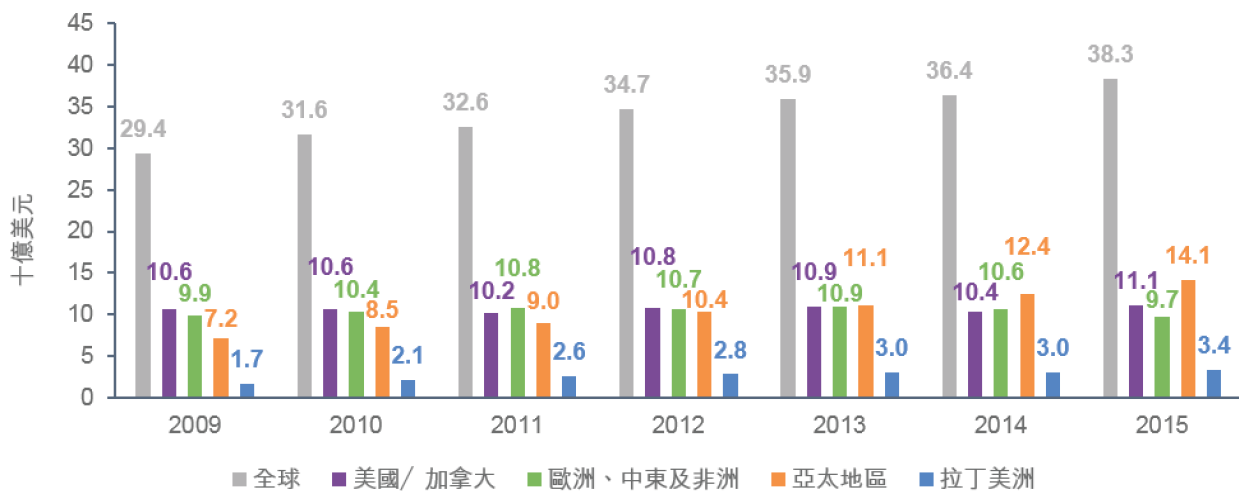
香港亦可為內地的專業人士和企業提供專業培訓服務。現時中國內地客戶對服務質素的要求正不斷提高。只有更高質素的服務標準，內地的服務行業才能進一步發展。香港專業服務提供者廣泛採用的國際標準，可給予內地客戶充分信心。香港提供的培訓和認證課程可協助內地企業提高服務質素，並且為其專業服務提供認可。作為國際城市，香港廣納世界各地的人才，正好建構讓中國內地與全球專業人士匯聚交流的平台，並可舉辦各種培訓課程、專業論壇和人才交流活動。這有助於推動知識共享，並縮窄內地專業實踐與國際標準之間的差距。

CEPA讓香港的服務提供者可以優惠待遇在內地開設業務，優惠的形式包括允許全資經營、減少持股限制、降低股本的要求、放寬地域及服務範圍限制等。CEPA是香港服務提供者將業務擴展到中國內地的大好機會，香港可為這些專業服務提供者給予支援。此外，香港政府應鼓勵香港服務提供者將內地部分業務遷移或外判到香港。香港成為後端支援中心，可為本港創造就業機會，使CEPA所帶來的經濟好處能夠惠及更多香港市民。

4.7.3 電影及視聽服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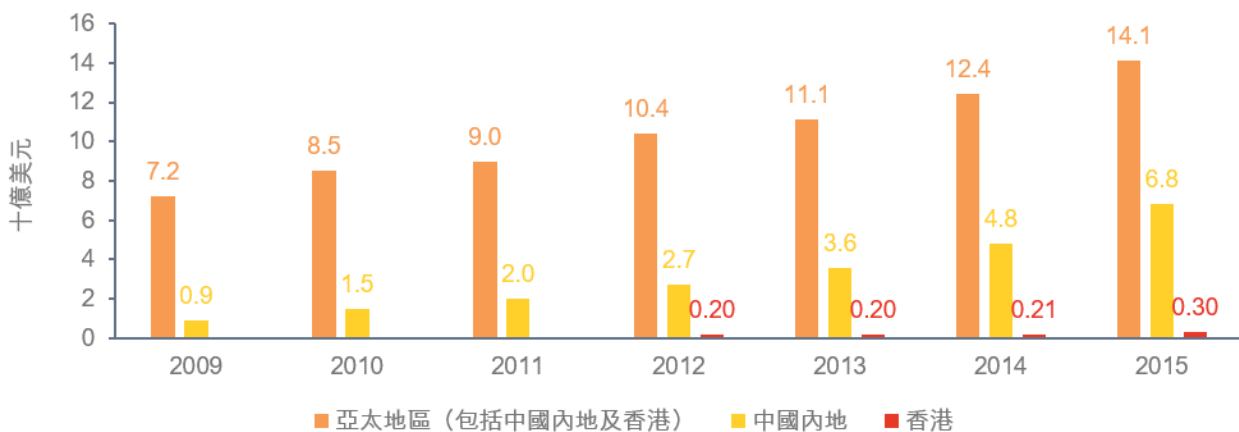
自2010年以來，當世界其他地區的票房收入停滯不前，亞太地區電影市場的票房收入卻一直迅速上升。2013年，亞太地區取代美國/加拿大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影市場（見圖48）。2015年，中國內地佔亞太地區總票房的48%。從2009年至2015年，中國內地的年度票房收入急增6.5倍（見圖49）。

圖48: 2009年至2015年全球、美國/加拿大、歐洲、中東及非洲、亞太地區，以及拉丁美洲的年度票房收入



資料來源：美國電影協會

圖49: 2009年至2015年亞太地區、中國內地及香港的年度票房收入



註：(1) 中國內地的票房數字不包括香港、澳門和台灣。

(2) 香港的數字僅可追溯至2012年。

資料來源：美國電影協會

中國內地的電影市場龐大，而且不斷擴展。迄今為止，內地電影市場以進口外國電影和「合拍片」³⁷（尤其內地與香港聯合製作的電影）為主。外國電影³⁸的進口配額約為每年60部³⁹，2014年佔內地票房收入45%；香港電影及「合拍片」（為數不足30部⁴⁰）佔14%；而總數逾200部的內地電影則佔41%（資料來自藝恩網（2016））。直到近年，全國十大票房電影中往往逾半均為進口外國電影或「合拍片」，內地製作的電影不容易打進十大（見表6）。

香港製作華語電影（不論是普通話抑或廣東話）經驗豐富，並具備專業知識。香港電影和「合拍片」在內地向來都有出色票房，在2012年至2014年佔內地總票房14%至22%（見圖50）。在2016年，由周星馳執導的《美人魚》在內地的票房收入高達33.9億元人民幣，成為中國史上最高票房數字。近年，《西遊記之大鬧天宮》、《賭城風雲II》、《捉妖記》等「合拍片」均打進內地票房十大。香港的電影人應與內地同業合作，在人才和知識上互相交流，製作出更多高質素的華語電影。中港的語言文化關係密切，香港對內地觀眾的口味和興趣相當熟悉。通過中港合拍片，香港電影人對於內地電影市場的蓬勃可謂功不可沒。我們必須進一步制訂適當的政策，以加強培育本地電影制作人及其他相關專業人士，使他們可以繼續積極參與其中，抓緊內地市場高速擴展所帶來的機遇並藉此共同分享成果。

37 「合拍片」一般指由兩間或以上公司聯合製作的電影。

38 外國電影可以「分賬片」、「批片」或「合拍片」的形式進入中國電影市場。「分賬片」是指外國製片人可收到電影票房收入的若干百分比作為報酬；「批片」是指內地電影公司以一筆固定金額買下外國電影的放映權，無須再與外國片商分賬。

39 2012年起，「分賬片」每年的進口配額為34部，「批片」則約為30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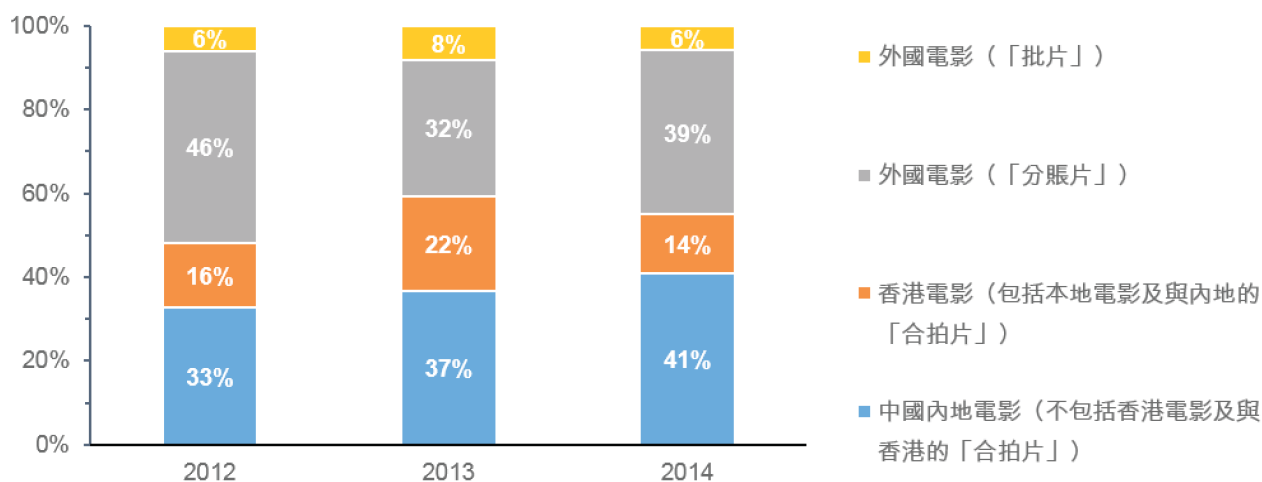
40 資料取自香港電影發展局《香港電影業資料彙編》。

表6：2012年至2015年中國內地十大票房收入電影

		中國內地電影	與香港的「合拍片」	進口外國電影
2012	電影數目	1	2	7
	總票房（十億元人民幣）	1.2	1.6	4.1
	佔十大電影總票房百分比	17.9%	22.9%	59.2%
2013	電影數目	5	3	2
	總票房（十億元人民幣）	3.0	2.4	1.5
	佔十大電影總票房百分比	43.5%	35.0%	21.5%
2014	電影數目	3	2	4
	總票房（十億元人民幣）	2.5	1.9	4.9
	佔十大電影總票房百分比	27.2%	20.6%	52.2%
2015	電影數目	5	2	3
	總票房（十億元人民幣）	6.7	3.4	5.3
	佔十大電影總票房百分比	43.7%	21.8%	34.5%

資料來源：豆瓣

圖50: 2012年至2014年按電影類型⁴¹劃分的中國內地票房



資料來源：藝恩網，香港電影發展局，團結香港基金

除了為內地市場製作更多更高質素的華語電影，香港也可將華語電影帶到國際舞台。事實上，香港電影業日漸受到國際認同。例如，《一代宗師》榮膺第八屆亞洲電影大獎「最佳電影」，王家衛和章子怡亦憑電影分別獲得「最佳導演」和「最佳女主角」獎項。在韓國最大類型電影節富川國際奇幻電影節，《踏血尋梅》奪得「最佳電影獎」。除了院線發行外，香港電影也吸引海外製作人買下版權重拍。例如，荷里活的《無間道風雲》（The Departed）便是重拍自《無間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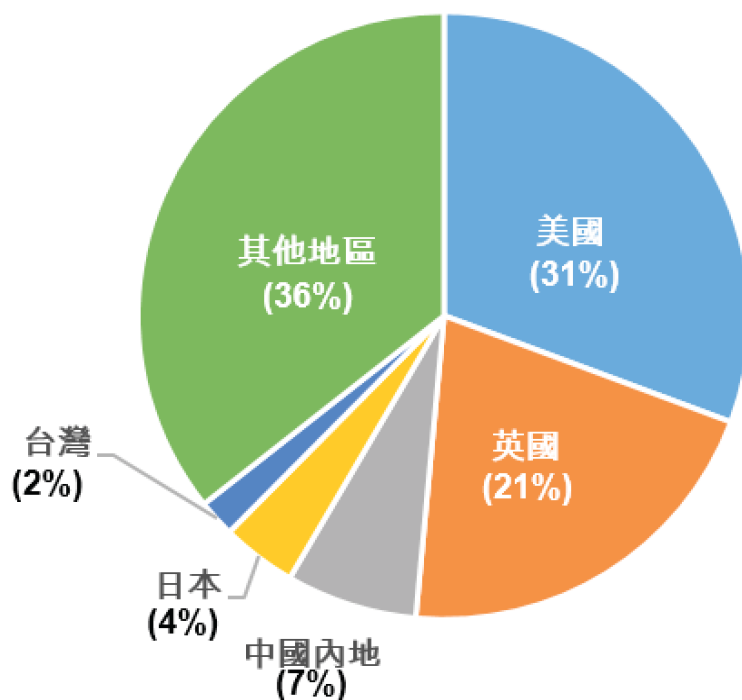
2015年，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華納兄弟娛樂公司及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合資成立「旗艦影業」，並在香港設立總部，目標是為全球觀眾製作華語電影。由此可見，國際電影製片人對香港電影業帶領中國電影走向世界，投下了信任一票。與此同時，根據CEPA下的優待政策，香港製作的華語電影通過內地當局審批後可進入內地市場，而不受外國電影進口配額限制。要促進華語電影在內地及全球市場發行，政府的支持必不可少。香港的電影發展基金成立於1999年，為支持香港電影業發展，香港政府於2007年和2015年分別向基金注資3億及2億港元，2016至2017年度財政預算案更宣佈額外注資2,000萬港元。要給予電影業更大支持，讓港產電影打進內地，政府必須持續向電影發展基金注資，並增加對電影業的投資。

4.7.4 金融服務

根據政府統計處於2014年公佈的服務貿易統計，出口到中國內地的金融服務僅佔香港金融服務輸出總額（不包括非直接計算的金融中介服務）的7%，美國和英國則分別佔31%和21%（見圖51）。由此可見，香港對內地的金融服務輸出仍有相當大的增長空間。我們就金融服務提出的詳細政策建議，將在第五章「香港作為雙向資本流動的門戶」深入探討。

41 「分賬片」是指外國製片人可收到電影票房收入的若干百分比；「批片」是指內地電影公司以一筆固定金額買下外國電影的放映權，無須再與外國片商分賬。

圖51：2014年主要貿易夥伴佔香港金融服務輸出總額（不包括非直接計算的金融中介服務）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4.8 結語

隨着中國經濟轉型，逐漸以內需作為經濟增長的動力，並更重視第三產業的發展，預期中國商品出口的增長速度將有所放緩。香港的商品出口十分依賴往返內地的轉口，因此在未來幾年不免會經歷較緩慢增長，與出口相關的行業（如運輸物流）亦將受拖累。香港轉口貿易及與之相關的物流業的雙位數高增長時代可能已經結束，而中國內地渴求高價值服務的新時代已經開始。香港必須適應這「新常態」，以服務貿易為重點，促進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2015年，香港的服務貿易盈餘抵消了商品貿易赤字，令貿易差額達至平衡。就貿易差額而論，中國內地佔香港服務輸出最大比重，因此尤為重要。香港要保持經濟增長的動力，必須致力為內地提供高價值服務（而當中不一定涉及商品貿易），例如高端旅遊、專業服務、視聽服務和金融服務。



5. 香港作為資金雙向流動的門戶

5. 香港作為資金雙向流動的門戶

5.1 序言

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於世界各大評級機構的排名中都穩佔全球首三至五位。金融中心擔當著一個中介角色，透過各種金融機構，把擁有儲蓄與需要資金的單位連繫起來，並提供平台以管理資產和定價風險。香港從一個卑微的珠江三角洲港口，為華南的轉口貿易提供資金，以及充當海外華僑給中國家鄉親屬的匯款中介，發展成為當今首屈一指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的金融服務早於起步之初已面向國際客戶群，儘管其規模和地域覆蓋範圍遠較今天的為小。香港是一個細小開放經濟體，香港金融服務向全球擴展是預料中事。正如第一章的論述，一個細小開放經濟體需憑藉服務其鄰近及世界其他地區才能生存及蓬勃發展。香港金融中心過去數十年的發展亦仰賴作為其腹地的中國內地的崛起。中國雖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其金融服務業的發展仍然相對落後。隨著中國經濟持續以中高速增长，勢將為各界帶來眾多的金融服務機會。香港必須把握此契機，成為連接中國內地與世界各地的門戶，令香港經濟蓬勃發展。

作為承傳英國殖民背景以及奉行「一國兩制」的細小經濟體，香港坐擁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各項獨特優勢。有別於其他內地城市，香港的資本市場完全開放而且不設任何資金進出管制（當然受制於清洗黑錢活動及其他審慎監管的法規）。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匯率自1983年起一直保持不變，大大減低市場參與者持有港元的匯率風險。而且香港利得稅稅率低，亦不徵收資本增值稅及遺產稅，對資產管理界無疑極具吸引力。香港與上海/北京位於同一時區，但比倫敦及紐約分別快7及12小時⁴²，讓本地市場可以於倫敦及紐約開市前進行交易。此外，香港社會雙語通行，其所奉行的普通法亦是各國際金融市場的主要法律框架。香港是內地與西方國家資金雙向流動的合適門戶。香港需要鞏固其自身地位，發揮優勢，抓緊中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良機。

42 此處所用的為夏令時間。因為香港不使用夏令時間，以標準時間計算的時差應為8及13小時。

以下我們將集中探討三個新機遇，進一步推進香港這個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到下一個高峰：（一）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可以為內地龐大的儲蓄和財富作為中介；（二）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香港可擔當卓越的人民幣離岸中心；（三）香港亦可成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金融樞紐。

5.2 資金進出內地的門戶

甲、直接投資的雙向流動

正如很多發展中國家，於1979年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勞動力充裕但資本匱乏。改革開放後，中國歡迎外來直接投資。正如第二章所述，香港引領外商投資內地的角色舉足輕重，初時的投資主要集中於製造業。1987年中國的全年外來直接投資有高達69%來自香港，2005年有關比例下降至30%，但到2015年此比例又回升至73%（見圖29）。這些外來直接投資的資金並非完全來自香港本地企業，有很多是外資經過香港的通道投資內地。歷史上，香港是內地吸納外來直接投資的重要來源，不僅擔當初始投資者的角色，亦充當連繫海外投資者的橋樑，而內地則是香港向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地。

一方面外來直接投資流入中國的資金有增無減，令中國成為第二大接受外來直接投資的國家，但同時中國向外直接投資趨勢亦開始迅速上升。這為香港帶來新機遇，成為內地資金走出去的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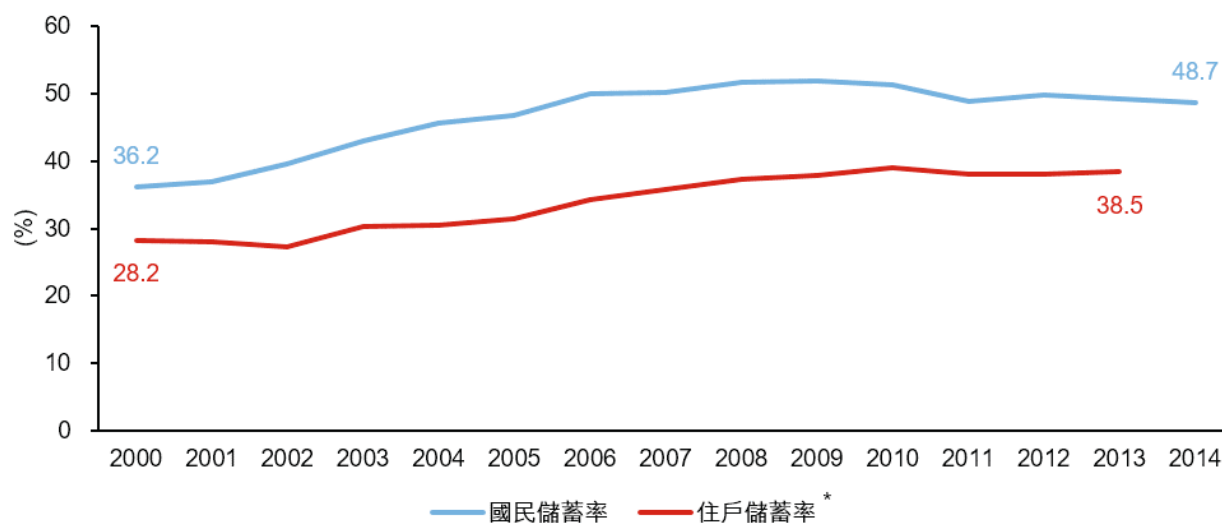
中國是一個擁有高儲蓄的國家，圖52顯示了內地的國民儲蓄率及住戶儲蓄率。內地過去數十年一直保持貿易順差（見圖53），因而累積了大量外匯儲備（見圖54），中國企業開始運用盈餘於海外尋找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他們在國際市場上成為了受人注目的投資者，收購基建及生產設施、通訊及軟件公司、能源資產、礦場，甚至足球隊及連鎖影院。圖55展示了中國每年向外直接投資的流量及存量均呈上升趨勢，過去13年按年流量更以年均36%的速度增長。大部份人都不曾留意中國2015年全年向外直接投資流出量（1,457億美元）已超越其全年外來直接投資流入量（1,356億美元）（見圖56），中國已成為資本淨出口國。2015年中國的向外直接投資達1,457億美元，佔全球總流量的9.9%。現時中國已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的資本出口國，排名僅次於美國。即使中國在2015年的向外直接投資存量只有1.1萬億美元，位列全球第八，但基於中國的高儲蓄率及多年來的貿易順差，我們預期中國很快便能超越前排的國家。⁴³

43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6年9月22日）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發佈《2015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取自 <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date/201609/20160901399201.shtml>

作為中國面向世界的門戶，大部份內地的向外直接投資均流到香港，2014年香港佔內地向外直接投資的流量及存量均高達58%（見圖57）。不過，數據沒有清晰顯示這些資金有多少是以香港作為最終目的地，或是借香港作為跳板投資海外。近年以銀行及金融機構為首的內地企業在香港越趨矚目，不僅在港設立區域分支，亦高調進行各種商業收購活動和買入整幢寫字樓大廈。無論如何，即使中國把40%左右的向外直接投資投放到海外市場，香港仍可在顧問諮詢、聯繫海外業務及融資方面擔當中介角色。據估計，在中國企業的海外併購交易中，有約32%於離岸市場進行融資。這正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在人才、專業知識及流動性方面均佔優勢的領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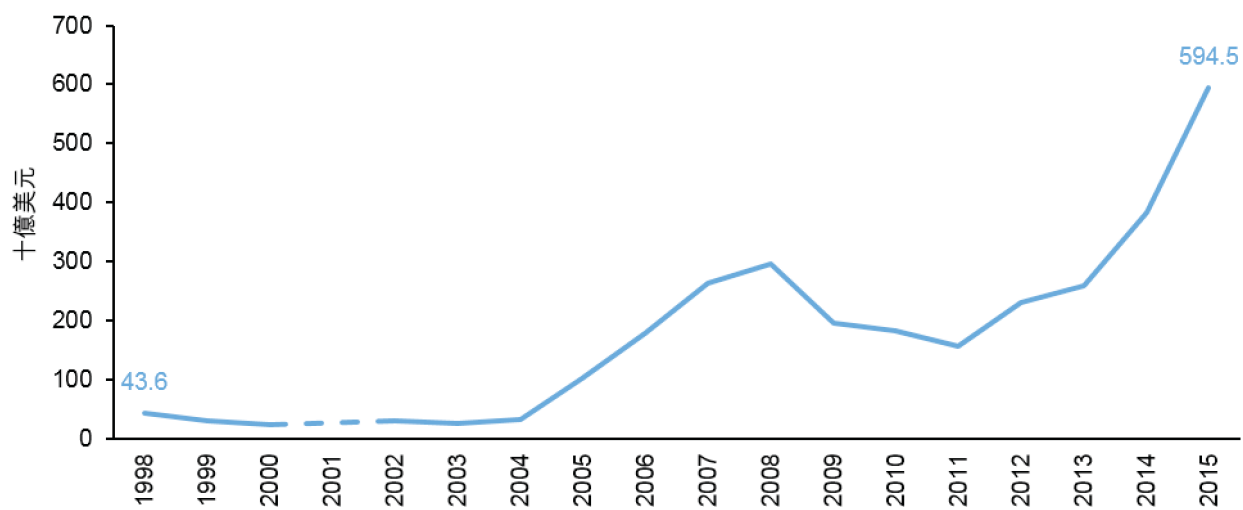
總括來說，香港是內地外來直接投資主要來源地，同時也是內地向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地。內地佔本港的外來直接投資總存量一直維持約30%的水平，相信這是因為其他國家為了利用香港的獨有優勢，進入內地市場，故也相應增加在港的投資。中國過去一直以外資流入為主，但隨着內地經濟急速起飛，儲蓄不斷增加，中資的向外直接投資日益重要，也為香港帶來更多機遇。

圖52: 2000年至2014年中國國民儲蓄率及住戶儲蓄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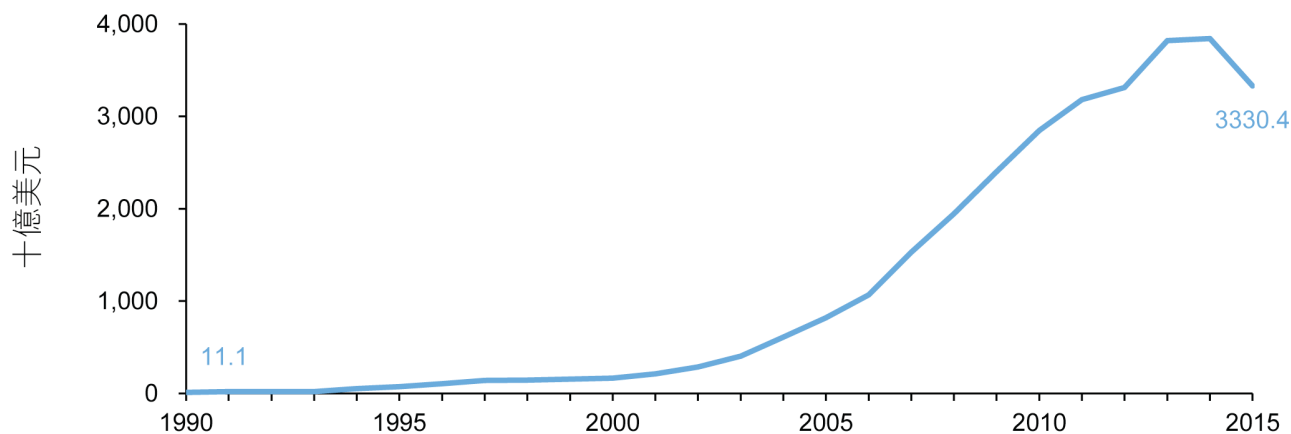
註：2014年住戶儲蓄率數據暫未能提供。
資料來源：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世界銀行

圖 53：1998年至2015年中國貿易順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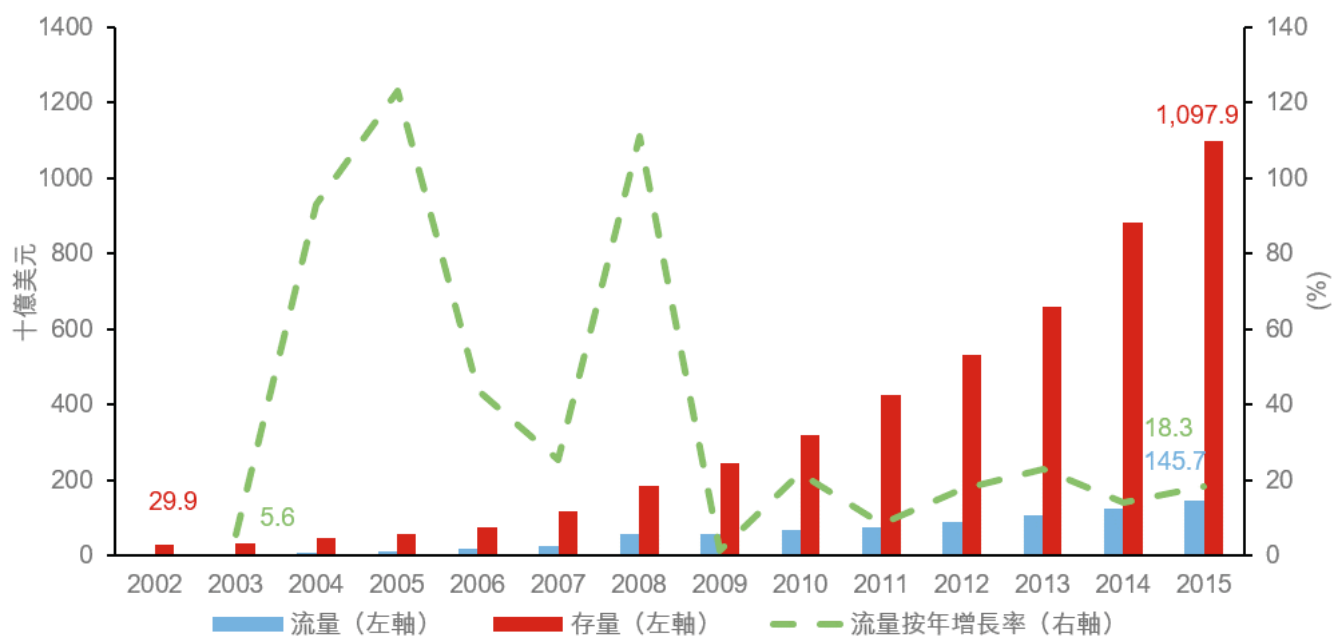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國家統計局

圖54：1990年至2015年中國外匯儲備



資料來源：國家外匯管理局（中國）

圖55：2002年(自向外直接投資統計制度設立起)至2015年，中國每年向外直接投資流量及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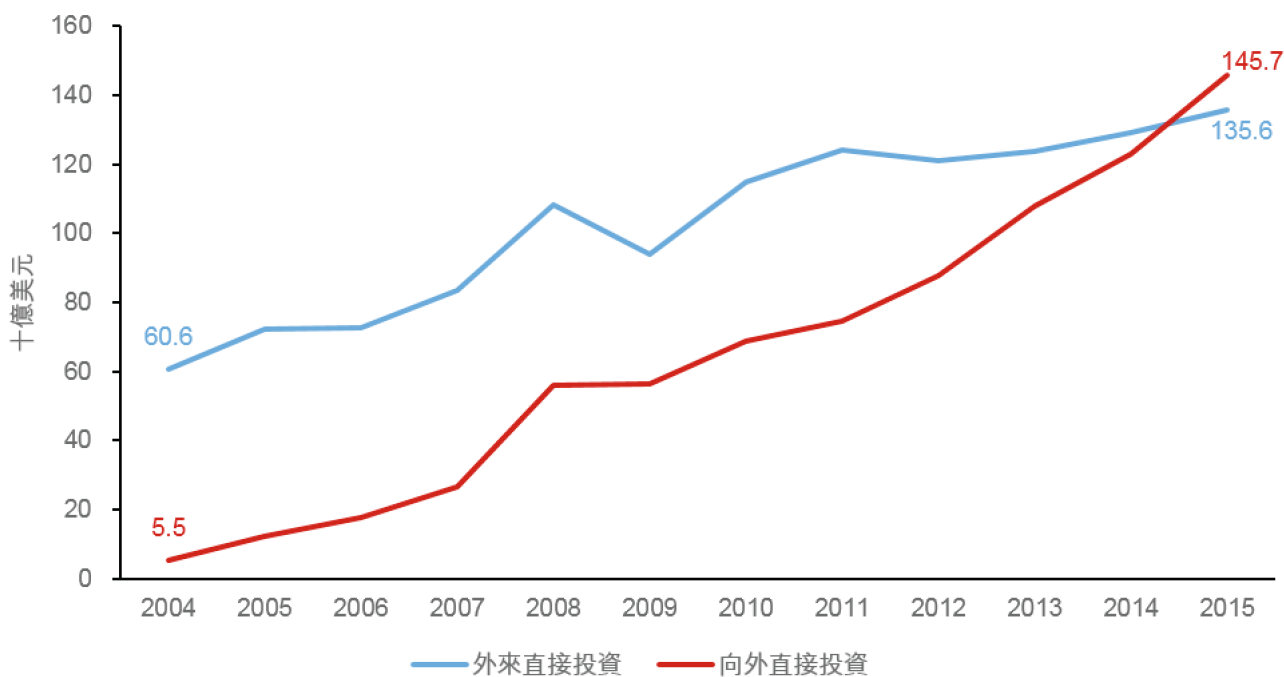


註：(1) 2002至2006年數據只包括非金融的向外直接投資，2007至2015年數據包括所有行業的向外直接投資。

(2) 2007年的年度增長率反映所有行業的向外直接投資升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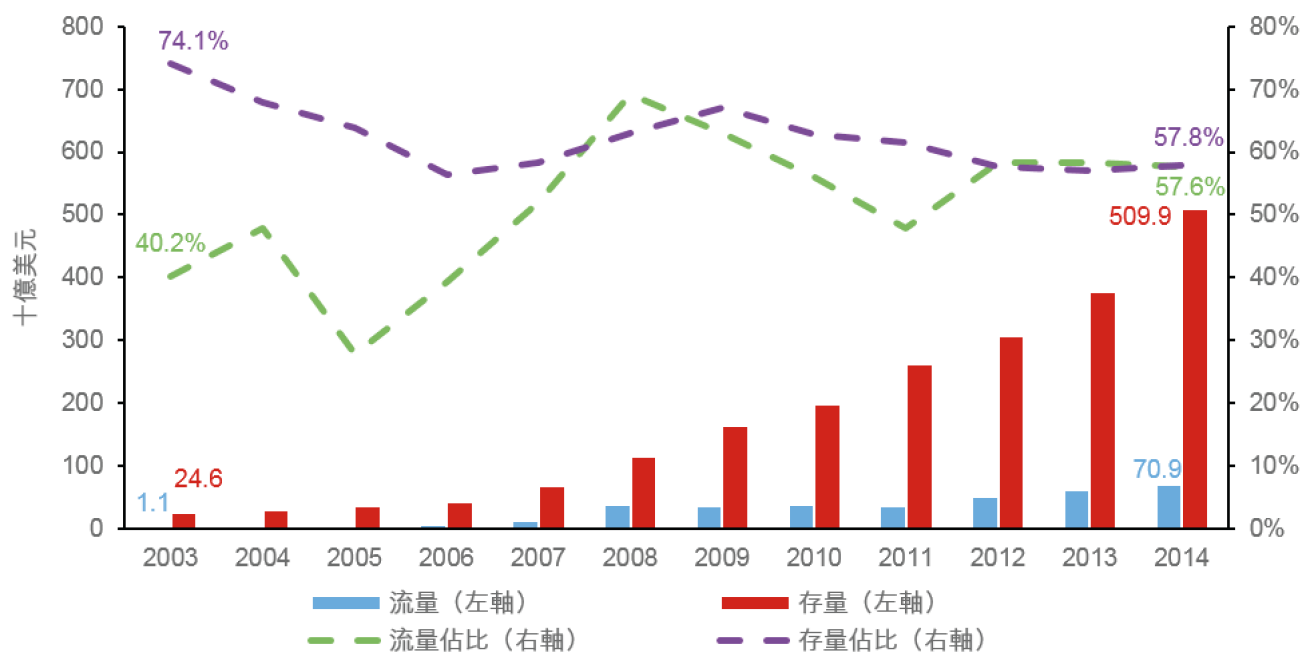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

圖56：2004年至2015年中國向外直接投資及外來直接投資流量



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

圖57：2003年至2014年中國對香港每年的向外直接投資流量及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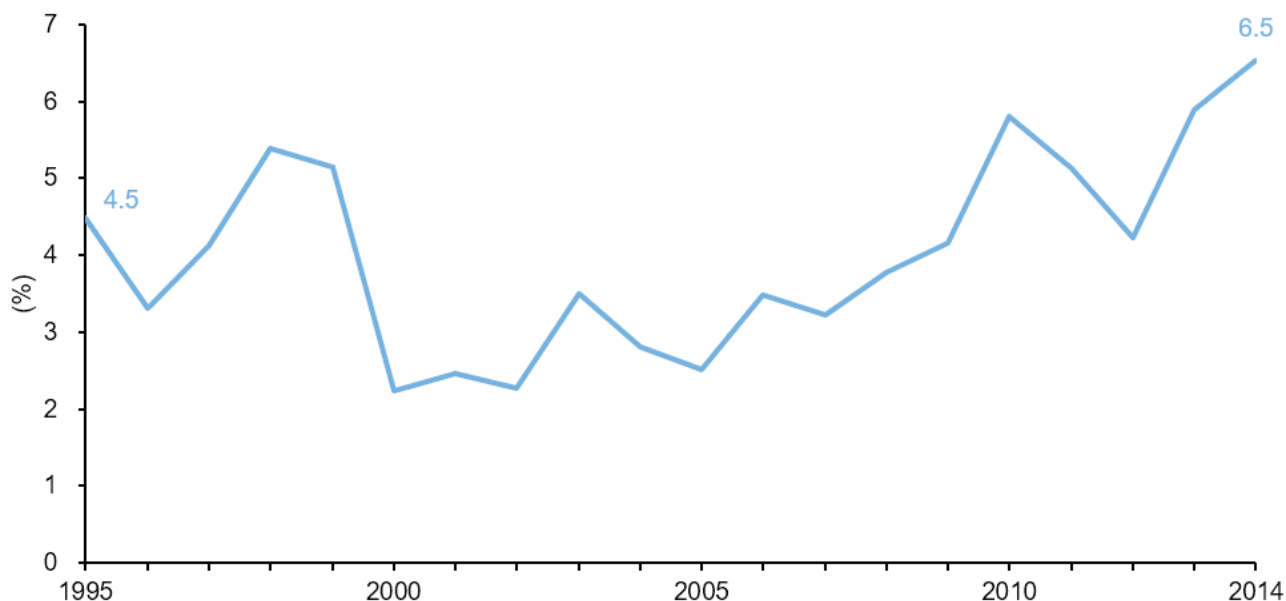
備註：2002至2006年數據只包括非金融的向外直接投資，2007至2014年數據包括所有行業的向外直接投資
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

乙、組合投資的雙向流動

目前為止，資本的雙向流動主要是用於直接投資。但當中國開始放寬對資本流通的限制，開放其資本帳，組合投資將會越來越受重視。雙向流動的組合投資勢將成為未來的趨勢。一方面，海外投資者（包括香港投資者）對投資中資股票及債券的興趣漸濃，希望能搭上中國這輛經濟高速增長列車。另一方面，內地投資者亦同樣熱衷於尋找海外投資機會，為其積累的財富分散投資風險。

香港是為這些組合投資基金連繫供求的理想地點。這個過程已經開始。雖然中國仍未完全開放其資本帳，但自2002年起，中國已容許合資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投資內地的金融資產，有關額度更由2003年的每年17億美元，增加至2015年的每年811億美元。2006年開始，中國亦准許內地居民透過合資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基金進行境外投資，但同樣需受制於QDII每年的額度限制。外資銀行於2010年起，可以參與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2011年，QFII升級至人民幣合資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容許外資使用人民幣投資。2014年，滬港通啟動，內地投資者可以直接透過上海證券交易所買賣港股，海外投資者也可透過港交所買賣上海A股。繼滬港通後，深港通亦預期於2016年11月通車。香港是中資企業設立財資部門及內地富裕企業家進行財富管理的理想地點。至今內地佔香港金融服務業出口（撇除非直接計算的金融中介服務）的比重仍屬偏低，僅佔金融服務業總出口約7%（圖58），意味為內地客戶提供直接金融服務的發展空間龐大。

圖58：1995年至2014年香港向內地出口金融服務（撇除非直接計算的金融中介服務）的百分比



註：(1) 數據採納2010年國際服務貿易統計手冊中的最新國際建議，包括服務項目分類及編制方法，並採用所有權轉移原則，記錄外地加工貨品及轉手商貿活動。

(2) 由於非直接計算的金融中介服務沒有按地區細分數字，所以本統計表並不包含有關數據。

(3) 有關2014年香港向其他貿易夥伴出口金融服務（撇除非直接計算的金融中介服務）的百分比，請參閱圖51。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當中國資本帳越來越開放，組合投資的雙向流量將會增加，擔當雙向中介及門戶的香港將能從中獲益。香港能否充分發揮其角色，把握機會，將決定我們未來國際金融中心的領先地位。

由劉遵義教授、水志偉及熊艷艷教授撰寫的團結香港基金報告《發揮香港潛力 再創經濟奇蹟》，比較了香港與其競爭對手紐約和倫敦的優勢及弱點，就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作出綜合分析⁴⁴。報告建議香港應該瞄準中國及東亞地區的龐大儲蓄池，致力成為整個東亞地區的債券及股票市場。屆時東亞地區（不單是中國）的企業及政府將會來港集資、發行股票及債券。東亞經濟體的騰飛也將吸引世界各地的投資者來港投資其債券、上市股票及私募股權。由於該報告的政策建議非常符合本章節的主題--香港作為資本雙向流動的中介及門戶，為免重覆詳細研究結果，我們於下文簡述了該報告（Lau, Shui and Xiong, 2016年9月）就資本流動的主要建議：

一、發展一個具規模及高流通性的債券市場

（甲）香港必須發展一個具規模及高流通性的債券市場，買賣各長短年期並以港元、美元或人民幣計價的主權債券及企業債券。

（乙）為港元建立一條近乎無風險孳息曲線，作為其他債券的計價基準，香港政府應發行更多不同年期的債券。政府應鼓勵半官方機構為機場第三跑道及高鐵的公共基建工程發行長年期的基建債券，並支持香港按揭證券公司發行長年期（35年）定息債券，用以購買自住物業按揭貸款。這將能填補長期債券在香港市場的短缺。

（丙）鼓勵中央政府及相關的準主權機構，如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以及新成立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亞投行（AIIB），更積極地在港發行各種不同期限的人民幣債券，藉以定立離岸人民幣的無風險孳息曲線。

（丁）當定立了港元（在聯繫匯率下亦相當於美元）及人民幣的孳息曲線後，香港及中央政府便可鼓勵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ADB）、亞投行（AIIB）、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等跨國組織，以及內地企業，在香港市場發行美元或人民幣債券。

（戊）以三種貨幣計價的不同年期債券能填補香港債市的缺口，強化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領先地位，從而吸引國際資產經理、主權基金經理、退休基金和保險公司在港設立財資部門。

44 Lau, L. J., Shui, K., & Xiong, Y. Y.. (2016). Yes, Hong Kong CAN!. Hong Kong: Our Hong Kong Foundation.

二、發展一個大型及流通性高的區域性股票市場

(甲) 除了成為內地企業上市的主要股票市場，港交所應吸引東亞地區的藍籌企業來港作第一或第二上市（以香港預託證券的形式），並以三種貨幣計價。

(乙) 內地和海外的資產經理可來港買賣東亞地區的藍籌股，投資高速增長的經濟體並從中獲益。

(丙) 香港應擴大滬港通以及未來的深港通的範圍，讓環球投資者能在香港市場直接購買A股。

三、發展一個區域性的再保險市場

(甲) 香港已經是內地的主要保險中心。因經濟增長以及「一帶一路」政策，東亞地區對各類型的保險包括人壽、房地產、意外、責任以及海事保險的需求激增。香港可趁機擴展成為東亞地區的再保險中心。

(乙) 東亞經濟體的偏高儲蓄率能提供風險資金來源，吸引各大國際性保險機構進駐香港，以再保險分散其業務風險。

(丙) 香港應首先吸納內地最大型的再保險公司在港設立地區總部，創造聚集經濟效應，進而吸引世界各地的保險公司使用香港的再保險服務。

四、發展一個創投中心

(甲) 通過投資更多研發，並充分利用深圳的科技基礎，香港可以為本地創造生態環境，培育創新科技，吸引國際創投資金注資，並在港交所作首次公開招股上市。今年七月成立的香港X科技創業平台，得到紅杉資本參與投資，就是一個有利的開始。

(乙) 香港政府應增加科研開支。例如，在政府資助的研究項目中，補貼首席研究員的總薪酬和相關支出；擴大研發項目的規模；以及加強對本地大學的研發投資，建立科研樞紐，就如矽谷圍繞史丹福大學發展一樣。

5.3 香港作為卓越的離岸人民幣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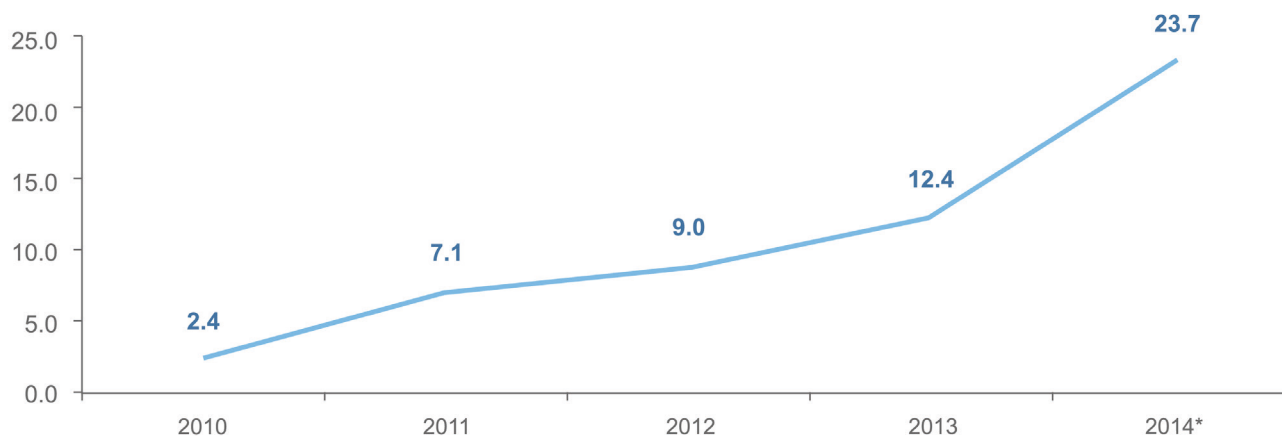
人民幣國際化為香港卓越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創造了黃金機會。香港是全球首個亦是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擁有內地以外最龐大的人民幣流動資金池（2016年7月的人民幣存款及存款證合共7,510億元人民幣）。香港亦擁有首個離岸人民幣支付系統，即人民幣結算所自動轉帳系統（RTGS），與中國國家現代化支付系統（CNAPS）連結，容許以即時支付結算的方式與內地處理人民幣的交易。此系統同時與美元及歐元的支付系統連結，故可進行跨貨幣交易。人民幣RTGS系統容許同步交收（PvP）的外匯交易，以及貨銀兩訖（DvP）的股債交易。自人民幣RTGS系統於2007年啟用以來，經該系統進行的人民幣交易的日均成交量，已於2013年超越港元的成交量，2015年的日均成交額更達9,470億元人民幣。參照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的《人民幣追蹤特刊》，2016年4月香港人民幣RTGS系統處理了72.5%的全球人民幣支付交易。2015年底，全球有219家銀行參與加入人民幣RTGS系統，另有超過1,500家銀行於參與銀行開設帳戶，以交收其人民幣支付項目。現時內地有逾97%以人民幣計價的跨境貿易於香港進行結算。我們已於第二章重點介紹部分由香港領頭的離岸人民幣業務，包括零售及企業銀行、資本市場、貨幣及外匯市場等。隨着中國進一步開放其資本帳及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香港將會是離岸市場中的主要受益者。

5.3.1 人民幣作為貿易貨幣

人民幣要成為國際貨幣，必須擔當國際貿易貨幣、國際投資貨幣及儲備貨幣的角色。此三部曲雖然未必需要順序發展，但卻是一個貨幣國際化的進程。中國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有確實的經濟原因。因為若人民幣可以在國際市場上廣泛使用，便能免除中國貿易商在進出口時需以外幣（如美元）計價的匯率風險和交易成本，增加內地企業為商品定價時的議價能力，並提高融資效率，促進海外投資。此外，人民幣國際化也能降低中國人民銀行持有外匯儲備的需要，並減少儲備資產因貨幣貶值而帶來的風險。最後，當人民幣被廣泛使用，中國便能藉開印鈔機輕鬆獲得鑄幣收益，就如美國過去數十年因美元是國際貨幣而得益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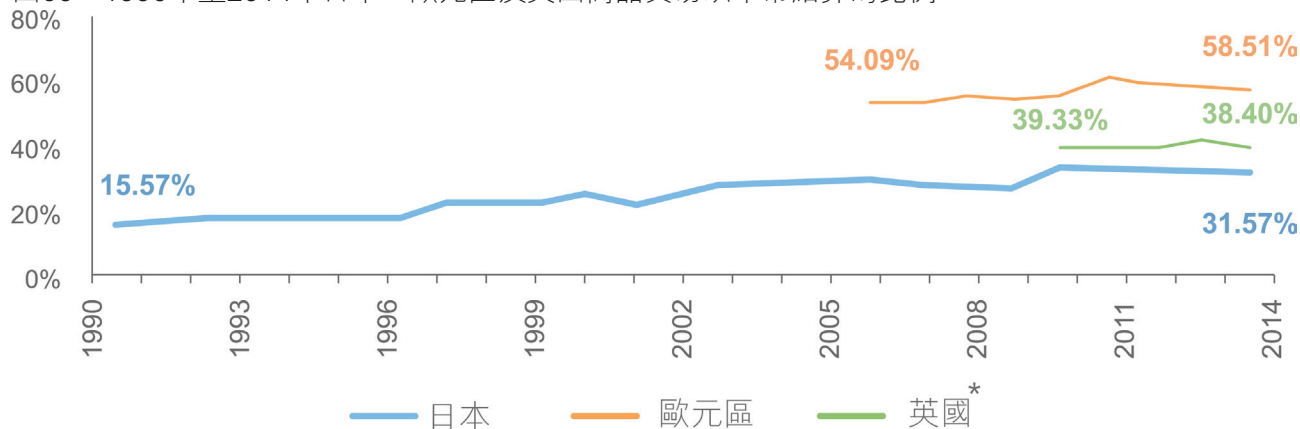
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中國的外貿增長突飛猛進。2015年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國及第二大進口國。以商品貿易總額計算，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最大貿易國，佔全球貿易量11.3%。儘管中國很久以前已開放其經常帳以促進國際貿易，但要到近年才發展至以人民幣進行跨境貿易計價及結算。2010年只有約2%的內地貿易使用人民幣結算，但到2014年，該比例已躍升至24%（圖59），惟此百分比相對於其他國際貿易貨幣仍屬偏低。圖60顯示歐元區、英國及日本在進行商品貿易時，有30%至60%的交易以本幣計價。歐元、英鎊及日圓是僅次於美元，三大排名高於人民幣的國際支付貨幣。可以預期的是，在不久的將來，將有40%至50%的內地貿易以人民幣計價及結算。基於中國是全球最大貿易國，未來使用人民幣進行交易的數量將大幅上升。作為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香港必須搶佔先機，把握處理大部份人民幣貿易結算的機會。

圖59：2010年至2014年中國商品貿易以人民幣結算的比例



註：*沒有報關的轉口貿易於2009至2013年間被納入服務貿易計算，2014年則調整為商品貿易。
資料來源：中國人民銀行，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

圖60：1990年至2014年日本、歐元區及英國商品貿易以本幣結算的比例



註：*不包括沒有標明貨幣的貿易。英國與非歐盟成員國的貿易計價貨幣數據乃自2010年起根據歐盟法例而收集。
資料來源：歐洲央行，英國稅務海關總署，國際清算銀，日本統計，團結香港基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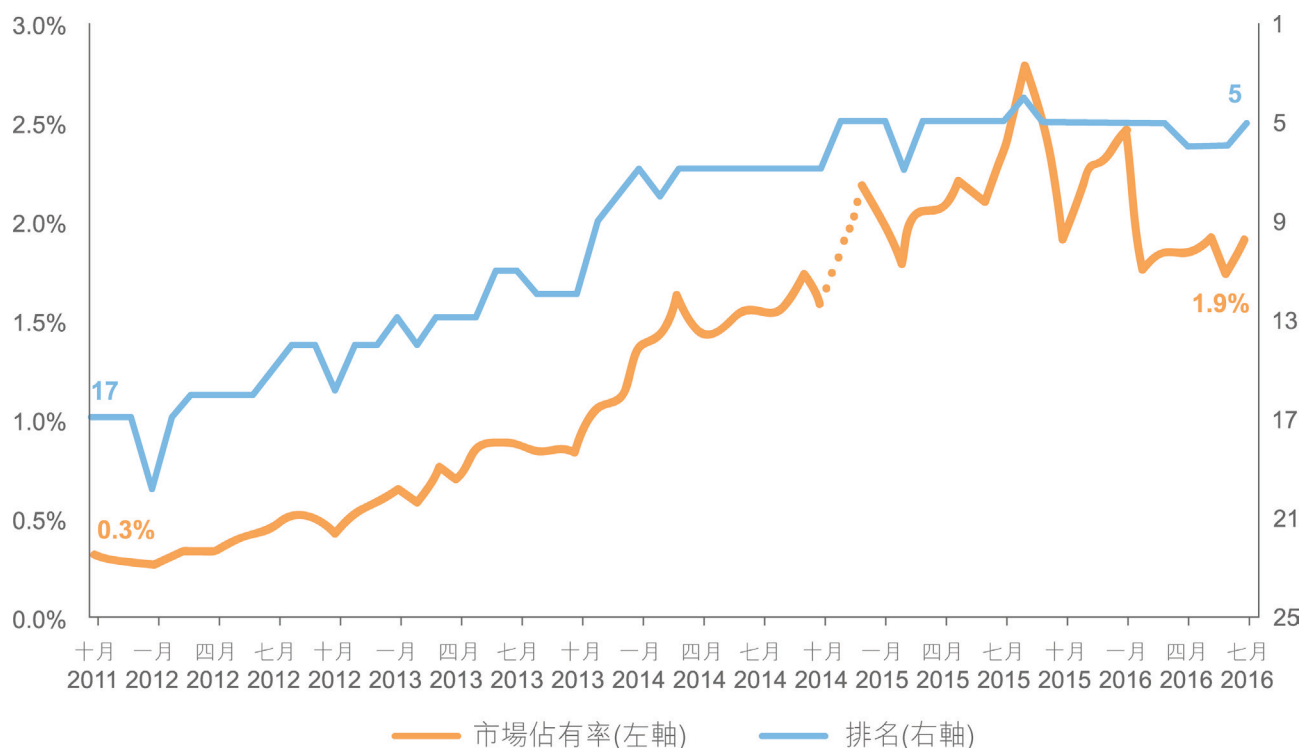
5.3.2 人民幣作為投資貨幣

當人民幣在貿易交易的使用量日益增加，它在國際市場上的使用度也將有所提高。持有人民幣結餘的海外人士將對以此貨幣計價的資產產生投資需求。為了抓緊中國經濟增長的機遇，國際資產基金經理亦將對投資人民幣資產感興趣。隨着中國資本帳逐步開放，人民幣作為投資貨幣將更被廣泛使用。現時估計只有約13%的外來直接投資及4%的內地向外直接投資以人民幣進行結算。由於中國是外來直接投資的第二大受益國，同時是世界第二大向外直接投資來源國，所以使用人民幣進行投資的增長空間龐大。以人民幣作為國際支付貨幣的比率已從2011年10月微不足道的0.31%，增至2015年8月的2.79%。人民幣成為第四大最常用的國際貨幣，排名緊隨美元、歐元及英鎊之後。鑑於近期人民幣貶值，2016年7月人民幣的國際支付貨幣排名退居日圓之後，只能以1.9%的使用率位列第五（圖61）。雖然使用人民幣進行國際支付因開始時基數低而增長迅速，但其國際使用比例相較中國佔全球商品貿易量的11.3%，兩者仍有巨大差距。再者，以人民幣計價的資產投資仍在起步階段（圖62），所以人民幣作為國際支付貨幣的前景非常可觀。

在全球外匯市場的外幣交易中，人民幣兌另一貨幣的日均交易量於三年間激增68%，由2013年的1,200億美元增至2016年的2,020億美元。當中有95%，亦即1,920億美元，是人民幣兌美元的外匯交易，而其中760億美元的交易於香港市場進行。現時人民幣外匯交易佔全球外匯交易的4%，是第八大外匯交易貨幣⁴⁵。

香港的人民幣離岸市場可作為內地開放資本帳及推出人民幣計價投資產品的試點平台。香港必須定位為離岸「超級市場」，為國際投資者提供多元化高流動性的人民幣計價股票及債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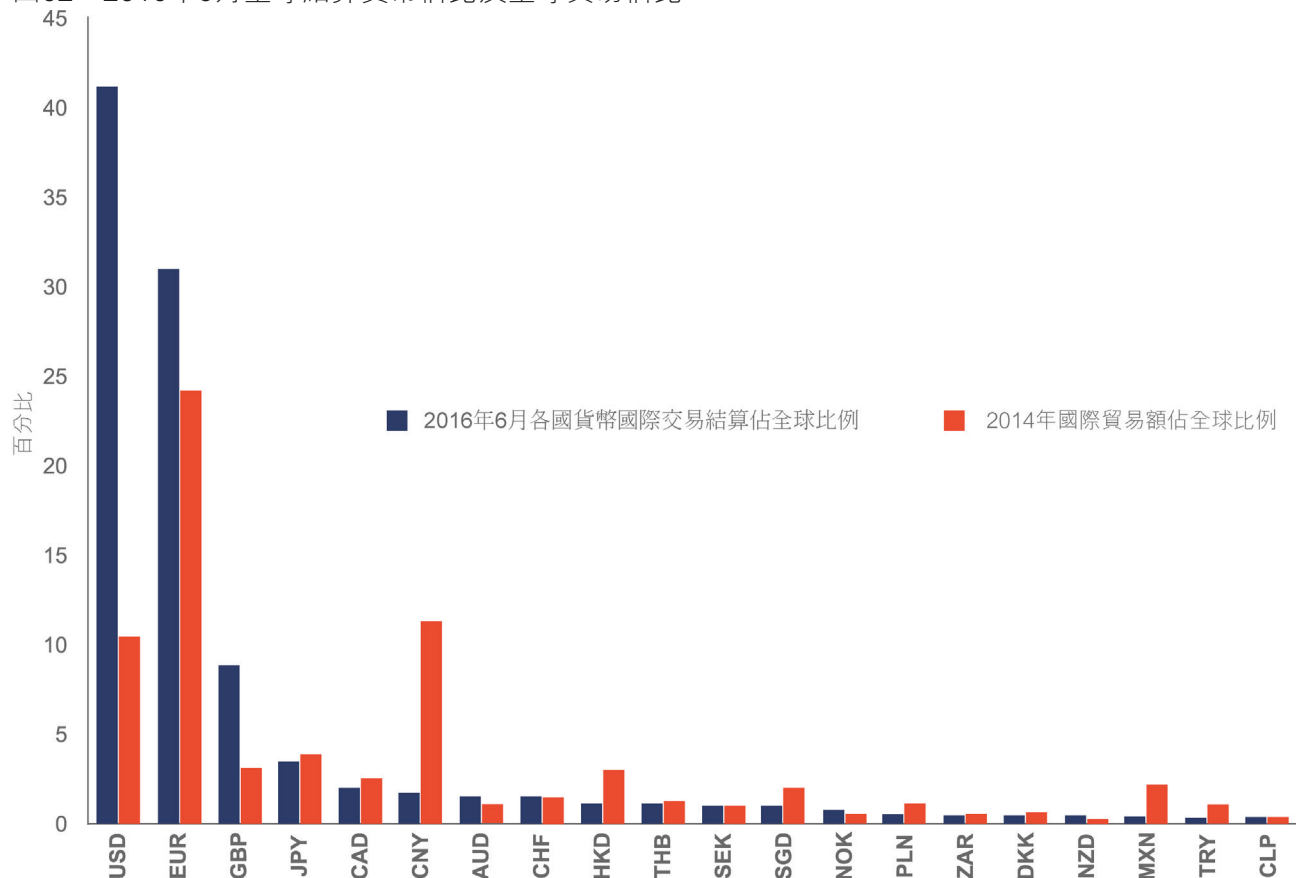
圖61：2011年10月至2016年7月經SWIFT系統使用人民幣作為全球支付貨幣的比例（以價值計算）



資料來源：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Wind資訊

45 位列於美元、歐元、日圓、英鎊、澳元、加元及瑞郎之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2016). Triennial Central Bank Survey of foreign exchange and OTC derivatives markets in 2016.)

圖62：2016年6月全球結算貨幣佔比及全球貿易佔比



資料來源：Lau, L. J., Shui, K., & Xiong, Y. Y.. (2016). *Yes, Hong Kong CAN!*. Hong Kong: Our Hong Kong Foundation.

5.3.3 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

人民幣要成為真正的國際貨幣，最後階段便是被各國央行納入為儲備貨幣，在這情況下，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工具也將成為其外匯儲備的一部份。2009年，俄羅斯率先宣佈把人民幣納入其外匯儲備中，其後日本及南韓也跟隨，為人民幣邁向儲備貨幣之路踏出第一步。2010至2012年間，有20家中央銀行與中國人民銀行簽訂了貨幣互換協議。2013年4月，澳洲宣佈人民幣佔其外匯儲備的5%。同年6月，英倫銀行成為首家歐洲央行與中國人民銀行簽訂貨幣互換協議，金額為2,000億元人民幣。據匯豐銀行對77家中央銀行進行的調查，其中32家央行有投資在岸及離岸人民幣資產，而2012年僅有3家央行進行此等投資⁴⁶。2015年11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表示，人民幣將於2016年10月1日起納入特別提款權（SDR）的一籃子貨幣。這個舉措必定會提高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的需求，並提升人民幣的國際貨幣地位。目前人民幣佔全球外匯儲備約1.9%⁴⁷。根據匯豐報告的市場預測，未來3至5年間，人民幣在國際儲備貨幣的比重將提升到4%至5%。一項對全球央行的調查亦預期，至2025年央行儲備會有多達6.7%投放於人民幣資產。

46 Ho, K. (2016, September 2). 人民幣入籃在即 國際化邁向新里程.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Retrieved from <http://www1.hkej.com/dailynews/investment/article/1382141/人民幣入籃在即 國際化邁向新里程>

47 人民幣納SDR 儲備需求升 中銀料10年內「三分天下」. (2016, September 26). MingPao, p. B4.

雖然香港難以在全球央行管理外匯儲備方面發揮很大的作用，但隨著人民幣在國際支付市場上的使用率不斷增長，香港也能受惠。香港能滿足主權財富基金的投資需要，把人民幣計價資產納入其投資組合中。

5.3.4 香港作為卓越的國際金融中心

人民幣國際化將會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根據不同的排名機構，香港的金融中心名列全球首三至五名。值得注意的是，當今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成就，是憑藉充當內地資金進出的門戶而來，與本地投資需求及本地貨幣沒有多大關係。而直至近期，通過香港進出內地的資金幾乎完全是人民幣以外的貨幣。隨着人民幣逐漸冒起成為主要的國際貨幣，香港的人民幣離岸中心角色，將把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推向另一高峰。就如當年倫敦的情況一樣，即使英鎊作為國際貨幣的影響力自二戰後明顯下降，但倫敦仍能依靠其歐洲美元市場，保持地位，成為全球數一數二的金融中心。

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以及美國長期龐大的國際收支赤字造就大量美元流出海外。美國對本土利率實施上限管制，驅使美國投資者將存款投放至海外，造成大量美元停泊其他國家。冷戰時期，共產主義國家及其他非美國盟友把其美元存款及資產放在美國以外的地方，以防美國政府會在危機發生時扣押有關資產（Einzig, 1970; Kindleberger, 1973）。如此龐大的美元資金池造就了倫敦成為全球最大的離岸美元市場。2008年年底，倫敦佔有美國境外最大部份（20%）的離岸美元存款（He and McCauley, 2010）。連同其他歐洲貨幣市場、歐元票據及歐元債券市場，倫敦成功鞏固其國際金融中心的領先地位，而英鎊在當中只扮演次要的角色。

在中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之前，香港已是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如今香港可參考倫敦的經驗，加強其離岸人民幣市場的定位。由於中國不會像美國般長期出現國際收支赤字，所以離岸人民幣市場的流動資金池規模將不及離岸美元市場般龐大。儘管如此，當人民幣在國際貿易、投資及儲備方面的使用度日漸提升，離岸人民幣資金池也會不斷增長，足以支撐各個人民幣離岸市場。畢竟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貿易國，並擁有高儲蓄率，有大量資金可投資海外。作為全球最大及領先的離岸人民幣中心，香港必須繼續穩守其位置。截至2015年，全球共有20個具備清算行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倫敦、新加坡及台北也將會力爭當中的領導地位。

5.3.5 人民幣自由兌換的影響

當中國資本帳完全開放及人民幣可完全自由兌換後，香港的離岸人民幣市場將會面臨新挑戰。目前香港與上海的在岸人民幣市場相比，享有的貨幣自由兌換優勢屆時將會消失。不過，當人民幣可完全自由兌換時，海外的人民幣存款及以人民幣計價的資產將會迅速膨脹，香港亦能從更大的市場中分一杯羹。即使香港的離岸市場在自由兌換方面面對上海在岸市場的對等競爭，香港仍坐擁其他優勢。正如美元雖然是完全自由兌換的貨幣，而紐約也有一個大型的在岸美元市場，但倫敦的歐洲美元市場在強烈競爭下亦能蓬勃發展。

據He & McCauley (2010)的研究發現，非美國居民傾向在美國以外的地方進行其美元業務，而官方儲備管理者亦偏好把美元存款留在美國境外。**表7**顯示，2008年有62%的銀行官方美元儲備存於美國境外，非美資銀行的百分比更高達82%。

表7：2008年12月按地區及銀行所屬國家劃分的官方美元存款分佈（十億美元）

銀行所屬國家	存款地點		
	美國	離岸	總數
美國	127.6	32.5 (20.3%)	160.1
其他	59.7	269.4 (81.9%)	329.1
總數	187.3	301.8 (61.7%)	489.2

資料來源: He, D., & McCauley, R. N. (2010). Offshore markets for the domestic currency: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issues. BIS Working Papers No 320.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投資者或會傾向在離岸市場持有貨幣，以規避發行國的國家風險。在岸市場的監管及儲備要求亦可能會增加本土融資的成本，降低在岸金融中介的效率，驅使資金流向離岸市場⁴⁸。Wong & Chan (2013) 發現，各離岸中心所佔的美元存款份額，與其法律體系的質素、監管架構、外匯市場成交量、組合投資的流入及與美國的商貿聯繫等條件成正比。至於離岸中心與紐約之間的時區相隔較遠，卻不會帶來任何優勢。事實上，若離岸市場與美國的時區相近，能跟在岸市場的交易時間有所重疊，反而更有利。

當人民幣可完全自由兌換後，香港的離岸人民幣中心相較上海的在岸中心，在軟基建方面仍繼續佔優。香港的利得稅率低，又不徵收資本增值稅，專業人士的薪俸稅率亦低，並設有可預測及透明度高的監管制度，以及健全的司法體系和獨立法院，奉行國際金融交易一直沿用的普通法。這些國際金融中心的軟實力建立需時，在短期內上海難以建立或複製。就如倫敦能持續位列全球國際金融中心的首兩名，香港也可憑藉其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實力，借助人民幣躍升成為主要國際貨幣的契機，鞏固自身地位，並向前邁進，成為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

5.4 香港作為「一帶一路」政策的金融中心

歷史上香港稱為國際金融中心，主要建基於其一直充當中國內地與美國、歐洲及日本，其次東南亞等國之間金融中介的角色。中國提倡的「一帶一路」政策為香港的中介角色創造了新機遇：連接內地及發達國家的儲蓄資金與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需求。目前很多發展中國家仍未連繫至全球金融市場，特別是位處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的中亞國家。若「一帶一路」政策成功，而香港又能充分發揮其中介角色，香港便能名正言順成為環球金融中心。

48 Choi, R. "Offshore RMB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A Look into the Eurocurrency Experience" Economic Analysis and Business Facilitation Unit,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一帶一路」政策牽涉66個國家，分別涵蓋全球63%人口及全球30%經濟生產總值（圖63）。根據亞洲開發銀行（亞開行）2009年的報告，自2020年起，每年單是亞洲國家對基建投資的資金需求便高達7,500億美元。據估計，亞開行及世界銀行每年合共只能提供約300億美元的融資。此龐大的資金缺口需要由其他的資金來源來填補。這也是中國發起的亞投行能得到如此熱烈回應的部分原因。2015年有多達57個國家加入亞投行成為創始成員，部份更並非「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不過，亞投行的法定資本只有1,000億美元，即使加上新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及絲路基金，有關資本仍不足夠。因此這些開發銀行將要倚賴槓桿借貸及公私營合作以進行融資。「一帶一路」的基建項目大部份規模龐大，已公布正在籌備或興建的項目包括高鐵（歐亞鐵路、中亞鐵路、泛亞鐵路、雅加達—萬隆高鐵）、港口發展（斯里蘭卡港口及巴基斯坦瓜達爾港口）、跨境油氣管道（東西輸氣管、中亞—中國及中國—俄羅斯輸氣管）、核電廠（巴基斯坦）及電訊網絡（緬甸—中國、塔吉克斯坦—中國、巴基斯坦—中國光纖網及東南亞海底光纖電纜）。

圖63：「一帶一路」地圖



資料來源：團結香港基金

香港可以同時提供美元及人民幣融資平台，以填補資金缺口。亞投行及絲路基金亦可應要求在港設立分支或財資管理中心，讓他們能透過發行債券，收集在港的美元及人民幣流動資金。這反過來能助香港的債券市場建立孳息曲線。「一帶一路」的項目可以透過發行債券或股票的方式進行融資，有關證券可以在港作第一或第二上市。如前文所述，香港有必要提高其貨幣市場流動性的深度，特別是離岸人民幣，因部份與中國有直接聯繫的「一帶一路」項目，很可能需以人民幣進行融資。香港應提供多元的金融工具，以滿足市場對收益及風險分散的需求。伊斯蘭債券就是其中一個新投資產品的例子。它是類似債券的投資工具，符合絲綢之路經濟帶中多個伊斯蘭國家所奉行的伊斯蘭律法。香港已開始為伊斯蘭債券發展市場。為配合與「一帶一路」項目相關的投資需求，有關市場的深度及闊度也可望不斷擴大。香港亦可鼓勵「一帶一路」沿線的銀行及金融機構在本港設立分行，以管理與「一帶一路」相關的業務。為了促進本地貨幣融資及交易，香港可以擴闊其RTGS系統，以涵蓋其他可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使用的國際貨幣。

香港作為「一帶一路」項目的金融服務供應地，若能同時為有關項目一併提供其他專業服務，就能進一步提升香港的吸引力。除了項目融資，香港也可以提供會計、保險、法律和仲裁的服務。由於「一帶一路」的相關糾紛有可能涉及各主權機構，奉行普通法及擁有獨立司法體系的香港，是提供仲裁服務的理想地點。香港亦可以提供建造與管理顧問服務，以及機場、港口和鐵路管理的專業知識。

5.5 總結

香港主要透過作為外來直接投資流入中國的門戶，已發展成為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中國經濟迅速增長，並累積大量的儲蓄和財富，再一次為香港打開機遇之門，讓香港成為中國儲蓄供應及西方資金需求的中介。面對中國資本帳開放，香港亦能為西方提供投資中國資產的平台。香港現已成為資本雙向流動的門戶。人民幣國際化及「一帶一路」國策將為香港創造嶄新的機會，發展成一個真正的環球金融中心。香港擁有這些機遇，只因內地把香港的地位納入國家發展政策中。因此香港一定要抓緊機遇，與內地締造互惠雙贏的夥伴關係。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large, abstract shape in shades of purple, resembling a fish or a stylized arrow pointing to the right. The shape is composed of various triangular and polygonal facets in different tones of purple, from light lavender to deep magenta. The overall composition is modern and geometric.

6.中國內地移民與人才流入

6. 中國內地移民與人才流入

6.1 序言

作為一個細小開放經濟體，維持開放予旅客自由進出進行商業與旅遊活動對香港尤為重要。為了方便訪港人士，香港應簡化入境程序，興建更多如出入境關口及機場第三跑道等高效交通基建，並提供更多會議、展覽、文化、旅遊及購物消費等設施，提升香港對旅客的吸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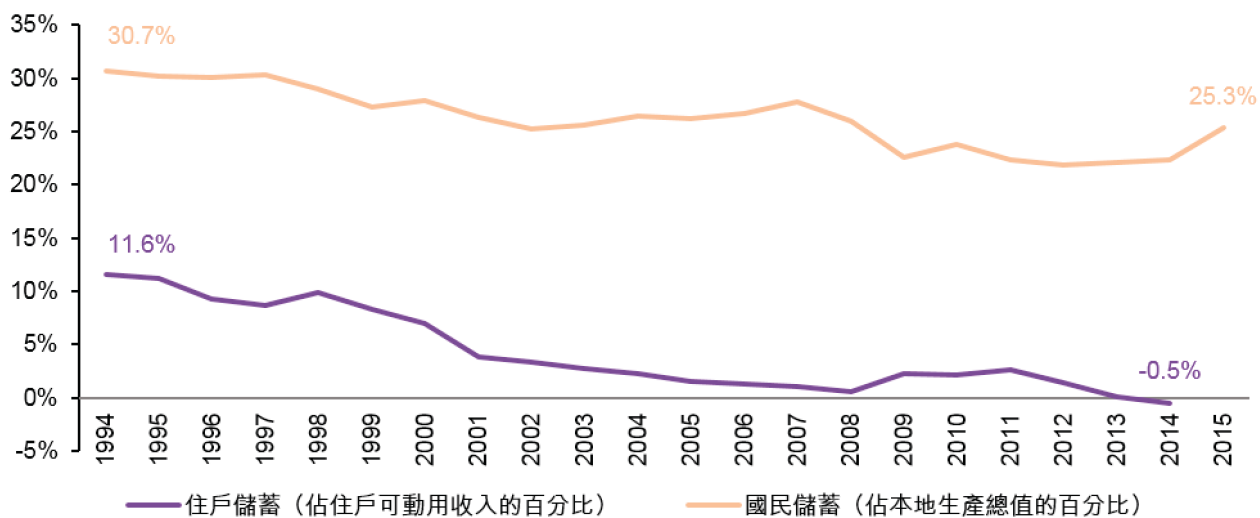
至於來港工作及移民人口的自由流動，則需另作別論。香港這個彈丸之地，毗鄰地大物博的中國內地，但由於兩地的薪酬及生活水平截然不同，若對跨境工作及定居的人口流動不設限制，將會為香港帶來災難性的影響。歐盟是極少數容許成員國之間人口自由流動的例子，但各歐盟成員國的大小及生活水平較為相近，與香港和內地的情況不同。即使如此，歐盟成員國之間對工作人口及移民自由流動亦持不同看法，各國彼此之間爭論不休，這亦是英國公投支持脫歐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雖然容許跨境移民自由流入香港⁴⁸並不可行且不合宜，但我們認為有控制地輸入移民對香港非常重要，有助提升本港人力資本、改善人口老化及抑制勞動人口下滑。

49 殖民地時期，直至1950年5月之前香港對內地人口進入本港一度不設限制，詳情可閱 Lam & Liu (1998)，頁7-8。

6.2 人口老化與經濟發展

人口老化會嚴重影響當地的經濟發展。首先，退休人士要為養老作準備而令消費傾向保守，他們的消費需求疲弱造成市場需求下降，拖累經濟發展。隨著年老人口比例上升，影響將更為顯著。第二，老年人傾向動用儲蓄，慢慢消耗積儲。面對儲蓄率下降，高齡化社會下投資及固定資產形成會欠缺動力，抑制潛在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日本便是一個例子，過去數十年來日本的人口老化令其儲蓄率日漸下降（見圖64）。第三，人口老化會令老年撫養比率上升⁵⁰。社會需要調撥更大比例的財政資源予老年福利及醫療，投放於教育、科技及基建等可以提高生產力項目的財政資源便會相對減少，全要素生產率以及社會經濟的增長亦會因此而下降。第四，人口老化意味着勞動人口終會減少。除非勞動人口參與率的增長能填補勞動人口的流失，否則勞動力供應則會下降，直接從供給層面拖累經濟。

圖 64：1994年至2015年日本住戶及國民儲蓄率



資料來源：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50 老年撫養比率指65歲及以上人口數目與每千名15至64歲人口相對的比率。

人口老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可用增長核算法進行估算。經濟生產總值增長可以歸因於勞動力、資本積累及全要素生產率等三項因素。根據美國經濟諮商局對55個在1990年至2005年間平均年均增長率為2.9%的國家作出估算，人口老化會令2014年至2019年間經濟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減少0.4個百分點。隨著人口進一步老化，預料2020年至2025年間，有關增長率的跌幅更會增至0.9個百分點⁵¹。

生育率低及平均預期壽命延長造成的人口下跌及人口老化是現代社會的現象。歷史上，人口下跌是由於戰爭、饑荒、瘟疫、自然災害或移民外流。現代人口下跌雖然不會發生得那麼驟然，過程會較為漫長及緩慢，但人口老化引致的人口下跌長遠對經濟造成的影響可以同樣嚴重。

6.3 兩個高齡社會：香港、日本

聯合國將「高齡化社會」定義為老年人口（65歲或以上）佔總人口比例的最少7%，「高齡社會」為老年人口佔總人口的14%以上，「超高齡社會」則為老年人口佔總人口超過20%⁵²。2015年日本在眾多超高齡社會中名列榜首，總人口中有26.4%為老年人口，其次為意大利、德國、芬蘭及希臘。幾乎所有歐洲及北美國家都屬於高齡社會。在亞洲經濟體中，日本擁有最高的老年人口比率並屬超高齡社會，香港排名第二而且是亞洲中唯一的高齡社會（15%老年人口）。其他亞洲國家包括韓國、新加坡、泰國及中國，但根據聯合國的定義，它們只屬高齡化社會，還未踏入高齡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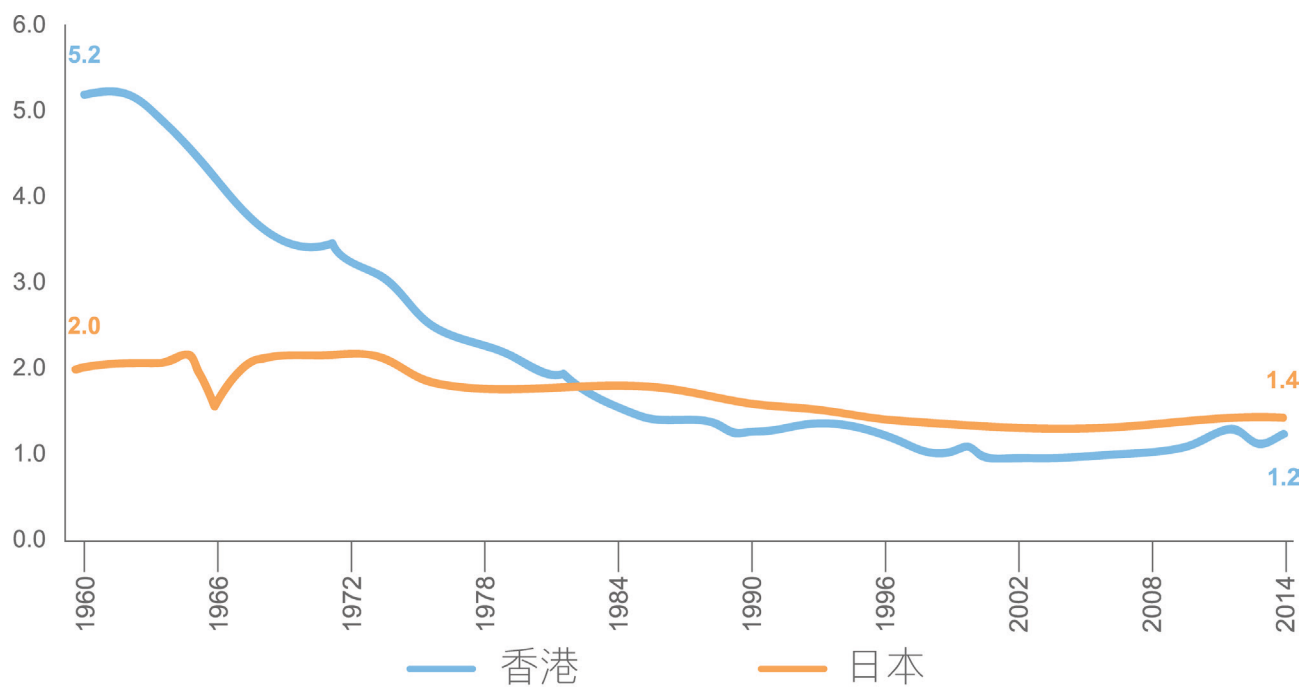
香港具備所有導致高齡社會的基本因素。跟日本一樣，香港的總和生育率是全球最低之一，平均預期壽命在全球亦數一數二。自80年代初，香港的總和生育率跌穿並維持在低於日本的水平（見圖65）。2016年，香港男性的平均預期壽命為81.24歲、女性為87.32歲，兩個數字均較日本的為高（男性為80.79歲、女性為87.05歲）⁵³。若非戰後嬰兒潮、80年代前的大規模湧港移民潮以及80年代後內地移民持續流入，香港的人口老化問題可能會跟日本一樣嚴峻（見圖66）。儘管如此，香港人口亦正在迅速老化（見圖67）。

51 Erumban, Abdul Azeez, Klaus de Vries & Bart van Ark 「New Measures of Global Growth Projections for the Conference Board Global Economic Outlook 2014」，美國經濟諮商局，2013年。

52 全球人口老化報告（Report on World Population Aging），聯合國，201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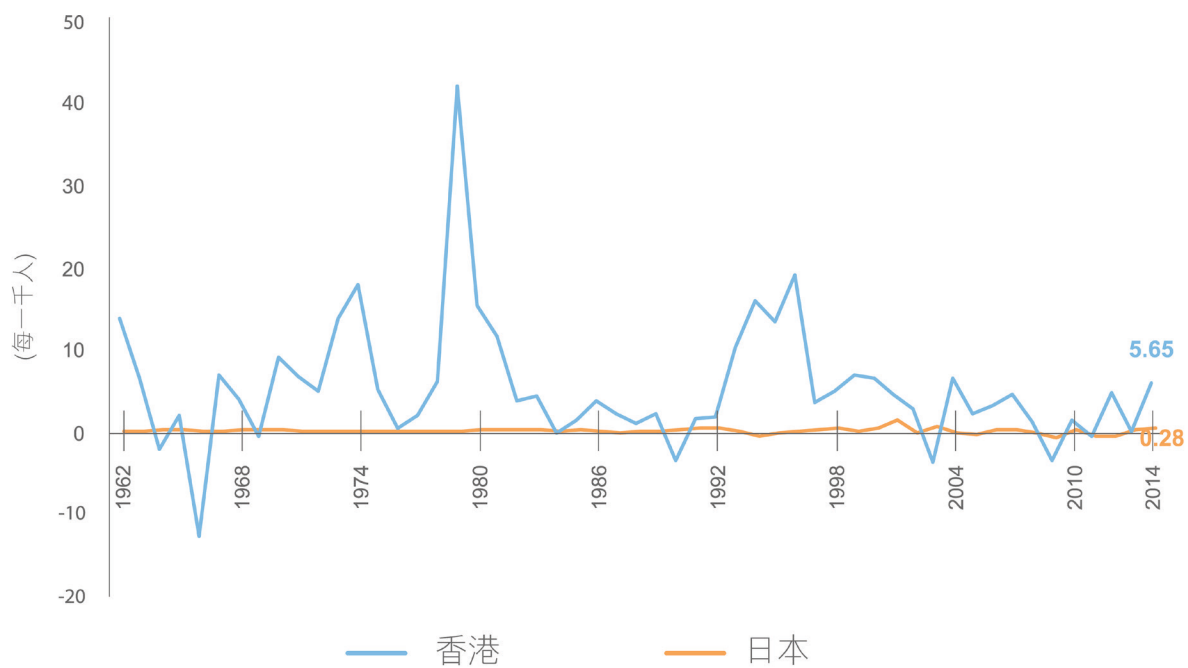
53 資料載取自日本厚生勞動省。

圖65：1962年至2014年香港和日本的總和生育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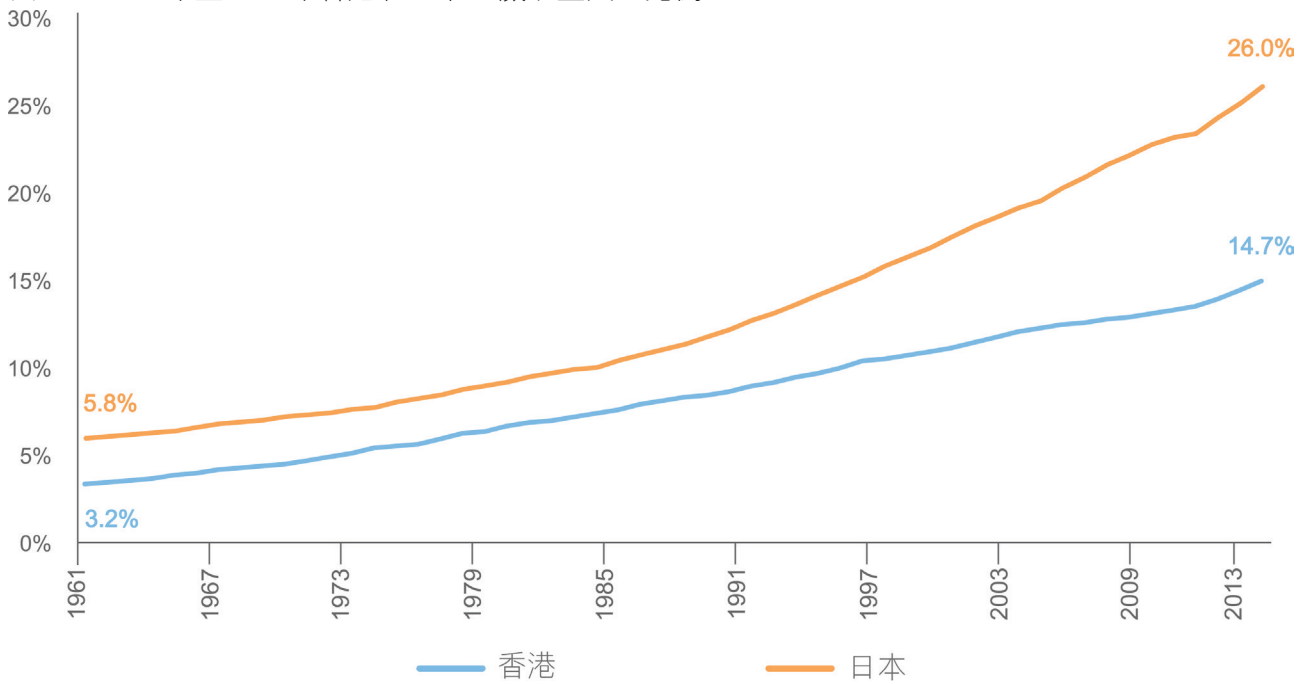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圖 66：1962年至2014年香港和日本的淨遷移率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香港）· 統計局（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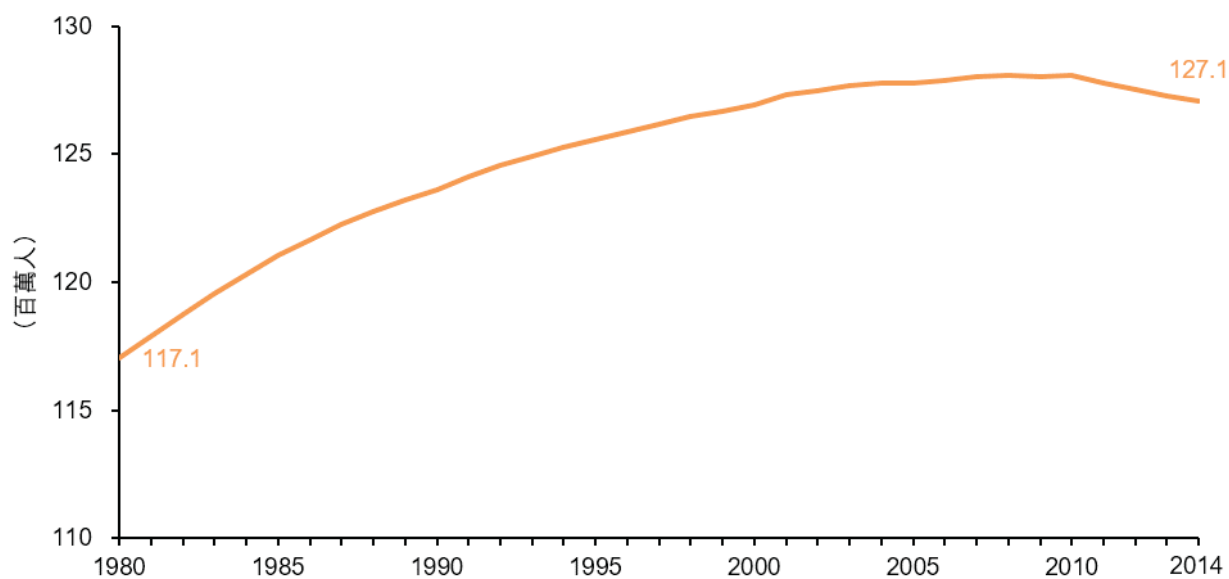
圖67：1961年至2014年香港和日本65歲以上人口比例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香港），CEIC數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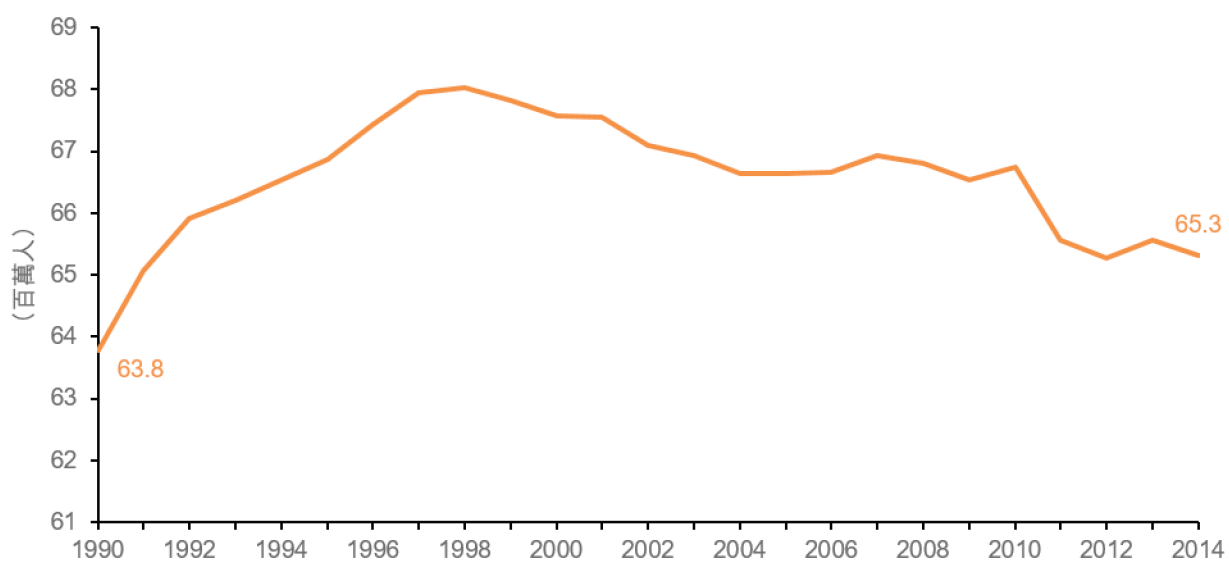
這裡有需要指出，日本人口於2008年到達1.28億人的最高點。今天日本人口比2008年少100萬人（見圖68）。其勞動人口則更早見頂，並下跌得更快。在1998年到達最高點後，日本現時的勞動人口比當年少300萬人（見圖69）。勞動人口下降是過去二十年日本經濟停滯不前、增長乏力的重要原因（見圖70）。事實上，日本的人均名義經濟生產總值（按美元計）由2013年開始一直落後於香港（見圖71）。雖然此比較多少受日圓兌美元貶值所影響，但背後的因素是日本經濟相比香港長期增長緩慢。

圖68：1980年至2014年日本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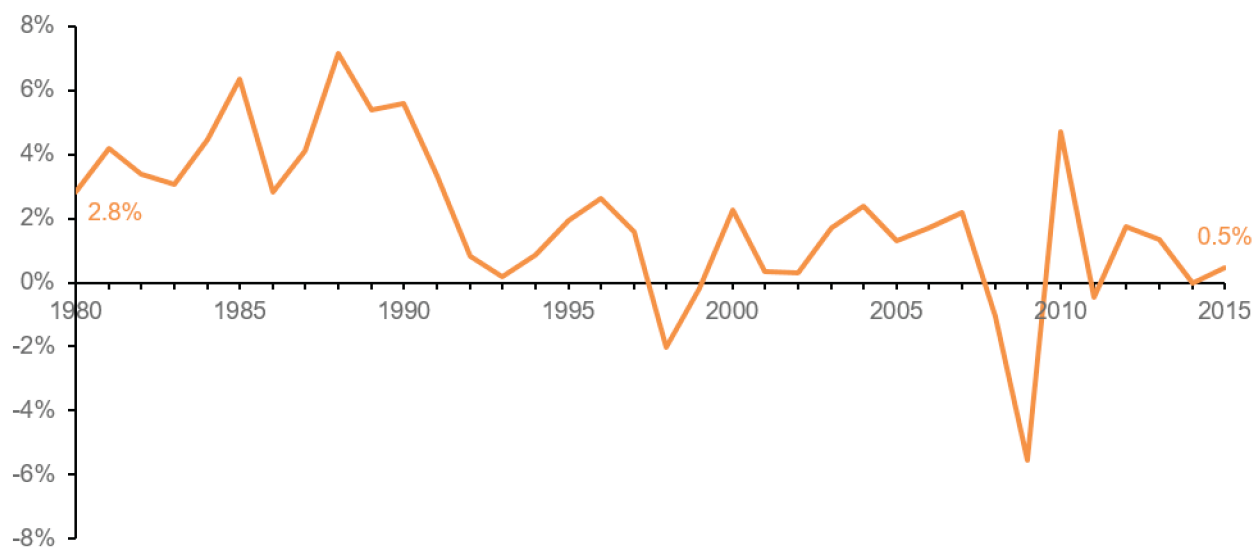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圖 69：1990年至2014 年日本勞動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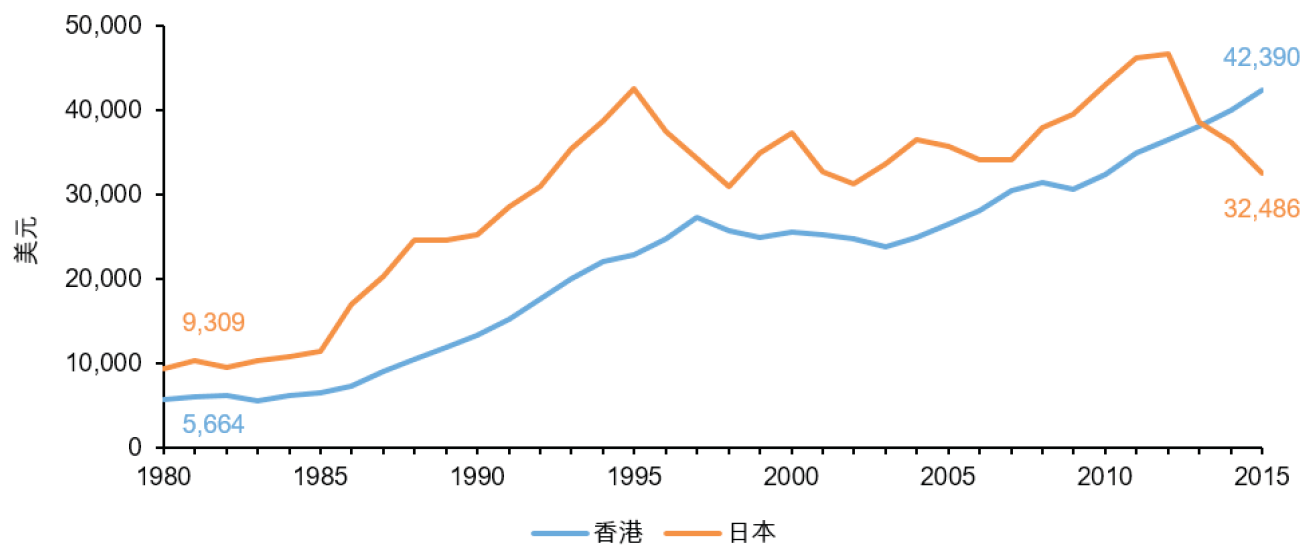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圖 70：1980年至2015年日本實質經濟生產總值增長率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圖 71：1980年至2015年日本及香港人均名義經濟生產總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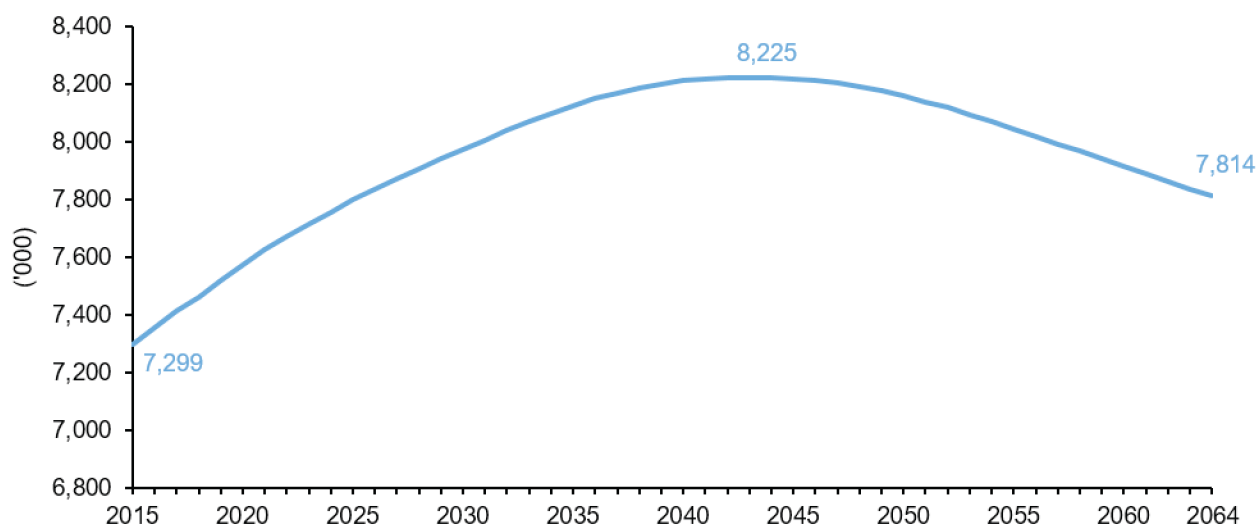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CEIC數據

基於生育率、死亡率、平均預期壽命、淨遷移率、簽證及入境許可證數目等多項前設下，政府統計處推算出香港居住人口會在2043年到達822.5萬的高峰，隨後逐步回落⁵⁴（見圖72）。2026年每年死亡人數會超過出生人數，導致人口自然增長轉為負數。但因為抵港和離港的移民及持入境簽證人士的淨流入足夠補充人口的自然流失，令人口增長能維持至2043年。當局推算香港人口將在2043年後萎縮（見圖73）。

與此同時，香港勞動人口與總人口的增長同樣正逐年減慢（見圖74），而內地移民佔全港勞動人口的比例亦同時不斷減少。1981年內地移民佔勞動人口的比例接近50%，2011年下降至約25%（見圖75）。勞動人口參與率持續下降亦進一步加劇人口增長下跌對勞動力的影響（見圖76）。2019年香港勞動人口預計會到達366.3萬，及後見頂回落，令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到2022年每年下降0.3%⁵⁵。

圖 72：2015年至2064年香港人口推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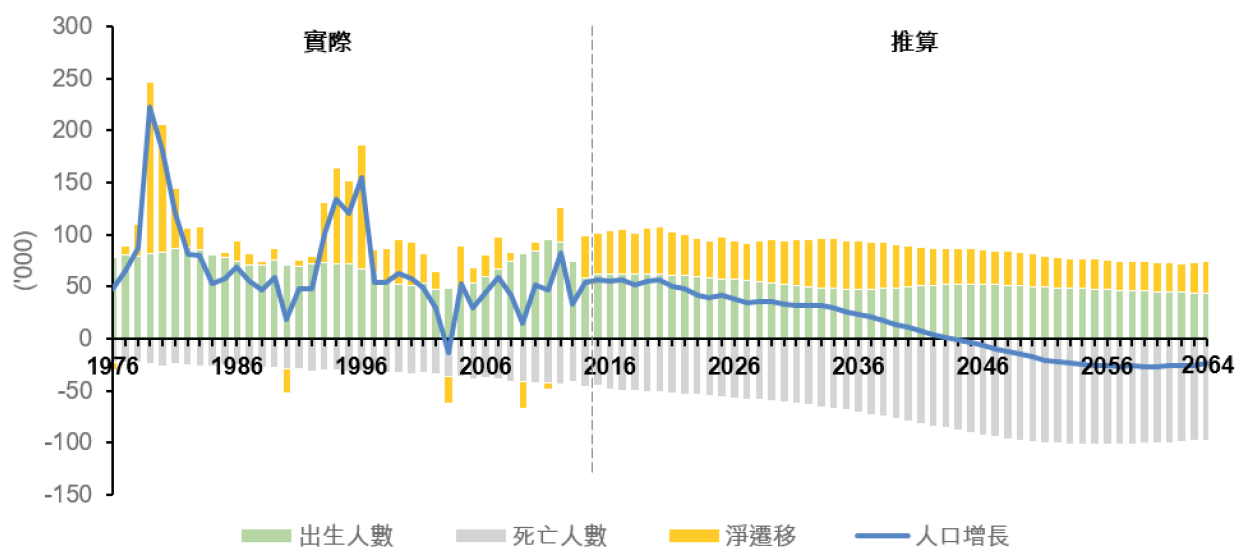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註：年中人口數字。

54 香港人口推算 2015-206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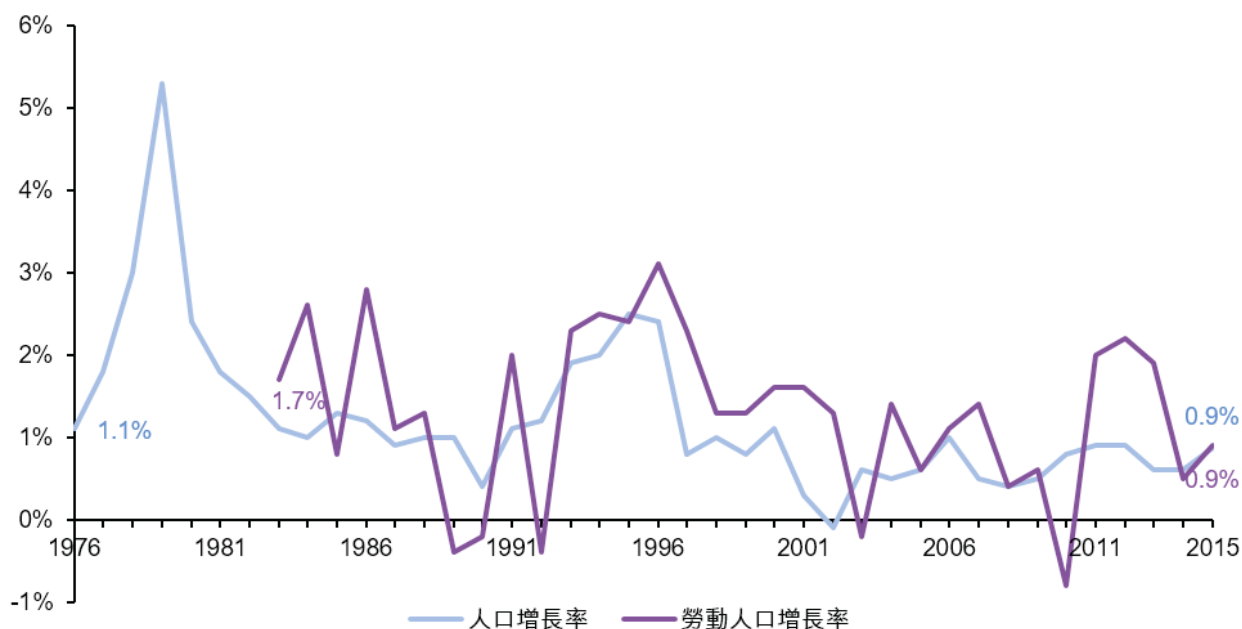
55 2013年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

圖73：1976年至2064年香港人口增長結構及推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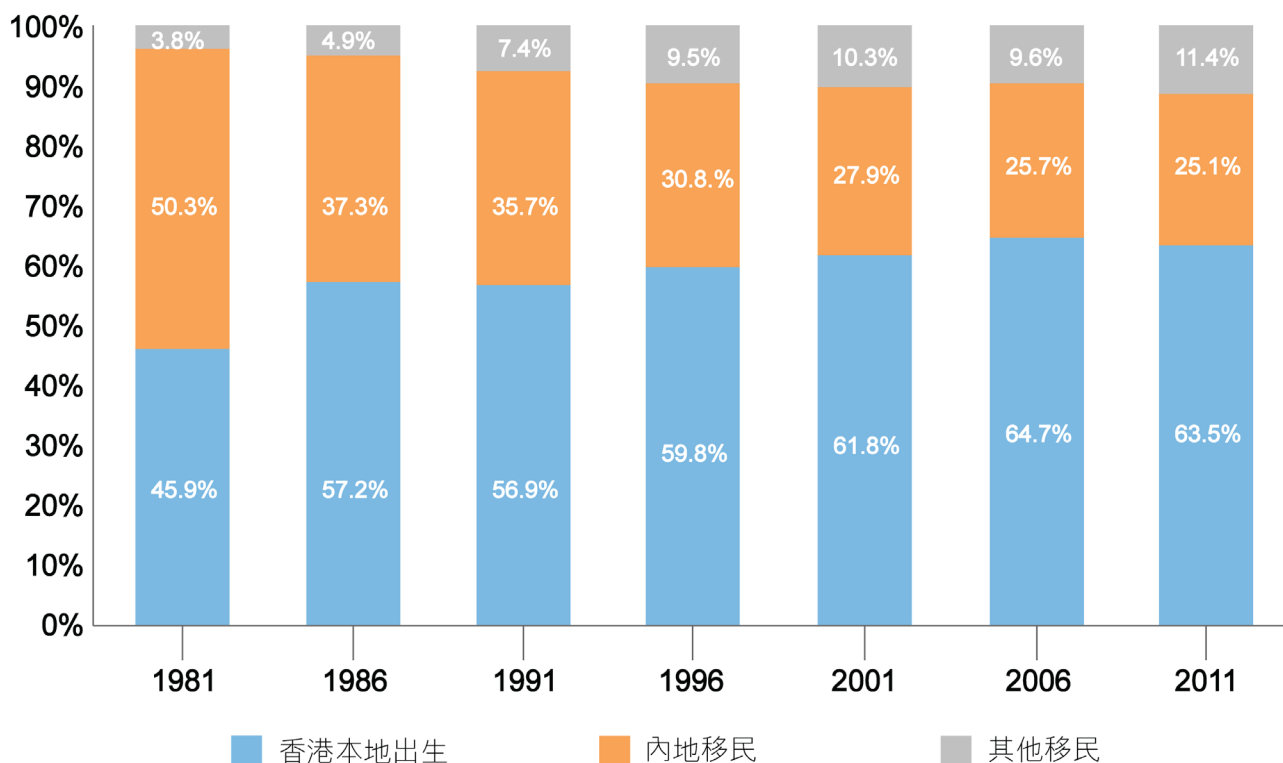
註：1995年以前的數字是根據「廣義時點」方法編製，自1996年起數字是根據「居住人口」方法編製。在「廣義時點」方法下編製的人口估計，人口基準包括普查時刻身在香港的人士外，亦包括普查時刻在內地或澳門工作的香港居民，以及通常居住在香港但在普查時刻離港往內地或澳門短暫外遊的香港居民。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圖 74：1976年至2015年香港人口及勞動人口增長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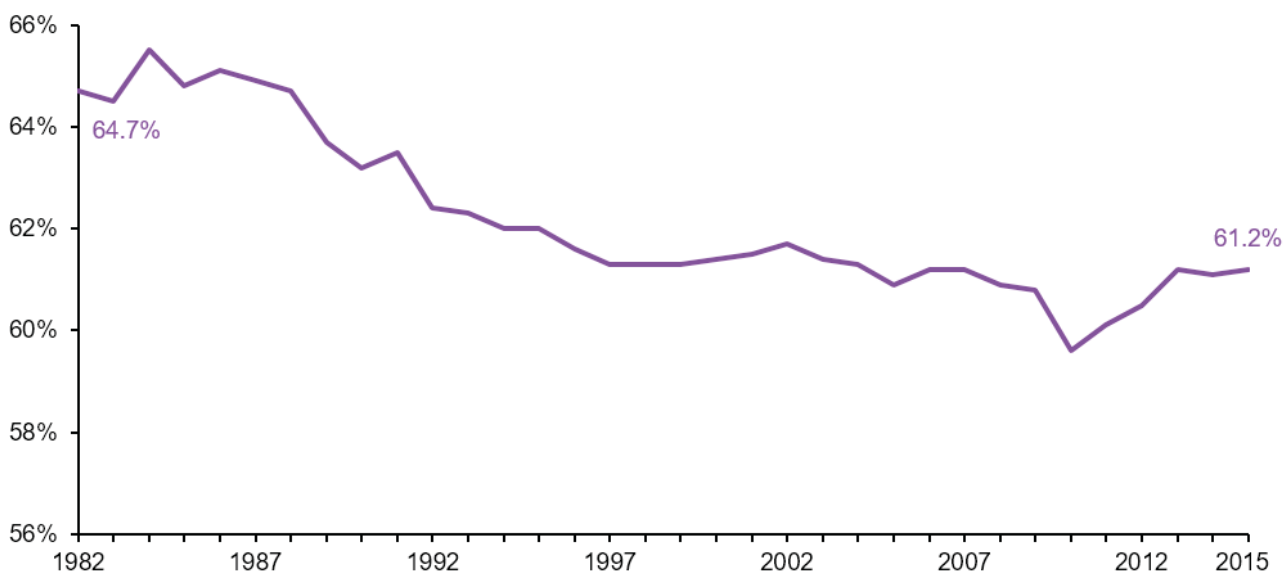
註：1995年以前的數字是根據「廣義時點」方法編製，自1996年起數字是根據「居住人口」方法編製。在「廣義時點」方法下編製的人口估計，人口基準包括普查時刻身在香港的人士外，亦包括普查時刻在內地或澳門工作的香港居民，以及通常居住在香港但在普查時刻離港往內地或澳門短暫外遊的香港居民。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圖 75：1981年至2011年移民佔香港整體勞動人口比例



註：基於1981年人口普查對出生地的定義有所不同，該年的內地移民包括來自澳門的移民。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團結香港基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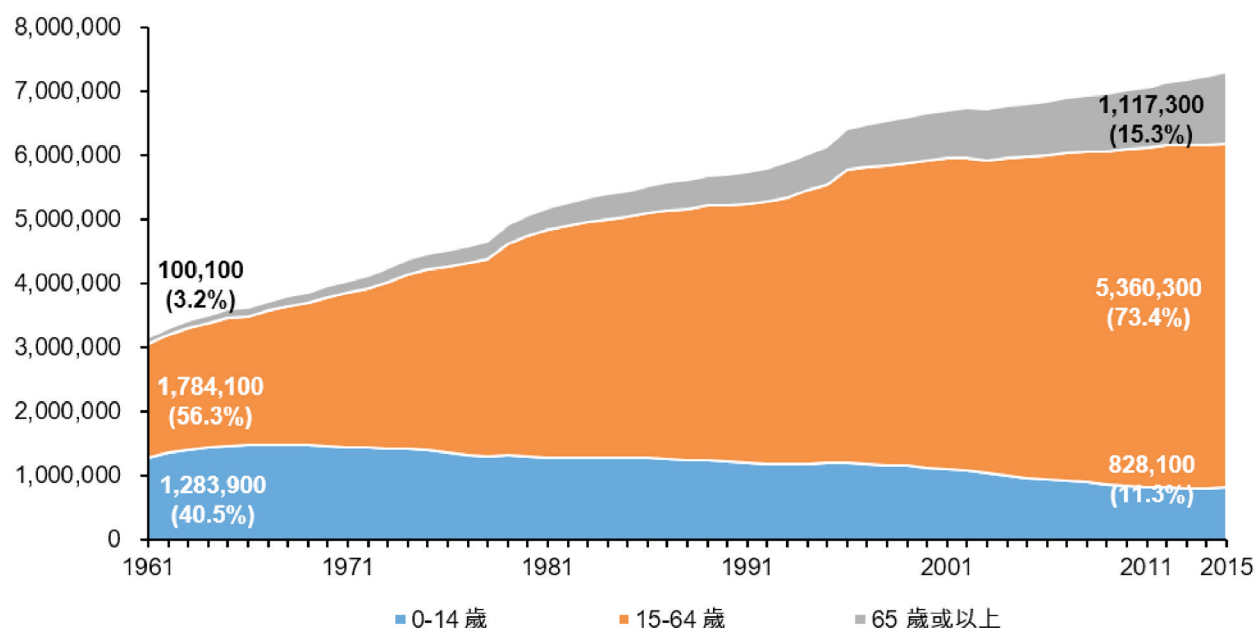
圖 76：1982年至2015年香港勞動人口參與率



註：(1) 由2001年開始，年度數字是根據每年1月至12月進行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結果，以及由政府統計處與跨部人口分布推算小組共同編製按區議會分區劃分的年中人口估計數字而編製。
(2) 勞動人口參與率是指勞動人口佔所有15歲或以上陸上非住院人口的比例。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老年人口（定義為65歲或以上）的比例快速增長及適齡工作人口（定義為 15-64歲）的比例下降是人口老化的跡象。除了拖慢勞動力及經濟的增長，高齡化人口的組成亦會令未來社會因撫養長者而面對沉重的經濟負擔。踏入廿一世紀，戰後嬰兒潮一代開始步入高齡，令老年人口迅速增長（見圖77）。2015年香港共有112.3萬名長者，佔總人口的15%。到2064年，這個數字將倍增至258.2萬人，即總人口的33%。根據聯合國的定義，屆時香港將進入「超高齡社會」之列。與此同時，15-64歲適齡工作人口比例將由73%減至58%。老年撫養比率，即老年人口相對每千名適齡工作人口的比率，將由2015年的208急升至2039年的489，2064年更達567（見圖78）。從這些數字可以預示未來撫養老年人口所需的經濟支出，無論在社會、政府或家庭層面都會造成嚴峻的問題。現時社會上相對每名已退休及沒有從事經濟活動的高齡人士，就有4.8名潛在工作賺取收入及繳稅的人士。到2064年，此比例將會惡化至每一位高齡人士對1.8人潛在工作人士（除非未來的退休政策有重大改變）。未來真實情況可能比推算的更為嚴峻，因為不是所有適齡工作人口也會投入勞動市場工作，而現時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只有61%。再者，當中的在職勞動人口同時要供養少年及兒童（0-14歲）。連同少年兒童撫養比率⁵⁶，2064年總撫養比率⁵⁷預計將為716。香港正跟隨日本成為超高齡社會，儘管進程會比較緩慢，主要因為移民流入。

圖 77：1961年至2015年香港人口年齡分布



註：(1) 年度中期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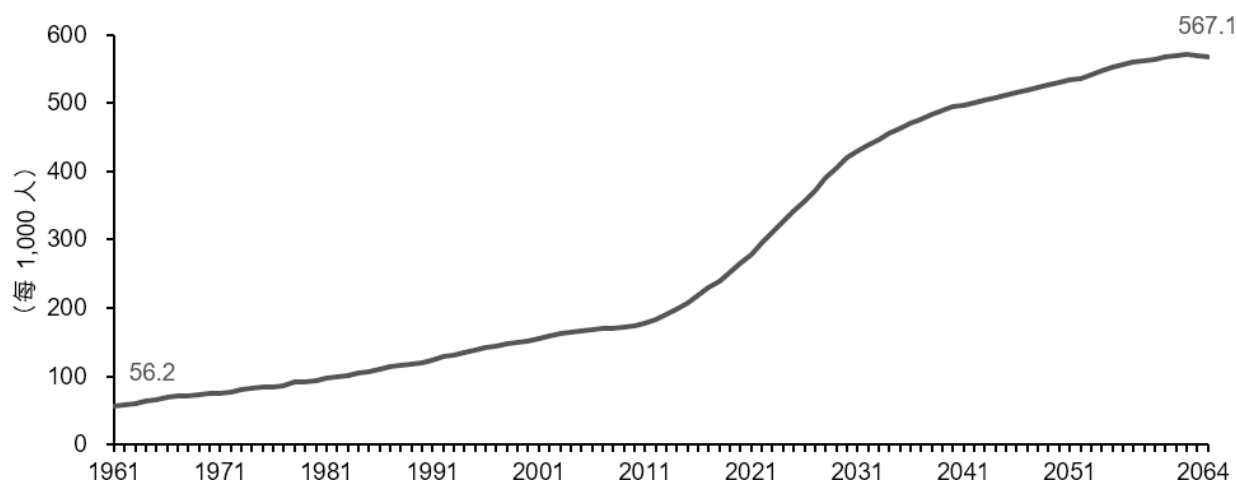
(2) 1995年以前的數字是根據「廣義時點」方法編製，自1996年起數字是根據「居住人口」方法編製。根據「廣義時點」方法，人口基數包括身在香港的人士、在內地或澳門工作的香港居民、以及經常在香港居住但在普查時正在內地或澳門作短暫逗留的香港居民。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56 少年兒童撫養比率指15歲以下人口數目相對每千名15至64歲人口的比率。

57 總撫養比率是老年及少年兒童撫養比率的總和，即15歲以下和65歲及以上人口數目相對每千名15至64歲人口的比率。

圖 78：1961年至2064年老年撫養比率



註：1996年之前的老年撫養比率乃根據「廣義時點」法編製的年度中期數據計算，因為1996年4-6月以前，以「居住人口」方法編製的年終數據欠奉。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隨著醫療保健服務及科技日益進步，平均預期壽命預料會進一步延長，但目前並沒有發達國家能夠成功把總和生育率提高至可更替人口的2.1水平以抵消人口老化的影響。輸入足夠的移民似乎是發達國家減慢人口老化的唯一可行辦法，長遠有助防止人口萎縮。作為全球最高齡社會的日本實質上並沒有任何移民人口（見圖66）。在政策及文化層面上，日本社會未有接收大批移民的準備，但日本政府承認輸入更多移民的重要性。近年當局引入了新的移民規例，放寬外國專才申請永久居留的所需逗留年期，由5年縮減到3年⁵⁸。新規例雖然能夠鼓勵外地專才定居日本，但仍遠遠不足以帶來足夠的移民人口以改善日本人口老化的情況。若移民政策不進行大型改革讓足夠移民持續流入，日本人口老化問題似乎沒有其他解決方法。

不少西歐國家亦面對人口老化問題，但因為東歐、北非及中東有大量移民湧入西歐，所以問題並不如日本嚴重。然而，這些移民不但社會經濟地位低，而且文化、種族、以至宗教上均與當地人民有所差異，如何令移民融入當地的經濟及社會文化是這些西歐國家要面對的棘手問題。這方面香港相對幸運，因為流入香港的移民主要來自中國內地，而他們與香港本地居民有著相同的種族及語言。

58 請參考日本法務省（2014年6月18日）《出入国管理及び難民認定法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案》。

6.4 移民的經濟同化

來港移民上流至香港社會上層的成功例子多不勝數。更重要的是在統計上，這些移民與他們的下一代整體上能否在經濟、教育及文化層面融入香港社會。不少國家都曾研究有關移民經濟同化的議題。在大多數接收大量移民的國家，雖然移民的平均收入一般比當地人少，但經過一段時間後，他們普遍能夠縮窄收入差距。移民本身擁有的人力資本可能只適用於其原籍國家，未能轉移至其移居國家 (Lam 1986)。移民外國後，他們有機會學習適用於移居國家的技能，例如當地語言及市場知識 (Chiswick, 1978; Borjas, 1985)。此外，移民抵埗後通常會立即接受任何工作機會，但經過一段時間，他們或會在本地僱主中找到更合適的工作，並能發揮自身擁有及移民後學習到的技能令回報上升 (Eckstein and Weiss, 1998)。在這個經濟同化的過程中，移民將能隨著時間漸漸縮窄與當地人的收入差距。

不過，根據1981年及1991年的人口普查數據，Lam & Liu (2002) 發現十年間香港男性移民 (20-64歲) 的平均收入，被本地男性居民拋離越遠，兩者收入差距由11.3%上升至25.5%⁵⁹。收入差距擴大 (而非縮窄) 的現象在接收大量移民的國家中頗不尋常。在香港，移民與本地人於1981年至1991年的收入差距擴大可歸因於兩者教育回報的差異擴大。移民人士在內地所接受的教育所學技能較適用於勞工密集的製造業，而非高增值的服務行業。由於香港於80年代正值經濟轉型，經濟由製造業發展成以服務業為主導。服務業市場更重視社交技巧及語言能力，尤其是英語，因此內地移民的教育回報率增速較本地人的為慢。

這個情況到2001年有所改變。當我們把以上的分析擴展到2001年及2011年人口普查數據並計算收入差距，發現內地男性移民相對本地男性的平均收入差距由1991年的25.5%持續擴大至2001年的31.6%，但隨後開始收窄至2011年的30.2%。若我們分析收入分布，可以更清楚看到2001年至2011年男性移民相對本地男性的收入情況有所改善。**表8**顯示由1991年至2011年，按本地人收入的百分位數劃分，收入低於本地男性的男性移民百分比。經過1991年至2001年的小倒退後，移民的相對收入狀況於2001年至2011年在所有收入分布組別上均有所提升，而50百分位數以下組別的改善尤為明顯。例如，2001年有18.8%的男性移民收入少於位於收入分布最底10%的本地男性，但到2011年，該百分比已下降至16.8%。

58 Lam & Liu (2002) Earnings Divergence of Immigrant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1), 86-104。收入差距是以內地移民收入對數的平均值減去本地人收入對數的平均值來計算，並以百分比表示 (調整至最接近的對數)。報告只分析男性的收入，因為相比女性，男性多數會從事全職工作，故此他們的每月收入數據更能準確地反映在職男士的賺錢能力。普查中並沒有時薪的數據。

表 8：1991年至2011年內地男性移民收入較本地人為少（按百分位數劃分）

本地人百分位數分布	1991	2001	2011
	(%)	(%)	(%)
10	19.3	18.8	16.8
25	40.2	40.7	38.8
50	67.4	71.8	69.5
75	88.7	90.8	89.2
90	95.6	96.5	95.8

資料來源：以1991年、2001年及2011年的人口普查數據計算

移民相對收入狀況改善主要因為他們的教育回報率相比本地人有較大的增長。**表 9** 按進入勞動市場的年份劃分為不同的群組，標誌著不同的工作經驗年數，兩者的教育回報率的估算。教育回報率是運用傳統的明瑟收入回歸方程（Mincerian earnings regression）所估算的系數，代表每接受多一年教育所增加的收入的比率。舉例稱，在1996年至2000年間進入勞動市場的本地人，其教育回報率從2001年的14.7%上升至2011年的16.7%。在各個進入勞動市場的群組，本地人的教育回報率都比移民的為高，而影響兩者相對收入狀況的有關因素是教育回報率隨著時間的相對變化。**表 9** 顯示由2001年至2011年間，所有群組（1981-1985年的群組除外）的教育回報率不是增幅相較本地人的為大，就是跌幅相較本地人的為小。此結果與大部分研究移民經濟同化的文獻結果一致，即兩者的收入差距會逐步收窄。之前，1991年及1981年人口普查發現兩者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Lam & Liu, 2002），已隨香港於90年代完成經濟轉型而有所逆轉。

表 9：2001年及2011年本地男性與男性移民的教育回報率及兩次普查之間的變化

進入勞動市場的年份	本地人			移民		
	2001	2011	兩次普查之間的變化 (2011-2001)	2001	2011	兩次普查之間的變化 (2011-2001)
1996-2000	0.147	0.167	0.020	0.117	0.137	0.020
1991-1995	0.145	0.167	0.022	0.116	0.141	0.025
1986-1990	0.160	0.169	0.009	0.101	0.116	0.015
1981-1985	0.159	0.165	0.006	0.091	0.092	0.001
1976-1980	0.140	0.137	-0.003	0.068	0.080	0.012
1971-1975	0.124	0.097	-0.027	0.070	0.053	-0.017
1966-1970	0.106	0.057	-0.049	0.064	0.038	-0.026

資料來源：根據2001及2011年的人口普查數據計算

近年來港移民的教育程度及技術水平均較早年來港的移民為高，這亦是他們的相對收入狀況有所提升的原因之一。學術界稱之為「群組效應」。第二章的圖24顯示，雖然持單程證來港的人數一直保持相對穩定（每日150個配額），近年透過輸入內地人才計劃（ASMP）及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IANG）抵港的人數卻有所增加。後者的移民人士大多數曾接受大學教育，而且從事專業工作。此外，15歲或以上持單程證來港的群組中，曾接受專上或高等教育的人數比例由1998年的5%增加至2015年的21%（見圖79）。另外，近期來港的移民有相當大比例是較年輕的一代，他們以受養人的身份持單程證來港與家人團聚⁶⁰。這批年輕移民較多於來港後接受教育，與之相比，早期的內地移民群組（包括非法入境者）大多在內地接受教育。我們可以比較男性新移民（定義為人口普查五年內的新來港人士）及本地男性的平均收入，兩者的收入差距明顯由2001年的48.4%，大幅收窄至2011年的27.6%。這足以證明2001年後來港的新移民的質素與較早期的群組截然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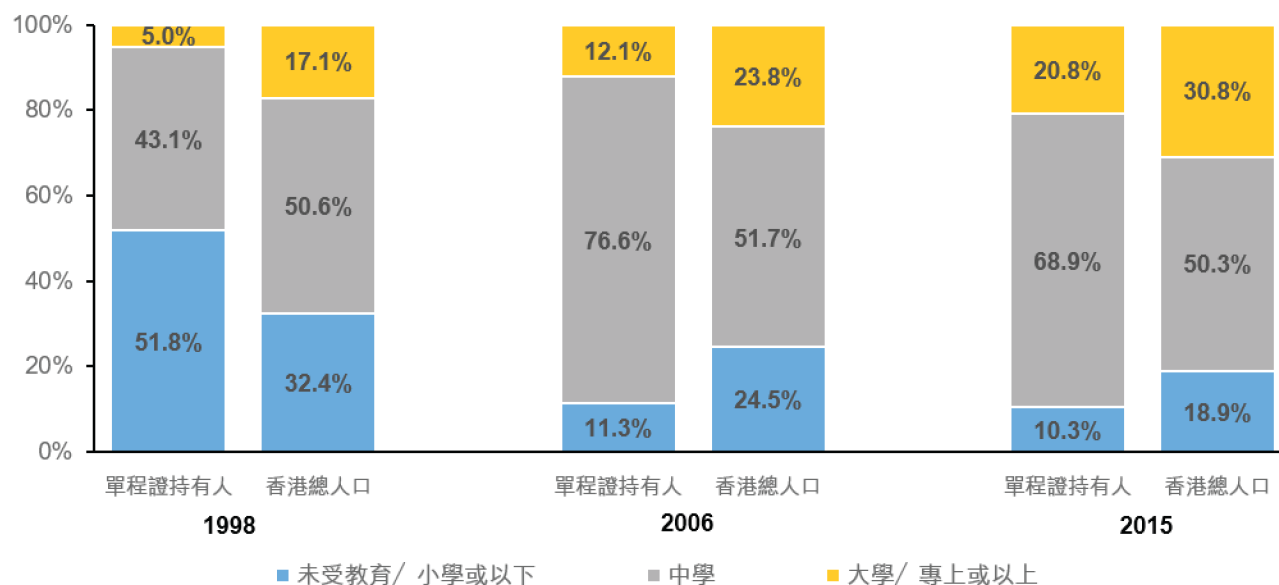
60 1998年有54%持單程證人士的年齡屆乎0-14歲，2014年則有19%（見圖84）。

總括而言，2001年後內地移民與本地居民的收入差距正在縮窄，這是經濟同化過程的一個典型現象，亦常見於很多大量接收移民的國家。雖然差距仍然頗大，但隨着近年內地移民的教育水平有所提升，未來兩者的收入差距將會收窄得更快，尤其當越來越多從內地移民到港的人士已持有大學學歷，或是有更多已在港獲得本科或研究生學位的內地移民透過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IANG）留港/來港。報告稍後將再探討此議題。

6.5 移民人士的跨代教育流動性

教育一直被視為促進社會平等的手段。為了盡可能令來自不同社會經濟背景的兒童能夠獲得平等的人力資本投資，政府為所有市民提供免費或大額資助補貼的教育，最高可達致中學及大學程度（適用於能考入大學的人士）。若在金錢資本上沒法達致平等，至少讓不同社會經濟背景的兒童在人力資本投資上能夠獲得平等的機會，可望在同一個起跑線上競爭。大部分持單程證來港的早期內地移民，他們的社會經濟背景及教育水平都較差（見圖 79）。問題在於教育是否真的能夠為香港的移民及其子女帶來向上流動力，進而促進移民融入本地社會。

圖 79：1998年、2006年及2015年按教育程度劃分的單程證人士及香港整體人口



資料來源：民政事務署，政府統計處

一個近期進行關於香港跨代教育流動的研究指出，事實上移民人士的教育流動性比香港出生的本地人為高⁶¹。根據香港人口普查的統計方法，只有當父母子女同住一屋，其親屬關係才能被識別。該項研究利用1991年、2001年及2011年三次人口普查中與父母同住的20至25歲青年數據，分析子女與父母教育水平的關係，並把父親與子女關係按他們的移民身份分為三大組別作研究：兩代都是香港出生、子女在香港出生而父親是內地移民（第二代內地移民），及兩代皆為內地移民。研究以三種方法量度跨代教育流動性：子女相較父親的教育水平的代際彈性（Intergenerational Elasticity）、子女教育程度較父親為高的比例，以及根據父親的教育水平，子女入讀大學的相對概率變化。結果顯示，按國際標準，香港擁有高跨代教育流動性。具體來說，研究發現雖然內地年輕成年人移民的教育程度較低，入讀大學的機率亦比香港出生的人士為低，但其教育向上流動性極高：他們跨代向上流動的百分比已趕上父母都是本地出生的香港青年。除此之外，在父母教育背景、家庭人數及青年性別相同的情況下，事實上內地移民的成年子女（大部分於香港出生⁶²）的在學年數以及入讀大學的機率均比父母皆為本地出生的子女為高。他們屬第二代移民，其教育程度及跨代教育流動性亦比兩代都是香港出生的人士為高。

第二代移民的教育水平及跨代教育流動性較本地出生的人為高，這現象並不單單在香港發生。美國（Card et al. 2000）、丹麥（Nielsen et al. 2003）、瑞士（Bauer & Riphahn, 2007）及英國（Dustmann & Theodoropoulos, 2010）的研究都有類似的發現。我們因此可以總結第一代年輕的成年內地移民雖然教育程度較香港本地出生的人士為低，但他們能利用香港的教育機會以獲取較其父母高的教育水平。至於出生於香港的第二代移民在教育成就及社會向上流動兩方面都十分成功。

總括而言，教育是移民向上流動的主要途徑。正如其他發達國家的移民，內地移民和他們的第二代努力耕耘，一般能取得成功。教育令移民找到更好的工作及收入。同樣重要的是，它是一個讓移民漸漸融入香港社會的過程。

61 Lam & Liu (2016)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al Mobility in Hong Kong: Are Immigrants More Mobile Than Natives? Working Paper No. 42, Lau Chor Tak Institute of Global Economics and Financ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62 1991年為85.3%、2001年為75.4%、2011年則為61.3%。

6.6 內地移民與香港社會的價值觀融合

從社會、文化、政治及道德價值觀方面來看，內地移民融入香港社會的情況還算不錯。我們可以參考「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結果⁶³。「世界價值觀調查」是一項全球性研究項目，由一批來自世界各地的社會科學家進行，以具全國代表性的調查方式研究了差不多100個國家18歲或以上人士的價值觀。絕大部分調查的樣本數目介乎1,000至2,000不等。調查問卷的結構規範全球一致，共有超過200條問題，涵蓋工作、家庭、生命、子女、道德、信任、宗教、自由、政治、民主、環境、文化、種族、性別、少數民族、外籍人士、包容、國家身份認同、安全及主觀幸福感等議題的看法及態度。第六波的調查於2013年在香港進行。公開的調查數據雖沒有明確指出受訪者是香港出生還是內地移民，但有指明他們的父母是香港出生或是內地移民。要留意的是，父母均在香港出生的人多數也在香港出生，但父母是內地移民的人士可以本身也是移民，但亦有較大的機會在香港出生⁶⁴。我們就以下兩組人士分別對問卷每條問題的回應進行了統計上的假設檢定（以百分比或分數表示）：（一）父母在香港出生的人士、（二）父或母其中一方在內地出生的人士。假設為兩組人士的回應相同。就大多數的問題，在統計上，我們都不能在5%的顯著水平下推翻其假設。問卷內270條問題中，比較父母在香港出生的人士（第一組）與父或母其中一方在內地出生的人士（第二組）的回應，只有在37條問題在統計上有顯著差異。即使如此，這些回應的百分比或平均分數數值上的總體差別也不大。

63 「世界價值觀調查」第六波調查結果，香港2013，技術記錄，2015年4月18日。

64 兩代都是內地移民的人口比例十分少。

例如，第二組人認為工作在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百分比稍低於第一組人（73.6%對82.2%）。但他們對其他多個議題的取態並沒有顯著差異，包括：家人、朋友、餘暇、政治、宗教的重要性；以及他們希望子女在家庭中學習到的品格，例如：節約、毅力、宗教信仰、無私、服從及自我表達。在統計學上，兩組人士對宗教、老人及性別議題均持相同看法，例如女性出外工作而不做全職家庭主婦、對女性作為領袖或上司的接受程度、女性收入高於丈夫及大學教育對女性的重要性等。此外，兩組對家人、鄰居、私下認識或首次認識的人士、陌生人、不同宗教背景的人士以及不同國籍的人士的信任程度都一樣。除了對未婚同居的情侶以外，兩組人對和以下人士當鄰居的偏好程度也差不多，包括吸毒者、不同種族、宗教或語言的人士、愛滋病患者、移民人士、同性戀者及酗酒者。在社會和道德層面上，兩組對以下行為的認同程度（無論行為有否合理解釋）亦相若：濫用社會福利、逃稅、同性戀、離婚、自殺、男人打妻子、父母打小孩，及對他人行使暴力。不過，第二組認為乘車不付錢、偷竊及受賄較令人反感；而對賣淫、墮胎及安落死則沒那麼反感。

在統計上，兩組都有高百分比（超過70%）的人士對慈善團體、環保團體、婦女團體、大學、銀行、警察及法院十分或頗為有信心。約50-70%人士對教會、大公司、武裝部隊、公務員及香港特區政府有信心。兩組均有低百分比（少於50%）的人對傳媒、電視、工會、立法機關及內地政府有信心。政黨得分最低，第一組只有30%人表示有信心，第二組的百分比更低至23%。

第二組受訪者對自己的國籍較感到自豪，亦較重視生活在一個以民主方式管理的國家。他們對社會及政治的看法與第一組在統計上相同，例如他們把自己歸類為左派或是右派、收入應否更加平等、政府應否負更多的責任確保每個人都受保障、競爭是否有害，以及人是否只能靠損人利己來致富。兩組人士對香港的民主程度及尊重人權的評估在統計上一致，對民主的本質亦有相同的認同程度，包括人民通過自由選舉揀選領袖、政府向富人徵稅以補貼窮人、失業者得到公共援助、政府令市民收入平等以及男女平權。兩組同樣相信誠實選舉的重要性，對香港選舉的公平度意見亦一致，例如反對派人士有否被拒參選、選民有否被賄、選舉是否被富商操控及選民有否受暴力威脅。不過，第二組受訪者較為相信選民在選舉中能作出一個真正的選擇、選舉官員公平公正、點票過程公平及記者以持平的角度報導選舉。雖然他們較熱心投票，但對政治的興趣與第一組相同。兩者的政治活動參與度或不參與度亦相同，如簽署請願、參與杯葛、罷工或其他形式的抗議，惟第二組受訪者稍較熱心於參與和平示威。

總括而言，父母來自內地的人士與父母生於香港的人士在社會、文化、政治及道德上的價值觀皆大致相同。我們為2013年香港世界價值觀調查以及2012年中國世界價值觀調查⁶⁵的價值觀差異進行了相類似的統計分析，結果亦具啟示性。當中除了少數例外，香港與中國幾乎對所有問題的回應，在統計上5%顯著水平下幾乎都不一樣。我們進一步比較中國調查中，廣東及福建的次樣本結果與香港的分別。雖然兩地的價值觀差異仍然頗大，但當中的差異相對香港與全國樣本的比較實屬相對的少。香港的內地移民主要來自廣東及福建兩個省份⁶⁶。相對於其他省份的中國人，我們可以判斷廣東及福建兩省的移民來港前的價值觀已跟港人較為相近。移居香港後，他們的下一代（絕大部份在香港出生）成功融入香港社會，並與兩代均在本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持有相同價值觀。

移民流入無可避免會對基建、房屋、教育及社會服務帶來一定壓力，形成社會矛盾。歷史上香港曾爆發過多次的大量移民抵港潮，包括在1980年取消抵壘政策之前，以及實施合法移民流入以後，每次香港均能成功應對。總括而言，內地移民，尤其是第二代，已經成功融入香港社會。只要移民人數並非大幅增加，香港其實有能力接收更多的移民人口，以減慢人口老化的速度。

6.7 內地移民特徵之轉變

內地移民的人口結構及社會經濟特徵自1997年以來一直轉變，對香港社會福利造成的壓力及負擔亦日漸減輕。Lam & Liu（1998）利用1981年、1991年及1996年人口普查的結果，詳細記錄了1997年回歸前的內地新移民特徵的轉變。1980年後，合法移民逐漸取代非法入境者，入境政策容許擁有居留權證明書資格的子女申請單程證來港與家人團聚，兒童移民（0-14歲）的比例相應大幅增加。1981年的新移民人口以男性居多，男女比例為58%對42%，這是由於大部分在1980年以前來港的非法移民都是男性。到了1996年，男女比例正好相反，因為大多數合法來港的成年移民都是香港人的內地妻子及子女。女性新移民的勞動人口參與率由1981年的70%大幅下降至1996年的48%，比本地女性的61%參與率低，反映當時大部分的女性移民都是家庭主婦。新來港移民的平均在學年數為7.4年亦比香港本地人的8.3年低。對於為來港兒童提供教育、為單親家庭提供支援、為失業移民提供社會保障援助以及為移民家庭提供公共房屋等議題一直在香港社會中具爭議⁶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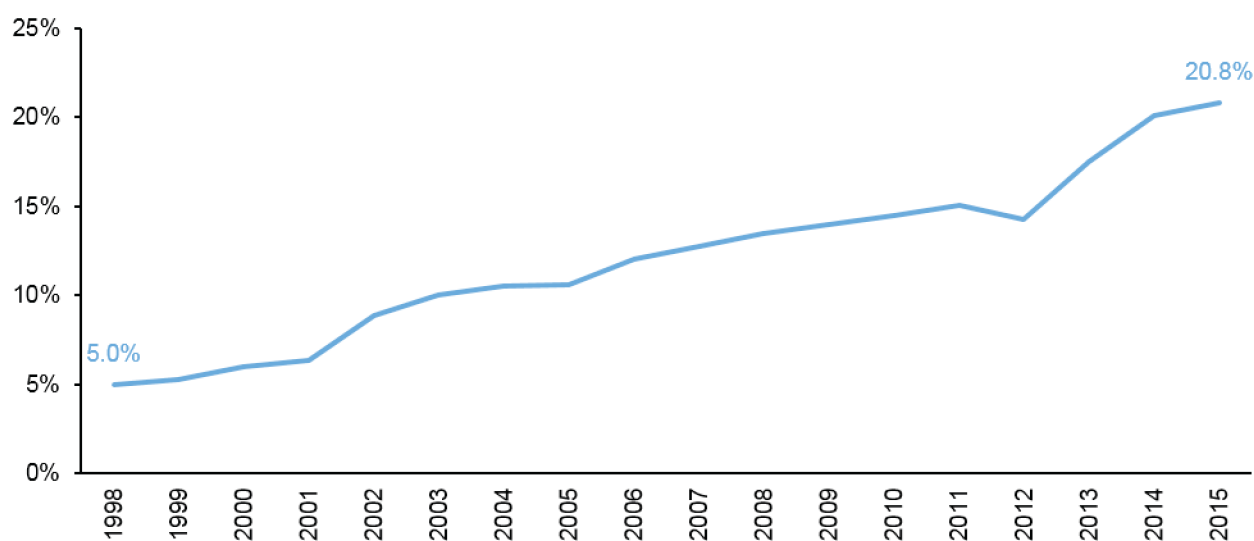
65 「世界價值觀調查」，第六波調查結果，中國2012，技術記錄，2015年4月18日。

66 1998年有多達92%的持單程證來港移民來自這兩個省份，雖然比率自2007年起下降至60%-70%。

67 關於持單程證移民對香港的成本及效益的詳細分析，可參閱 Bacon-Shone, Lam & Yip（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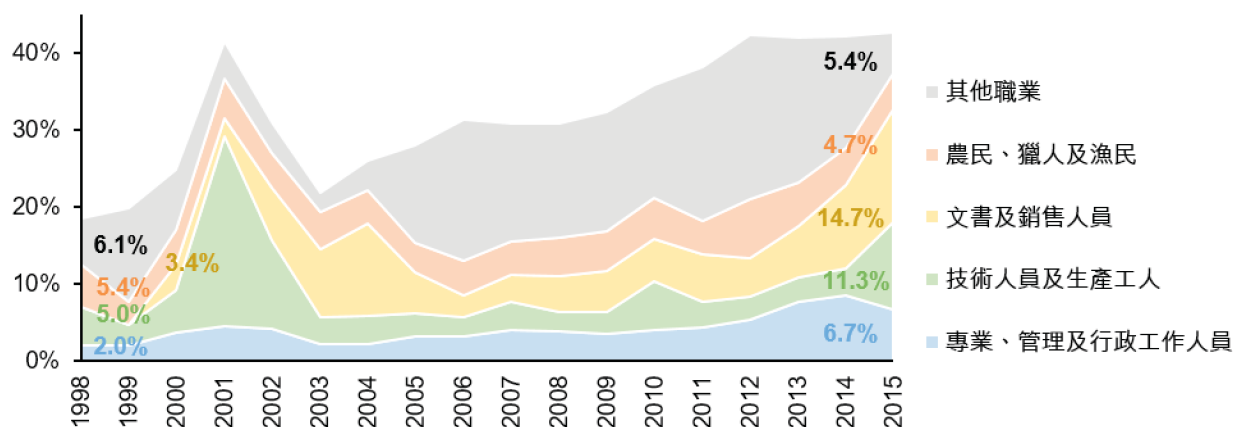
自香港於1997年回歸以來，內地移民的人口結構起了顯著的改變。內地移民人口中單程證持有人佔最大部份，當中15歲或以上擁有中學以上或大學學歷的移民比例從1998年的5%躍升至2015年的21%，近幾年的升幅尤其顯著（見圖80）。來港前曾在內地受僱的移民比例由19%增加至42%，而家庭主婦的比例則由59%下降至36%。至於移民來港前在內地從事的工作類別，當中的專業、管理及行政人員比例穩定上升，由2%增加至9%，而農民、獵人及漁民的比例則維持在5%（見圖81）。持單程證來港人士的特徵自1997年起不斷改變，移民擁有更高的學歷，並更活躍於經濟活動。與1997前的移民相比，他們應更容易融入香港的勞動市場。

圖 80：1998年至2015年單程證持有人擁有專上教育及大學程度的比例（15歲及以上）



資料來源：民政事務總署

圖 81：1998年至2015年單程證持有人移民前於內地的職業



註：1998年及1999年擔任文書及銷售人員的單程證持有人的數據欠奉。
資料來源：民政事務總署

6.8 輸入內地移民計劃

正如第二章所提及，目前香港共有六項主要的輸入內地移民計劃，包括單程證、輸入內地人才計劃、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優秀人才入境計劃、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以及受養人簽證。第一項計劃的目的是為了讓香港居民的配偶及子女能夠家庭團聚。第二至第五項計劃旨在為香港注入金融資本及人力資源。而最後一項計劃則是為了第二至第五項移民計劃的合資格申請人的受養人而設。

6.8.1 單程證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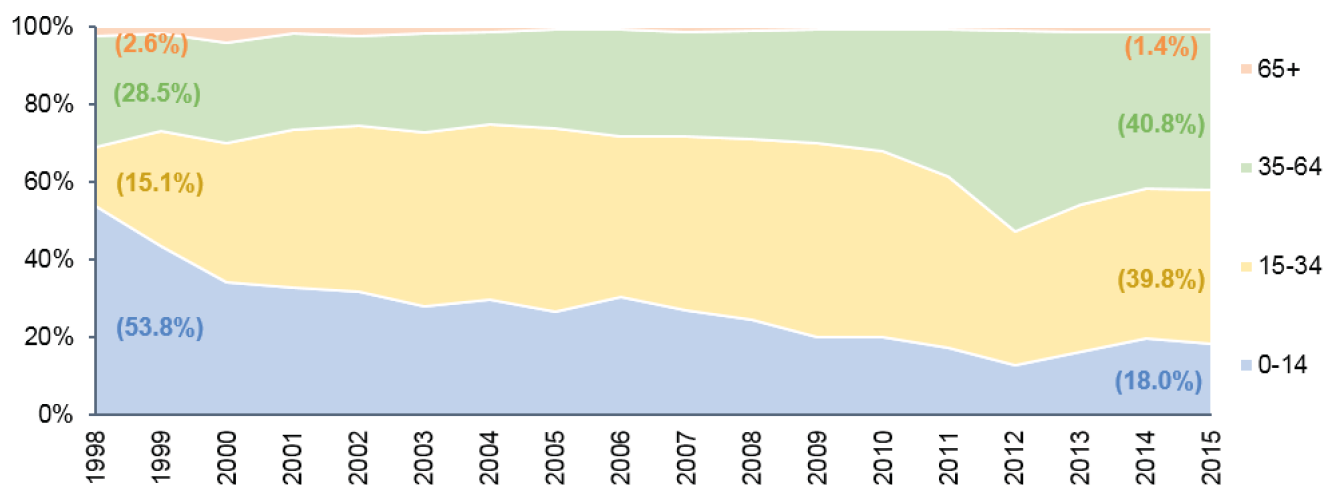
內地移民中最多是持單程證來港的人士。從圖82中可見，自2002年，除了2003年、2005年及2012年，內地持單程證來港的人數遠低於年度配額的54,750人（即每日150人）。事實上，該人數已逐步回落至2015年的38,338人。單程證持有人當中兒童（0-14歲）所佔比例從1998年的54%，下降至2003年的不足30%及2015年的18%（見圖83）。此比例於1997年往後幾年間開始下跌，反映計劃已逐漸處理之前積壓下來等候與香港父母團聚的兒童。

圖 82：1998年至2015年單程證持有人數目



資料來源：民政事務總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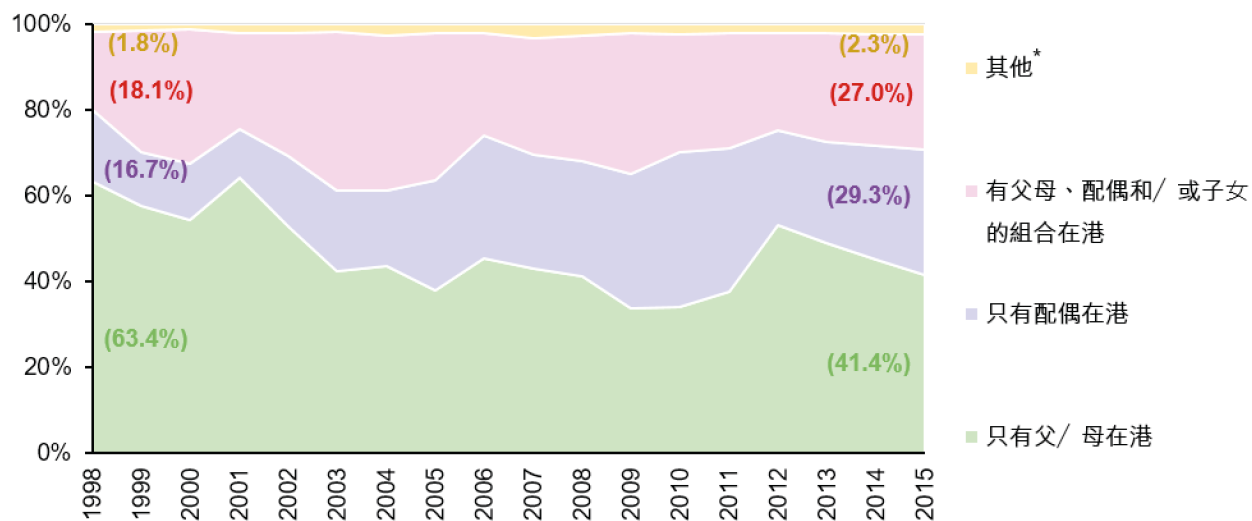
圖 83：1998年至2015年單程證持有人的年齡分布



資料來源：民政事務總署

持單程證來港與家人團聚的人士中，他們在港親屬類別之分布已有所改變，反映單程證持有人的人口結構的轉變（見圖84）。持單程證與配偶團聚的比例由1998年的17%增加至2015年的29%。隨着現今跨境婚姻數目的上升趨勢，其性質亦不同以往，這個比例預期會在未來進一步增加。在八、九十年代，不少跨境婚姻來自於早年來港的香港男性（多數為非法入境者）回內地家鄉娶妻。他們的子女於內地出生，1997年後擁有居港權。這批子女排隊輪候單程證，等候獨自或與母親一同來港與父親團聚。

圖 84：1998年至2014年單程證持有人在港親屬類別



註：(*) 包括只有子女在港及沒有近親在港的單程證持有人。
資料來源：民政事務總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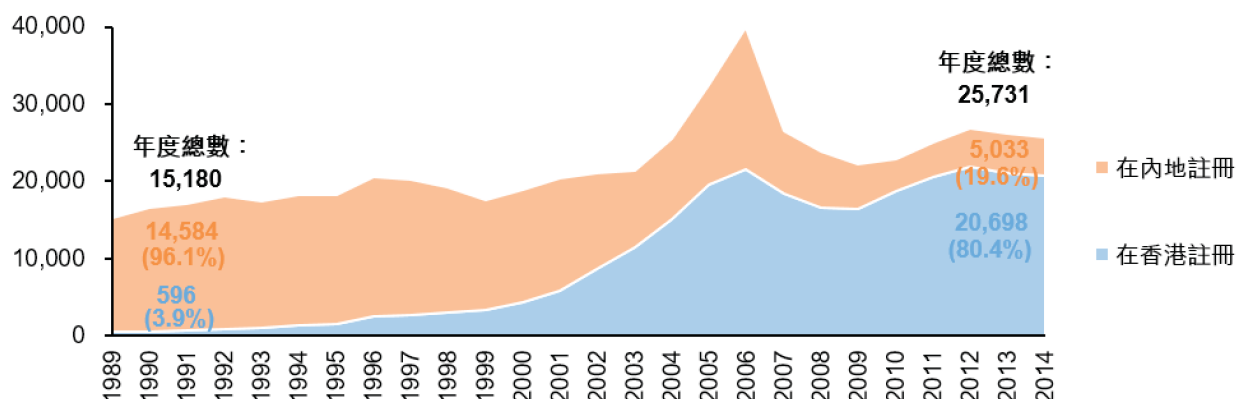
近年跨境婚姻的趨勢已不同以往。自1997年起，在內地註冊的跨境婚姻一直下跌，但在香港註冊的數字卻上升（見圖85）。在2014年的25,731宗跨境婚姻中，有20,698宗（即80%）在香港註冊，於內地註冊的只有5,033宗。反觀1997年的20,168宗跨境婚姻中，有87%在內地註冊。不同於以往大部分婚姻均是香港男子回鄉娶妻，現在更多的是香港居民在本港與其內地配偶註冊結婚。在香港註冊的婚姻當中，香港新娘嫁予內地新郎的比例亦持續上升，由1997年的14%增加至2015年的27%（見圖86）⁶⁸。

68 在港註冊的跨境婚姻現時佔所有本港註冊婚姻的約35%。

我們雖然未有掌握跨境婚姻夫婦的社會經濟特徵的詳細資料，但與早期的跨境婚姻伴侶相比，近年的跨境婚姻伴侶估計有較多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年青專業人士，他們在香港或內地工作或求學時認識對方繼而共諧連理。香港婚姻登記處資料顯示，跨境婚姻中內地新娘的教育水平自2001起已開始提高，內地新娘擁有專上或以上學歷的百分比由2001-2005年的1.5%，上升至2006-2010年的4.7%及2011-2014年的12.5%⁶⁹。這些香港居民的配偶及子女將會在一定時間內申請單程證來港定居。有鑑於現時每年在港註冊的跨境婚姻有18,000宗並有上升趨勢，預料未來大部分單程證的申請人將為此等跨境婚姻港人的配偶及子女。

因此香港有需要把單程證配額上限維持在每年54,750個，並且預期配額的佔用將會上升。跨境婚姻的新趨勢將會為香港帶來更多年輕、高教育程度及經濟活躍的移民，為香港帶來更多的人力資本，並有助人口恢復活力。鑑於近年有不少剩餘的單程證配額，港府絕對有理由與內地機關溝通，縮短現時港人內地配偶申請單程證的四年等候期⁷⁰。政府應優先處理在港結婚及有婚生子女的港人內地配偶的申請，此優先准則相信不會提升跨境假結婚的動機⁷¹。

圖 85： 1989年至2014年在香港及內地註冊的跨境婚姻個案數目



註：(1) 2010統計年度以前的數字是根據入境事務處按月提供的個人結婚登記紀錄內的兩項資料，即「來港前居住的地方」是中國內地和「在香港的逗留時間」少於一年，來估算內地新郎/新娘的數目。這數字可能包括持有單程證來港並於不足一年內結婚的人士。然而，有關數字仍是統計跨境婚姻一個不錯的參考指標。由 2010 統計年度起，除上述兩項資料外，採用更多相關的資料（例如所持旅行證件類別）用以改良內地新郎/新娘數據的估算。

(2) 1989年至1998年的跨境婚姻數據並沒有把來自香港及澳門的新郎/新娘分開計算，因此該年期的小計數字包含來自香港及澳門新郎/新娘的跨境婚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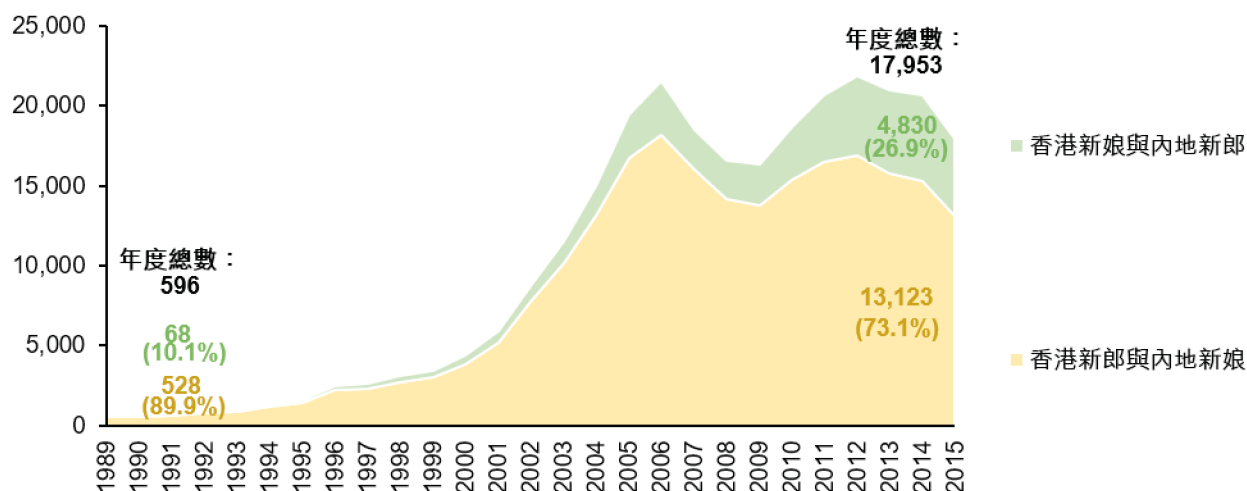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中國民政統計年鑑，政府統計處（香港）

69 感謝王于漸教授提供香港特別行政區婚姻登記處數據。

70 如美國等不少國家，在處理新婚外地配偶移民簽證的等候時間比香港短很多。

71 根據2013年3月20日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在回應立法會議員鍾國斌的提問時，保安局局長指2012年有1,000人因假結婚而被捕，他亦承認要證實這些婚姻的真確性有一定難度。

圖 86： 1989年至2015年與來自內地的新郎/新娘在香港註冊的婚姻數目



註： 2010統計年度以前的數字是根據入境事務處按月提供的個人結婚登記紀錄內的兩項資料，即「來港前居住的地方」是中國內地和「在香港的逗留時間」少於一年，來估算內地新郎/新娘的數目。這數字可能包括持有單程證來港並於不足一年內結婚的人士。然而，有關數字仍是統計跨境婚姻一個不錯的參考指標。由 2010 統計年度起，除上述兩項資料外，採用更多相關的資料（例如所持旅行證件類別）用以改良內地新郎/新娘數據的估算。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亦曾有人提議內地應准許持單程證來港移民保留或重新申請其內地家鄉戶籍，讓不能適應香港或在離婚後未能維持生計的人士能重返家鄉。這個候補選擇方案不但對移民有好處，亦能減輕香港支援這類不適應移民的社會福利負擔，定能得到香港大眾的廣泛支持。惟政策需視乎內地的戶口制度能否開先河例外處理持單程證的人士。

6.8.2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 回港就業安排

內地來港移民的第二大來源為畢業後留港工作的非本地內地學生。在現時的入境安排下，非本地畢業生（包括其他國家）可以在畢業後在港逗留12個月尋找工作。若要延長逗留時間，他們必須已獲得聘用，而受聘從事的工作須通常由學位持有人擔任，其薪酬福利條件亦須達到市場水平。回流的非本地畢業生則需在申請簽證前已獲得聘用。他們在連續居港至少七年後，便可申請永久居港權，而此七年居港期可包括他們在港接受教育的時間。

在留港的內地大學畢業生之中，大部分均畢業自香港各大學所開辦的自資修課式研究生課程。**圖87**顯示入讀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及經評審的自資課程的內地生人數，當中自資修課式研究生課程的入讀人數錄得最大而且最快的增幅。每年有大批非本地畢業生來自這類課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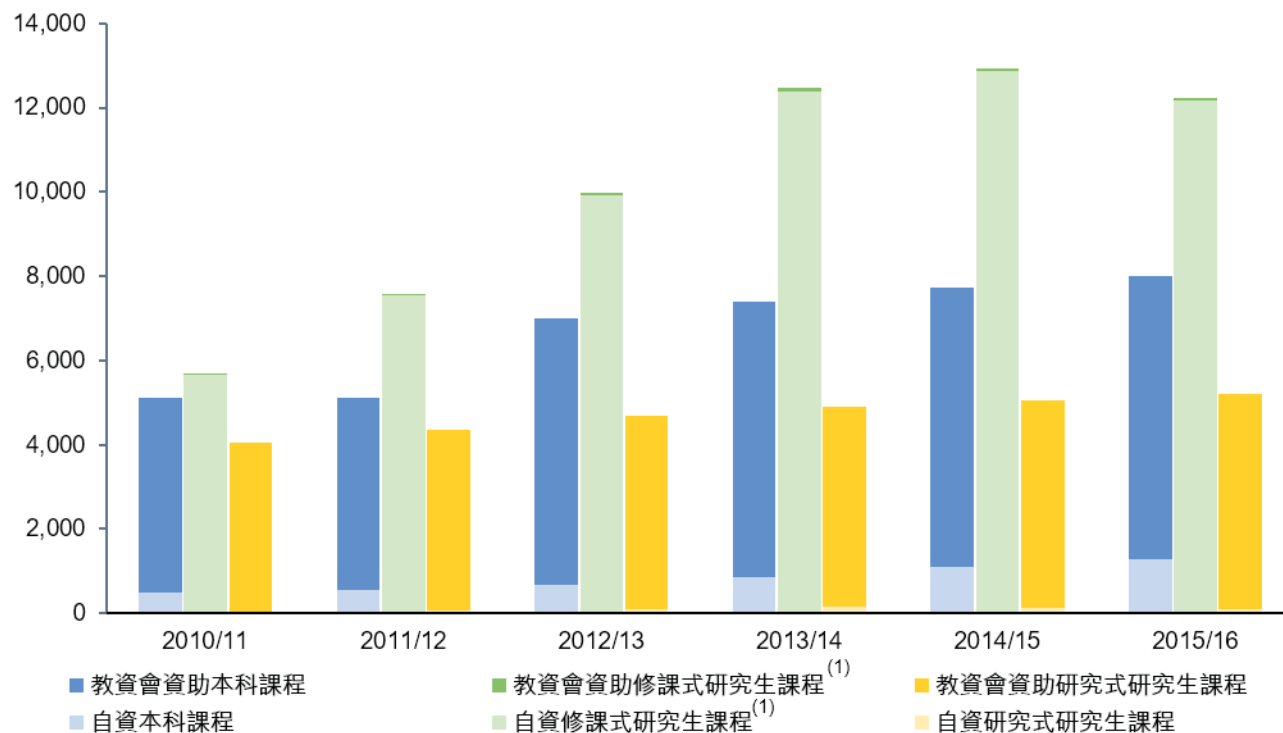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2015/16年度正就讀教資會資助課程的本科生只有6,726人，意味每年僅有約1,680名畢業生。非本地學生

只佔全部入讀資助課程的本科生的8%，遠低於教資會所容許的20%上限。必須指出，20%非本地生學額屬教資會所批本地生資助學額之外，增收非本地生填補餘額不會影響本地生入大學機會。

香港可以善用這些獲批的本科生學額來錄取更多非本地學生。與非本地修課式研究生相比，非本地本科生在更年輕的時候抵港，理應能更快學習廣東話，而且他們通常與本地學生一同住在大學宿舍，自資的非本地研究生則多數租屋自住。直到畢業他們有四年時間融入香港，畢業後要過渡到香港社會將會更為容易及順暢。可惜現時非本地本科生的入讀人數升幅非常緩慢，且遠低於可容許的比例。

香港的大學一直不缺具質素的內地本科生申請報讀，但大學卻比較注重平衡來自內地及其他國家的非本地學生比例。政府應鼓勵大學更主動招收內地以外國家的本科生。另一個瓶頸是學生宿位短缺。若要大幅增加非本地本科生的入讀人數，教資會需要放寬計算所有學生宿位數目的方法，又或透過私人捐款興建更多學生宿舍。

圖 87：2010/11年度至2014/15年度全日制內地學生按學業水平劃分的就讀人數



註：(1) 包括全日制及半日制學生，並無分開計算之統計數字。
資料來源：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育局

跟單程證持有人相反，非本地畢業生的移民人士均於香港的大專院校獲得學士學位，甚至更高的教育程度⁷²。他們年青、擁有市場所需的技能，並從事有薪工作，是受香港歡迎的人才資源，亦更能融入香港社會。在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下獲得入境許可的人數由2008年的2,658人增加至2015年的9,541人，共上升了3.5倍，佔2015年全年批出學生簽證量的一半以上。增加這類人才的流入將會是人口政策的關鍵，不但能促進香港經濟發展，亦能減慢人口老化。

與增招非本地本科生同時，政府亦應考慮增加本地生大學學額，並透過適當的課程和培訓，加強本地青年在新時代下的競爭力，以增強本地人力資本存量。

6.8.3 其他內地抵港移民計劃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亦為香港帶來不可多得的人才及專業人士。雖然此計劃下的移民均來自內地，但很多可能曾於海外受教育及工作。他們普遍擁有高的教育水平及專業技能。由於申請人必須先獲得香港僱主的聘請，所以在這個計劃下的移民人數的升幅相對緩慢但穩定。

另一個性質相近的移民計劃是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目的為吸引高技術人才或優才來港定居。申請人不需在申請前獲得本地聘用。計劃實施初期廣受好評，預期會吸引國際及世界級人才來港定居。然而，計劃每年只能吸納數百名移民，成果有限，而且我們不清楚這些人才獲得居留資格後是否仍有留港工作。

至於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則備受爭議。在近年改變規例之前，此計劃吸引了內地投資者在香港購入豪宅以取得入境資格，導致香港樓價急升。但香港目前需要的是人才，而不是資金，尤其是流入到已經過熱的房地產市場。

72 副學位課程的非本地畢業生不符合申請留港/回港就業安排的資格。

6.9 回流返港

過去數十年，有數十萬計的香港居民移居海外留學、工作或定居，主要移民到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及歐洲等地。他們是一批擁有高教育水平、具專業知識及工作經驗的人才，並涵蓋各個專業範疇。這些移民的子女在跟父母移居外國之前，很多都在香港長大及接受教育。因此無論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的移民，他們對香港都有可能依然保留着一份情意結。如香港能吸引部份移民回流，將能為人才市場注入新動力，特別是在專業人才短缺的領域。

這批潛在回流移民的重要性絕對不容忽視。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當年流散海外的猶太人回流以色列。根據1950年的「返鄉法案」（Law of Return），世界各地的猶太人都有回流以色列的權利。過去幾十年間，以色列曾出現多次大型回流潮。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從俄羅斯回流的猶太人。1969年，定居蘇聯的猶太人向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提出呈請，並得到蘇聯同意讓他們遷出，結果共有150,000名猶太人回流至以色列，當中不少為科學家及工程師。當時以色列人口少於300萬人。這次移民潮加上其他的回流者組成了強大的人力資本基礎，推動以色列的科技發展。

目前香港設有輸入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第二代計劃，為非香港身份證持有人提供海外回流香港工作的機制。為吸引更多的海外移民回流香港，政府可以更主動推廣香港毗鄰中國內地這個高速增長經濟體所帶來的經濟機遇，並減輕他們對本地政制發展的憂慮。設於北美及歐洲各地的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可以更進取的方式吸引當地的香港學生及專業人士。除了向外國人推廣香港，他們亦應有任務向定居海外的香港移民宣傳香港。新加坡吸引海外專才的進取政策值得香港借鏡⁷³。同樣重要的是協助他們回流後定居香港的政策，包括承認海外頒發的學位，以及醫學、法律、會計及工程學等專業資格，打破入職門檻，並解決住屋問題。

73 新加坡過去一直有給予當地學生獎學金入讀英國頂尖大學，並要求他們在完成學業後回流服務社會。政府的各個海外辦公室亦會主動向各地區的本地及海外學生推廣新加坡。

6.10 輸入移民作為人力資本的來源及減慢人口老化的辦法

為了迎接人口轉變對香港帶來的挑戰，香港特區政府成立了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在2015年1月發表了《人口政策：策略與措施》報告。在該報告中，委員會建議了一系列的具體措施以增加勞動人口的質素及數量，例如延長工作生涯、延遲退休年齡、加強職業訓練、協助婦女取得家庭及工作平衡、增加託兒及課後照顧服務等。芸芸措施之中，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輸入人才及移民，但報告缺乏增加移民流入的明確建議。

如上述討論，各種從內地輸入人才、專業人士及非本地畢業生的計劃均能提升香港的人力資本。單程證計劃雖然主要是為家庭團聚而設，但亦為香港帶來越來越多擁有專上或大專學歷的移民人口。再者，大部分內地移民都較香港的平均人口年輕，有助降低香港整體人口的平均年齡。

表10根據2001年、2006年及2011年的人口普查結果，列出了在港居住未滿七年的內地人士的平均年齡。他們平均比香港本地人口（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年輕11至13歲。沒有他們，香港人口的平均年齡視乎統計年份將會上升0.33至0.48歲。若我們將內地移民的居港年期拉長至20年計算，他們讓2011年香港人口的平均年齡降低了0.68歲。而這只是內地移民所帶來的最直接的第一輪效應。因為內地移民較為年輕，平均生育率會較本地人口為高，因此他們將為香港帶來更大批的新一代年輕人口，對減慢本港人口老化的總和效應會更大。

表10：香港整體人口（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及不同人口分組的平均年齡

	2001	2006	2011
A. 內地來港居民 (少於7年)	27.14	27.86	30.11
B. 香港人口減去內地來港居民	38.78	41.31	43.20
C. 整體人口	38.30	40.87	42.87
D. 平均年齡下降的幅度 (B - C)	0.48	0.44	0.33

資料來源：2001年、2006年及2011年的人口普查及中期人口普查數據計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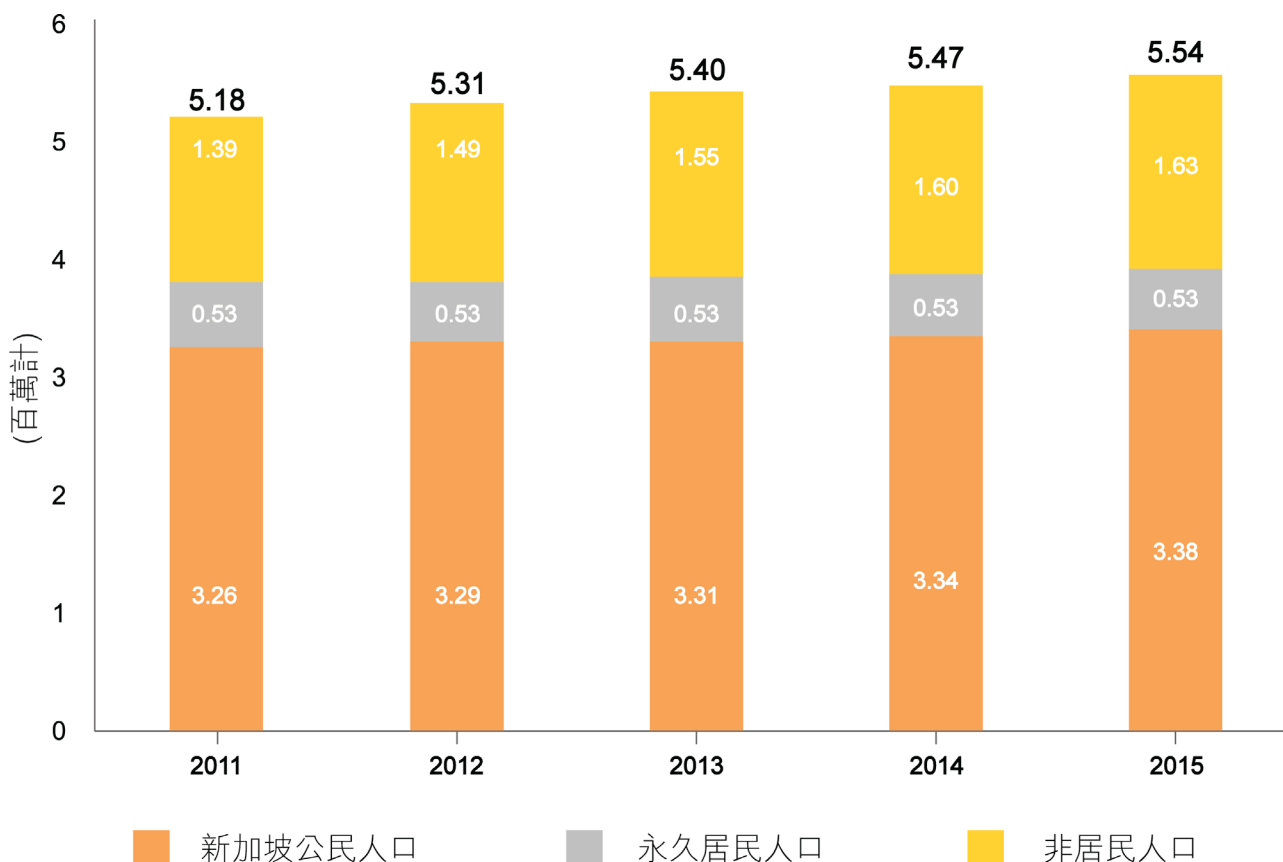
總括而言，輸入移民對減慢人口老化本身的效果雖不太大，但卻頗為重要。最終的成效將視乎有關移民政策對移民流入數量所訂的目標。降低平均人口年齡只是輸入移民的其中一個效益，其他與人口結構相關的影響還包括人口增長率、勞動人口增長率、年齡結構及老年撫養比率等。

6.11 在不同情景下的人口及移民推算

問題仍然存在：每年應輸入多少移民？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參考新加坡的移民政策⁷⁴。新加坡的總人口由三個類別組成：公民、永久居民及非居民。非居民透過不同種類的就業/創業入境准證、家屬簽證及工作許可證到新加坡居住，只有持首兩類簽證的人士才有資格申請成為永久居民。工作許可證持有人並沒有申請成為永久居民的資格，其中包括外籍家庭傭工（2015年有227,100名）及建築工人（2015年有322,400名）。在新加坡居住滿兩年的永久居民可以申請成為公民。政府非常謹慎控制永久居民的數量，每年只批出約30,000個永久居留權，把永久居民人口維持在50至60萬，讓優質人才成為公民（見圖88）。為了制止公民人口萎縮並維持穩定的年齡分布，新加坡每年會從永久居民中吸納15,000至25,000名人士作為新公民，再以新移民填補永久居民的人口。以現時受控制下的移民輸入率推算，至2030年新加坡的公民人口將達360萬至380萬（見圖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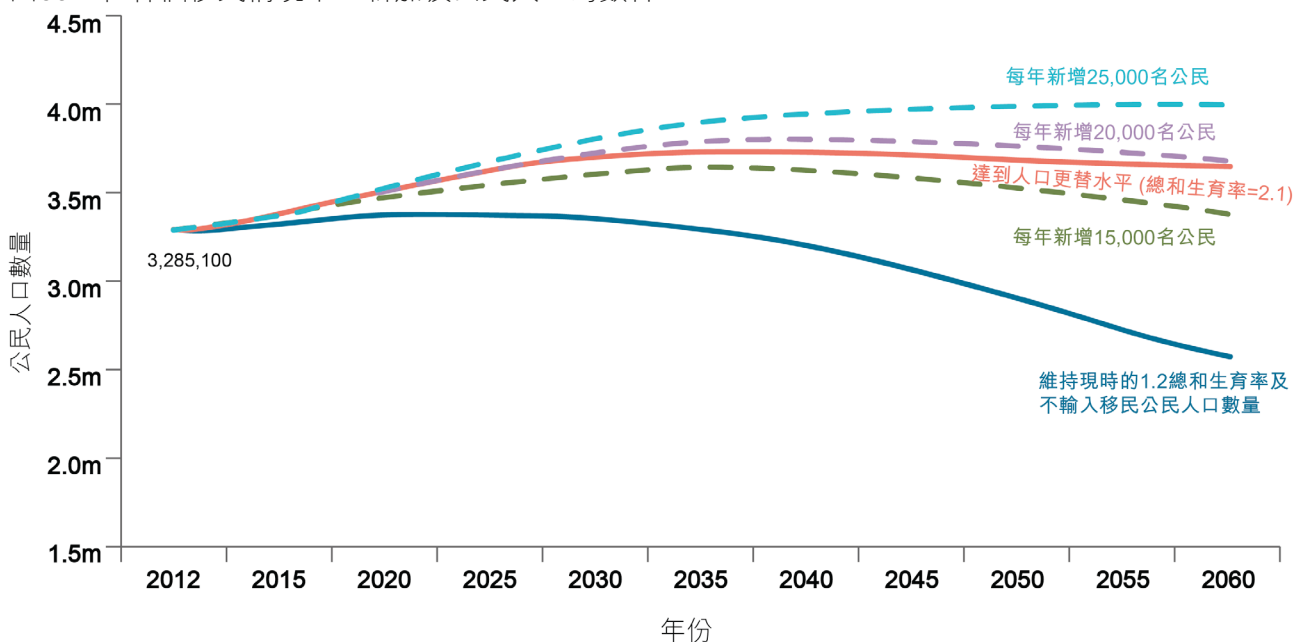
74 新加坡政府，人口政策白皮書，2013年1月。

圖88：2011年至2015年（6月份計）按居民身份劃分的新加坡總人口（百萬計）



註：(1) 新加坡總人口由公民、永久居民及非居民組成。數據乃根據各居民身份的法定定義及註冊資料計算，並撇除所有於統計期間在海外連續居留超過12個月的居民。
 (2) 非居民人口包括在新加坡工作、留學或居住，但沒有得到永久居留權的外籍人士。不包括旅客及短期訪客。
 資料來源：新加坡政府統計局

圖89：在各個移民情境下，新加坡公民人口的數目



資料來源：新加坡政府統計局

香港的居住人口由「常住居民」⁷⁵和「流動居民」⁷⁶組成。政府統計處直至2064年的人口推算是基於以下對推算期內的生育、死亡及遷移的假設：

生育假設

- 在育齡時期結婚的女性會越來越少
- 已婚生育率維持穩定
- 總和生育率徘徊在1.15至1.21之間
- 根據過去趨勢，未來每年將會有5,500名第一類嬰兒，但第二類嬰兒的數目為零⁷⁷

死亡假設

- 死亡率將會繼續逐步下滑，但下降速度會減慢

遷移假設

- 部份第一類及第二類嬰兒會在出生後離開香港，但隨後幾年可能會回流返港（如接受教育）。所有第一類嬰兒及約30%的第二類嬰兒會在21歲之前定居香港
- 持單程證來港人士會由每日的119人，上升至2019年中的每日130人，然後逐步下降至2027年中的每日約100人
- 其他淨遷移會參考過去趨勢作推算

6.11.1 情境0：基準情境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假設，我們在圖90至圖93展示香港直至2064年的總人口及勞動人口數量、年齡分布以及總撫養比率的推算結果，當中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⁷⁸。重點是若香港人口政策不變，整體人口會在2039年開始萎縮，並以越來越快的速度下降，推算2064年的年度跌幅將為0.4%。至於勞動人口預料早在2019年就會開始減少，而總撫養比率則會升至882的高水平。若香港維持現時的人口政策，人口老化將對香港人口結構帶來極為不利的後果。

圖90至93的推算為本報告的入境政策建議提供一個基準，我們稱之為情境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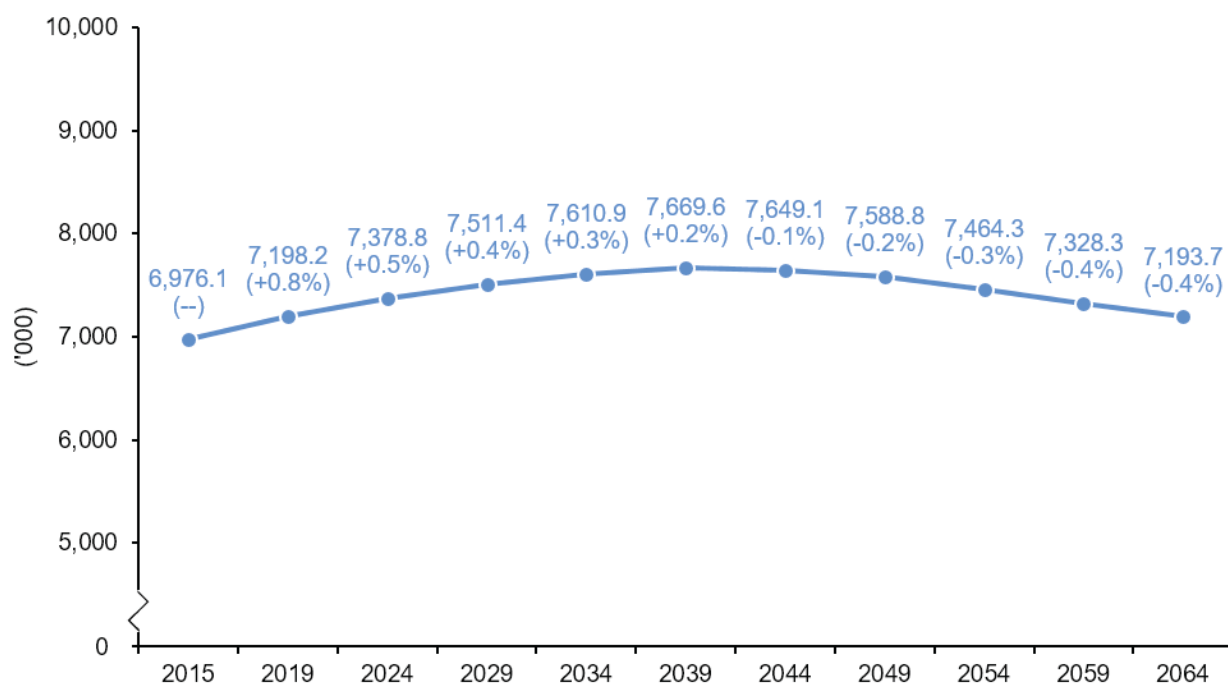
75 「常住居民」指（一）在點算時刻前的6個月內，在港逗留最少3個月，又或在點算時刻後的6個月內，在港逗留最少3個月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不論在點算時刻他們是否身在香港；及（二）於點算時刻在香港的非永久性居民。

76 「流動居民」指在點算時刻前的6個月內，在港逗留最少1個月但少於3個月，或在點算時刻後的6個月內，在港逗留最少1個月但少於3個月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不論在點算時刻他們是否身在香港。

77 第一類嬰兒是指配偶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內地女性在香港所生的嬰兒。第二類嬰兒是指配偶為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內地女性在香港所生的嬰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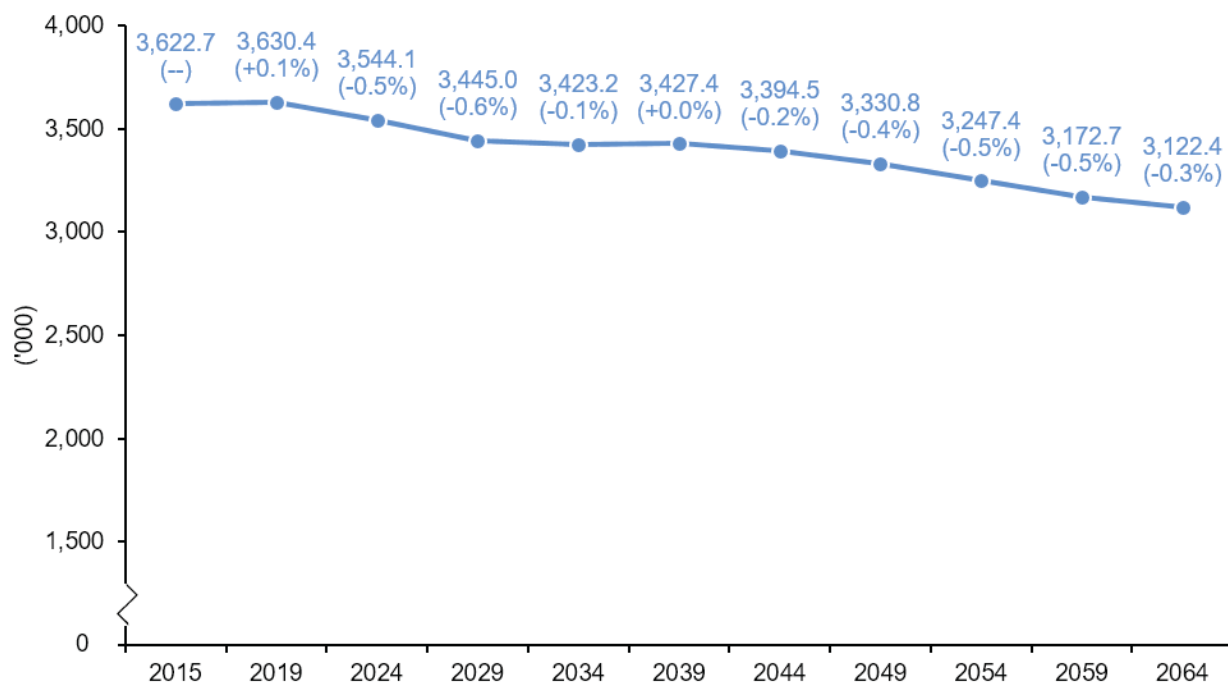
78 香港人口推算2015-206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15年9月。

圖90：在情境0下，2015年至2064年的總人口推算（撇除外籍家庭傭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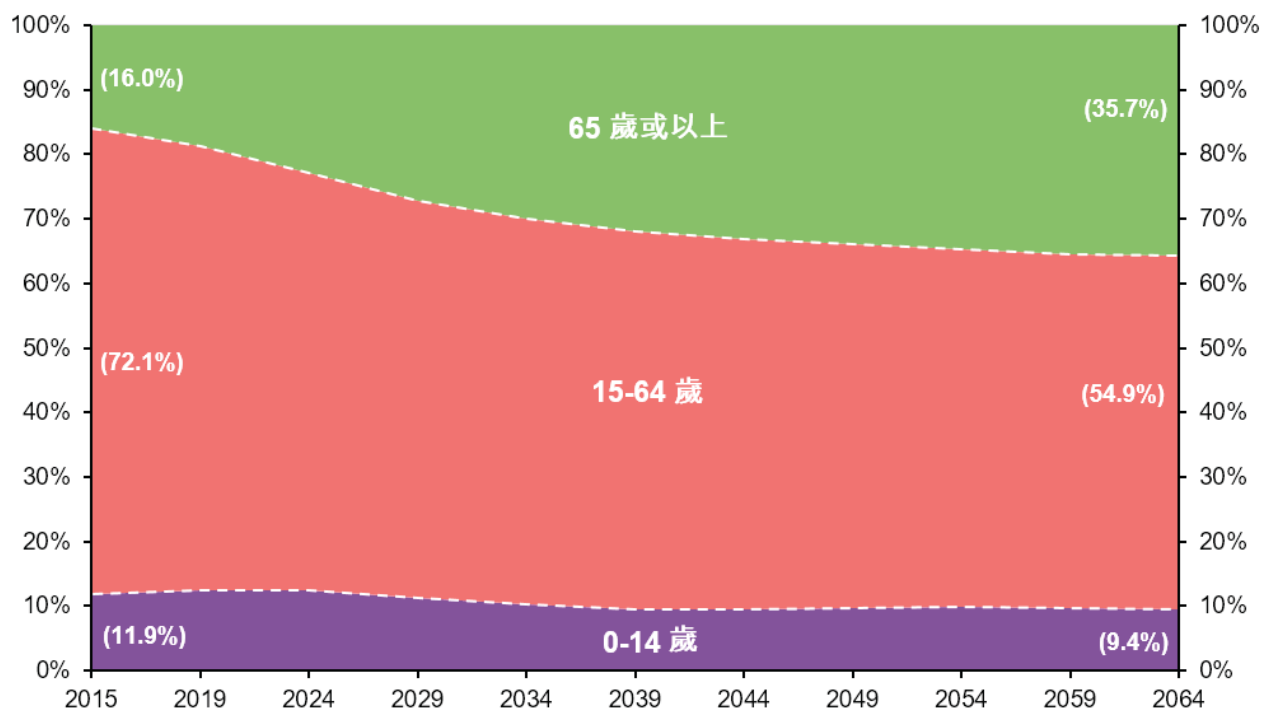
註：括號內的數字是自前一個時間點的年度增長率。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團結香港基金

圖91：在情境0下，2015年至2064年的勞動人口推算（撇除外籍家庭傭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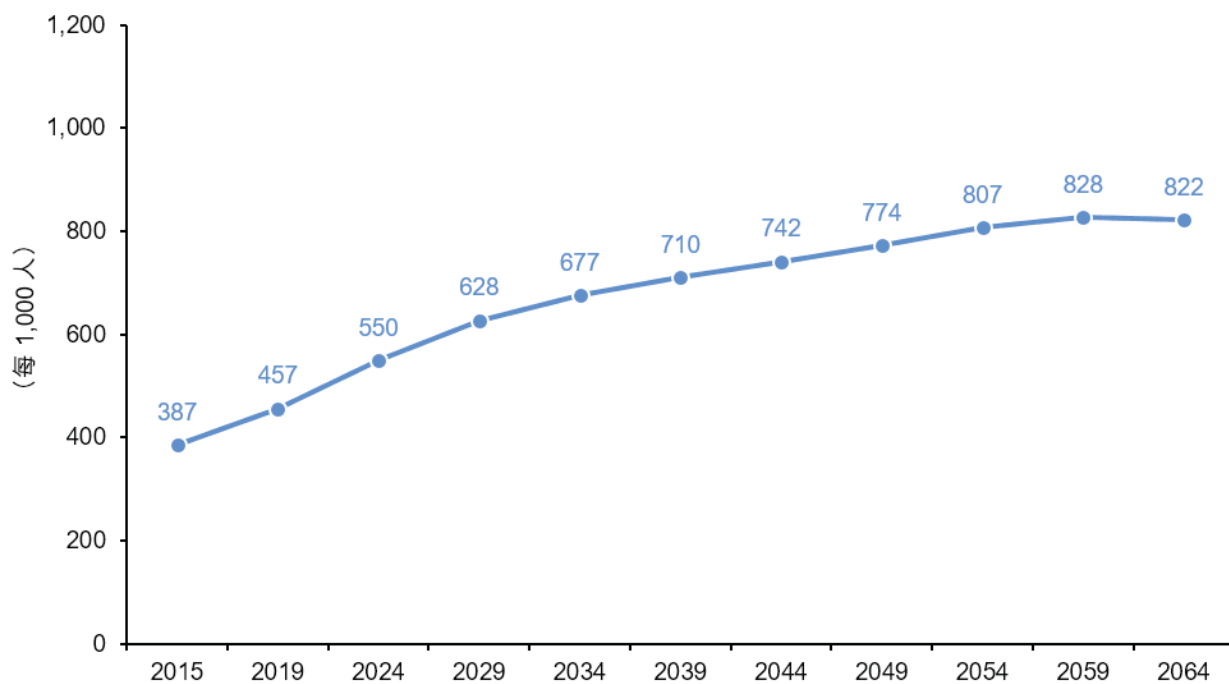
註：括號內的數字是自前一個時間點的年度增長率。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團結香港基金

圖92：在情境0下，2015年至2064年的人口年齡分布推算（撇除外籍家庭傭工）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團結香港基金

圖93：在情境0下，2015年至2064年的總撫養比率推算（撇除外籍家庭傭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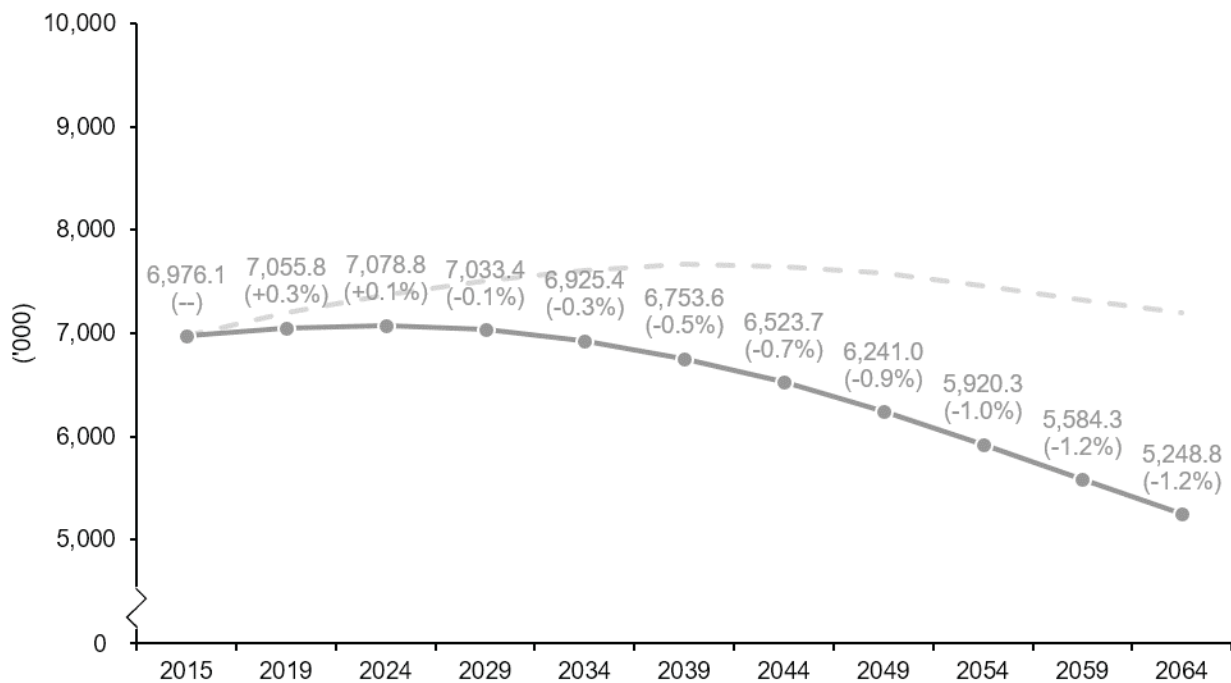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團結香港基金

6.11.2 情境1: 不輸入移民

為了突顯輸入移民（或反過來不輸入移民）對人口結構的影響，我們在圖94至圖97中繪製了情境1的結果。情境1假設香港在2015年開始再沒有任何離港或抵港的移民⁷⁹。這情境下的人口變化令人憂慮，總人口及勞動人口幾乎即時萎縮，分別大幅下滑至2064年的每年1.2%及1.3%負增長。老年人口會上升至佔總人口的43.5%，香港將會成為超高齡社會，而總撫養比率會到達1145⁸⁰這個不可持續的水平。結果非常明顯，若香港沒有移民，勞動人口將快速下降，人口老化將愈趨嚴重。正如報告一直強調，這正是日本遭遇的困境。

圖94：在情境1下的，2015年至2064年總人口推算（撇除外籍家庭傭工）



註：虛線代表情境0的基準走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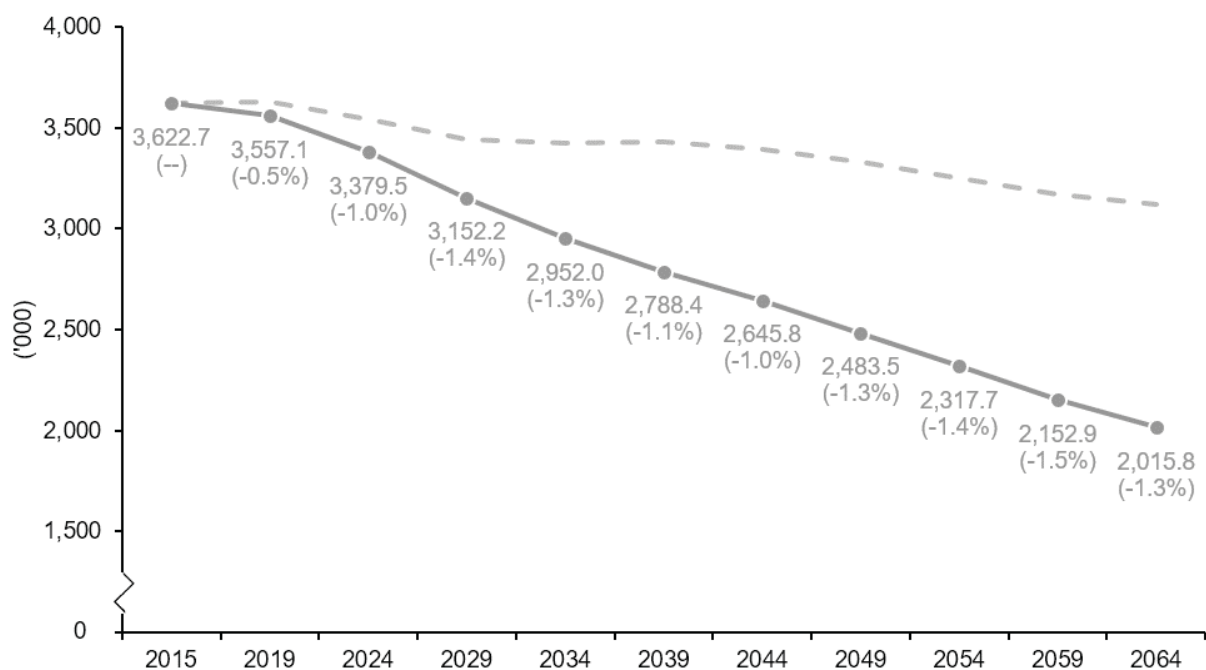
括號內的數字是自前一個時間點的年度增長率。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團結香港基金

79 推算包括第二類嬰兒。他們在香港出生，擁有居留權，因此不是移民。

80 按年齡及性別劃分的人口金字塔及勞動人口的推算結果已載於附錄。

圖95：在情境1下，2015年至2064年的勞動人口推算（撇除外籍家庭傭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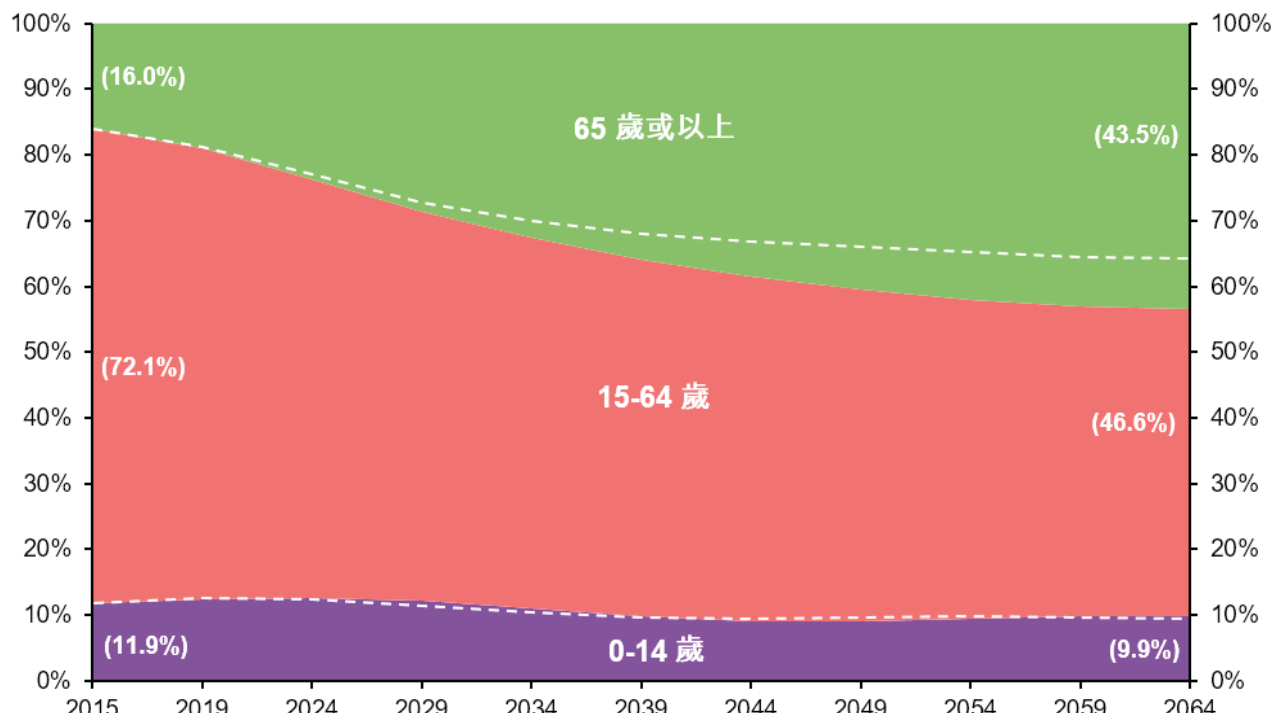


註：虛線代表情境0的基準走勢。

括號內的數字是自前一個時間點的年度增長率。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團結香港基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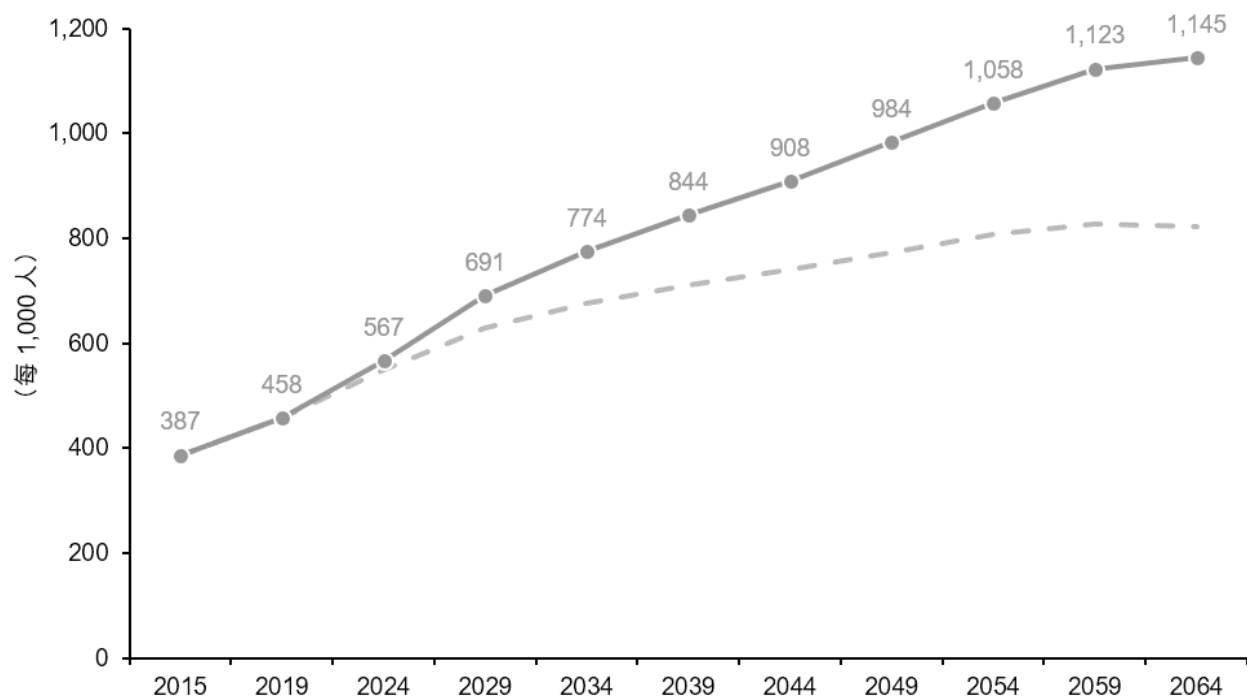
圖96：在情境1下，2015年至2064年的人口年齡分布推算（撇除外籍家庭傭工）



註：虛線代表情境0的基準走勢。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團結香港基金

圖97：在情境1下，2015年至2064年的總撫養比率推算（撇除外籍家庭傭工）



註：虛線代表情境0的基準走勢。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團結香港基金

6.11.3 情境2: 總和生育率為2.1及不輸入移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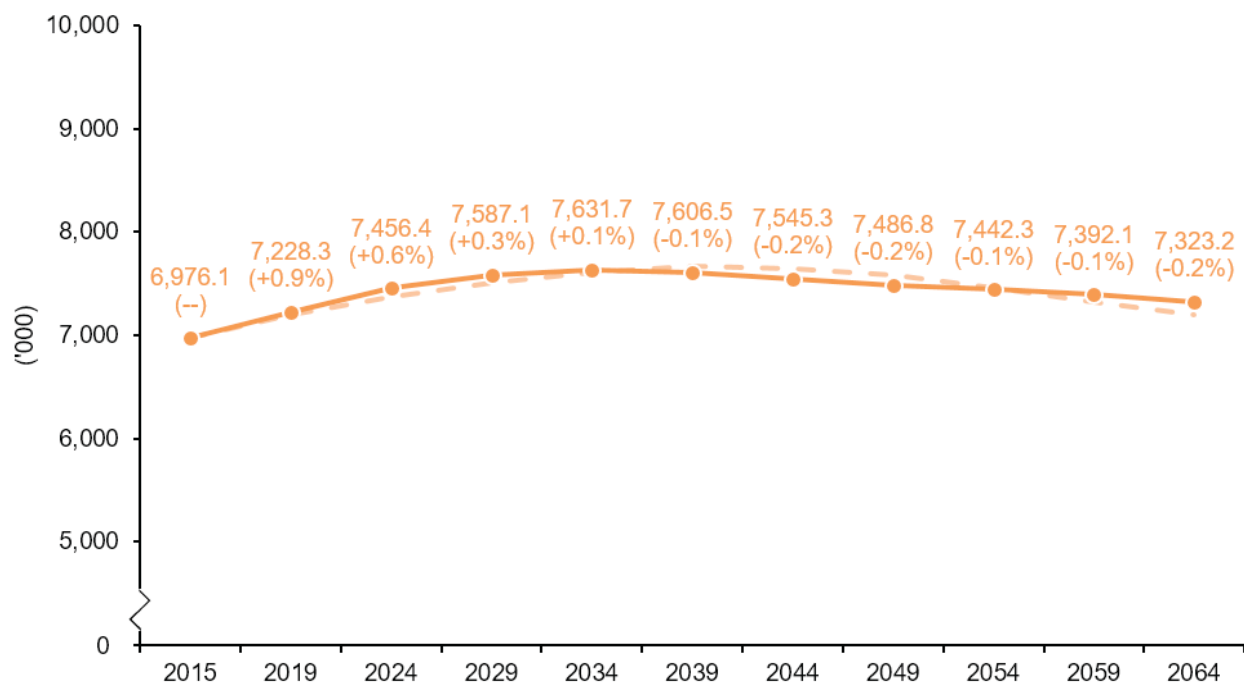
另一個可作比較的基準是假設香港由2015年起再沒有淨流入或流出的遷移人口，但總和生育率將達到人口更替水平的2.1，我們稱此為情境2。在最理想的情況下，當總和生育率為2.1，人口數量長遠來說將穩定在某一個水平，並能自動更替⁸¹。因此沒有必要依靠輸入移民來維持人口增長。輸入移民的唯一理由是為香港注入人才及所需的技能。

我們都知道香港目前或在可見的未來都沒法將總和生育率推高至2.1。正如新加坡的人口政策，用2.1的總和生育率來推算總人口及勞動人口是訂立輸入移民目標數量的恰當基準。**圖98至圖101**顯示若總和生育率能達到2.1，對人口結構所帶來的結果最為合意。在沒法將總和生育率升至2.1的情況下，依靠輸入移民來填補生育率的差距可被視為一個可行的手段。在我們的推算期中，人口變化的趨勢跟情境0一樣，但減幅較溫和。相對於基準情境，情境2的人口更為年輕。勞動人口在經過早期的下調之後，隨著生育率增加所帶來的年輕一代加入勞動市場，有關數字將會趨向穩定，但會較情境0的水平為低⁸²。由於假設總和生育率在2015年才開始提升至2.1，老年撫養比率將持續上升。人口年齡分布需要一段時間才能轉趨穩定，總撫養比率的改善也需時。

81 當總和生育率為2，代表一對已婚夫婦去世後的人口流失將由他們的兩名子女取替。餘下的0.1是用以填補嬰兒夭折、早期死亡、不生育、不育、及維持單身的女性的人口流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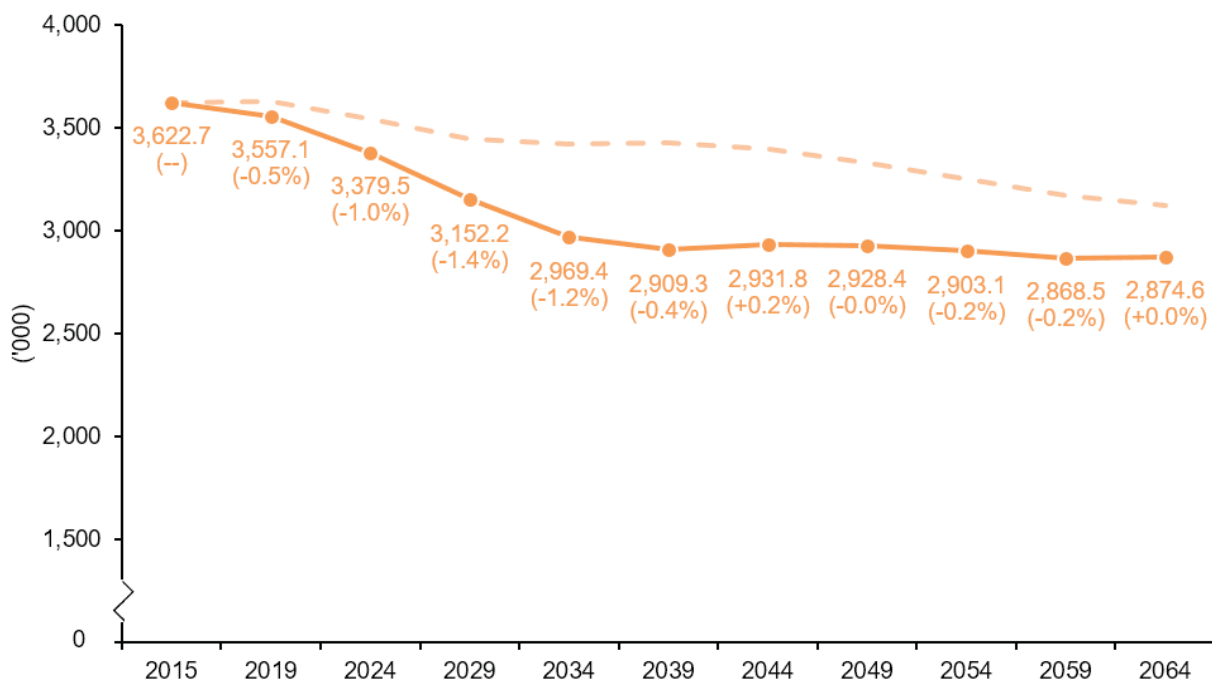
82 按年齡及性別劃分的人口金字塔及勞動人口的推算結果已載於附錄。

圖98：在情境2下，2015年至2064年的總人口推算（撇除外籍家庭傭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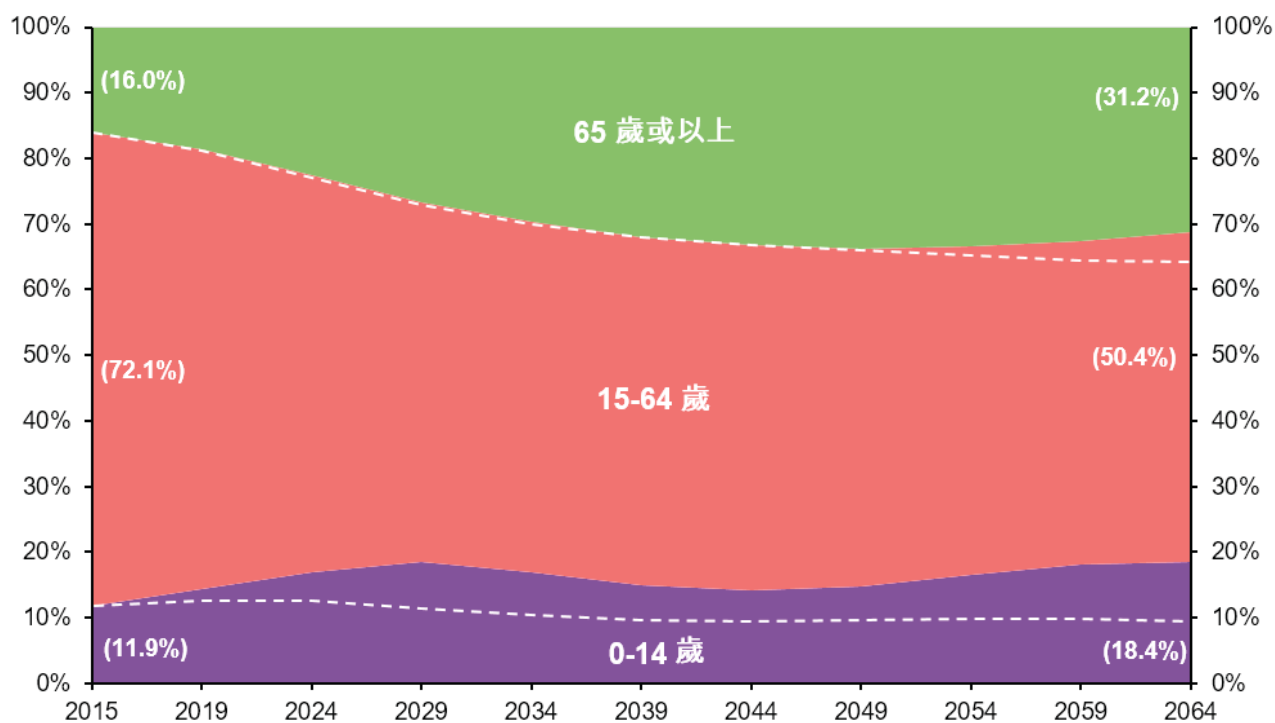
註：虛線代表情境0的基準走勢。
 括號內的數字是自前一個時間點的年度增長率。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團結香港基金

圖99：在情境2下，2015年至2064年的勞動人口推算（撇除外籍家庭傭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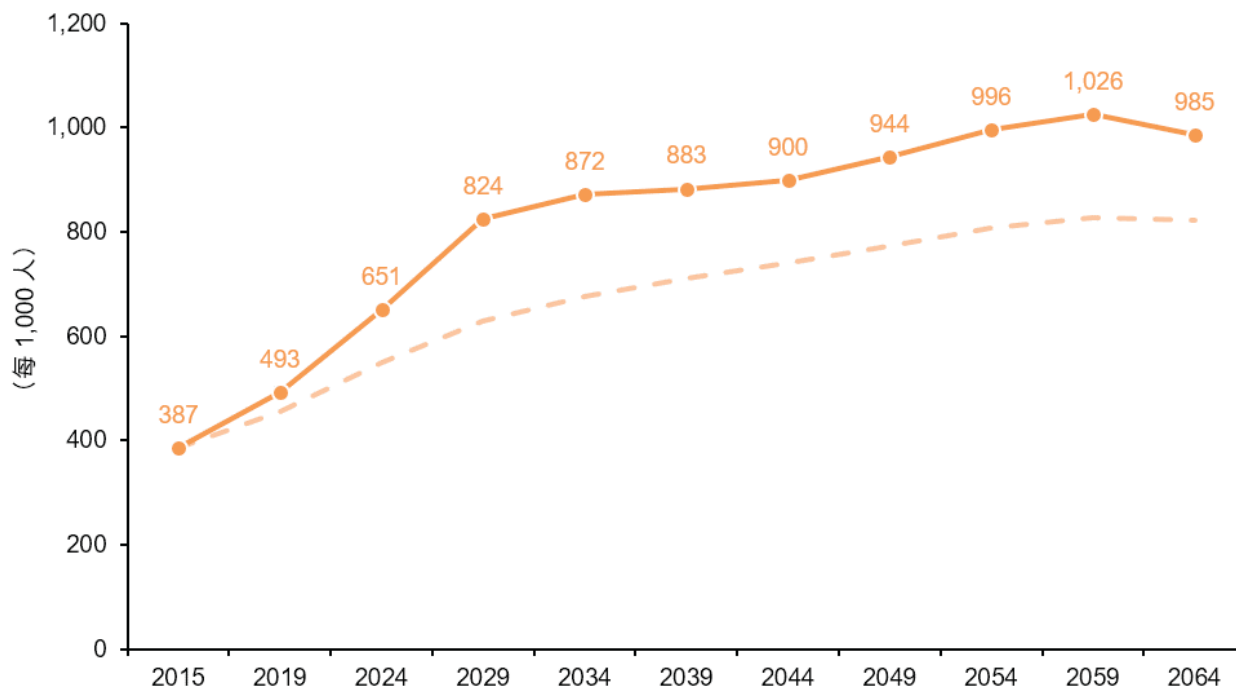
註：虛線代表情境0的基準走勢。
 括號內的數字是自前一個時間點的年度增長率。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團結香港基金

圖100：在情境2下，2015年至2064年的人口年齡分布推算（撇除外籍家庭傭工）



註：虛線代表情境0的基準走勢。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團結香港基金

圖101：在情境2下，2015年至2064年的總撫養比率推算（撇除外籍家庭傭工）



註：虛線代表情境0的基準走勢。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團結香港基金

6.12 增加移民數目及來源的建議

以上三項人口推算呈現了不同的人口政策所導致的人口結構轉變。情境0展示了現行人口政策下的人口結構結果。在不輸入任何移民的情境1下，勞動人口會即時下滑，人口數量也會緊隨下跌，香港會更快成為超高齡社會。至於情境2，若我們能成功提升總和生育率至2.1（至少在短期內，這是無法達到的目標），則我們在不輸入任何移民的情況下，仍能維持相對合意的總人口數量，但總撫養比率的增長以及勞動人口的萎縮將比情境0的情況差（見圖99）。

參考上述三個人口統計模型，我們提議兩個簡單的目標以考量香港每年應輸入的移民數量。此數量必須（1）足夠將整體人口及勞動人口維持在一定水平，避免兩個數字在推算年期中顯著下滑；（2）足以減慢老年撫養比率的增幅，將其穩定在一定水平。這兩項都是相對溫和的目標。

根據情境0（亦即基準情境）所採用的政府統計處的人口推算（包括生育、死亡及遷移等各種假設），我們建議因應房屋及基礎設施的承載能力，於未來數年分階段增加輸入移民。一旦確立了新增輸入移民的目標人數，政府便應為所需設施作長遠規劃。對總人口及勞動人口的數量、年齡分布及總撫養比率的推算影響將在稍後6.13章的情境3討論。

按照現時的趨勢，我們預計大部分新增移民均可能來自中國內地。目前單程證持有人的數目為38,338人（2015年數據），而數字預料將下降至2027年的約36,500人。按照現時每年54,750的單程證配額與推算2027年的36,500個批出名額，本報告所建議增加的輸入移民（主要來自中國內地），只填補了兩者之間的部分差距。香港有能力應付增加的移民人數，因為香港的年度單程證配額亦曾經滿額批出。然而，本報告新增的移民名額不應透過單程證計劃來港（畢竟單程證的名額還未用完），反而應從其他途徑輸入，如：輸入內地人才計劃、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輸入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第二代計劃，以及這些移民的受養人親屬。

現時本地大學的非本地本科生收生數目遠低於容許的20%配額，因此香港的院校有空間進一步招收非本地生，但我們需要興建更多的學生宿舍以移除宿位供應不足的瓶頸。非本地學生的供應幾乎源源不絕。我們所指的非本地學生可以來自世界各國，但從實際角度來看，在可見的未來，絕大部分應該也是來自內地。至於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因為申請人必須在來港以前獲聘，所以過去經此計劃來港的移民並沒有大幅增長。

如果擴大現有的入境計劃仍不能將移民人數增加至目標數量，香港可以考慮推行一項類似美國多元化移民簽證的有限度計劃。在多元化移民簽證計劃下，美國每年透過隨機抽籤接收高達50,000名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⁸³。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配額。申請人只需持高中學歷，或在指定行業有兩年工作經驗。申請可在網上辦理。隨機抽籤選中的申請人需要到當地的美國領使館約見面談，在經過身體檢查之後就可獲發簽證。香港可以推行類似的計劃，自行設定目標人數及申請條件，包括年齡組別、教育水平、工作經驗及沒有犯罪記錄。內地人士可以在網上申請。若果申請人數超過限額，計劃將透過隨機抽籤選擇申請人。被選中的申請人和其直系家屬可以在面談及身體檢查之後移民香港。計劃的詳細運作可與內地機關一同商討。從美國的經驗可預計，這類隨機抽籤計劃的申請人數將遠超配額的多倍，能夠帶來任可合宜數量的移民。

6.12.1 建議對經濟增長及薪酬的影響

其中一個令人關注的問題是這些額外的新移民會否取替本地人口，影響本地人的收入及就業情況。過去不同國家均有不少文獻及實證研究估算移民對本地人的薪酬及就業的影響⁸⁴。最近，美國國家科學院、工程學院及醫學院委託了一群由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人口統計學家、統計師及政策專才組成的專家小組，在2016年9月22日發表了一份總長450頁，題為「移民對經濟及財政的影響」的報告⁸⁵。總的來說，專家小組的發現與之前的研究結果一致，論証說明移民對本地人口的整體薪酬及就業影響極微。若有本地勞工被移民影響其收入或就業，則是因為他們的位置最容易被新移民替代，例如：較早抵埗的移民、或本地出生的高中輟學生，他們與低技術的新移民爭奪同類的工作。相反，高技術移民能為本地人士（無論有否接受大學教育）的薪酬及就業帶來正面影響，因為他們通常能與本地人士互相補足。技術移民能提升知識及創意水平，提高生產力，並帶動總需求。

83 要留意美國的多元化移民簽證計劃只是美國移民政策中的一項輔助計劃。該國尚有其他更大的讓家屬團聚的移民計劃及H1簽證等。

84 有關早期各地文獻就移民的經濟影響及國際經驗的評論，請參閱Lam & Liu (1998)，第六章。

85 Blau, F., & Mackie, C.. (Eds.). (2016) *The Economic and Fiscal Consequences of Immigration*,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該報告總結移民對美國的經濟增長不可或缺，並有助國家避免如日本一樣，因人口老化甚至勞動力萎縮而導致的經濟疲弱。高技術移民為當地注入人才，提升國家創新、創業及科技革新的能力⁸⁶。

額外輸入移民意味着勞動市場會增加數千名勞動人口（餘下的移民人口包括小孩或經濟未必活躍的配偶）。這些進入勞動市場的新移民大多是年輕並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才，為香港帶來人力資源和技能。除了有助減慢人口老化，他們還能增大香港經濟容量，對經濟增長及就業都有貢獻，情況就跟其他接收年青技術移民的國家一樣。這個現象又稱為規模效應，當可用的生產投入越多，便越能夠吸引投資及推動生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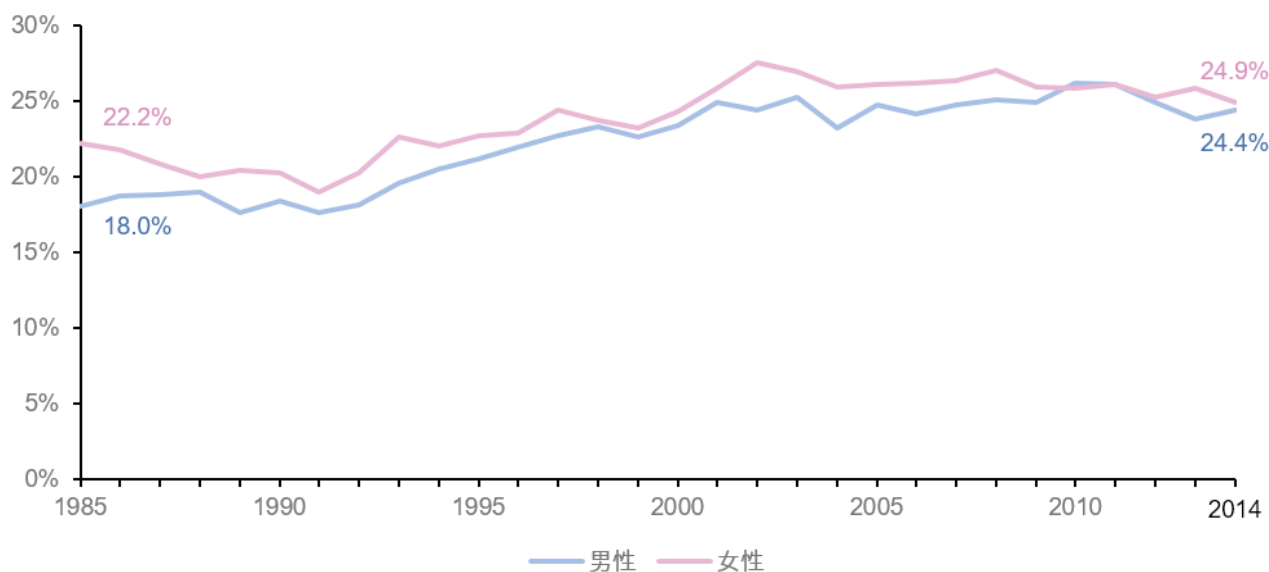
從過去經驗所得，新增加移民對薪酬及就業的影響視乎本地人的技能是否能被新移民直接替代，還是兩者互補不足。大學畢業並具專業技能的新移民，對教育程度和技術較低的本地勞工來說能起互補作用，本地勞工因而會受惠於規模效應。若替代效應大於規模效應，而新移民與本地大學畢業生的位置可以互相替代，本地畢業生便有可能受損。數據分析指出與規模效應相比，替代效應對本地大學畢業生在勞動市場上的影響有限。即使在九十年代入讀大學的人數飆升，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也沒有因此而大幅上升。相比其他發達國家，目前香港勞動人口中擁有專上學歷的比例（27%）頗低（見圖5），向勞動市場注入數千名有大學學歷的移民也不會對此比例有顯著影響。事實上，在早前由劉遵義教授、水志偉及熊艷艷教授所撰寫的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報告「發揮香港潛力 再創經濟奇蹟」中，曾提出若香港有志成為國際金融及創新中心，應將非本地學生的大學收生率提升至40%。我們所建議額外輸入的新移民不太可能會在勞動市場上取代本地大學畢業生的位置。

為了支持這個觀點，我們考查過多年來香港的大學教育回報率。圖102顯示1985至2014年按性別劃分的大學畢業生教育回報率⁸⁷。回報率自1997年起維持在23-27%，以國際標準而言屬於相當高的教育回報率。新增的移民不太可能會對此回報率造成任何顯著的負面影響。

86 Blau & Mackie (2016), pp 4-5

87 數據由王于漸教授慷慨提供。回報率乃根據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的數據，以明瑟收入方程估算得出。

圖102：1985年至2014年按性別劃分的大學畢業生教育回報率



資料來源：王于漸教授的推算

透過分析大學教育溢價，我們可從另一角度分析新移民對本地大學生的影響。大學教育溢價的定義是大學畢業生的平均收入相對中學畢業生的平均收入的比例，按各人口普查年份進入勞動市場的群組劃分。**表11**顯示於1991年，根據人口普查數據，在1986-90年期間進入勞動市場的大學畢業生平均比中學畢業生的收入高2.3倍。在1991年的普查年份，此群組的大學及中學畢業生已有1-5年工作經驗。至1996年，同樣具1-5年工作經驗的新勞動人口（即於1991-1995年進入勞動市場的群組），他們的大學教育溢價輕微下調至2.17。1990年大學開始擴大大學學位的收生人數，令大學畢業生的人數激增，或對新畢業生的大學教育溢價構成負面影響⁸⁸。然而，大學教育溢價在1996年後再次上升，2011年已升至2.41。總括而言，剛投身社會而經驗尚淺的大學畢業生的大學教育溢價仍屬穩定。雖然溢價於九十年代因大學畢業人數大幅增加而下調，但隨後再次上升。若我們追蹤同一年代入職的畢業生群組的收入走勢，隨着他們獲得更多工作經驗，大學畢業生相對中學畢業生的收入優勢就更為明顯。1996年對大學畢業生來說算是相對差的一年，當年於1991-1995年進入勞動市場的大學畢業生較同期入職的中學畢業生的收入僅高2.17倍；但到2011年，他們比同期進入勞動市場、有16-20年工作經驗的中學畢業生多賺3.42倍。兩者的收入差距顯著，並逐漸擴大，故此不難明白為何中學畢業生會力爭升讀大學的機會。香港的勞動人口有114萬人具專上教育程度，即使輸入額外數千名擁有大學資歷及不同工作經驗年期的移民人士，也不會對本地的大學教育溢價帶來顯著的負面影響。

88 1997年回歸前，香港政府為填補因回歸前的海外移民潮而流失的高學歷人口，大幅增加大學本科學位收生的名額，由原本佔適齡人口組別的7%增至18%。結果導致大學入學率增加超過110%，直至1996年才趨於穩定。

表11：1991年至2011年大學畢業生相對中學畢業生的平均收入比例

進入勞動市場年份	1991	1996	2001	2006	2011
2006-10	-	-	-	-	2.41
2001-05	-	-	-	2.20	3.13
1996-00	-	-	2.26	2.68	3.42
1991-95	-	2.17	2.70	2.72	3.47
1986-90	2.30	2.65	3.01	2.75	3.33

資料來源：計算自1991年至2011年的人口普查及中期人口統計數據

6.12.2 建議對社會福利、房屋及基建的影響

另一個考量是增加輸入移民對社會福利的影響。由於大多數額外新增的移民都受過大學教育，部份亦具工作經驗，想必他們也有積蓄，所以這批移民與單程證持有人不同，應該不會對社會福利制度造成負荷。

這批新增移民可能會增加對私人樓宇的需求，而非公屋。視乎新移民的家庭大小，對私人樓宇的新增需求可能是每年數千個單位。政府長遠房屋策略的供應目標可作修改，以容納未來預期的需求。政府應就訂立的新增輸入移民人數，及早規劃相應的額外房屋及基建，例如運輸、教育及醫療設施。新增輸入移民的數量可按額外設施的興建進度在數年內逐步增加，而毋須急切地達到目標人數，畢竟人口老化是漫長的過程。值得提出的是，興建額外設施以應付新增移民的需求是可行的，因為未來三十年的人口增長速度將會低於過去數十年的增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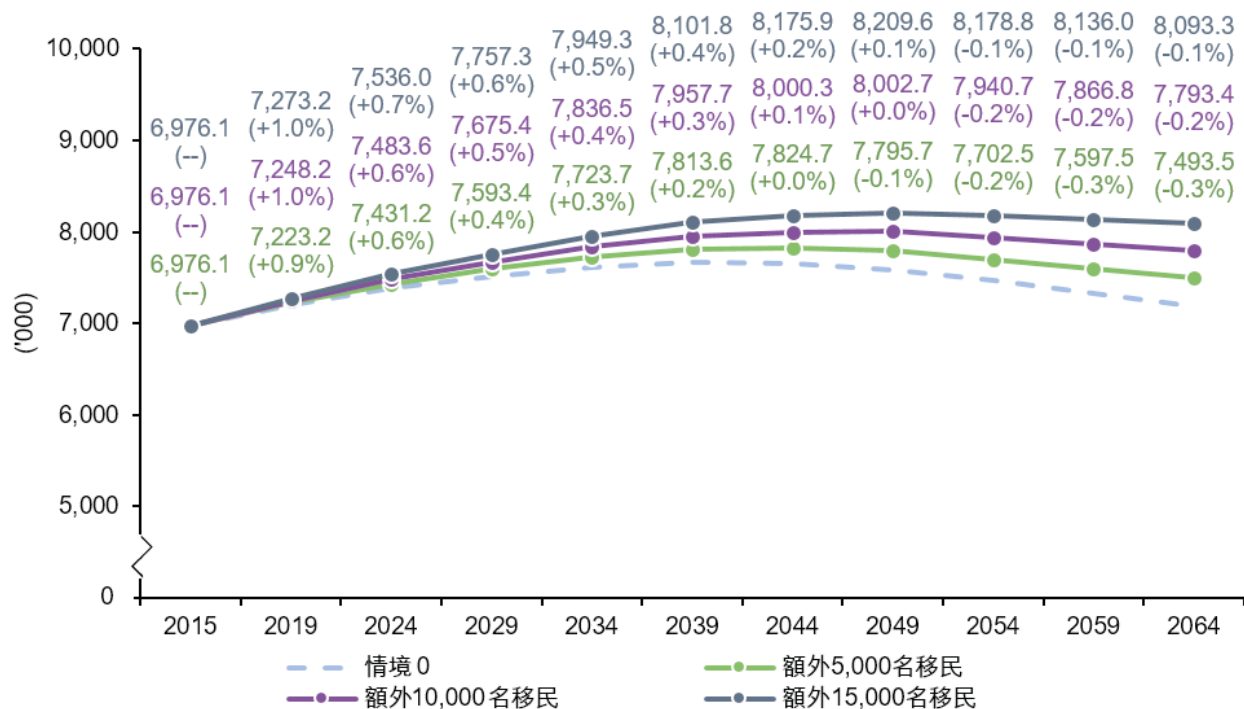
由王于漸教授及曾維謙所撰寫的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報告《重塑公共房策 力建土地儲備》已詳細分析了房地產市場及土地等議題，故本報告不再加以討論。

6.13 情境3：增加5,000，10,000 或 15,000 名移民

假設新增的5,000，10,000 或 15,000 名移民人士大多數為青年（例如10% 為1-19歲，60%為20-34歲，20%為 35-49歲，及10%為50-59歲），而且性別分配平均，圖103至圖108模擬了情境3的總人口及勞動人口數量、年齡分布及總撫養比率的走勢。在這情境下，若每年額外輸入15,000名移民，總人口將溫和增長，並在810萬穩定下來，而勞動人口則會維持在約360萬。若每年額外輸入的移民數目為5,000或10,000，整體人口及勞動人口的萎縮將不能避免。

長者佔總人口的比例會保持在約34-35%，比政府統計處基準推算(情境0) 的35.7% 略有好轉。至2064年，總撫養比率將會是771-803 (取決於新增移民數目)，較基準情境推算的882為佳，但仍然遜於2015年的387。除非能持續有大批的年輕新移民湧入，否則人口老化只能被紓緩，而非逆轉。不過，保持整體人口及勞動人口的數目仍然重要，因其對長遠經濟增長有正面影響。情境3下新增移民數目及其對人口的模擬影響只用作示範。政府應因應房屋及基礎設施的承載能力，訂定一個合適的數目。

圖103：在情境3下，2015年至2064年的總人口推算（撇除外籍家庭傭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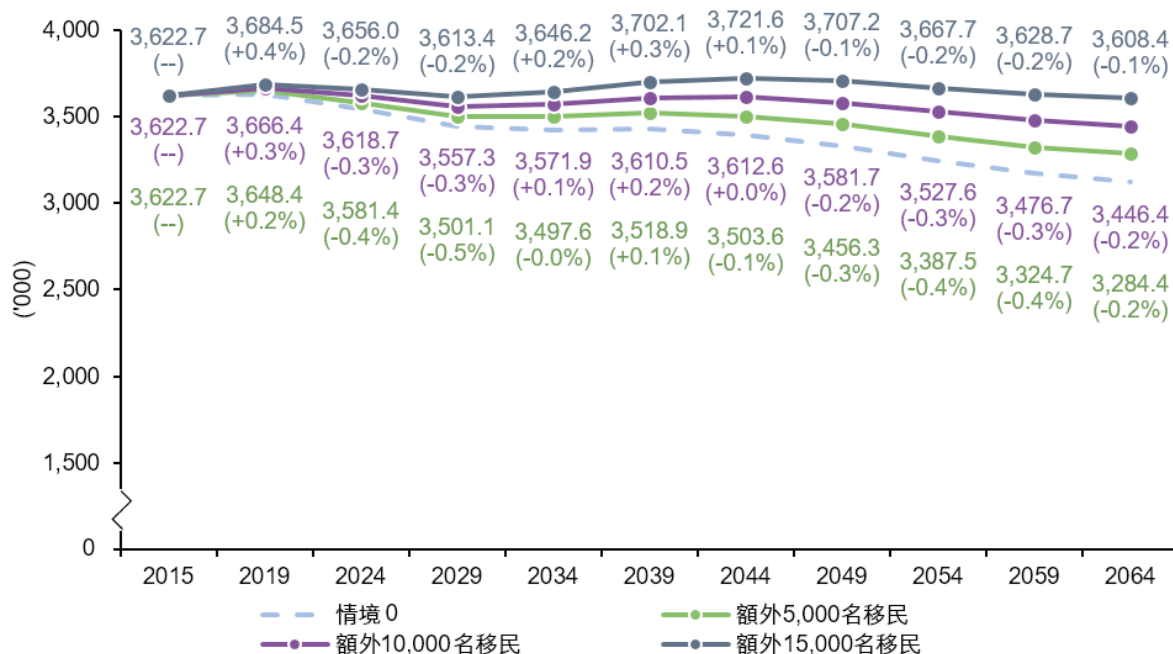


註：虛線代表情境0的基準走勢。

括號內的數字是自前一個時間點的年度增長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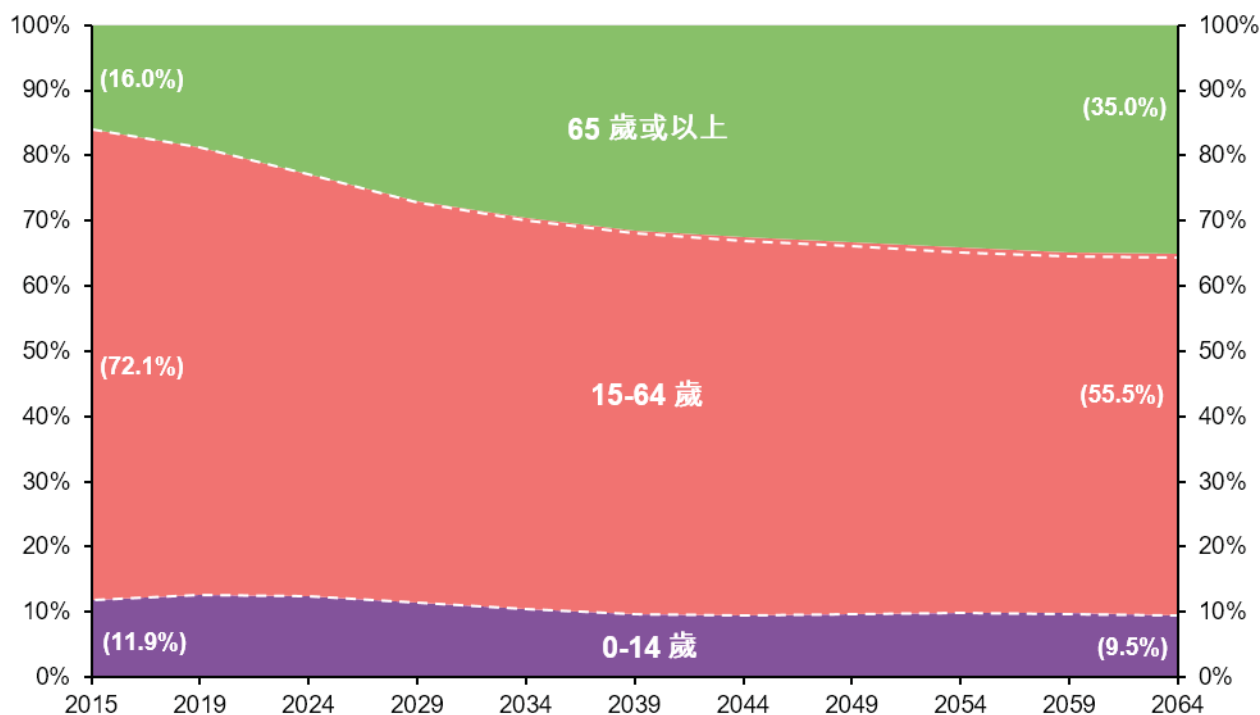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團結香港基金

圖104：在情境3下，2015年至2064年的勞動人口推算（撇除外籍家庭傭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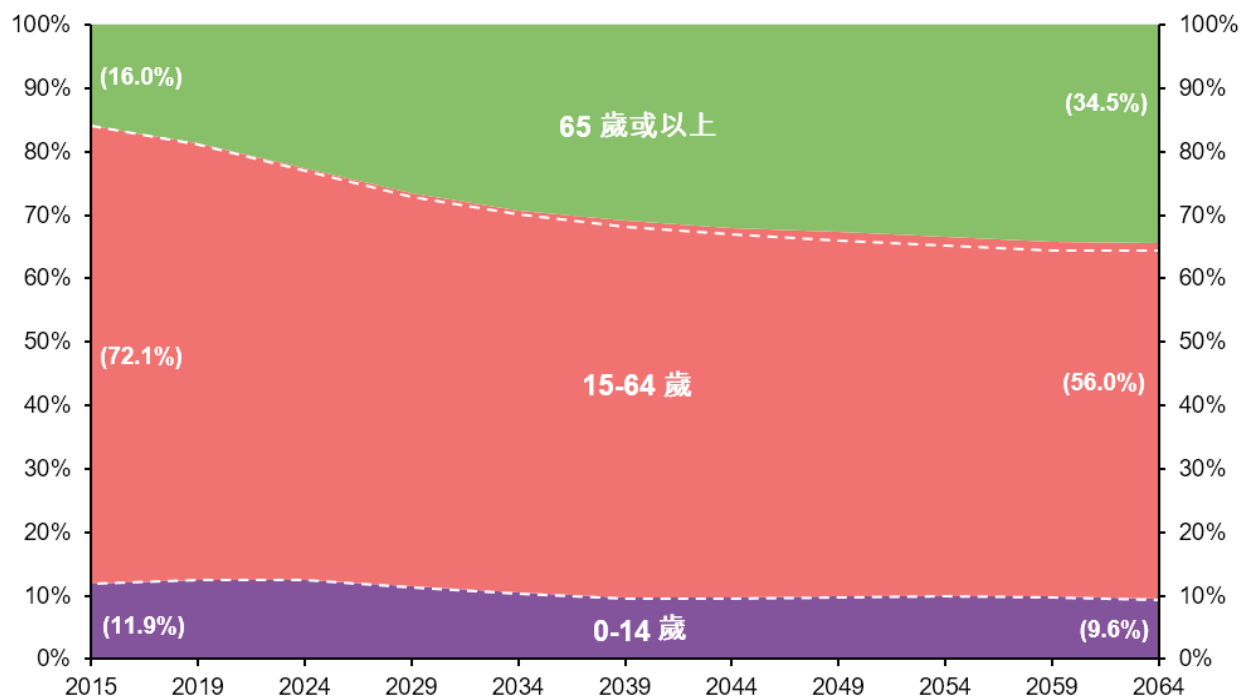
註：虛線代表情境0的基準走勢。
括號內的數字是自前一個時間點的年度增長率。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團結香港基金

圖105：在情境3（額外5,000名移民）下，2015年至2064年的人口年齡分布推算（撇除外籍家庭傭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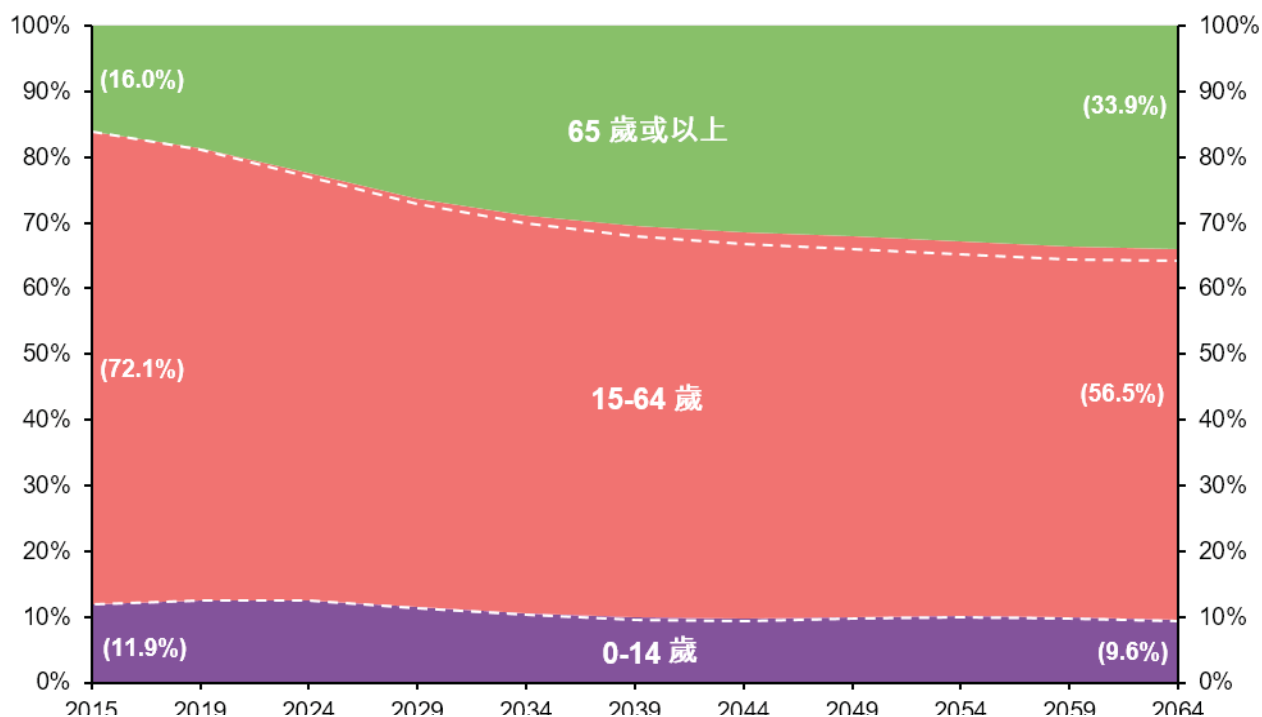
註：虛線代表情境0的基準走勢。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團結香港基金

圖106：在情境3(額外10,000名移民)下，2015年至2064年的人口年齡分布推算(撇除外籍家庭傭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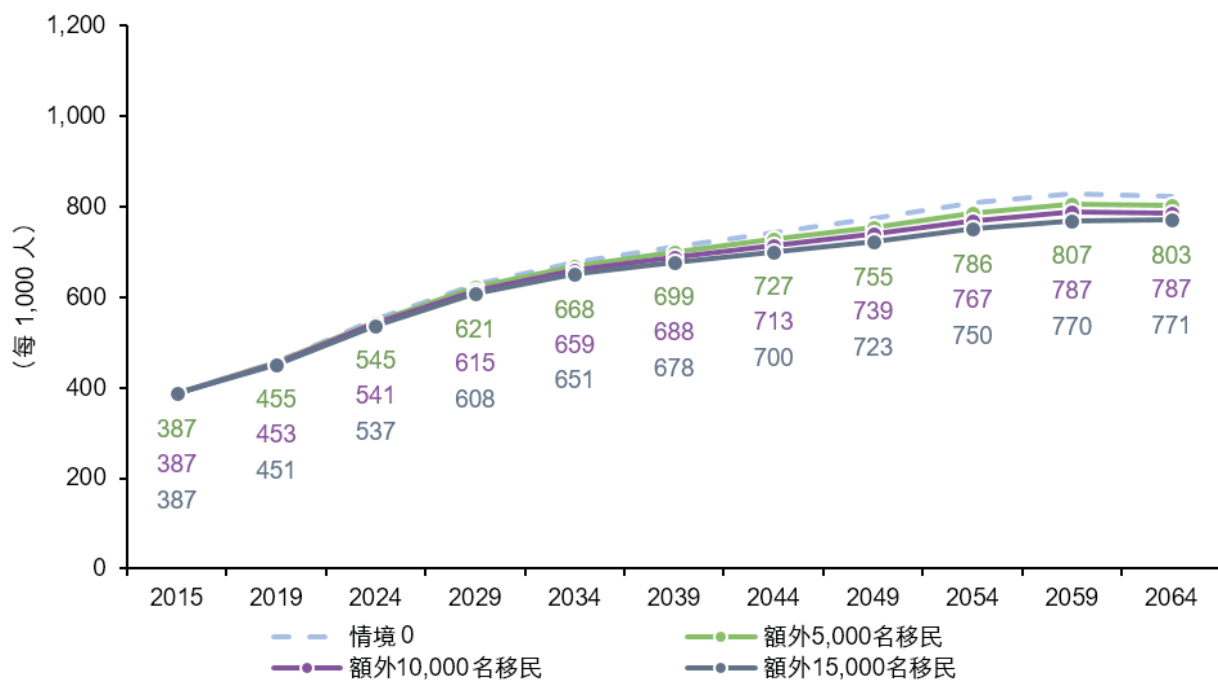
註：虛線代表情境0的基準走勢。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團結香港基金

圖107：在情境3(額外15,000名移民)下，2015年至2064年的人口年齡分布推算(撇除外籍家庭傭工)



註：虛線代表情境0的基準走勢。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團結香港基金

圖108：在情境3下，2015年至2064年的總撫養比率推算(撇除外籍家庭傭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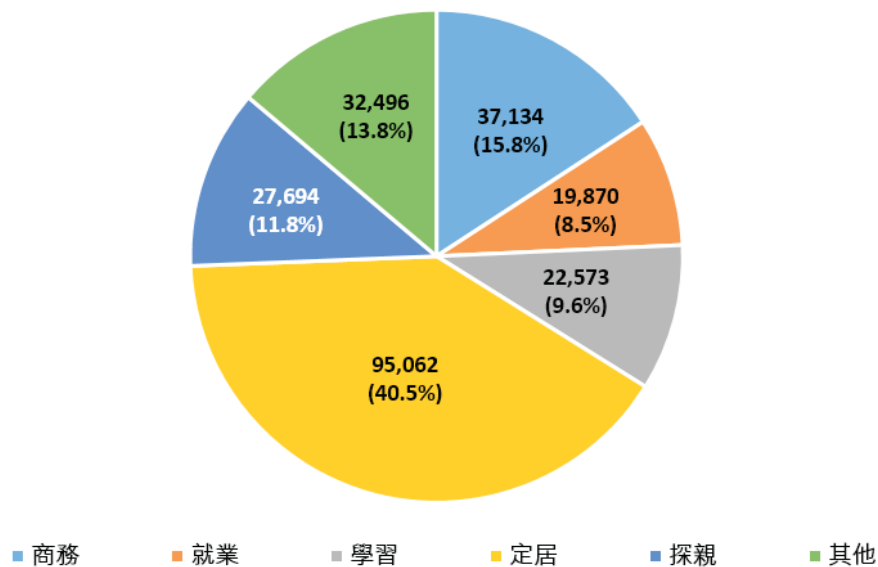
註:虛線代表情境0的基準走勢。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團結香港基金

6.14 中港兩地人流

一個關於香港和內地的人流研究必須包含有關香港居民流入內地的分析，才可稱得上完整。根據2010年內地人口普查，約有234,800名香港居民於普查期間身在內地。按他們前往內地的原因分類，最多是港人返回內地定居（約95,100人），佔總人數的40.5%。其次是商務訪客（15.8%），及探親的人士（11.8%）（見圖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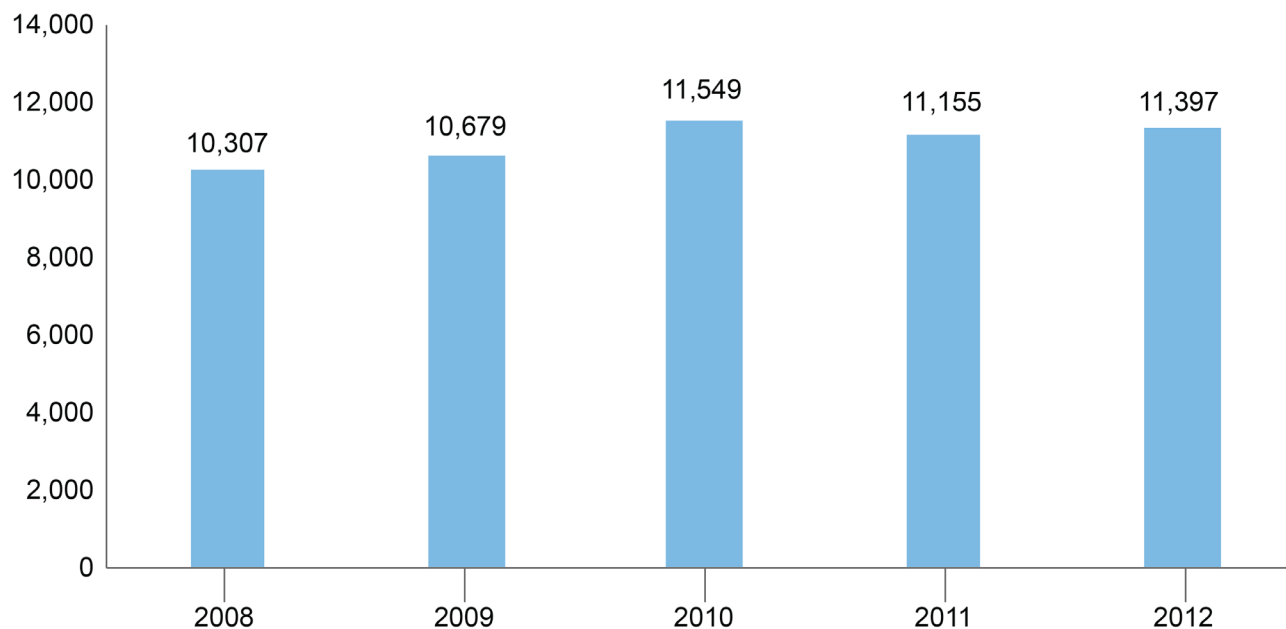
圖109：2010年按前往內地的原因劃分的居於內地的香港居民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0年，有多達22,600名香港居民到內地接受不同年期的教育。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備有關於香港居民在內地大學及研究院進修的更詳細數據，從圖110可以看到2012年的人數約為11,400人，而同年內地生持學生簽證來港入讀大學的只不過是16,400名。考慮到兩地教育制度的規模有龐大差別，選擇離港到內地留學的香港居民人數可謂相當多。內地的大學已逐漸成為香港中學畢業生在升讀本地大學以外的一個可行兼具吸引力的另類選擇。

圖110：2008年至2012年在中國內地就讀大學及研究院的香港居民數目



資料來源：中國教育統計年鑒

在2010年有約19,900名香港居民在內地受僱。未來的趨勢將會如何？香港特區政府曾多次鼓勵香港年青人北上把握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所帶來的機遇。近期智經研究中心就香港年輕一代對往內地就業的態度委託一大學機構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頗具啟發性⁸⁹。該研究在2014年8月至9月進行（佔領中環運動的一個月前），集中訪問18-29歲、沒有內地受僱經驗的年青人，採集了1,001個成功樣本。研究發現有33%的受訪者願意或非常願意到內地進行受僱工作，反之有65%的受訪者不願意或非常不願意於內地受僱。願意（包括非常願意）受僱於內地的受訪者中，最主要的考量為內地的經濟前景，其次是內地的生活質素及個人能力。他們對內地的經濟環境的評估包括：具較佳的經濟前景及就業機會、經濟重心向內地遷移、以及優厚的薪酬福利。不願意（包括非常不願意）北上進行受僱工作的受訪者中，他們的主要考量是內地的生活質素，然後是內地的政治前景及個人家庭因素。他們對內地的法治缺乏信心，不太習慣內地的生活，並對中國的生活質素及社區持負面的觀感。

89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電話調查研究室「香港青年往內地就業態度意見調查」，2015年1月。

這批受訪的年輕一代對內地與香港的經濟及政治前景的看法甚具啟示性。只有稍稍超過一半（50.3%）的年青人對香港的經濟前景感到樂觀或非常樂觀，但有多達76.1%的受訪者對內地經濟前景感到樂觀。在政治前景方面，有非常高比例（86.5%）的受訪者對香港的政治前景不樂觀，比憂慮內地政治前景的71.2%還要多。總括而言，香港年青人認為內地的經濟前景比香港的樂觀。在政治前景方面，相比中港兩地，他們對香港的政治前景較為悲觀。基於他們對兩地政治經濟前景所作的不同評估，決定他們是否願意往內地受僱的因素，相信是他們對內地生活質素及家庭原因上的差異。隨着內地主要城市的生活質素及水平日漸改善，兩地的差異收窄令觀感有所改變，將來或會有更大的誘因讓香港人移往內地就業。

總的來說，當香港與內地的生活水平差距減少，預計更多人會穿梭兩地就學、就業及從事商業活動，從而增加兩地人口的雙向流動。

6.15 總結：移民、人口及兩地人口流動

本報告透過幾個不同的情境，推算低生育率和平均壽命延長對人口增長及結構的影響，並點出了移民的重要性。每年額外增加不同數目移民來港的建議只是一個提案。我們可以調整此配額及分階段增加人數，演算不同的情境，以達致所需的人口結構結果。對很多有興趣移民來港的內地人士，香港在教育、工作及生活各方面仍是具吸引力的地方。我們應該把握機會，挑選適合香港的新移民。隨着內地發展，生活質素及水平得以改善，我們或會有更多的香港居民移往內地留學、工作及生活。

現今在不少國家，如美國、英國及歐盟等，增加移民（尤其是失控的移民流入）都是一個敏感的議題。我們需要就增加輸入移民的數量，考慮社會接收移民的能力。只要小心管理輸入的移民人數，並在更多年輕人口的優勢以及人口老化和勞動力萎縮的壓力之間，權衡利弊，應該就能夠釋除部份港人對增加輸入內地移民的疑慮。

香港社會應該緊記內地移民，尤其是他們的第二代，多年來與本地社會的融合還算不錯。報告建議額外增加的移民都是擁有高教育水平及經濟活躍的年輕一代。他們理應比早期的內地新移民更能融入香港以及本地的勞動市場，也導致較少社會福利和公屋的負擔。在這方面，我們慶幸背靠內地腹地，讓香港能從中挑選所需的額外移民。其他歐洲國家則相對沒那麼幸運，他們要面對不可控制的移民湧入，以及不同文化、宗教和語言背景的難民所造成的困擾。

人力資本及技術變得充裕，將能促進嶄新的經濟活動及相關職位的發展。人口與移民人數的持續增長，會增加對交通基建、醫院及房屋的需求，但由於未來人口的增速預計會大幅減慢，香港應較過去更有能力應付這些社會需求。

7. 結語

7. 結語

跟其他成功的細小經濟體一樣，香港能達至高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的水平，是依靠其出口商品及服務的外來需求，以彌補細小經濟體的內需不足，此成就來自香港對國際貿易及投資的完全開放。香港長久以來一直採取自由港政策，即使在世貿成立前，當國際貿易體制仍被出口配額和關稅主宰，香港已單方面開放港口作自由貿易，並設零關稅入口，保持資金自由出入。

作為一個細小開放經濟體，香港必須與鄰近地區及貿易夥伴培養友好合作、互惠共贏的經濟關係。雖然香港僅屬小城市，但在紡織品出口配額及產品來源地限制等問題上，曾與歐洲多國及美國（當時為其最大的貿易夥伴）靈活熟練地進行緊密的貿易談判。香港一直能與其貿易夥伴維持友好的關係。

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改變了香港的命運。香港找到自己的新角色，成為中國發展及現代化的火車頭，不再需要與區內其他低成本生產商競爭，或在貿易投資上偏靠歐洲及美國。香港將製造業北移到珠江三角洲，其外發加工及轉口貿易獲得空前成功，以至於在九十年代初的巔峰時期，香港單單一個小城市已經佔了中國整個國家幾乎一半的商品貿易量。香港也為發展中的內地經濟引入外來直接投資以及管理專才。今日，中國有超過70%的外來直接投資來自香港。

作為中國經濟的火車頭，香港率先抓緊中國開放的機會，在過程中分享其迅速發展的經濟成果。這亦使香港與中國的經濟聯繫更為緊密，遠超之前香港與美國的經濟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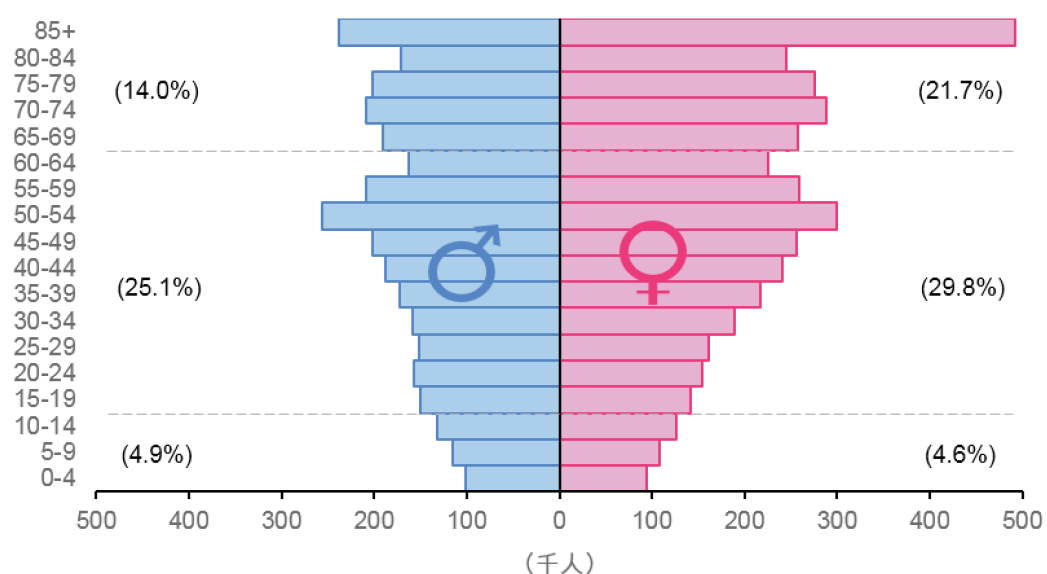
1997年，兩地的關係進入一個新時代。「一國兩制」奠定了香港與內地的憲制以至經濟關係。當香港在適應其於國家的新地位時，中國經濟崛起迅速，教人意外。自2001年中國內地加入世貿起，其外貿蓬勃發展，中國與不同國家及地區組織簽定多項自由貿易協議，香港不再是中國的最大經濟夥伴。中國貨櫃碼頭如雨後春筍在內地沿岸接踵出現，中國不需再依賴香港作為轉口及貨運中心。除了進口大量海外資金作發展，中國內地亦開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並迅速躍升為全球第二大資本輸出國。隨著中國崛起，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香港對中國的重要性漸漸減少，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不及內地的3%。港人必須了解時代在改變，正如以前經歷一樣，我們要靈活變通，銳意革新，進入新時代。

中國的增長正步入一個「新常態」，經濟進入重新平衡及調整結構的階段，強調內需，進一步開放資本帳，並邁向人民幣國際化。在這新階段，香港必須重新定位，成為內地的主要服務供應者，以及資本雙向流動的門戶，成為內地與世界之間的通道。內地專業技術人才仍然認為香港是具吸引力的工作及居住地點，香港必須以更有效的方法，輸入更多高技術的內地移民，以增加香港的人力資本，刺激增長，並紓緩人口老化的問題。

雖然香港在製造業及轉口貿易方面漸缺優勢，新機遇卻接踵而來。在不久將來，中國會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香港必須乘著中國騰飛之勢，尋求新的發展機會。過程中香港必須扮演重要的角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某些領域不可或缺的夥伴。只有這樣，香港才能維持與內地相得益彰的經濟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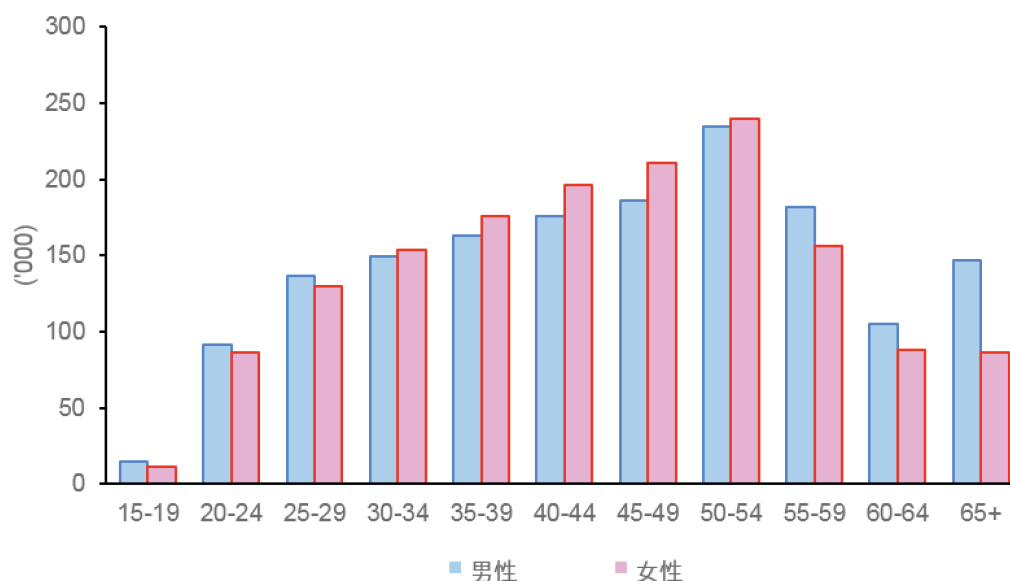
附錄：在各個情境下推算的人口結構

圖A1：2064年在情境0下的人口金字塔推算（撇除外籍家庭傭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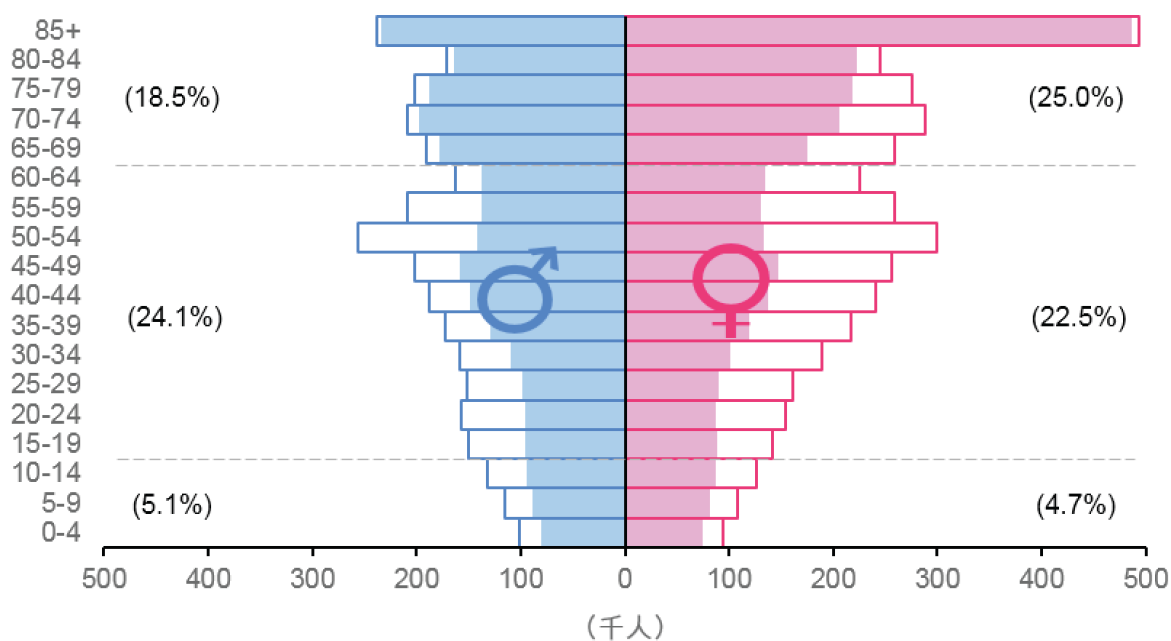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團結香港基金

圖A2：2064年在情境0下按年齡及性別劃分的勞動人口推算（撇除外籍家庭傭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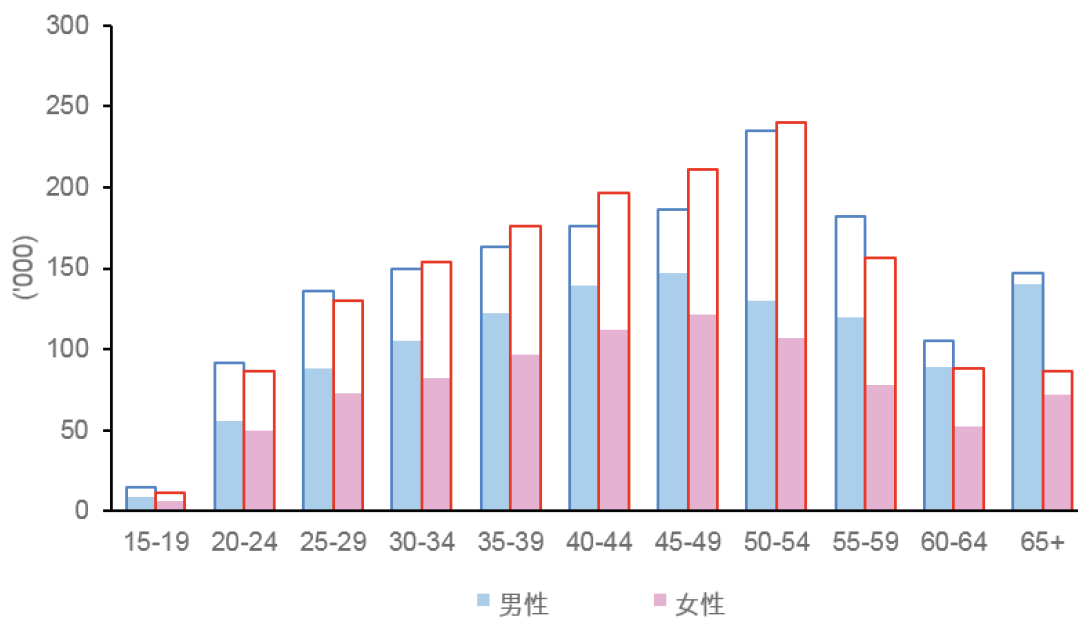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團結香港基金

圖A3：2064年在情境1下的人口金字塔推算（撇除外籍家庭傭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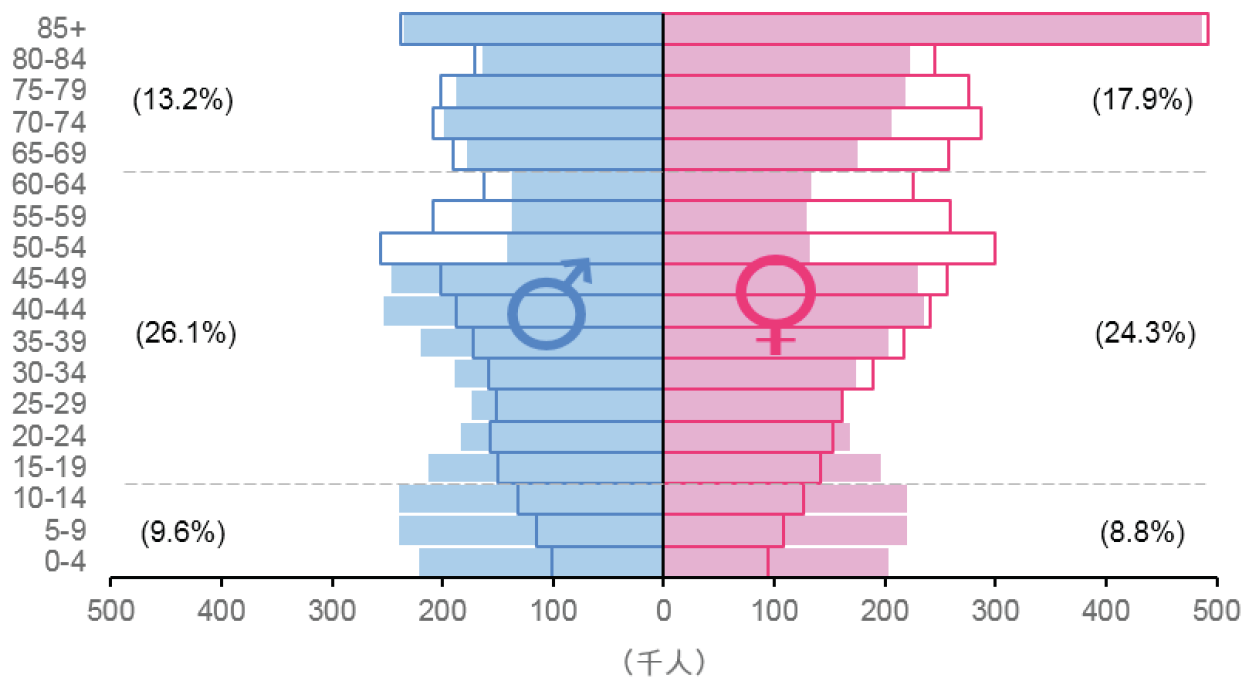
註：棒型邊框代表情境0的基準分佈。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團結香港基金

圖A4：2064年在情境1下按年齡及性別劃分的勞動人口推算（撇除外籍家庭傭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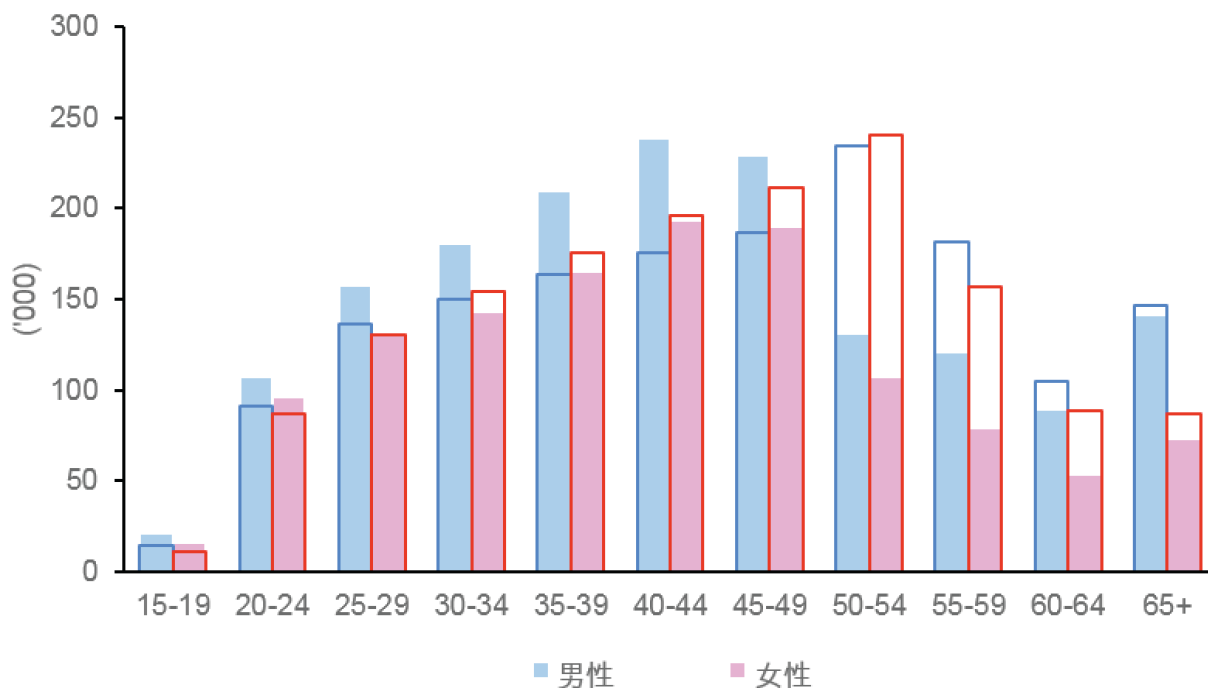
註：棒型邊框代表情境0的基準分佈。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團結香港基金

圖A5：2064年在情境2下的人口金字塔推算（撇除外籍家庭傭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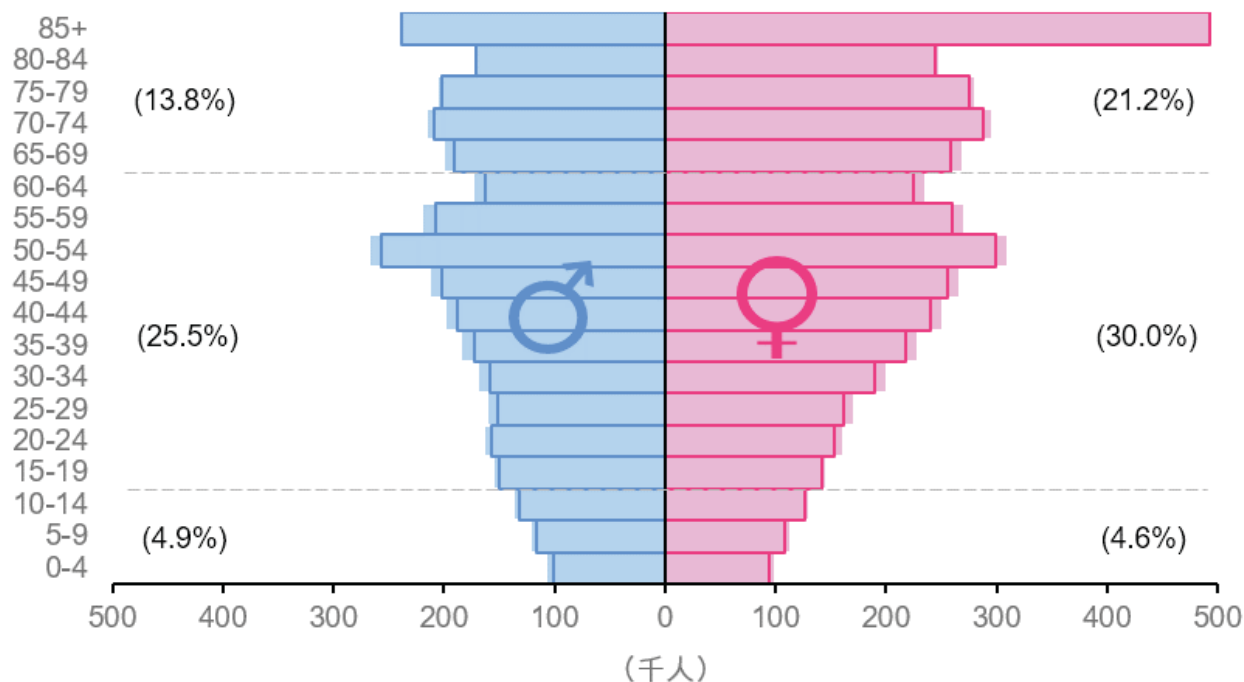
註：棒型邊框代表情境0的基準分佈。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團結香港基金

圖A6：2064年在情境2下按年齡及性別劃分的勞動人口推算（撇除外籍家庭傭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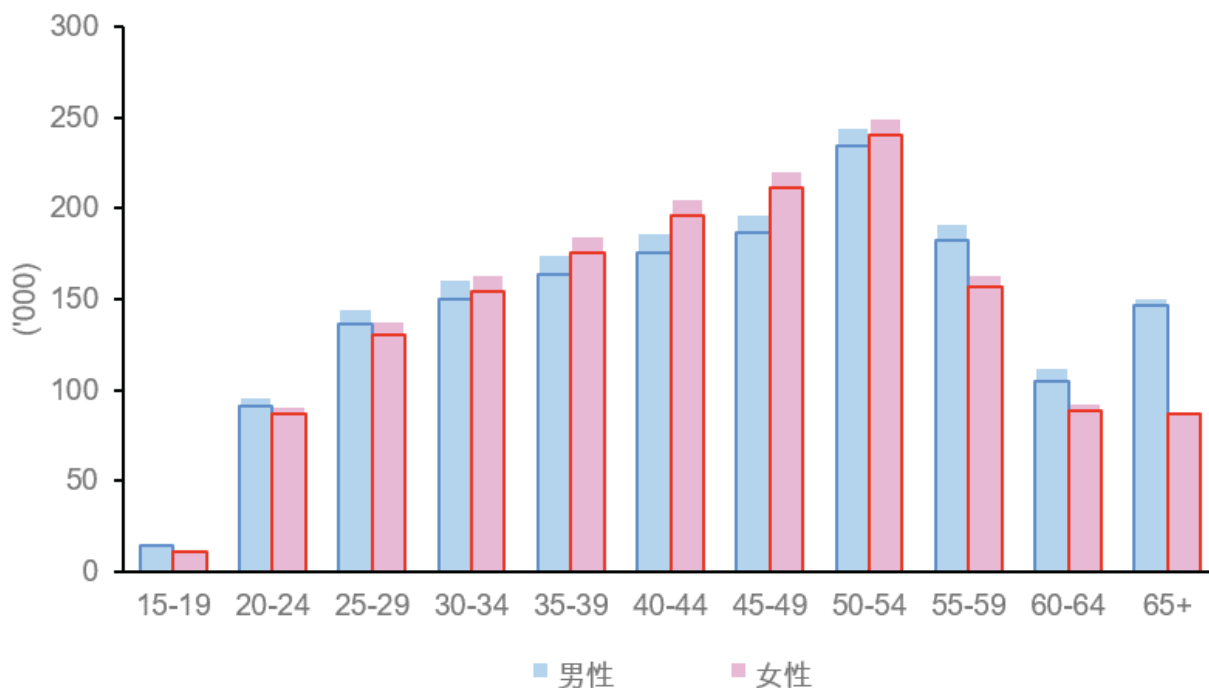
註：棒型邊框代表情境0的基準分佈。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團結香港基金

圖A7：2064年在情境3（額外5,000名移民）下的人口金字塔推算（撇除外籍家庭傭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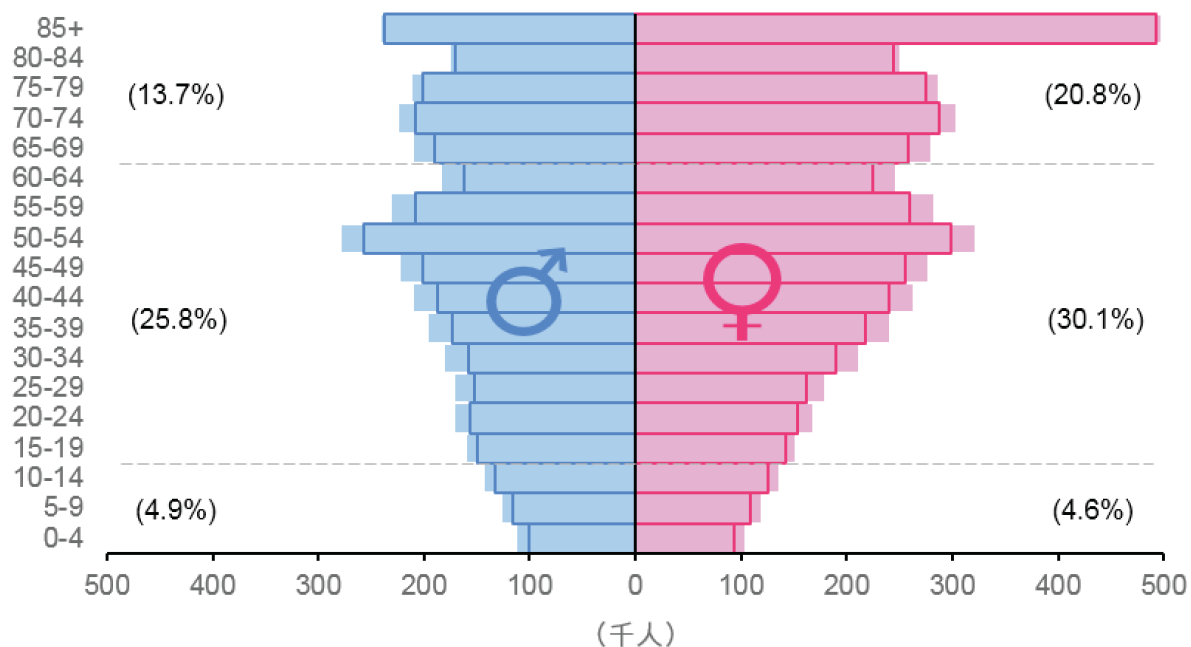
註：棒型邊框代表情境0的基準分佈。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團結香港基金

圖A8：2064年在情境3（額外5,000名移民）下按年齡及性別劃分的勞動人口推算（撇除外籍家庭傭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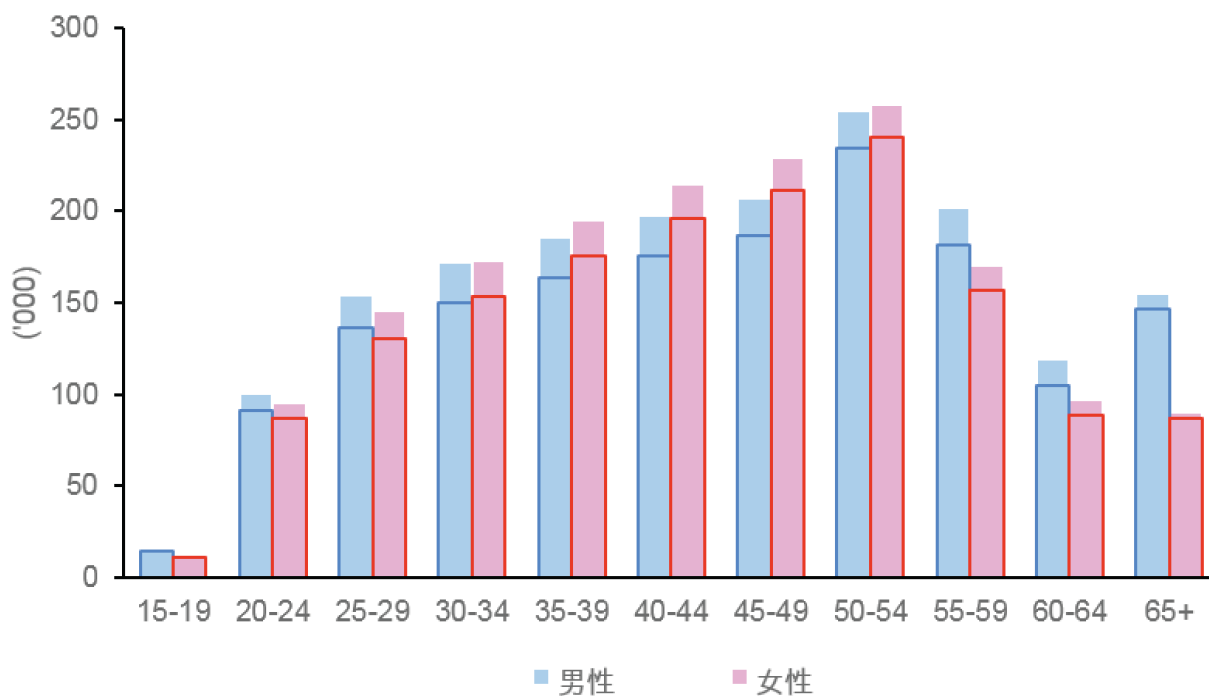
註：棒型邊框代表情境0的基準分佈。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團結香港基金

圖A9：2064年在情境3（額外10,000名移民）下的人口金字塔推算（撇除外籍家庭傭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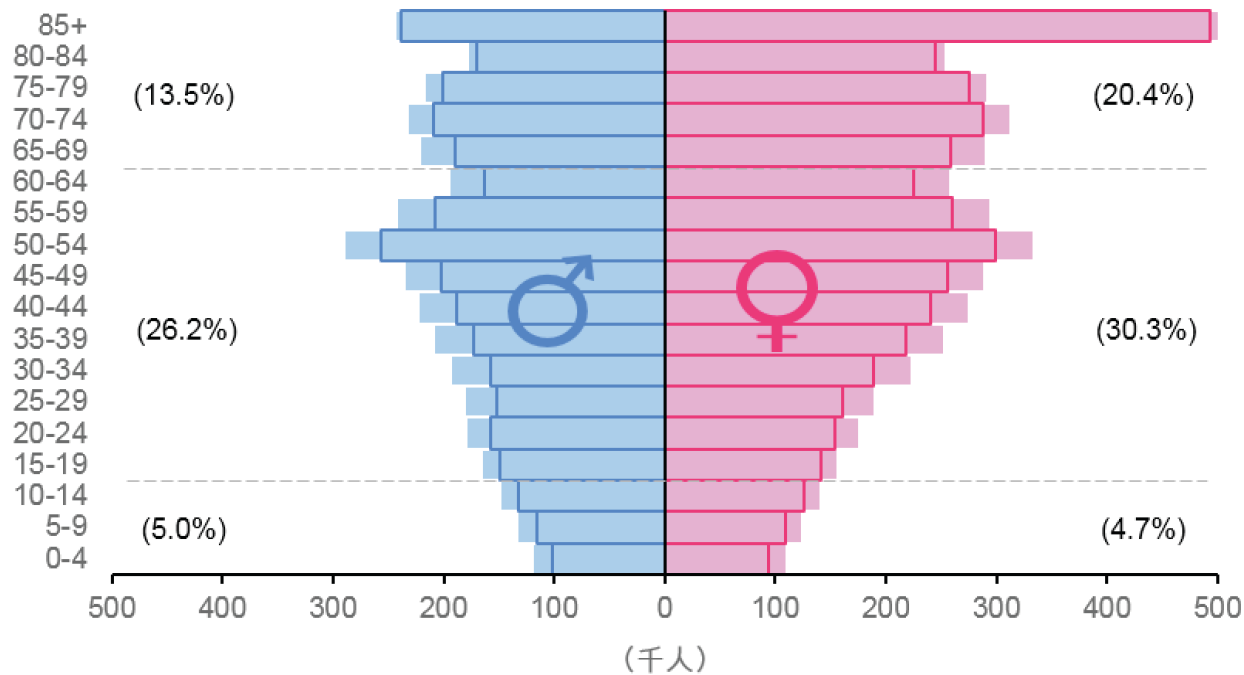
註：棒型邊框代表情境0的基準分佈。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團結香港基金

圖A10：2064年在情境3（額外10,000名移民）下按年齡及性別劃分的勞動人口推算（撇除外籍家庭傭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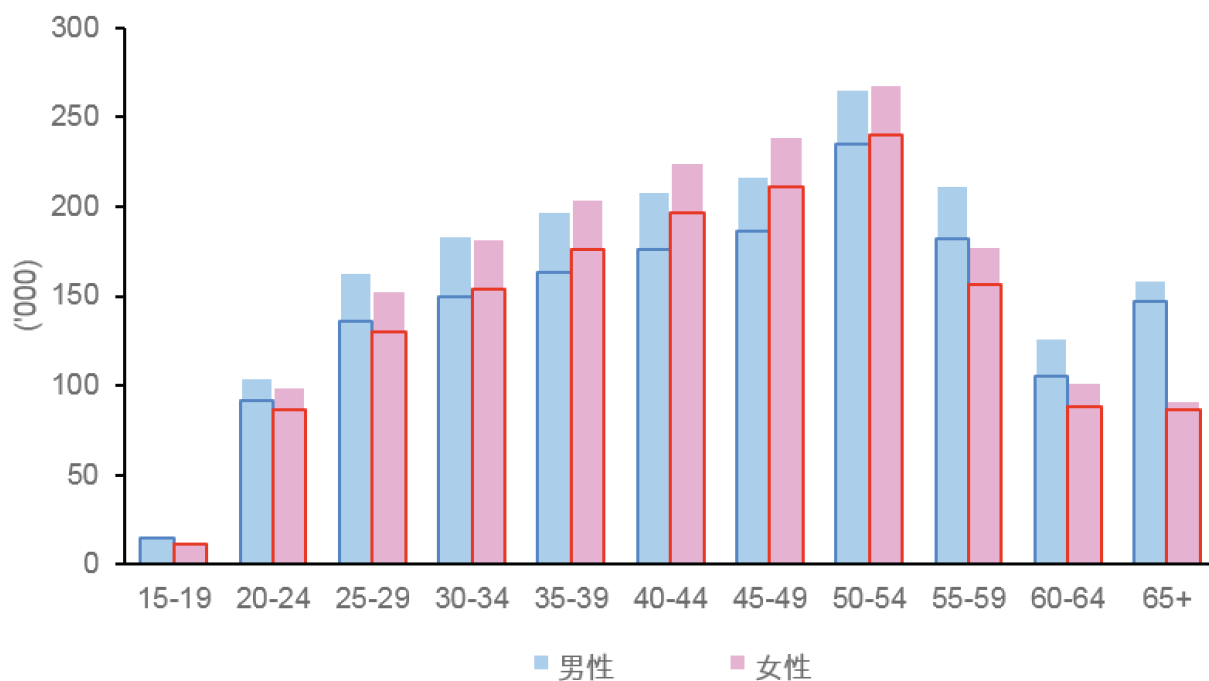
註：棒型邊框代表情境0的基準分佈。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團結香港基金

圖A11：2064年在情境3（額外15,000名移民）下的人口金字塔推算（撇除外籍家庭傭工）



註：棒型邊框代表情境0的基準分佈。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團結香港基金

圖A12：2064年在情境3（額外15,000名移民）下按年齡及性別劃分的勞動人口推算（撇除外籍家庭傭工）



註：棒型邊框代表情境0的基準分佈。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團結香港基金

參考書目及文獻

- Bacon-Shone, J., Lam, K. C. J., & Yip, P. Y. F. (2008). *The Past and Future of the One Way Permit Scheme in the Context of a Population Policy for Hong Kong*. Hong Kong: Bauhinia Research Center.
-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2016) *Triennial Central Bank Survey of foreign exchange and OTC derivatives markets in 2016*.
- Bauer, P., & Riphahn, R. T.. (2007). Heterogeneity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evidence from Switzerland on natives and second-generation immigrant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1), 121-148.
- Blau, F., & Mackie, C.. (Eds.). (2016) *The Economic and Fiscal Consequences of Immigration*,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 Borjas, G. J.. (1985). Assimilation, changes in cohort quality, and the earnings of immigrant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463-489.
- Card, D., DiNardo, J., & Estes, E.. (2000). The more things change: immigrants and the children of immigrants in the 1940s, the 1970s and the 1990s. In Borjas, G. J. ed. *Issues in the Economics of Immigr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227-269.
-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HKSAR. (2015). *Hong Kong Population Projections, 2015-2064*.
-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HKSAR. (2016). *Statistical Digest of the Services Sector*.
- Charles, M. E.. (1997). *A future for small states: Overcoming vulnerability*.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 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2015). *Annual Report on China's Exhibition Industry 2015*.

- Chiswick, B. R. (1978). The effect of Americanization on the earnings of foreign-born men.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7-921.
- Choi, R. (2011). *Offshore RMB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A Look into the Eurocurrency Experience*. Economic Analysis and Business Facilitation Unit,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World Bank Joint Task Force on *Small States*. (2000). *Small States: Meeting Challeng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 Cruise Line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2015). *Asia Cruise Trends 2014 Edition*.
- Dustmann, C., & Theodoropoulos, N.. (2010). Ethnic minority immigrants and their children in Britain. *Oxford Economic Papers*, 62(2), 209-233.
- Eckstein, Z., & Weiss, Y.. (1998). *The Absorption of Highly Skilled Immigrants: Israel, 1990-1995*. Pinhas Sapir Center for Development.
- Einzig, P. (1970). *The Case Against Floating Exchanges*. Springer.
- Entgroup. (2016). China Film Industry Report 2015-2016 (in brief).
- Erumban, A. A., De Vries, K., & Van Ark, B. (2013). *New measures of global growth projection for the conference board global economic outlook 2014*. The Conference Board, 2013.
-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Bureau, HKSAR. (2014).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Long Term Fiscal Planning*.
- He, D., & McCauley, R. N. (2010). *Offshore markets for the domestic currency: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issues*. BIS Working Papers No 320.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2013, July 4). Brisk demand for beauty services in China. Retrieved from <http://hkmb.hktdc.com/en/1X09TM33/hktdc-research/Brisk-demand-for-beauty-services-in-China>
-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2016, April 13).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Industry in Hong Kong. Retrieved from <http://hong-kong-economy-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Hong-Kong-Industry-Profiles/Convention-and-Exhibition-Industry-in-Hong-Kong/hkip/en/1/1X000000/1X0018NP.htm>
-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2015). *ICC Open Markets Index*, 3rd Edition 2015.
- Kindleberger, C.. (1974). *The formation of financial centers: A study in comparative economic history / [by] Charles P. Kindleberger* (Princet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 no. 36). Princeton, N.J.: International Finance Sec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 Kuznets, S.. (1960). *Economic growth of small nations* (pp. 14-32). Palgrave Macmillan UK.
- Lam, K. C.. (1986). Imperfect information, specificity of schooling and rate of return-migration. *Economics Letters*, 21(3), 283-289.
- Lam, K. C., & Liu, P. W.. (1998). *Immigration and the Economy of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Lam, K. C., & Liu, P. W.. (2002). Earnings Divergence of Immigrant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1), 86-104.
- Lam, K. C., & Liu, P. W. (2016)..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al mobility in Hong Kong: are immigrants more mobile than natives?. Working Paper No. 42. Lau Chor Tak Institute of Global Economics and Financ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au, L. J., Shiu, K., & Xiong, Y. Y.. (2016). *Yes, Hong Kong CAN!*. Hong Kong: Our Hong Kong Foundation.
- Legislative Council. (2016). *Joint letter dated 28 January 2016 from eight members of the beauty industry on the launch of the "Beauty Industry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harter"*.
- Mystery Shopping Provider Association. (2016). *Ireland and Guatemala scores high in the Smiling Report 2016*.
-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2016). *China's Economy Realized a Moderate but Stable and Sound Growth in 2015*.
- Nielsen, H. S., Rosholm, M., Smith, N., & Husted, L.. (2003). The school-to-work transition of 2nd generation immigrants in Denmark.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6(4), 755-786.
- Radelet, S., Sachs, J., & Lee, J. W.. (1997). *Economic Growth in Asia*. 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 Research Office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2015). Hong Kong's tourism industry. *Research Brief*. Issue No.6 2014-2015.
- Singapore Government. (2013). *A Sustainable Population for a Dynamic Singapore: Population White Paper*. Singapore: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Talent Division.
- Sung, Y. W., Ng, A. C., Wu, Y., & Yiu, A. W. (2015).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Mainland Tourists for Hong Kong: The Individual Visit Scheme (IVS) and Multiple Entry Individual Visit Endorsements (M-Permit).
- Tomislav, M.. (2014, September 17). *What is Medical Tourism?* Retrieved from <http://www.news-medical.net/health/What-is-Medical-Tourism.aspx>
- Tsui, L. C., Lun, R., & Cheung, E.. (2015). *The Ecosystem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ur Hong Kong Foundation.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13). *World Population Ageing 2013*. ST/ESA/SER.A/348.

Wong, M., & Chan, W. eds. (2013). *Investing in Asian Offshore Currency Markets: The Shift from Dollars to Renminbi*. Springer.

Wong, R., & Tsang, W.. (2016). *Rethinking Our Public Housing Policy, Striving to Build Up a Land Bank*. Hong Kong: Our Hong Kong Foundation.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2016). *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16*.

World Value Survey (2014). Hong Kong 2013. Retrieved from <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DocumentationWV6.jsp>

Parasuraman, A., Zeithaml, V., & Berry, L.. (2002). SERVQUAL: a multiple-item scale for measuring consumer perceptions of service quality. *Retailing: critical concepts*, 64(1), 140.

內地美容市場發展前景廣闊. (2013). Retrieved from <http://www.hketa.com.hk/news?id=164>

鳴謝

我們衷心感謝團結香港基金創會主席董建華先生的鼓勵和支持。

我們亦希望向團結香港基金總幹事鄭李錦芬女士、副總幹事兼公共政策部主管黃元山先生以及本基金的研究委員會成員，包括：

亞洲金融集團及亞洲保險總裁陳智思先生
路訊通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及非執行董事陳祖澤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前校長張信剛教授；
最低工資委員會主席翟紹唐資深大律師；
香港黃金五十創辦人林奮強先生；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女士；
香港珠海學院校監李焯芬教授；
南豐集團董事長及行政總裁梁錦松先生；
香港大學秦蘭鳳基金（肝膽胰外科）講座教授及香港大學外科學系系主任盧寵茂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雷鼎鳴教授；
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及黃乾亨黃英豪政治經濟學教授王于漸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協理副校長及社會學系教授王淑英教授；
會德豐控股（私人）有限公司主席吳光正先生；
香港金融管理局首任總裁任志剛先生；及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院長楊永強教授，

對本研究的參與及貢獻表達謝意。

此外，作者衷心感謝劉遵義教授的精闢見解及意見、黃元山先生的建議，以及王于漸教授和曾維謙先生提供數據。本研究得以圓滿完成，亦有賴多位本研究範疇的專家、學者、專業人士以及持份者，給予眾多寶貴意見，作者謹此致謝。作者亦感激香港特區政府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和政府統計處幫忙提供統計數據。

最後，我們感謝蘇悅華、曾聖宇、溫韞，甄定軒、姚永皓及姚卓榮對本研究作出的努力。

關於團結香港基金

團結香港基金是於2014年9月在香港註冊的非牟利組織。其宗旨是集合本港、內地和國際精英，以香港長遠和整體利益為出發點，為香港政府、公共服務機構及廣大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公共政策研究、分析和建議，務求促進香港社會和諧、經濟繁榮及可持續發展。

免責聲明

本報告僅供說明，並非對任何行業或經濟每項重大事實的全面分析。事實陳述乃從可靠來源獲得，但團結香港基金或任何聯屬公司不會就其完備性或準確性作出聲明。本報告中所有估計、意見及建議構成截至本報告日期的判斷。團結香港基金不會就使用本報告或其內容而產生的任何直接或由此招致的損失承擔任何責任。本報告不應與任何合約或承諾予以依賴。

如英文版本與中文版本有任何不一致或不清晰之處，請以英文版本為準。



OUR HONG KONG
FOUNDATION
團結香港基金



政策研究院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88號
南豐大廈19樓

二零一六年十月

ourhkfoundation.org.hk